

肯尼迪传

(美) 奈杰尔·汉密尔顿

× × × 出版社

第一章 波士顿发迹

波士顿发迹

波士顿创建于 1630 年，最初是英国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海岸的一块移民聚居地。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是美国一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波士顿市民从 1773 年波士顿茶叶党事件到 1775 年 3 月英军的被迫撤离，始终走在美国革命的最前列。从此，敌军再也没有踏进这个港口，它成了海军的摇篮。保存于此的在 1812 年对英海战中屡建奇功的木质战舰“老铁甲舰”，是海军最重要的精神象征，同时波士顿也是美国最初的 13 个联邦州之一——马萨诸塞州的首府。

不过到后来，随着美国 19 世纪的飞速发展，波士顿的显著地位日渐下降。在美国内战期间，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海上贸易陷于瘫痪。当时，铁路的兴建和重工业的发展使西部和南部以及交通发达的内陆城市，如匹兹堡、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等大受裨益，波士顿日渐衰落了。虽然从欧洲来的大量移民使波士顿的人口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随着去美洲内陆开拓者的日益增多，波士顿最终落后了，昔日一度靠兴旺的波士顿港为生的码头搬运工和小商贩们，今日仅能勉强糊口。

波士顿港一半以上的移民是爱尔兰后裔，他们的父辈或祖

肯尼迪传

辈，都是 19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著名的土豆饥荒时逃难来到这里的。他们以群居、多愁善感和吃苦耐劳而著称，总的来说没有出过大企业家。因此，波士顿的财富多半是靠无形收入——早期殖民者及其后裔和商人所榨取的利润而聚集起来的，其中被称为波士顿上流的索顿斯托尔家族、洛威尔家族、卡伯特家族、亚当斯家族和其他家族投资所得的利润也包括在其中。这些名门望族、商业世家和纺织业家族的后裔居住在比肯希尔和巴克贝，曾经有过显赫一时的辉煌，他们中自独立以来至少出过三位总统。他们虔信宗教，具有办教育的激情，不仅创建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和学院，而且还陆续在波士顿地区创办了近 50 所大学。

由于诸多的学院、大学、名门世家以及漂亮的住宅和大金融机构的装点，波士顿自然而然显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在查尔斯·布尔芬奇建筑高雅的古典风格中可见一斑。另外，绝大多数的爱尔兰移民的亲情，在波士顿民主党内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与当地民主党采取神秘的选举系统——以给市府效劳和恩惠换取选票的地方选区“老板”制——亦有很大关系。

1887 年，波士顿有史以来选出了第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市长。他在任期间，增设了许多新的职务，包括城市服务部门的管理人、邮递员、垃圾承包处理商和城市食品供应商等等。由于 19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天主教徒加强了对波士顿民主党机构的控制，凭着其数量优势，他们能够把市长职位一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达数十年之久。

正是这一政治机遇——爱尔兰移民争取地方自治而不懈拼搏的环境下，一位波士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深受感染，他就是

年轻的约翰·F·菲茨杰拉德。

19世纪40年代，菲茨杰拉德的父亲初来美国时身无分文。他从一个沿街叫卖的卑贱的小贩白手起家，逐渐发家致富，后来与一个爱尔兰血统的姑娘结了婚，并且与人合伙，在北区汉诺威大街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很不错。菲茨杰拉德夫妇生育能力很强，在婚后20年中共生了12个孩子。杂货店在晚上兼做私人酒店，酒客们通宵达旦地闲聊，回忆绿宝石岛（爱尔兰的别称——译者注）和爱尔兰的小酒店，高唱催人泪下的民谣和起义歌曲，谈论一些热门政治话题，菲茨杰拉德家的孩子们就是在爱尔兰酒客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长大的。

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生于1863年2月11日，在家中排行第四，后来成了家族的明星。他从埃利奥特文法学校毕业后，顺利就读于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在学校他不仅是“学校体育运动的骨干”，而且还是足球队队长，棒球队教练，并且兼任校刊《拉丁学校纪事》体育版的编辑。毕业时，他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数学、物理和历史等成绩全为优秀，后来他得以进入南区市立耶稣会波士顿学院深造。据当时的《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这位年轻人试图以最自由的方式接受教育，因为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以班级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后，菲茨杰拉德顺利进入哈佛医学院学习——这对一个从来就上不起学的爱尔兰移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件非常重大的事，然而他的医生梦还没做完就破灭了。

步入政坛

约翰·菲茨杰拉德的母亲在他 16 岁时便去世了。1885 年，离哈佛医学院第一年期末考试还有两周，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菲茨杰拉德后来回忆道，“入学才 9 个月，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托马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留下了几千元钱，可家中却有 9 个孤儿。显然，“不可能有足够的钱供我上学了。”

一位北区食品杂货商——北区选区老板、政治领导人，提出资助菲茨杰拉德念完医科专业，不过，当时菲茨杰拉德已无心学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叙述说，“我意识到支撑起家是我的责任。每天我要给弟弟妹妹们洗脸，甚至要给婴儿穿衣服。”年仅 21 岁的菲茨杰拉德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我认为，我的生活属于我的兄弟们，不上医学院可以干得更好。所以我决定放弃学业，到海关去参加考试，以便能找一份工作。我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因而被分派当了一名办事员，干了三年多。”回到家里，“我还能做家务。我们没有姐妹，只得雇了个女管家。”

其实菲茨杰拉德对政治的喜欢胜过对医学的喜欢。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精力充沛，好活动，好交际。21 岁时，他创建了帆船俱乐部——海神协会。遇到租借波士顿音乐厅兴办舞会经费不够的问题时，他竟“毫不担心”。《波士顿邮报》后来记载道：“他促使商人在他的节目单上做宣传，想方设法让政界人士买他的门票，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措施：在举办舞会的那天晚上，在客人们都到了之后，他切断一切水源，迫使客人们不得不买汽水喝。所有这些对筹备俱乐部的经费起了很

大的作用。”

“最初，”《波士顿邮报》报道说，“菲茨杰拉德筹备天主教社交聚会，并在波士顿第一次开办阳光舞会。他是爱尔兰人社交圈里的佼佼者。男孩子向他请教衣着，女孩子向他询求社交礼仪。”

然而，在不知疲倦的社交者假面具背后的菲茨杰拉德，担任了北区选区老板马修·基尼的政治秘书。在基尼的私人办公室里，这位年轻的海关办事员学会了波士顿爱尔兰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和论调。那是在书上无法得到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更改的。一幕政治丑剧往往就在葬礼前的守灵夜悄然上演。少数人操纵公职人员的提名，用不正当手段选举作弊——利用“重复投票者”多次投票，利用投机家增加投票，甚至买下人来顶替已死选民去投票。如果一个民主党人在本党地方选举中，把票投给了“不恰当的”候选人，他就会丧失在选区老板那里的一切优待，法庭代理、困难时的家庭福利救济、结婚帮助，甚至连洗礼、丧葬安排以及在市府的临时工作或固定工作都会泡汤。因而，几乎没有一个移民敢冒此风险。

另一家报纸在报道中称约翰·F·菲茨杰拉德是一位“集胆识、活力、才能和毅力于一身的人”。他经营着一支打遍美国无敌手的马球队，他博览群书，活动广泛，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1889年9月，他终于与从小青梅竹马的乔西·汉农结婚，婚后仍继续抚养留在家里的7个兄弟。由于各种额外的收入和在各种政治活动中的得利，他的手头十分宽裕。在1891年，也就是他28岁那年，“我终于进驻了火灾和人寿保险业。”他回忆说，这使他登上了政治选举的最低阶梯——波士顿市会议员的宝座。

肯尼迪传

成为了年薪 300 美元的波士顿市会议员，反而大大激发了菲茨杰拉德的政治野心。1892 年，他打算竞选州参议员。他的选区老板对他并没有把握。菲茨杰拉德后来评价说，“基尼属保守派，非常守旧。”因为在基尼看来，只要党的干部会议被其他两个地方选区老板所操纵，菲茨杰拉德就不可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

1892 年 2 月，马修·基尼突然去世，菲茨杰拉德继任选区老板。“由于第七和第八选区联手，第六选区被挤掉了”，他后来回忆自己初次成为选区老板时说，“第六选区被排斥在民主党选举外长达 10 年之久，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州参议院或州众议院议员。据我所知，北区的民众非常激愤，他们希望有人出来奋战一场为选民们讨回公道，于是我便迎刃而上，迎接了战斗。”

人们都以为他输定了，但是在最后一刻小菲齐得知，由于另两个选区老板之间的内讧，“我将会获得提名”。在这个爱尔兰裔民主党把持的地区，党的提名就意味着当选。果然，在 1892 年 11 月 8 日，这个波士顿北区的“神童”——29 岁的菲茨杰拉德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

次年 1 月 4 日，他在比肯希尔的布尔芬奇州议会大厦宣布就职。在那里，他首次会见了他的民主党同僚——东波士顿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J·肯尼迪。

国会议员菲茨杰拉德的经历

帕特·肯尼迪出生于 1858 年，是第二选区的选区老板。他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留着一对浓密的八字胡，但是缺乏演说

才能或者说缺乏教育。帕特·肯尼迪的父亲也是一个一贫如洗的逃难者，他在帕特出生不久后在波士顿死于霍乱。帕特没有兄弟，只有姐妹，他们都在东波士顿——当时被称为诺德尔岛——帮母亲打点小杂货店。

帕特 14 岁时辍学当了一名码头装卸工，后来又在几家小酒店里打过杂，在 22 岁时，他决定开办一家自己的酒店。26 岁时他已经拥有两家酒店，无形中被卷入波士顿爱尔兰人政治角斗场，5 次当选马萨诸塞州众议员。1887 年，他与富有的老处女玛丽·希基结婚，次年生下了儿子约瑟夫，1891 年 6 月，出生仅三个月的次子弗朗西斯不幸夭折，同年 11 月他成功地当选为州参议员，但是只与 J·菲茨杰拉德共事了一届。1893 年底，帕特以要集中精力经营他的酒店为由退出了州参议会。

事实上，1892 年夏天帕特·肯尼迪被提名为波士顿的民主党代表，前往芝加哥参加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大会，他非常喜欢幕后操纵波士顿的民主党。作为党的所谓的策略委员会的成员，他负责为民主党争取利益。该委员会在南波士顿昆西饭店每周开一次会。1894 年的一次秘密会议差点毁了 J·菲茨杰拉德的政前途，那年秋天菲茨杰拉德刚刚获得州参议员继任选举的胜利，就宣布自己希望成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并直接向策略委员会的提名人，当时的国会议员约瑟夫·奥尼尔下了挑战书。

对帕特·肯尼迪来说，这无疑是宣战。他于是下指示：凡是在 9 月党的干部会议上给菲茨杰拉德投的票一律作废，即全部作废。据菲茨杰拉德后来回忆：“我在南区没有获胜的希望，因为在那里党的组织与奥尼尔关系密切。我坦率地对他们说：‘我在第七选区还有什么机会？我能得到投给我的选票？’他

肯尼迪传

们也清楚地告诉我，他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南区投奥尼尔的票。”

关键在于不择手段。“这是该选区过去政治活动的真实写照，”菲茨杰拉德解释说，“意识到我的努力将会浪费在南区后，我便毅然带着我的追随者去了东波士顿和查尔斯敦等地……我在本市各地到处都有大批与我关系不错的年轻伙伴。当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是北区海神协会的会长，与社会组织关系十分密切，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当时，我的体育才能使我能结识到全市的年轻人。我进入市议会一年后就赢得了州参议员竞选的胜利，这一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1894年整个夏季，小菲齐组织了众多的集会游说和群众大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公众演说，这些不仅吸引了大批听众，而且通过有预谋地向公众提出有关竞选运动的问题，抓住了竞选的主动权。奥尼尔从华盛顿返回来准备应对菲茨杰拉德日见势强的挑战时，他已被迫处于守势。令策略委员会惊愕的是，菲茨杰拉德竟向奥尼尔议员发出了与他进行公开辩论的挑战，并且租下了许多可能辩论要用到的礼堂，还在波士顿各报上公开发表了邀请奥尼尔出席辩论的信。

奥尼尔不但拒绝了他的邀请，而且在“本选区 900 名早已对菲茨杰拉德意志坚定的绅士”面前为自己的政绩竭力辩护，大势公开国会议员同僚发来的称赞电报。他甚至打出美国总统的招牌，宣称自己与现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关系如何如何密切。对于别人指责他未能使查尔斯敦海军造船厂在停办了 25 年后重新开工一事，他十分坦然地说：“他们说我没能使海军造船厂重新开工。是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尝试了 4 年，不也是一事无成吗？如果说我不能把海军造船厂

重新办起来，那么换了别人肯定也办不到。”

会议主席说：“他们都确信，人们将会发现在党的干部会计票时，该区居民是站在奥尼尔先生这样一位可敬可信的政府人士一边的。”但是，据《波士顿环球报》后来评论：“公众普遍认为，这位国会议员太卖弄他的荣誉了。”相反，竞选似乎恰恰激发了菲茨杰拉德让人意想不到的战斗精神和雄辩力。尽管他在南波士顿的得票将不得不全部作废，因为这些选票根本就不会被计算在内，但菲茨杰拉德巧妙地把战斗扩展到他对手的其他势力范围，如帕特里克·肯尼迪的东波士顿第二选区。那里，兰心大厅 2000 名听众等待听他演讲。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一开始就指责奥尼尔无故缺席，不敢在选民面前公开辩论，然后向听众控诉他任国会议员期间无所作为，最后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在市议会和州参议会中我的政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俱在，你们尽可以去查阅有关的记录。我始终为民主而奋斗，一贯忠于党，这一点我远比他强。

不要为任何无关大体的问题所蒙蔽！战斗只是奥尼尔先生和我之间的事。如果你们认为奥尼尔先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那就投奥尼尔先生一票吧，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给党内的年轻人一次机会的话，那就请支持我吧！

第二天晚上，菲茨杰拉德在一支由“举着旗帜打着鼓的、大约 500 名坚定支持者组成的火炬队伍的簇拥下”，在全波士顿马不停蹄地进行巡回演说。无论他在哪里演说，“听众中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的人数颇多，这一点深受关注”。报纸报道说，

肯尼迪传

“在第十二选区，大厅挤满了人，许多妇女不得不站在走廊里听”，大家“非常热情”，因为在前一天晚上奥尼尔刚“坚定地”向民主党市民发表过演说的查尔斯敦，人们情绪激昂。“军械库大厅附近的列克星敦大街被围得水泄不通。烟火和红光照亮了街道的每个角落。当菲茨杰拉德的车子在门口停下时，这位州参议员几乎是被听众用手托着上讲台的。”

在波士顿国会议员初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始料不及的情况，而且这是首次采用“澳大利亚式的”秘密投票方式，使用统一的选票。肯尼迪所在的第二选区进行的选举投票“可谓盛况空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与以往相比，投票的人最多，人们的情绪近乎狂热……4点钟军械库的大门全部打开，接着大批群众朝着围栏涌去，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房间里便挤满了群众……人群那么拥挤，骚动那么严重，投票已经无法按程序进行下去，于是投票监督人鲁滨逊先生命令警察清理现场。”

帕特·肯尼迪原打算像前几次那样，在选票上做手脚，不幸的是这回未能得逞。当人们发现没有人为菲茨杰拉德监督投票而仅有 P·J·肯尼迪的亲信在场时，“有人立即给城里打了电话”，于是城里用马车送去一个菲茨杰拉德的人。“他刚进入马弗里克广场，就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他立即前往选区办公室，与参议员 P·J·肯尼迪交涉。”经过争论，肯尼迪勉强答应让 3 个菲茨杰拉德的人监票。《波士顿环球报》报道：

整个晚上都非常拥挤。很多人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才等到投票，两个候选人的许多亲信在现场强拉选民投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候选人的票。

肯尼迪传

参议员 P·J·肯尼迪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他的候选人奥尼尔拉选票。他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所能依靠的力量，实际上，他早已被他一直所依靠的人抛弃，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他还是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到凌晨 6 点钟，马弗里克街被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不可能接近选区办公室，幸亏有了一中队警察的力量，街道才恢复了畅通。似乎第六选区的选民都来到了这里为菲茨杰拉德呐喊助威，并且非常卖力。他们在选区办公室 200 码周围的灯下举行临时选民集会，刚过 8 点钟，当参议员菲茨杰拉德第二次在选民面前露面时，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在投票站里，监督人都宣布说这是“历年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投票”。然而，要确保在随后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候选人只有赢得 163 名代表中的 82 名的支持才能成功。午夜渐至，气氛更加紧张，就连“以往从不参加党的干部会议的人”都出来投下难能可贵的一票，双方票数相差无几。

支持奥尼尔的代表在 12 个选区中有 6 个选区获胜，菲茨杰拉德的人在剩下的 6 个选区中没有一个获选。不过，在剩下的 6 个选区，即市内的主要选区，情形则恰恰相反。使帕特·肯尼迪失望的是，在他管辖的东波士顿选区，只有他自己被选为支持奥尼尔的代表，其余的 18 名全都支持菲茨杰拉德。《波士顿环球报》编辑室成了新闻聚集中心。报社大楼外面，一大清早，双方的支持者就聚集起来看选举结果。这些结果从选区办公室被拿出来后，就被钉在布告牌上。“人们欢呼，抽烟，高谈阔论，说到口干舌燥时，就去斯库尔街、华盛顿街或附近

肯尼迪传

马路的酒吧去润一下干渴的舌头。”当肯尼迪的东波士顿选区的选举结果公布出来时，奥尼尔的支持者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天《波士顿环球报》的大标题是《面对菲茨杰拉德的大铲斗，老党员一筹莫展》，文章评论说：

他们宠信的人的失败对于东波士顿的老党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那些多年来操纵政坛的人来说。

他们简直是莫名奇妙。当宣布除参议员 P·J·肯尼迪之外，所有的代表都支持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已经赢得了该岛的选举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这是一个彻底的惨重的失败……他们对选举结果百般挑剔，但是仍无法掩饰失望的情绪。这是一个完全出乎预料的结果……他们料想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是他们对党的这位年轻人发起的进攻毫无准备，等到他们觉察出对方策略之精、攻击力之强时，大势已去矣。

凌晨时，菲茨杰拉德的得票总数已接近关键的 82 票，当波士顿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多诺万同帕特·肯尼迪——“奥尼尔两名最得力的助手”——亲自去《波士顿环球报》看布告牌时，他们遭到了人们的嘲笑。到上午 6 点，明显的是菲茨杰拉德已经获胜——最终结果是 87 名代表支持菲茨杰拉德，剩下的 76 名支持奥尼尔。

“昨天，政客之间谈论的话题不外乎是奥尼尔争取获得重新提名的失败。”《波士顿环球报》后来评论道，“这不仅为民主党人，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猜测的题材。像奥尼尔先生这样

的人，竟然败在参议员菲茨杰拉德这样年轻的政治家手上，这一周前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民主党的领导们，至今还没有从星期五晚上的惊骇中清醒过来。”

当时，本市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菲茨杰拉德居住的北方广场附近一条不出名的小街，围着这位年轻参议员的住所，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用菲茨杰拉德的话说：

房子不够大，无法容纳我的朋友们。我的邻居们结伴而来向我表示祝贺。北区的人更是欣喜若狂，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深深地爱着那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它相比。那些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并看着我长大的人，觉得我应该获此荣耀。

无疑，菲茨杰拉德竞选的成败给波士顿政界开创了一种年轻、热情、态度鲜明、以民众参与为宗旨的竞选风格。“一大批青年人都站在我这边，”初选结果出来后他慷慨激昂地说，“当我宣布我要竞选时，他们都来支持我，我的竞选胜利应当归功于他们……全选区的人民都支持我，我期盼着胜利当选。在国会里，我将努力成为奥尼尔先生的一位优秀继任者。”

1894年11月6日，约翰·F·菲茨杰拉德以2000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共和党的竞争对手，获选美国众议院议员，第二年，他按惯例到华盛顿就职，成为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惊世之举

有关菲茨杰拉德如何做国会议员，后来又如何当上了波士顿市长之事，无需在此赘言。值得一提的是小菲齐惊人的精力和别具一格的竞选风格，因为那是多年后他的外孙将会继承的。不过，他与帕特里克·J·肯尼迪之间的斗争也因此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肯尼迪对菲茨杰拉德打败奥尼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虽然菲茨杰拉德在 1894、1896 和 1898 年，连续三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但肯尼迪终于在 1900 年击垮了他。“当我父亲在国会第三届任期结束，期待再次得到提名和当选时，”菲茨杰拉德的大女儿罗丝许多年后回忆说，“党内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暗中鼓吹重新结盟。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P·J·肯尼迪和其他委员会的成员，联手阻止选民对我父亲的再次提名。”

事实上，1900 年 10 月中旬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引发了一场长达 5 天的激烈战斗，最后结果是肯尼迪获胜。菲茨杰拉德在野长达 5 年。1905 年他东山再起，再次向策略委员会发起挑战，这次是竞选波士顿市长一职，“让波士顿变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成了他的口号。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之战中，他的惊世之举是他只身对抗选区老板制。11 月 8 日，《波士顿环球报》在《直接呼吁人民》的文章里，记载了菲茨杰拉德如下一段富有战斗性的言词：

这场战斗要彻底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意于在

波士顿谋取公职的人，是否都必须得到选区老板的支持？我一宣布参选，就有各方好心的人士来劝我，说我不会成功，因为选区各组织的主席以及选区的代表和市委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一致反对我……我相信，波士顿人民多数是诚实正义的。我相信，他们不需要没有自我的公职人员。我已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我现在斗胆越过老板的视线向波士顿人民呼吁，我知道，你们将证明只有我是可以信赖的。

菲茨杰拉德的助手们给“到会的每一个人发了一面小国旗”。随着他演说情绪的逐渐激昂，发国旗的目的也逐渐清晰起来。他说：

如果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那么普选权还有什么用？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除了老板给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几乎没有其它任何权利。

如果我们允许老板随心所欲，那么我们就是放弃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权利。

朋友们，我们面临的问题源于波士顿政府，我坚信，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感到骄傲，它是人为的事业。我为自己身为人民的朋友感到自豪；我为反对我们的敌人感到自豪。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们套用林肯的话说：让我们相信，权利就是力量，本着这种信念，让我们最终敢于按我们的权利尽我们的职责。

菲茨杰拉德在一片欢呼声和“打倒独裁者”的歌声中结束

肯尼迪传

了讲话。他扭转了不利局面，使策略委员会转胜为败。这次他再度采用 1894 年的竞选战术，以哀兵姿态主动出击，取得市民的信任与拥戴。他不光是嘴说，他的理论是：民主社会里的政治选举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进行选举说明民主在起作用，被选举人的命运应由民众决定。因此举行火炬游行、创建行军乐队、在街上挂旗以及其他方法，都可用来唤起公众的觉悟。“在波士顿，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竞选场面！”他的传记作家 J·H·卡特勒记述道：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呼呼拉拉快速行驶的汽车队伍——在波士顿历史上，动用一支不用马拉的车队来为市长竞选助威，这还是第一次。约翰·菲茨杰拉德和他的 6 个支持者坐着一辆大红车，在队伍的前头行进，后面跟着两辆速记员和记者坐的车。几个由“迪尔罗丝”和杰斐逊俱乐部成员组成的队伍，乘电车从一个选区跟随到另一个选区，只为向这位“小将军”致意，他们狂热地欢呼着，要用肩膀把他抬进举行集会的礼堂。他们被记者们称之为小拿破仑的“轻骑兵”，他们总是等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扮演着合唱队的角色。“轻骑兵”们熟悉进场和退场的路线，并且都被训练得能对信号做出迅速反应……引人注目的是，菲茨杰拉德俨然像个棒球联合总会会长，亮出许多“招牌”：他在全城张贴标语，标语印着他的肖像，周围是一些醒目的口号“只有人民，而不是党魁能做出裁决”。“让波士顿变得更大、更好、更繁华。”菲茨杰拉德甚至把原本是玩笑性的绰号“拿破仑”拿来为己所用，还特地把它贴在小徽章和标语上。当地雪茄烟制造商制造出“拿破

仑”雪茄烟时，谁都知道上面所指的小伍长是谁。如果说科林斯市长是波士顿最最受崇敬的政治家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无疑是最富个性的政治家。当他高喊“我将与党的领导核心、老板和市政当局进行单独地较量”时，一下子便激起了群众狂热的欣喜。

帕特·肯尼迪选身体欠佳的街区委员会委员内德·多诺万当策略委员会提名的市长候选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判断。这使菲茨杰拉德不仅能够严厉指责多诺万缺乏可以令人信任的事实，而且能够戳穿肯尼迪、洛马斯尼与波士顿“党的领导核心”暗中支持多诺万的阴谋。1905年11月14日菲茨杰拉德在群众大会上向广大听众高声喊道：“你们知道羔羊和狼的寓言吗？请注意，你们将在候选人爱德华·多诺万的羊毛下面，发现老板洛马斯尼先生的狼皮和爪子！”

菲茨杰拉德用一个接一个问题引出他的对手过去的政绩，并且以“我已经控告你们把票投给……”为开头，以“你们为什么不反驳，你们为什么不回答，多诺万先生？”作结尾，问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公共问题”。他揭露肯尼迪和当权者们强迫内德·多诺万无论如何要挺住；他们威胁他，如果不挺住，就罢免他年薪7500美元的街区负责人的职务；他批评说，少数几个人聚集在密室里，“在5万民主党党员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就为他们挑选好了市长候选人，我们不禁要擦擦我们的眼睛怀疑地问：“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坚定地维护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让每一个说自己是民主党党员的人都去参加星期四的初选，不论以前是否参加过，大家都有权利前去阻止在我们美丽的城市里实行

肯尼迪传

丑恶的专制政治。”

1905 年争取民主党候选人被提名的竞选，令波士顿人永生难忘，至少帕特·肯尼迪永远不会忘记。11 月 16 日早上 6 点，投票在波士顿各初选区开展。这是“该市有史以来争夺最激烈的一次”。人们是那样的情绪激昂，斗争程度的激烈从赌金的数目即可看出。“最低限度的估计，赌注总数达 10 万美元之多，”《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候选人花在竞选上的经费。“然而打赌终归是打赌，即便是用钱打赌。”

“在第二选区，组织领导人帕特里克·J·肯尼迪和约瑟夫·K·康里阁下及其他的一些人，正为多诺万争取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每一票而努力。”《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肯尼迪向一名记者透露，自己已经从“忠实的选民”那里得到了近 2000 个“保证”，“多诺万先生将会以相当多数在该选区获胜”。

事实上，最使肯尼迪头痛的是，在该市 25 个选区中，菲茨杰拉德至少在 21 个选区中都赢得了多数票。《波士顿环球报》第二天报道说：“在民主党初选中，约翰·F·菲茨杰拉德，打败了党组织领导人提名的候选人爱德华·J·多诺万，赢得了民主党市长职位提名的巨大胜利。”

菲茨杰拉德以 28228 票对多诺万的 24301 票的胜利，在新闻界受到了广泛的称赞，认为这是民主的真正回归。波士顿《旅游者报》声称：“菲茨杰拉德先生将不受党的机器的羁绊，摆脱诺言的约束，自由地执政。这将使他能放手地为本市最大、最高的利益工作。”星期六一整天，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天主教周刊《合众国》周六版中度过，心情十分舒畅。“我将尽自己所能，把波士顿变得更加繁荣。”他向记者承诺说。呆在他身边的孩子们，一个个亲热地搂着他的脖子。

冲 突

约翰·F·菲茨杰拉德生性宽容。虽然帕特里克·肯尼迪制造了许多令他恼火的麻烦，但是，菲茨杰拉德在就任波士顿市长后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包括重新任命帕特·肯尼迪为电信局局长。于是一系列友谊便建立起来，但是 1906 年夏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在民主党缅因州老果园海滩度假中，喜欢上肯尼迪的儿子时，这位市长变得敏感起来。“我想，世上每一个做父亲的都会认为没有哪个男人能完全配得上自己的女儿。”罗丝回忆说，“在我父亲眼里，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气质非凡的、智慧和魅力超人的小姑娘。当我长成大姑娘时，他的这些意识更加强烈。”

然而菲茨杰拉德不承认自己有错觉。罗丝美丽漂亮，天资聪颖，很招人喜欢。相比之下，约瑟夫·肯尼迪身材矮小，粗鲁莽撞，反应迟钝，况且还是菲茨杰拉德长期的政治竞争对手的儿子。因此，菲茨杰拉德市长不许罗丝接受这个男孩的邀请，去参加波士顿拉丁学校举行的第一次季节舞会，理由是“他不赞成 16 岁的女孩到处去陌生地方参加舞会，这样可能会见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人。”

麻烦只是一种低调的说法。不过，禁令恰恰起了鼓风机的作用。两个青年进行了秘密幽会。菲茨杰拉德得知此事后，后悔自己过去过于鼓励女儿独立。因此在与波士顿大主教商量后菲茨杰拉德决定，罗丝多切斯特中学毕业后，不许她上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一所罗丝渴望去的新教徒大学。他说，她才 17 岁，太年轻，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会引起他的天主教选民

肯尼迪传

的不满。于是，他把罗丝送到联邦大街圣心女修道院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和修女们可以监视她。

原指望随着时间的流逝，罗丝不会再迷恋年轻的约瑟夫·肯尼迪，然而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这种迹象。于是在她 18 岁时，菲茨杰拉德把她送往欧洲，在那里，她与她的妹妹阿格尼丝一起被关进了荷兰布卢门塔尔一座监狱似的女修道院里，过两年荷兰行为准则的极其痛苦的生活，希望她忘掉当时已在哈佛大学上大一的乔·肯尼迪，并希望罗丝“皈依宗教信仰”。

罗丝果真信起教来，却始终没有忘掉约瑟夫。她故作庄重的表象后隐藏着钢铁般的坚毅。在荷兰经受煎熬期间，她一直与他父亲的敌人的儿子保持着通信往来。不得已，菲茨杰拉德又在 1910 年费尽心思地把她送进了另一座圣心女修道院，不过这次是在纽约曼哈顿维尔。这些接连不断的伤害，给罗丝的禁欲主义的余生留下了伤痕。

罗丝后来悲叹地回忆：“我的父亲在公共事业方面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但在教养子女方面，没有人会比他更保守。试想想，当你把新英格兰人的伦理标准和爱尔兰天主教的伦理标准混在一起时，结果会有多么不堪想象。真令人悲叹不绝！人的一生毕竟只有一次青春，若不趁年轻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短暂的特殊年华，青春很容易消失。可是我的父亲偏偏想不通，顽固得很。”

在罗丝心里，乔·肯尼迪在她生活的这个阶段几乎像上帝，是“一个严肃的年轻人”，但又有“机智和幽默感”。他喜欢微笑，还朗声地、不由自主地笑，动不动就大笑，他的笑富有感染力，使得每个看到的人都会受到感染。”

在恋爱被干扰的情形下，罗丝反而把乔·肯尼迪看成是加

拉哈，认为他非常勇敢，能够把她从父亲过于保守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至于那个不通情达理的父亲，仍然非常顽固，并且禁止“肯尼迪家的孩子”进他家的门。当一切都毫无作用后，他决心要把罗丝带到棕榈滩去。罗丝坚决反对，她说她已经接到肯尼迪室友的邀请，要去参加哈佛大学三年级的班级舞会。“我的父亲说，他就是容不得这种荒谬事情，说我必须去佛罗里达。”罗丝回忆说。

1911年夏天，菲茨杰拉德市长搭乘法兰克尼亚号离开美国赴欧旅行，他没有带夫人同行而是带了女儿罗丝。这艘豪华客轮由许多拖船和小艇护送至波士顿灯塔，以便让“波士顿人热情地送别”，当时报纸纷纷报道说。他把罗丝带到英国、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德国等地，他不仅以波士顿市市长的身份，而且还以波士顿赴欧商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旅行。他致力于宣传，把自己当成超级推销员，是总统和国王的密友。在展现外交手腕的同时，他不忘对女儿的安排。他安排他看中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儿子修·诺恩与罗丝见面，还让他在奥斯坦德加入了代表团。

罗丝后来回忆说，她的父亲和哈里·诺恩都希望这种友谊能“演变成恋爱和婚姻”。菲茨杰拉德在那年1月花钱为罗丝举办过一个大型社交舞会，特制了一个帐篷，出席的有400多位来宾。后来当波士顿商会代表团的船沿着中欧著名的河流顺流行驶时，罗丝·菲茨杰拉德和修·诺恩在他们父亲赞许的目光面前，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跳起了华尔兹。他们的父亲认为，这是财富和美貌的完美结合，这将为两家带来无上的荣耀。

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罗丝担任了赴欧代表团的法语和德语

肯尼迪传

翻译，但是她从未对旅途中遇到过的任何显贵倾心过。她的梳妆台上，一直摆着一张镶了镜框的、她所惟一衷情的情人——帕特·肯尼迪之子乔的照片。什么东西都无法动摇她日愈强烈的、有朝一日成为 J·P·肯尼迪夫人的决心。

接下来的日子里，菲茨杰拉德又带着罗丝随同波士顿商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去了新开凿的巴拿马运河，经堪萨斯横穿北美大陆，去华盛顿会见塔夫脱总统，去巴尔的摩帮助伍德罗·威尔逊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父亲千方百计的阻挠下，罗丝仍然没有放弃乔·肯尼迪。或许是她独具慧眼，看到了父亲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乔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东波士顿酒商、酒馆老板和幕后政客，但是有朝一日这个“肯尼迪家的孩子”终将飞黄腾达，功成名就。

菲茨杰拉德垮台

“我从未对任何别的人认真过。”乔·肯尼迪声称，他还特意强调“认真”一词。他的哈佛大学同学阿瑟·J·戈德史密斯在回忆他与罗丝的爱情时说，在与罗丝的恋爱中，乔一直是“喜欢在女人中厮混的”——尤其偏爱歌舞队女演员。事实上，他们两个“经常陪两个红粉佳人”逛波士顿。有一天，他们四个人正好碰见了罗丝·菲茨杰拉德。戈德史密斯后来吐露，“她对那件事一点都不在乎。”

乔的自信心是惊人的。他在哈佛读书时，就“偷偷兼做旅行客车生意，净赚 5000 美元——相当于他父亲当市政委员一年的薪金。1911 年夏天，当罗丝陪同她父亲游历欧洲时，乔正在怀特山棒球协会打职业棒球，他与球队经理一起住豪华饭

店，依仗球赛和寄给《波士顿环球报》的请同学约翰·康利代他写的社会新闻大发横财。“一切我所感兴趣的的就是钱”是他的座右铭。

乔企业家的天赋似乎注定他在商业上会取得成功，事实也是如此，他很快把经营旅行客车所得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不动产投机中。因为，他确信，大钱的赚得还是要靠银行业和投资。

然而，对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说，尽管野心勃勃，甚至有哈佛大学的文凭，但是，要想在高雅之士云集的新英格兰地区取得成功并非易事。“唯爱尔兰人不用”的告示代表性地显示了新英格兰人家族的陈腐的偏见，而且现在仍然如此。虽然乔被允许去上哈佛大学，但是由于其社会地位，他在那里一直受到冷落。更使他感到懊丧的是，他被哈佛大学所有大规模的俱乐部拒之门外，而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是保证日后被波士顿上层社会接受的通行证。

罗丝责怪乔总是我行我素。她后来评论说：“我相信，如果他从小在哈佛大学一开始就像我一样接受社会等级，把它们当成无需忧虑的基本生活事实，那么他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少一些。”

但是，乔·肯尼迪认为，这种社会等级是令人忧虑的。1912年哈佛大学毕业，他无法在任何大的马萨诸塞州金融机构中谋得任何职位，于是他只得屈就，到他父亲与其他16个人于1892年在东波士顿默里迪恩街一起合伙创建的一家波士顿爱尔兰小银行——哥伦比亚信托公司当一名低级职员。经过20年，它的资本才增至7万美元。虽然不算太多，然而，对一个未来的波士顿爱尔兰银行家来说，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

肯尼迪传

开端，他不甘心永远被新英格兰的美国佬踩在脚下面，正如他不会因菲茨杰拉德市长反对他与罗丝结婚就放弃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乔和罗丝都是坚定不移的。她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选择，无论可能发生什么，都矢志不移。在家中，她的父亲就是法律，在波士顿市同样如此。但是，尽管这位市长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政治地位依旧是不稳定的。在市长第一任期结束时，他几乎栽在波士顿财政委员会对合同附件和“贿赂”案的调查里。1913年时，就在他的第二次当选即将结束之时，菲茨杰拉德意识到自己正与一位年轻的波士顿爱尔兰煽动家、国会议员詹姆斯·迈克尔·柯利战斗。柯利是一位持不同政见，因使用诽谤战术，企图夺得有利可图的市长职位而臭名昭著的人。“这位罗克斯伯里的国会议员在游说中一直在诋毁选区主席，”《波士顿先驱报》很快报道说，“这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

不过，这位罗克斯伯里的国会议员制造的麻烦，却远比闹弄要糟糕。众所周知，菲茨杰拉德很受女人喜欢，偏偏他夫人是个醋坛子，占有欲极强。“对乔西这样的女人来说，与约翰·菲茨杰拉德这样魅力十足的男人一起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一个外甥女回忆说，“她只有接受他‘右手搂着她，同时，左手仍有足够的爱和感情可以拥抱整个世界’的现实，她或许会感到幸福。但是她要全部占有他——而这正是他永远不能满足她的事。”

詹姆斯·迈克尔·柯利想了解的是，除市长老婆以外，市长还与哪些女人有染。没有费多少时间他就知道了——通过一名仍在为他在财政委员会审理案中未能起诉菲茨杰拉德而感到后悔的波士顿检察官，柯利终于找到了可供自己利用的武器——

一名尽人皆知的，绰号为“甜豆儿”的纽约妓女——伊丽莎白·瑞安。接着，这位罗克斯伯里的国会议员给乔西寄去了一封黑边匿名诽谤信，告诉她，她的丈夫——市长与一个名叫“甜豆儿”的妓女有过不清楚的关系，除非市长退出竞选，否则他将把这桩绯闻曝光。

起初，菲茨杰拉德想设法避开这件事情。他是波士顿爱尔兰人的骄傲。据《波士顿先驱报》评论，他的第三任期“在政治方面的业绩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为市长候选人阵营中所有比较开明的政治家所私下认可”。

然而，在柯利的阵营中，没有任何人这样认为。对于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诽谤，菲茨措手无策。他一贯依靠女人的家庭影响。虽然她们当时并没有投票权，但是她们可以通过向男人们施加压力从而使男人们来投他的票。他曾经回忆说：

据我所知，女人的家庭影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在闹市区当速记员或打字员的姑娘听到顾客学着财政委员会的论调谈论我，虽然她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却可以回家红着脸与她们的父兄争论。结果在多数情况下她们都间接地使选民转向了我。在很多情况下，她们非常激动，甚至威胁她们的男性亲属，除非他们放弃投他们不公正地诽谤的人的票，否则就离家出走。我还清楚地记得走进南区多弗街附近一家商店，被一大群妇女团团围住，她们波涛般地簇拥在我周围。我认为，我的胜利相当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她们的影响。

不过，当时柯利想把菲茨杰拉德诽谤成一个与人通奸者，

肯尼迪传

借此使他失去女性的支持。不久，在波士顿一首下流的歌谣流传开来：

酒杯里的威士忌，
甜豆儿的小屁屁，
弄得风流的菲茨，
神魂颠倒着了迷。

1904年，柯利曾因在一次邮政考试中作弊而蹲过联邦监狱，并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受到过几次起诉，因此可以说，这些手段是卑鄙的。不过，柯利的脸皮比犀牛还要厚。在给市长夫人寄匿名诽谤信和散布流言蜚语无效以后，柯利又下了一个风险更大、代价更高的赌注：在一位大学校长的帮助下，他宣布将举办历史上关于腐败现象的专题系列讲座，第一讲的题目是《古代与现代的贪污受贿》。第二讲的题目暂定为《历史上的著名情人：从克娄巴特拉到甜豆儿》，接着是第三讲《历史上的淫荡好色之徒：从亨利八世到现在的菲茨》。

这对菲茨杰拉德夫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她的女儿罗丝即将过24岁生日，然而国会议员柯利的竞选活动把别人的“揭发的隐私”都牵扯进来。这是一场肮脏的竞选活动，这可能会对罗丝以及她妹妹将来的婚姻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于是1913年12月17日，市长的助理秘书爱德华·E·穆尔向新闻界发放消息，市长无意第三次当选，用市长的话说“遵照医嘱，我撤回我对市长职位的竞选。由于过度劳累，目前我健康状况不佳。医生劝我进行长期的休养……”

菲茨杰拉德的同僚们大为震惊，一个个被弄得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民主党市委员会主席声称：“市长本来已经赢定这场战斗了。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再次当选。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容易的一场战斗。我为他准备了 10 万枚竞选小徽章……我们还写了 6 万封信，我们一直在做许多预备工作。我只能说我感到很遗憾。我市将失去历史以来最好的市长。”

柯利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大言不惭地说：“我非常高兴听到市长阁下退出竞选，因为这将确保我当选。我对他的身体不适感到非常抱歉，相信他很快就会康复。”

从以后看来，这位 50 岁的菲茨杰拉德退出竞选，就意味着他走到了自己曾经辉煌的政治生涯的尽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打垮他的，竟是他的爱尔兰同胞和民主党内的同志——柯利。

柯利阴险恶毒的手段让菲茨杰拉德家族永世难忘。更没想到约 40 年后，与柯利争夺国会议员席位的恰是菲茨杰拉德的外孙。他拒绝一切劝告和恳求，拒绝在柯利请求总统宽容的申请书上签字，从而使年迈且疾病缠身的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因贿赂罪在联邦监狱中受罚。

婚 前

菲茨杰拉德撤出市长竞选后 20 天，报纸上登载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市长之女准备结婚——所传罗丝小姐订婚之事尚未得到菲茨杰拉德家族承认的证实》。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大标题以及罗丝占四分之一版面的大照片下，有一则模棱两可的报道：

肯尼迪传

原市长菲茨杰拉德的许多朋友都在议论市长的女儿罗丝·E·菲茨杰拉德小姐与一位商界名人之子订婚的传闻。

自 1911 年 1 月 2 日罗丝第一次在社交界露面以来，她一直是社交界的宠儿。她的名字家喻户晓。仰慕她的人一直很多，但她至今未婚。目前传言她订婚之事尚未得到家族的认同，虽然据传订婚可能在 1 月份宣布。

如果菲茨杰拉德是想借此迫使自己的女儿接受修·诺恩的求婚的话，那么，据罗丝后来透露，他的计划恰恰产生了相反的结果。罗丝仍不让步，以致外界“预期”的宣布订婚一事，只落得个不了了之的下场。

罗丝特别爱穿精致的轻薄上衣和长毛裙，然而对性却无知得可怜。她认为，她与乔的结婚是纯洁的，浪漫的，不具任何欲望色彩。她自命有音乐天赋，并且在 20 岁时成为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她经常外出旅行，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她确信，如果她能与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结婚，她一定会用自己的娇柔气质、受到的教育和纯真，改变帕特·肯尼迪之子多少有点粗俗和我行我素的生活。

罗丝为了与乔结婚等了几乎整整 7 年。不容置疑的是，即使要她再等 7 年，她也会乐意的。但是最终无此必要了。在她父亲这颗一度闪亮的政治明星开始陨落时，她情郎这颗商业明星却开始发出光彩。在父亲的银行里做了一段时间职员后，乔·肯尼迪于 1912 年谋得马萨诸塞州银行审查员一职，这使他终于立足于这个曾将他拒之门外的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世界。同年 12 月他得知第一区国民银行要兼并哥伦比亚信托公司的消息后，便立即采取行动。

肯尼迪传

首先，他向第一区国民银行的一个竞争对手要求贷款 4.5 万美元，以此来降低收购出价。到 1914 年 1 月，在设法控制了哥伦比亚信托公司 51% 的股份后，25 岁的乔便在股东特别大会上单枪匹马地打消了他们合并的企图。结果，原信托公司总裁——合并的提议者被迫辞职。

当他决意用偿还贷款所得的 1200 美元预付利息时，乔的一位朋友跟他开玩笑道，“你是否要当财务主管了？”

他笑着回答道，“嘿，我要当银行总裁了！”

1 月 20 日，星期二，约瑟夫·P·肯尼迪成了即使不是全国至少也是波士顿最年轻的银行总裁。罗丝·菲茨杰拉德非常高兴，然而，她的父亲并不高兴，他一如既往，禁止“这位肯尼迪家的孩子”踏入菲茨杰拉德在多切斯特的家。

对于父亲的无动于衷，罗丝很是失望。一气之下，她自作主张与乔私订终生。多年后，她想不起来乔是否明确地向她求过婚。“当时已不是‘你愿意娶我吗？’的问题，而是‘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她说道，“一切都是很简洁的。没有对话，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普通的结婚场面。”

生活打碎了罗丝罗曼蒂克的幻想，她的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意识一样，是值得注意的。至于她的父亲是否做过最后的努力劝她放弃这场私定的婚姻，我们无从知晓，不过她倒记得 1914 年冬末春初的某天，乔送给她一个两克拉重的订婚戒指，那是他向与家人合伙作珠宝生意的哈佛同学低价买来的。

菲茨杰拉德终于还是没能强过他们。随着约瑟夫·肯尼迪在哥伦比亚信托公司新的岗位上不断取得的显著成功，这位前市长不能再说乔是一个无用的家伙了。她的女儿马上要过 24 岁生日，或许再也难找到这样好的求婚者。菲茨杰拉德最终只

肯尼迪传

得让步，1914年6月13日，星期六，约翰·F·菲茨杰拉德夫妇终于对外正式宣布：“我们的长女罗斯·伊丽莎白与温思罗普的帕特里克·J·肯尼迪夫妇的儿子——哈佛大学第12届毕业生约瑟夫·P·肯尼迪订婚。”

4个月后的10月7日，罗斯与乔在大主教私人礼拜堂简单地举行了婚礼，随后宴请75位宾客，这与应邀参加罗斯首次社交聚会的几百人的规模相比相差甚远。

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共和国》报宣布，“这对年轻夫妻度过蜜月回来后，住进他们在布鲁克林比尔斯街的新家，他们于1月的第二、四个星期二接待客人。新娘是一位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人，收到了许多漂亮的礼物。”

婚 后

以这块土地的原买主的名字命名的比尔斯街始建于19世纪90年代有轨电车飞速发展时期。接下来的20年里，在街道两旁陆续种起来的树后面，建起了样式各异的房屋。它们或者为不同身份的中产阶级家庭——职员、商人、工程师、海军上校、设计师、雕刻师、酿酒商、雕塑家、家具制造店、保险代理商、音乐家和其他的专职工作者及其家人所拥有，或租赁。然而，这一开发热随着1910年萧条经济时期的到来停止发展了。83号是这条街所建的最后一座房子。它不太大，两层半的楼房，外面装着护墙板，有屋顶窗、四坡屋顶和殖民地时代的门廊。在它的身后一大片的建筑用空地一直延伸到邻近的大街。

比尔斯街居民的平均年龄为45岁，约瑟夫·肯尼迪夫妇分

别是 26 岁和 24 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先借了 2000 美元预付买房定金，然后又向哥伦比亚信托公司收回借款 4500 美元付清剩余的房款，这样，他们就完全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罗丝在她的新家清理结婚礼物，接待客人，她的丈夫则在比肯街乘电车去他在东波士顿的银行上班。乔因购买银行股份和房子要偿还大量的贷款。尽管年轻，但他却老于世故，把银行当成独自的领地，他的隆隆作响的声音使职员感到害怕，而他的专用电话——杯形说话口能防窃听，这更给他年轻总裁的职位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明显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急性子，银行业务每年翻番很快就显示出他卓越的才能。在哈佛时，他就以严格、不妥协著称，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优惠贷款，他的条件很苛刻，而且要求按时偿还。他现在仍然如此，不管是对待他父亲的老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是一视同仁。

乔·肯尼迪是否完全真诚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有充沛的精力和获得成功的强烈欲望。他愿意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愿意相信别人。经历了几次教训，他学会了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甚至提出多么好的担保，而是要看他的经济实力。

虽然负债累累，他还是买了一辆汽车，以便出门交际应酬。罗丝后来回忆说：

我一生中极为兴奋的时刻，就是我丈夫开回家一辆崭新的、油光铮亮的黑色 T 型福特轿车的那天。对我来说汽车的隆隆声似乎从来没有那么悦耳过。自然，乔为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惊喜感到骄傲和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要

肯尼迪传

带我出去兜风。

不巧房子附近在修马路，工人留下的警示灯的光线太昏暗，车又开得快，看不清，等我看见灯笼大叫小心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一下子掉进了沟里。

车子可怕地倾斜和反弹了一下，金属擦在马路上的声音、发动机空转声、石头尘土飞溅声、乔和我的尖叫声夹杂着，现场一片混乱。好在乔加足马力，紧握方向盘，同时我一手抓住车帮，一手抓住他的衣服，汽车使劲地颤抖了一下，几秒钟后，我们便跳出了沟。

从许多方面讲，这段插曲都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起克服了许多艰难的起伏与坎坷。”罗丝笑着说道。

罗丝没有说的是，等待7年的婚姻的魅力很快就减退了。罗丝不再是她爱尔兰人父亲的家庭中值得骄傲的大女儿。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在我们看来，它非常漂亮和舒适，是一个成为现实的梦”。室内有“我在欧洲旅行时看到的特别羡慕的杰作的仿制品”；一架罗丝的两个叔叔赠送的艾甫斯和庞德大钢琴；一套菲茨杰拉德的一位英国朋友托马斯·科普顿爵士赠送的三叶花饰的茶具；“时髦、漂亮、坚固、耐用的”仿古家具以及一个女仆。只是房子大部分时间惟一缺少的东西就是丈夫。

然而，自从罗丝怀上第一个孩子，肚子一天天变大，就没有多少时间去管丈夫的问题了。她决定不在布鲁克林生产，而是在一所租赁的楠塔斯基特赫尔的房子里生孩子，那里离她父母每年夏天租住的一所能俯瞰大海的都铎式大房子很近。1915

年7月28日，确切地说是婚后9个月零两周，罗丝产下一个10磅重的男孩，取名小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罗丝的父亲知道后，便“以一流短跑选手的速度”，从海滩跑回房子给报社打电话。这位前市长对其第一个外孙出生的评论就像一个激动的父亲对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的评论。“他会嗷嗷地叫喊，”他宣布，然后自唱自演地说，“我敢肯定，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会从政吗？当然，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的父亲和母亲已经打算好让他上哈佛大学，在那里他将加入足球队和棒球队，顺利地夺取学生的一切荣誉，接着他将成为工业巨头，直到他担任两届总统。除此之外，目前尚无进一步的决定。在他坐上总统宝座之前，他可能会当一段时间的波士顿市市长和马萨诸塞州州长。”

菲茨杰拉德虽然只是开玩笑地这样说，但是他说的并非完全是笑话，虽然1901年帕特·肯尼迪迫使他退出了华盛顿权力机构的席位，但是他至今仍然渴望地盯着这个席位。那年冬天，他把罗丝和小外孙带去了棕榈滩，而把女婿留在了波士顿。1916年夏，菲茨杰拉德再度以6.5万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民主党参议员的初选——向威严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了挑战。

菲茨杰拉德挑战洛奇

神圣的科德角，
绿荫荫的哈佛，
是我生活的全部。
洛威尔家族渴望跟卡伯特家族讲话，

肯尼迪传

不幸的是卡伯特家族只跟上帝讲话。

约翰·F·菲茨杰拉德称，这就是洛奇偏执的从政态度。洛奇虽然当了 20 年的参议员，但是由于以往的参议员均由马萨诸塞州议会选举，而州议会中共和党人始终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从来无需顾虑男子普选权，直到 1916 年，这次洛奇才猛然醒悟。

“人民反对亨利·卡伯特·洛奇”是菲茨杰拉德在波士顿用来竞选的口号。这位前国会议员从东波士顿的法纳尔大厅到西波士顿的工厂，到处指控这位参议员“在参议院的 24 年里，没有提出过一项有助于提高市民生活水平的议案”。菲茨杰拉德每天在新英格兰各报头版发表对洛奇的指控。他在这些指控中声称，洛奇是一个“杰出而强硬、冷酷而心肠狭隘的贵族”，一个“一贯反对一切有关人权和人民福利的议案的人”。他所指的还包括劳工抚恤金法案、联邦所得税和直接选举等。4 年前洛奇支持威廉·塔夫托，几乎毁了整个共和党，如今他仍然以种族主义的眼光反对移居美国的外国人，声称“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希腊人和波兰人与大多数美国人最不相容”，建议把他们“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拒之门外”。

菲茨杰拉德用了半版广告，除了他的一张巨幅照片之外，还在《我的政见》标题下列出数项公共政策。其中包括重申煤矿公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中，“不可容忍的”和被垄断的煤炭价格将被当作一种丑闻；伪造股份与伪造货币同罪；非摊交的养老金制度；事故保险、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政府应给身为“国家支柱”的农民发放补贴以及联邦应资助中学和大学在美国开办更多的在职进修培训。

接着，菲茨杰拉德把自己和洛奇在国会的表现加以比较。菲茨杰拉德宣称，“从 1891 年为波士顿拥挤的住宅条件争取公园和操场的第一场战斗，到关于遗赠和遗产征税的法案”，他能够列出比当了 20 多年参议员的洛奇多得多的政绩，而洛奇惟一的政绩，就是关税法案，“好让他的亲朋好友发财”。

菲茨杰拉德的竞选态势起初并不甚看好，因为马萨诸塞州农村选民大多支持共和党，但在他接二连三的攻势下，情势发生了逆转，甚至连著名的波士顿红短袜棒球队经理，都从缅因州打电报公开支持菲茨杰拉德，说：“祝你好运。你是我迄今所知最优秀的波士顿绅士。”

1916 年 11 月 7 日举行全民选举。菲茨杰拉德在波士顿的政绩超过其他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他获得了将近 25 万张选票，票数甚至高于与他同事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不过，他虽然在波士顿市区击败了洛奇，却未能把农村的共和党支持者拉拢起来。

不过尽管如此，菲茨杰拉德还是给洛奇的政治棺材钉上了第一颗钉子。11 月 8 日，他在落选演说中说到，“若能再多一周，洛奇先生必败无疑。”并且断言，“通过努力，马萨诸塞州终将重新回到民主党的怀抱。”

果然，46 年后马萨诸塞州归入民主党——为菲茨杰拉德的外孙所得。对菲茨杰拉德家族而言，1916 年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失败像以前的竞选一样，只是另一场战斗的开端。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约翰·F·菲茨杰拉德虽然未能把亨利·卡伯特·洛奇赶下台

肯尼迪传

去，但是伍德罗·威尔逊却以几票之强战胜共和党对手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当选美国总统。

威尔逊的竞选口号是“让我们免受战争之苦”，虽然他千方百计地拉拢欧洲国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对立一方者，可是作为停战的基础，他的“抛弃并吞野心，和平相处”的呼吁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而且他积极倡导成立国际联盟的提议也遭到了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反对。

当时，在对协商感到无望后，德国政府宣布，从1917年2月1日起，将实施潜艇战不受限制的政策。无视美国的警告，德国海军不久击沉了美国在地中海的“胡萨托尼克号”客轮。在接下来的3周里，大约包括美国在内的134艘非交战国非武装船只惨遭袭击沉没。威尔逊总统冲破参议院的阻挠，迫使国会通过了允许美国商船自卫的紧急议案。

然而，为时已晚。

美国“阿尔贡金号”轮在3月12日遭鱼雷袭击沉没。18日，“孟菲斯城号”和“比希兰特号”无一幸存。3天后，威尔逊提出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在4月2日星期一向参、众议员联席会议致词，总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

伟大的、热爱和平的人民卷入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这场战争是战争史中最可怕的战争。但是正义比和平更宝贵，我们将为我们最关注的事情——为民主……为权利和自由，为通过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最终使世界本身获得自由的自由人民对权利的共同支配而战。为了完成这项伟大艰巨的任务，我们可以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抛开我们的成就和我们拥有的一切。为

立国的原则抛头颅、洒热血的一天终于到来，这是美国的灾难，也是美国的骄傲……愿上帝保佑，我们别无选择。

除 6 名参议员和 55 名众议员反对以外，其余的都赞成宣战，4 月 6 日，国会通过《对德战争宣言》。

全国的征兵活动全面开始。5 月 18 日，总统发布命令，1917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这一天，全国所有 21 ~ 30 岁的男性必须到征兵站登记，通过筛选，合格者必须立即到美国武装部队服役。

反正迟早都得应征入伍，许多人索兴提前参军。金融家 J·P·摩根早在 5 月份就宣布儿子朱尼厄斯已经入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许多华尔街男子纷纷报名参了军。在这个金融区土黄色成了最普遍的颜色，大约 3000 名来自银行和经纪人商行的雇员已经在加弗纳斯岛集中进行训练。”据华盛顿有关消息说，美国将很快向法国派兵，可能需要动用 100 万以上的兵力。军事训练协会称，这样一支军队将需要“在我们的新军官中有名副其实的领袖。第一批响应号召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将在以后几年中被列入光荣册，他们将为他们没有等到第二、第三次号召就积极参军感到骄傲。”

在波士顿，乔·肯尼迪这位美国最年轻的银行总裁，无意响应第一、二、三次号召。才过了几个星期，哈佛大学就有五分之三的学生志愿参了军。甚至连以往一直认为爱尔兰有权独立的忠实的信徒——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市长都向波士顿被纳入美国参战部队的 62 名第一批志愿军表示了诚挚的祝福，他说：“你们出去参战不仅代表美国这个最古老的城市，而且代

肯尼迪传

表美国这个首先被播下了自由种子的国家。你们将去捍卫属于世界人民的自由，就如在我们美国看到的那种自由一样。”

在波士顿附近的艾尔，建了一个很大的供来自马萨诸塞州3万名首批新兵住宿的兵营，但是20多岁的乔·肯尼迪仍然拒不从军，虽然他明明知道几周后他将不得不应征，否则将被处以监禁。1916年夏天，在与一些哈佛老朋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后，有一天他指着熟睡中的儿子小乔对妻子说，“这是惟一最长久的幸福，”罗丝回忆说，“然后他就一声不吭地走了。”

默不做声地走开成了乔·肯尼迪的专利。毫无疑问，他对战争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冒着疏远亲友的代价，他仍然坚持当个孤立主义者。据罗丝后来向肯尼迪家族编年史记录员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讲述：“乔始终认为他不志愿参战是对的，但是考虑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圈子的观点，他感到他的决定可能是不合流的。”

罗丝叙述说，很快乔发现自己“在他的朋友圈子里成了一个孤立的人”。战争使美国人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不管其宗教信仰或移民血统。乔的朋友，如他的婚礼时的男宾相乔·多诺万，他的即将成为肖马特国民银行（波士顿第三大银行）副总裁的哈佛朋友鲍勃·波特，乔在哈佛时的同室同学——橄榄球明星鲍勃·费希尔，甚至从上波士顿拉丁学校时起就是同学和伙伴的乔·希恩，都响应总统的号召参了军。不顾别人的含沙射影甚至公然骂他胆怯，乔仍然每天去默里迪恩街的小哥伦比亚信托银行上班，其实乔非常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惟一让他担心的是在马萨诸塞电力公司董事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最后尝试是否能成功。

肯尼迪传

在布鲁克林，罗丝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她又怀孕了。除厨师和女仆外，罗丝还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因为她准备在比尔斯街的家中进行分娩。天气阴冷——这个季节不该这样冷——夜间温度最低只有华氏 40 多度。1917 年 5 月 28 日夜里 11 点，波士顿地区下了一场罕见的特大雷暴雨。罗丝已经作了准备：如果孩子在夜间降生，她就用最靠近门和电灯的床；如果孩子在白天降生，就用靠窗户最近的床，“因为我希望古德医生和一切相关人员，能够确切的知道正在发生的和他们正在做的一切。”

第二天，也就是 1917 年 5 月 29 日早晨，雨停了。天还阴沉沉的，但气温已略有回升。罗丝开始感到阵痛，弗雷德里克·古德医生及其助手立即赶到，命令女佣把热水烧好。罗丝则“试着以把孩子抱在怀中的喜悦的想像来减轻痛苦”。

过了 50 年，罗丝还能记得当时医生所收费用的详细数目——产前、分娩和产后护理共 125 美元。她还记得给古德医生的助手的上药费是 25 美元，相当于付给分娩的护理护士的周工资。连付给女佣每天 1 美元的工资，她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虽然她挑选了靠窗户的床，但是她自己并不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据后来她向秘书透露，直到 70 岁，她才体会出“胎儿”这个词的含义。

这个急于离开母体的胎儿，于 1917 年 5 月 29 日下午 3 点顺利来到人间。古德医生把孩子举到窗口的亮光下，郑重地宣布又是个男孩。

这次前市长菲茨杰拉德再次“喜形于色地”向报界宣布这一消息。更使他乐不可支的是，几天后罗丝说服乔第二个跟自己姓，因为第一个孩子已经按肯尼迪家族的传统起了名，所以

肯尼迪传

这第二个儿子应该按菲茨杰拉德家族一个人——她敬爱的父亲的名字命名。

3周后的1917年6月19日，在比尔斯街附近的圣艾丹罗马天主教教堂，婴儿接受由菲茨杰拉德的一个穿军装的儿子做的洗礼，取名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不过这次美国正处于战乱，这位前市长未作任何预言。

第二章 发财致富

灰色的爱情

罗丝回忆说，小乔·肯尼迪一直很健康，但是小约翰·菲茨杰拉德——“杰克”，人们都这样称呼罗丝的第二个儿子——在“襁褓时期就胃口不佳”，经常生病。罗丝生活在孤寂的、中产阶级聚居的、没有爱尔兰人的波士顿郊区，周围全是比她辈份大的陌生人，她很想念自己的娘家。

除了孤独，性爱也是一个大问题。事实是，罗丝在宗教信仰和教育上长期处于混乱——半是修女、半是政客娇妻，只有温柔而体贴的丈夫的照料，才能使她逐渐成熟起来。甜蜜的非茨早就了解到这一点，而且也知道乔·肯尼迪既不温柔，也不体贴，是一个典型的波士顿爱尔兰裔男子，把生活简单地看成是适者生存规则主宰的世界。他只对基本生存原理感兴趣，不懂得情感的娇柔与细腻。因此，当罗丝缩起她那易碎而惊恐的躯壳，除了作为生育工具，否则回避与他性交时，乔当然有意见。有一回，他当着朋友玛丽和文森特·格林的面对罗丝说，“好，听着，罗丝。你认为除了生育之外就没有浪漫的爱情，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圣坛前的结婚誓约中没有这项内容；神父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书上也从来没有那样写过。如

肯尼迪传

果你在这个问题上不敞开心扉，我就不得不向神父告你。”

然而，当着朋友的面羞辱，或者以要进行教会惩罚相威胁，都无法改变罗丝作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禁欲主义的心理。期盼天主来“净化”生活的罗丝，从小对性爱及其它任何“肮脏的”话题都非常排斥。她童年时的朋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每当我开这方面的玩笑，她就板着脸严肃地问，‘玛丽，是不是又要讲肮脏的故事？如果是，我不想听。’其实，我并没有讲淫秽的东西，只讲略微涉及但不伤大雅的故事，不会伤着任何人，除罗丝以外。”

乔无法唤起罗丝的性欲，只好把失望埋在心里。在外面，乔把自己当和尚似的生活分成两部分——责任与真实的自我，后者由于与罗丝缺乏性生活而变得黯淡。乔花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时间明显增多，他曾经戏称自己每天在公司工作 16 个小时。后来，一个在银行工作过的人说：“哥伦比亚公司只是一个小公司，他每天还工作 16 个小时，说明“他不是个笨蛋就是个傻瓜”。面对别人的嘲笑，他才更改了这个数字。据他的挚友说，他的淫乱行为更加厉害了，他经常恬不知耻地与歌女或名声不好的女人鬼混，不论老少都是他寻欢的对象。

在整个恋爱的过程中，罗丝总是尽量地去了解和支持乔，真诚地观看他和他的哈佛朋友们所热衷的橄榄球比赛，而她自己又尽量建议他去听古典音乐，放弃去听那些伴随他成长的爱尔兰吉格舞曲、爱尔兰歌曲和爱尔兰流行音乐。但是他承认，在她的记忆中，除此之外，这场婚姻形同虚设，比尔斯街 83 号一楼卧室里的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就是肯尼迪夫妇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她悲叹道：“乔的时间只属于他自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以前，中学和大学曾经占去他很多时间，

现在占有他很多时间的则是工作。”她只得认命，“继续担任高手俱乐部的主任”。这是一个由她创建的社交性俱乐部，致力于关于时事的教育性讨论。正如她曾经评论过的，“我的生活心得之一是：人在一生中，无论何时，只要与有类似背景、兴趣和才智的朋友呆在一起就会活得很快乐。”

如果没有朋友，罗丝就不可能从乔带给她的那种孤独中活下去。她孤独，不仅因为他们那所临近布鲁克林比尔斯街空旷地带的、灰色的、装有护墙板的房子离她的父母的房子有数英里之遥。还因为乔不喜欢娱乐，因而家中没有笑声，没有欢乐，没有从前在父亲家接待客人时的那种美好的氛围。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胆小的女婿

罗丝的第二个儿子在布鲁克林出生的那天，约瑟夫·P·肯尼迪获悉，经过三次尝试，自己已经当选为马萨诸塞州电力公司的产业代言人。当一个朋友问他，现在正值世界危机之际，为什么这样一个完全只是荣誉性的任命对他如此重要时，他狡黠地问：“你有更好的办法结识像索顿斯托尔家族这样的人吗？”

当时索顿斯托尔家族的年轻人早已穿上军服，当兵上前线去了，这样的问题显得更加奇怪。乔·肯尼迪坚决不报名参军。他认为，抛下前途无量的金融生涯去为参战的国家服兵役简直荒谬，不过后来他为掩饰这段逃避兵役的历史，付出了不少代价。乔对后来详细记载了他光辉一生的记者乔·丁南吹嘘说，他从1915年开始就投入战争工作了，对别人他则说是从1916

肯尼迪传

年开始。甚至连罗丝·肯尼迪也为丈夫掩饰，声称在她的记忆中，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尚未出世”的时候，乔就开始投身“重要的战争工作”了。

事实上，在第二个儿子杰克出生后，乔拒绝入伍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到婴儿3个月的时候，乔所有的同学已经全部参军。美国自1917年4月初开始参战，但是乔一直坚持不参军。1917年8月4日，白宫宣布，抗拒参军者处死。17日，威尔逊总统补充命令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也应该应征入伍。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动摇乔的决心，他反而更牢地抓住自己在小哥伦比亚信托公司的工作和马萨诸塞州电力公司董事会的新职位不放。

1917年的夏天，菲茨杰拉德和肯尼迪两家都是在楠塔斯基特度过的。在海滩上，乔甚至想方设法掩饰他的年轻，戴着上过浆的在正式场合用的领圈、丝绸领结和眼镜，故做老态地与新生婴儿一起躺在沙滩上，却让现在已经54岁的岳父身着蓝白相间的游泳衣，抱着两岁的大外孙冲向大海，教他游泳。

乔·肯尼迪缺乏爱国热情的行为使菲茨杰拉德一家感到耻辱。罗丝曾经做杰克教父的弟弟汤姆·菲茨杰拉德当时已经成为了一名步兵军官。历史上第一支到欧洲大陆服役的美国军队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事实上乔在小小的哥伦比亚信托公司的工作，完全可以由上了年纪的、经验丰富的副总裁韦林顿先生代理。况且，当大金融家们的儿子都志愿从军奔赴疆场，不久还要强行征招100万人之时，而显出格外年轻的乔与许多老商人正一起坐在马萨诸塞州电力公司董事会里，精力充沛，为什么他不像其他人或者他的小舅子那样，积极地为祖国而奋战呢？

8月，本来是大家族休闲娱乐的季节，但是对肯、菲两家

来说，1917 年 8 月却充满了难堪与屈辱。约瑟夫·肯尼迪不得不板着脸面对照相机，忍受着指责、窃窃私语和含沙射影的辱骂和折磨。两家人返回波士顿时，眼见拒不参军事件就要演变为一起公开丑闻了。然而就在 1917 年 9 月底，即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约 6 个月，罗丝的父亲为他“怕死的”女婿最终觅得了一条出路。

约翰·菲茨杰拉德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任国会议员时，结识了钢铁大王——以白手起家而闻名的传奇人物查尔斯·施瓦布。1914 年，菲茨杰拉德在施瓦布的大型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钢铁公司兼并昆西市的福尔河造船厂一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福尔河造船厂在波士顿市以南数英里，效益不佳。花 4800 万美元收购福尔河造船厂，使伯利恒钢铁公司获得了一批熟练劳动力以及进入大西洋的方便途径。当战争在欧洲打响，伯利恒钢铁公司赢得 10 艘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的订货单时，它为施瓦布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潜艇在福尔河公司预制组件，然后运往加拿大组装。

18 个月后，依照年轻精干的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命令，福尔河造船厂又得到了 19 艘美国海军舰船的订货合同，其中包括 8 艘潜艇、8 艘驱逐舰。美国宣战后，政府立即招标建造更多的驱逐舰和潜艇。施瓦布的价格大大低于任何一家竞争对手，因而赢了不少于 28 艘新驱逐舰和 15 艘潜艇以及一艘战列舰的订单。

罗斯福 1917 年春天的大批新的海军订单成了在福尔河造船厂大受欢迎的消息，而且好消息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福尔河造船厂有可能在秋天再获得一批 35 艘驱逐舰的订单。因此目前有必要在福尔河造船厂下面的斯宽特姆建一座设备更好的

肯尼迪传

造船厂。船厂由政府出资建设，该公司经营，且全部用于建造驱逐舰。

考虑到这是一项庞大的应急工程，伯利恒钢铁公司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协调部署其经营活动。福尔河造船厂总裁约瑟夫·鲍威尔被调往宾夕法尼亚，整个伯利恒钢铁公司船舶建造部的副总裁，福尔河造船厂的总经理仍归他管。

福尔河造船厂新的总理由现任监督——塞缪尔·韦克曼担任。39岁的造船工程师韦克曼不懂会计，因此需要配备一个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助手来管理——这正是这位前市长1917年秋为他女婿设法谋取的职位。

这一年的9月29日，约瑟夫·P·肯尼迪前往波士顿杨氏饭店，接受由伯利恒钢铁公司副总裁鲍威尔先生和福尔河造船厂新的总经理韦克曼先生亲自主持的面试。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野心勃勃的青年银行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威尔和韦克曼只应付式的面试完其他的候选人，便当即敲定了最佳人选。最后在1917年10月16日——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发布命令，在斯宽特姆动工兴建一个有10条滑道、4个湿船坞的新驱逐舰工厂后11天——当地报纸《昆西爱国者记事报》报道：“波士顿哥伦比亚信托公司总裁约瑟夫·P·肯尼迪辞去总裁一职前往福尔河造船厂任韦克曼先生的助理经理。肯尼迪原是波士顿市长约翰·菲茨杰拉德的女婿，”好像料到造船界会感到震惊似的，报纸又补充道，“他的工作只限于办公室。”

大罢工

乔·肯尼迪来到福尔河造船厂后不久，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造船工人大罢工。韦克曼先生去宾夕法尼亚洽谈新的驱逐舰订单，由肯尼迪代理船厂工作。工人们原先与鲍威尔先生已经达成协议，造船厂按与附近的波士顿海军造船厂相同的工资率付给他们工资，第一次增加工资应从 10 月 15 日起开始执行。然而，令 9000 名船厂工人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 10 月 27 日领取工资支票时，竟发现工资丝毫没有增加。

《波士顿先驱报》10 月 31 日报道，“鲍威尔先生被调到了另一个伯利恒钢铁厂任职，前市长菲茨杰拉德的女婿约瑟夫·P·肯尼迪继任为福尔河公司负责人。工人们指控肯尼迪先生对于他的前任鲍威尔总裁曾与谁达成过协议一无所知，肯尼迪宣称，不管有什么协议，对于鲍威尔先生任总裁时可能做过的任何事情，该公司也概不负责。”

几个小时内，5000 名技工就在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举行罢工。肯尼迪以要开除罢工工人相威胁，从而使他们失去免于征兵的优待，但是他的话既不明智，也不合时宜。如潮水般的电话不断地向宾夕法尼亚伯利恒公司总部打来。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创建者查尔斯·施瓦布和政府航运局首脑，不得不立即赶往波士顿与造船工会领袖商谈。与此同时，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也给工会组织者发去了私人电报，恳求他向工人们传达政府有关机关的紧急通知：

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工厂，它的持续开工对国家在

肯尼迪传

战争中的胜利比福尔河造船厂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为国家大局作想，本部敦请双方摒弃一切次要的分歧，携起手来为我们国家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个人干预，一周后罢工结束了。在罗斯福的建议下，工人们原本的工资协议得到了执行。肯尼迪丢了面子，并被降职调往新的斯宽特姆造船厂，远离是非之地。

短暂而失败的管理船厂尝试使乔·肯尼迪丢尽了脸，但是他后来隐瞒了真相。而且，他还散布了一种关于他与罗斯福第一次小接触的、进一步抬高自我的谣言。他坚持说，“只要不付清造船费用”，他就拒绝向阿根廷政府交付两艘战列舰。“罗斯福的仲裁努力化为乌有，最后他失去了耐心，对肯尼迪说，他将派海军在第二天下午两点用船拖走军舰，而且他真这样做了。”（虽然关于两艘战列舰的这种说法被后来的传记作家广泛引用，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伯利恒钢铁公司给阿根廷海军造的两艘战列舰“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在肯尼迪任职于福尔河造船厂前两年就有了。）

29岁的约瑟夫·肯尼迪暴露了他管理大批劳工的无能。相比之下，33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却显示了不凡的素质：他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深刻了解美国的最大利益、对广大劳动人民有强烈责任感的民主管理者。在全国各造船厂的10万名工人为海军订货日夜加班加点的紧张时期，罗斯福凭着崇高的人格和高明的管理技巧，不仅使得战时产量直线上升，而且还使劳资纠纷降低到最低限度。

约瑟夫·肯尼迪没有给罗斯福留下很深的印象，没有被解

肯尼迪传

雇已属万幸，这点他十分清楚。为了弥补过失，他全力以赴，为斯宽特姆造船厂建成后公司的接收工作做准备。他被安排在远离管理大楼的一个小办公室管理公司仓库。福尔河造船厂的一个机械师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并不知道肯尼迪是谁。他肯定不是造船的。他对造船懂些什么？什么也不懂！”

然而，根据父亲和 5 个兄弟都在这个造船厂工作的一个工人回忆说，肯尼迪负责仓库和厂内运输。据他回忆，虽然肯尼迪在这任职有“政治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在工作上确实业绩不一般。“他在主货栈负责运输造船厂购进的一切材料。主货栈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他把所有的螺丝、螺栓和铆钉都分门别类的造单存放。他的工作干得相当出色——一切都井然有序，各种涡轮机、发动机、减速齿轮、管道和船用家具，用火车把它们运到仓库。仓库是一个很好的部门，它对造船厂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

去福尔河造船厂工作两个月以后，约瑟夫·肯尼迪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征兵通知来了。地方登记委员会把他列为一等应征者，随时可能应征入伍。但是他想方设法改变这个事实，他甚至说服伯利恒钢铁公司副总裁约瑟夫·鲍威尔亲自从宾夕法尼亚给波士顿地方登记委员会写信说情。当此招失灵后，副总裁又被说服，于 1918 年 2 月 15 日给华盛顿发电报表示抗议，声称对整个船厂而言，其重要性能够与肯尼迪相比的“不超过 6 个人”——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证明，因为肯尼迪在船厂失败的开端才刚过了 4 个月。

鲍威尔之所以替肯尼迪说情，是因为肯尼迪清楚公司不可告人的财务账目，而且肯尼迪还参与其中。（战后人们指控造船厂利用战争谋取暴利，甚至成立了一个参议院直接领导的福

肯尼迪传

尔河造船厂账目审查委员会。)然而,尽管人们看到的利润是不真实的,但船厂的生产没有出现什么问题。1918年4月,5艘驱逐舰龙骨被首次运进已经竣工的斯宽特姆造船厂,造船工作正式开始。福尔河造船厂很快以超常的速度生产出一艘4烟囪的驱逐舰,后来发展成为每天有两艘军舰从该厂下水。

这一成就,当然归功于造船厂工头和熟练工人的辛苦劳动,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培训出一批新劳动力。根据在为英国海军制造潜艇的过程中得出的经验,造船厂从全国各地买来钢板、发动机和其他零部件,然后用类似于福特汽车公司生产T型汽车的流水作业法,把零件组装成军舰。

约瑟夫·肯尼迪降职以后的工作虽然卑微,但却重要——他在福尔河造船厂所积累的经验,为他后来在商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石。造船厂战时生产总值达1亿美元。工人们打破驱逐舰生产纪录固然可嘉,但与约瑟夫·肯尼迪亲手拟订每一份合同,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和材料是分不开的。

这位年轻有为的银行经理逐渐成为杰出的造船业管理人员。1918年,福尔河造船公司已经雇用了2.6万人。肯尼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在为自己购买伯利恒钢铁公司股份的同时,他劝他的父亲也去购买。一度威胁着这个兵役逃避者的战争,竟成为一棵意想不到的摇钱树。他不仅有数目可观的基本工资,而且还另有奖金——福利社经营合同所得的分红。除此之外,造船厂许多舰船的正式下水仪式,使他不仅能够有幸见到伯利恒钢铁公司在全国的董事会成员,而且有机会结识来参加仪式的达官显贵。做为一个酒店老板的儿子,约瑟夫·肯尼迪干得非常好。

然而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这年夏天由于俄国战线上敌对行

动的结束和鲁登道夫 1918 年在西线突破英法防线的失败，美国部队大批参战，战争形势变得对民主国家有利。1918 年秋，德国军队开始退出战争——德国的政权已经从独裁者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在最高军事指挥官关于战争已经失败的确认下，德国人开始议和，1918 年 11 月 11 日，和平会议在凡尔赛召开，双方就停战条件达成协议，战争正式结束。

造船厂还在持续强度地进行着生产，造船厂工人在美国政府的订货合同可能被撤销之前，都在拼命地赶做。到 1919 年，仅仅 27 个月，造船厂就制造了大约 71 艘驱逐舰——超过美国其他所有造船厂产量的总和。

鲍威尔和韦克曼都极力挽留乔·肯尼迪，许诺在适当的时候把他调升到宾夕法尼亚公司总部，然而肯尼迪另有打算。他才 30 岁，一个会大幅度裁员、萧条的战后造船厂，对他已经没有多大吸引力。造船厂使他逃避了兵役，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学会腐败。在他看来，要想成为百万富翁，现在是该走的时候了。

感情危机

1919 年，乔·肯尼迪在位于波士顿米尔克街的海登—斯通公司办事处谋得的一个职位令他整天忙忙碌碌没有空闲。因为他想借此摸索他的股票经纪生意的窍门。他后来声称，在他想方设法凑合大西洋湾兼西印度群岛轮船公司董事长老盖伦·斯通鉴定福尔河造船厂的造船合同时，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他赶到这位经纪人乘火车去纽约必经的火车站，买了他旁边的票。虽然斯通对造船合同不感兴趣，但他却对肯尼

肯尼迪传

迪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乔·肯尼迪只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正如他妻子的记忆有选择性一样。不过这是精明之举。他在一战中获得过几笔可观的投盗收益，但也损失过许多。他想，必须有一种更加可靠且更有利可图的投资方法。他既不留在福尔河造船厂，也不去哥伦比亚信托公司。这一决定是他 1912 年哈佛大学毕业后决定当一个低级银行审查员的翻版。做为一名为股票经纪人谋利的人，虽然工资降低了很多，他却已逐步掌握股票内销、合伙经营和投机倒卖的秘诀。很快他成了证券部主任，开始实现他的第一个 100 万——虽然付出了不少家庭的代价。

至于是否是乔·肯尼迪在外面拈花惹草的行为最终破坏了罗丝·肯尼迪的爱情梦，至今难以确定。后来家族编年史纪录员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曾就罗丝的婚后生活访问过罗丝本人及她的许多朋友。最后得出：乔经常不在家，罗丝只得过修道士般的生活。乔在福尔河造船厂工作时很少在晚上 12 点之前回家。罗丝后来解释道，“他的工作压力太大，除了周末，他只是睡觉才回家。”不过，使乔不回家的不只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有部分是因为罗丝不想服侍她丈夫的行为。

1918 年 9 月，第三个孩子——一个女儿降生了，取名罗丝玛丽。1919 年秋，罗丝第四次怀孕。她对乔的不忠和经常不在家很是反感，声称她受够了。1920 年 1 月初，罗丝丢下她的丈夫和孩子，回到了多切斯特她父母那里。

他们分居 3 个星期。倘若罗丝指望她那风流的、长期不着家的丈夫来卑躬屈膝地请求她的宽恕，那她一定会失望的，因为乔根本不会来。因此，罗丝的父亲约翰·F·菲茨杰拉德只得劝她尽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义务。他自己在 1918 年当选国

会议员获胜，但自从受到有投机行为的指控后，不得已把席位让给他的对手彼得·塔格。他不能再承受一次家族丑闻。他认为罗丝是自找的，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时光一去不复回……罗丝，既然你当初即已许下了诺言，现在你就必须覆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为了信誉，罗丝选择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回到了比尔斯街她3个孩子和丈夫身边。几周后，也就是1920年2月20日，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取名凯思琳。此后罗丝再也没有抱怨过什么。不管怎样，她至少算得上是一个忠贞不渝的、清心寡欲的爱尔兰天主教母亲。

猩红热

罗丝一回家，家里就发生了一场危机——新生婴儿出世不久，杰克便染上了猩红热。

后来罗丝承认她当时“害怕极了”，生怕杰克把病传染给他的兄妹们。更糟的是，布鲁克林没有医院治疗传染病。这时，罗丝的父亲再次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说服波士顿医院的普莱斯医生，杰克因此住进了他的医院。

由于罗丝产后身体很虚弱，仍然需要卧床休息，乔只得去医院照顾两岁的儿子。后来罗丝回忆说，杰克是“一个非常命薄的小孩”，有好些次差点死亡。医院护士对乔·肯尼迪解释说，杰克的病情“恶化”是难以预料的。肯尼迪马上给普莱斯医生写信，信中说，“此前家人从未生过重病，我不知道杰克这一次生病对我可能代表着什么。我觉得，在这最令人担忧的日子里，再没有什么比儿子的康复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了。”神

肯尼迪传

父被请去祈祷，在情急之中，乔许愿，只要孩子能够活下来，他情愿把他的一半财产捐献给教堂。

孩子终于得救了。这个 3 岁的孩子后来被送到缅因州的一个疗养院，治疗了 3 个月才康复。1920 年初夏，杰克回到家中，他的保姆是那样的喜欢他，以致恳求罗丝让她继续留下来和杰克——一个从不哭闹、喜欢嬉戏、像大人似的小孩呆在一起。

杰克的一场病使他父母暂时和好了。杰克回到布鲁克林的家中不久，肯尼迪一家迁往那不勒斯路角上的一所更加气派的住宅——阿伯茨福德路 51 号，这是一所仿殖民时代的建筑修建的漂亮大宅，有二层，里面有弯曲凸窗、环廊、14 个房间和一间可用来停放新罗尔斯—罗伊斯的车库。这所房子建于 1897 年，它是由建筑师格林利夫和科布设计的，占地近一公顷。乔以 1.8 万美元买下并归入在罗丝·肯尼迪名下——一种既使罗丝高兴，又使约瑟夫·肯尼迪可以只拿出 3500 美元去履行他向教堂捐赠的诺言的巧妙安排）。

尽管罗丝虔信宗教，但她喜欢讲排场，这所新房子正好圆了她的郊区梦。搬进来的那周她又怀上了，孩子于次年 7 月降生——又是一个女儿，他们随罗丝患肺结核病的最小的妹妹，给她起名叫尤妮斯。

罗丝后来回忆说：“自从杰克病过以后，乔决心及时了解孩子们在做的每一件小事。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花几个小时谈论子女，讨论孩子们的活动。这使我感到，在我的‘企业’里有了一个合伙人。”

“企业”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字眼——虽然从罗丝 1920 年出于使命感回来，这对肯尼迪一家来说是个很贴切的比喻。乔

可以跟她谈几个小时“关于孩子的事情”，但是，他绝不与她谈论他的业务，即便理由充足。他对别人也守口如瓶。一位曾经做投机生意的人评论说：“股市是不讲交情的。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另一个人说：“你要想问他任何问题，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能让乔信任的人很少很少。”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乔所做的事情不道德。在海登—斯通公司，乔学到了让他几年后即救活了纽约黄色出租汽车公司，又给他自己带来更多利润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股票联营。它是靠人为地哄抬一种股票，骗得股市价格上浮，然后立即抛出的这样一种交易者之间的阴谋。

虽然肯尼迪不向罗丝透露半点他所从事的工作，但是罗丝后来承认，她突然感到“他与政治脱节，变得痛斥时政、更加保守，对社会事务淡漠”。然而她从不向乔打听自1922年开始源源不断涌进家里的财富的来源，乔也不说。罗丝只是全力经营她的家庭“企业”。她后来讲述，她很少“换尿布，但我必须保证手头有很多优质的尿布……每天还要准备大量清洗和消毒过的奶瓶和奶嘴。虽说我亲自做得不多，但我必须保证做事的人把它做好，并且不使这些和别的重要计划相冲突。譬如保姆在厨房正用炉火煮奶瓶和奶嘴，配制喂养婴儿的奶和制作蔬菜酱泥，这时厨子又必须用炉子……可能就会发生厨房危机，言辞过激，伤害感情在所难免，从管理的角度看，会导致情绪和效率陡然下降。”

肯尼迪家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父亲劝回来“履行她的婚姻诺言”的罗丝·肯尼迪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管，一个下达命令和严加管教小孩的家庭行政管理员，她已不是一个母亲。她曾经顽固地企图摆脱父亲的令人憎恶的控制，寻找

肯尼迪传

自由。如今却因父亲的竞选丑闻和丈夫的拈花惹草行为丢尽面子，所谓的自我现在已经消失。她变得对她的母亲的始终不渝的做法崇拜起来，同时像她母亲一样回避丈夫的欲望，以便把精力集中转移到宗教和对孩子“良好的”教育上。她用卡片索引档案法记录孩子的生病情况和重要的成长统计资料（包括他们每两个月称一次体重的数据）；她坚持带他们去散步，“检查”他们的衣服有无破损，特别注意他们的纽扣有无松动。据她自己讲述，她在“缝纫室兼办公室”的特殊工作室里，“为缝缝补补用去了很多时间”。

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冰姑娘”一样，她把冰冻的心掩藏在勇敢和自立的外衣下面。人们对她多次生育却仍然身材苗条感到惊奇。她竭力按照当时的时尚潮流——苗条、匀称、魅力四射——来打扮自己。她还保留着高手俱乐部主任的头衔和其他天主教社交圈中的会员资格。她整天外出拜访朋友——同时准时在晚上5点之前赶到家，以免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士气”低落。她与乔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后来她回忆说：“我们是负有高度责任感的伙伴，共同分享所有努力得来的成果。”

这种晦涩难懂的骗人鬼话，是已经出现病状的一种令人沮丧的爱情婚姻的写照。这种婚姻现在仅仅是一家生产布鲁克林中产阶级孩子的工厂，一种用消好毒了的奶瓶、奶嘴和不松动的纽扣维系的工厂。

小淘气

阿伯茨福德路的环廊很快被用板门拦起成了5个孩子的

“羊栏”，成为他们的专属活动区。罗丝后来解释说，“那样，他们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独自玩几个小时，最起码可以防止相互推倒或者用尖锐的东西扎伤，甚至把重物堆到婴儿车上。”而且，孩子们从走廊上能看到“使他们愉悦的周围全景：过路的汽车、行走的人们（包括许多人是打招呼的熟人）、邮车、带着来时盛得满满的、走时空荡荡的铁丝柜的送奶人、巡逻的警察、卖杂货的男孩、商人、来访者和其他一些朋友——每个人都带着微笑，向孩子们高兴地打招呼。”

罗丝的回忆生动可悲地表明，这种被隔离的走廊，实际上是其那种在社会上、甚至医疗上处于被隔离状态的郊区家庭的缩影。以附近的公立小学（按它的赞助人——17 世纪的乡村警官爱德华·德沃申死后的名字命名，他的装有护墙板的房子还在那里，只是在黄砖大楼的衬托下显得矮小）记载，肯尼迪家的第一名小学生小约瑟夫·P·肯尼迪，1920 年 11 月，5 岁时入幼儿班——一周后由于流行感冒而退学。

小乔在 11 月流感治愈后复学。据采访过小乔的小学老师的传记作家汉克·西尔斯称，这个孩子身高体壮，可惜学前教育严重缺乏，因为他母亲没有让他跟同龄孩子过正常社会生活。只会从阿伯茨福德路房子走廊向邮递员或警察打招呼，毕竟不是孩子正常人际交往的替代方式。西尔斯写道：“小乔起初表现很差。一连几个星期他的注意力都不集中。他感到自己总不能做得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好。他需要帮助。虽然有贝齐·博和科妮莉亚·福尔德两个教师的辅导，以及一个年轻的训练助教的帮助，但是班上有 62 名男孩和女孩……图画和绘画使他感到很为难……他现在变得很敏感，时常因一点小小的挫折而大哭大叫。”

肯尼迪传

杰克成了他发泄的对象。尽管罗丝尽量赶在晚上 5 点半之前到家，“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及时给他们吃感冒药，或者询问他们白天发生的有趣的活动”，但是，她既缺乏感情，又经常不在，这必然影响她儿子的心理。与其说她是母爱来抚育孩子，不如说是在用所谓的“管理”。她曾经离家出走过一次。在缺乏母爱的情况下，两个孩子必定争抢母爱，而他们正是这样——有时像猫、狗一样地厮打。罗丝在回忆中说，“我想他们互相打斗是不可避免的。小乔比杰克强壮得多，一旦发生打斗，小乔肯定狠狠地揍他一顿。”

在新房子里罗丝有一间单独的卧室。虽然即使在乔公开与歌女之类的人鬼混的时候，她也不会拒绝他做丈夫的要求，但是她却可以拒绝与他超出天主教徒义务范围的性爱。“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罗丝产科医生的儿子小弗雷德里克·古德回忆说：

不管他去哪儿，他都带上一个女人；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而罗丝则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度日。回想起来，我现在非常尊重她，虽然当时我没有。她虽不像我的母亲那样经常见她的孩子，但是她必须忍受许许多多！我敬重她这一点。她经常要打听丈夫是否是向东走，如果是，她就向西行！反之亦然！他们很少碰面……试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她避开他——我想这是一种明智之举。至少她挽回了婚姻。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妇女能忍受欺骗主的行为！虽然他应该得到尊重，但我认为他没有尽到一名做丈夫的责任。肯尼迪是缺乏严格管束的，不是吗？

杰克肯定不满哥哥在父亲外出时在同辈中充当长者的行为。“孩子们有各自的保育员。”古德回忆说，兄弟俩自小就是死对头，原因不外乎是缺乏母亲的关注以及后来父亲要求孩子们每事力争必胜的要求的影响。这些在杰克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他继承了父亲浅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眼睛和略呈方形的脸的特征，但他的较一般人都要大的嘴巴、突出的白牙和冷静的性格则更像他的母亲。

相比之下，小乔与他的父亲极为相像的个性则是争强好胜、反复无常、好发脾气，这些特征是他哥哥一生的弱点。当后来人们问起杰克的童年是否有过幸福时，他说有过，不过小乔是个十足的“恶霸”。罗丝本人讲述：“他们俩人性格迥异，他们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在许多方面小乔的性格都不同于杰克，其中较为明显的是他的整洁和条理感……在很小时，他们就经常打架，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有的则是别人告诉我的，都是真正的打斗。小乔年纪大些，个头儿较大，力量也较大，然而杰克尽管身体虚弱，但他发起脾气来，也不好对付。”

记得有一年暑假，有一次杰克错穿了小乔的新泳衣（罗丝为他们买了两件相似的）。罗丝回忆说：

小乔气极了。我劝导他，并向他保证今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然而，杰克四天后又犯了同样错误……那次我不在家，所以我没有亲眼目睹事情的前后，但是我听说小乔十分生气，紧追他的弟弟。杰克一边不时地扭头向后看，一边飞快地逃。穿过草坪，越过湿地，进入海滩，然后沿着老防波堤继续逃。眼看小乔快要追上他，多亏埃迪·穆

肯尼迪传

尔（过去她父亲的秘书，现在她丈夫的杂务总管）出现在出事地点。他立刻明白了杰克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惹得小乔在追赶他，但是这次可能很危急。他高声喊道：“快住手！你们两个都过来，马上过来！”他们照办了。但是一想到如果埃迪没有及时来到会发生的事情时，我浑身都打寒战。我猜想杰克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杰克还经常疑惑为什么大部分时间他母亲都不在他们身边。当罗丝宣布她准备与阿格尼丝外出度假 6 个星期时，立刻遭到了这个年仅 5 岁孩子的指责：“哼，你只顾自己外出，却把孩子们丢下不管，真是太‘伟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杰克已不再和他哥哥打架了，而是埋头于书本。虽然他从猩红热中死里逃生，但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照样经常生病。据罗丝说，正是因为被迫呆在家里，加上家庭教师的指点，他才培养出对读书的兴趣。“他常常卧病在床或者在室内调养，需要消遣，”罗丝回忆说，“所以，只需一点鼓舞，就会激发出来潜在的嗜好。”

事实上，这种嗜好并非天生，而是他对父母在时常常发现的不堪忍受的家庭关系紧张的一种回避的方式，或是他们不在时的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不管怎么说，书肯定引发了他对布鲁克林家的走廊以外的世界的极大的好奇心。约瑟夫·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在他上学之前”，杰克总是问一些一般同龄人都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他相当执着，非要找到加那利群岛不可，因为他已经在比利·惠斯克斯的书中读到过一些有关它的资料。可是我呢，那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加那利群岛。”

罗丝知道桑威奇群岛，但不知道加那利群岛。后来她回忆

说，“我承认当时我不知道，但是我说我能找到，后来我果然找到了，然后在地图上指给他看。”罗丝讨厌比利·惠斯克斯的书，“本来是不允许家里有这种书的，只是我母亲早把它送给他了。在我看来，它的插图相当的糟糕，图画尽是用些浮华艳丽的颜色。”

浮华和艳丽是这位阿伯茨福德路的“冰姑娘”厌恶的色调。据说，她除了讨厌提及性外，她还对描写“贫困、肮脏和懒散”的戏剧和小说非常反感。她自己对书的情趣就像挂在她家墙上的复制画一样，一直是不怎么样的，她只允许小杰克读“家长教师联谊会和图书馆目录中得到过许可”的书。就像后来在家里放映的电影一样，这些书全部都要经过别人的审查、筛选认可，才让孩子们看。罗丝解释，她放电影的原则“是何要放映给我们的小观众的影片，都需事先有人推荐或审查，认为适合小孩观看后方可放映。”她还说，“如果出了差错，发现情节过分渲染，就立即停止放映，把观众送走。”

从医学上讲，罗丝·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正显露出不正常、故作正经和思想僵化来，而这种故作正经和思想僵化，必然使她从来不吻、不摸和很少见到的孩子们更加感到苦恼。她在家时，不符合她价值观念的行为常常被处体罚。她意味深长地说，起初她用她缝纫桌里的一把尺子打他们，然而随着两个大孩子越来越淘气，她开始用木衣架体罚孩子们，常常是手或屁股。她后来解放说，衣架打人方便“随手可以拿到”。

正如她后来一个孩子评价的，这种惩罚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罗丝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并没有证据表明她喜欢“这样体罚”孩子。但是她无法很好的表达母爱这种天然的感情，所以只好用木衣架或有金属柄的发刷代替责备，成为她

肯尼迪传

与较大的孩子们沟通的最常用方式。

也正因为这样，在这个类似“企业”的、清规戒律众多的、缺乏生气的家庭中，孩子们才不得不寻找各自在家中的位置。老大小乔寻找到的充当他母亲所期望他担当的角色，他爱整洁、做事有条理、负责任，甚至慈父般地对待他的弟弟妹妹们——不过对不遵守规矩的对手杰克则不同。据罗丝回忆，使小乔感到恼火的是，杰克经常得到“一份特别的，或者在盆底给他留些浓稠的调味肉汁的食物，因为他需要它们。他的脸相当瘦长，耳朵稍向外支，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所有这些使他看上去活像个小幽灵。但是他是个非常活泼、非常机敏的小精灵，即使在生病的时候也生气勃勃，富有想像力，还常做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因为他独立思考，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想方设法不落俗套。”罗丝后来承认，“其实，过去和现在都令我很困扰，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1921年9月，虽然杰克才4岁，罗丝就送他去爱德华·德沃申学校贝齐·博的学前班就读，然而杰克总不能令人省心，因为从他的健康记录显示，在34周中他仅到校10周。

尽管杰克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但是他还是在1922年9月顺利地升入了爱德华·德沃申学校的小学一年级。他当时5岁，多灾多难的幼儿期从此遂告结束。

白日梦

与他的外祖父菲茨一样，杰克是个天生幽默的人。罗丝在回忆时说：“他是个很有趣的小孩，说起话来总是那样特别、生动”，尽管她自己常常是他幽默的对象。5岁时，他对于母

亲近乎狂热的宗教情结反应相当独特。“杰克不想祈求在安乐中死去，倒祈求得到两只狗。”杰克对她母亲说，他最好的朋友查利有一只名叫白兰地的狗，“因为他父亲是私酒生产商。”她觉得杰克说的话如此的与众不同，便开始把它们一一记在日记里。“爸爸有一颗牙爱吃甜食，是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颗。”他经常说一些风趣幽默的话，如告诉她母亲，老师要来家里“说他的坏话”，因为自己上课不够专心，“你知道，我现在挺好的，如果一个人太用功，会把脑子用坏的！”

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杰克的幽默感使他在家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对待衣服的态度也是同样的幽默。罗丝在她的日记中骄傲地记录了她花 200 美元购买了一件女式长袍，而杰克对穿戴似乎毫不在乎。他的衬衣似乎从来不纳在裤子里，领子也总不翻下来，他总是马马虎虎。罗丝后来回忆说，在她所有的孩子中，他是着装最散漫的一个。夏天如果他不能在 12 点 45 分赶到沙滩上的集合地点，罗丝就“丢下他照原计划驱车出发……因为我说得很清楚，行动缓慢意味着吃一半饭就要出发，以至他经常只吃一点儿午饭。”

罗丝自以为是的刻板的纪律作风对幼小的杰克显然是一种考验，然而他经常设法不搭理它，或者读书，或者故意不遵从她的规定。罗丝回忆说：“我常常感到他心不在焉，一半的心思花在做算术作业或者收拾满地的脏衣服上，另一半则做白日梦。”

罗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杰克在逃避她同样逃避的家庭梦魇。由于丈夫不忠，罗丝把精力都投入了社交活动中，而把子女只当做工作来管理，这是一种杰克即使作为一个小孩也感到无法接受的做法，虽然他从来不公开指责她，但是他永远不能

肯尼迪传

完全忘记他的被遗弃和母亲的剥夺感。这使他陷入终生的、没有结果的罗曼蒂克和性的追寻中。

尽管后来他的兄弟和妹妹们都对母亲近似残酷的强制性教育方式表示赞同，但是杰克知道那只是口是心非，是骗人的鬼话。她希望孩子们做事干净利索、穿着考究、打扮入时、举止大方、谈吐风雅、博学多才、虔诚于宗教和思想纯洁。这既可笑又可悲，因为对杰克来说，她的陈腐的价值观和家庭准则仅仅是一种绝望的自我保护手段，一个从根本上来说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她希望她的孩子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她重复她父亲的算术游戏，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沿着父亲对美国和新英格兰历史浓厚的兴趣走下去。她抱怨孩子们语法的糟糕，强调要正确区分主宾格的“谁”和“我”，第一人称和第二、第三人称的“将”、“可能”和“能够”。她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她的爱在她的生活中，已经像一支蜡烛一样燃尽。

杰克6岁时升入了比克内尔小姐的二年级。1924年，又升入了曼特小姐的三年级，这比大多数同龄人至少早一年。罗丝一直认为小乔是她两个儿子中更聪明的一个，直到看到学校智力测试的结果她才改变看法。罗丝回忆说：“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做很多事情，我认为杰克的智商不如他哥哥，无论什么时候，小乔做事情要比杰克卖力，而且不管他是否感兴趣，他都认真地去，而杰克则喜欢集中精力去做他感兴趣的事情，对其他事情不甚关心。”她向学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觉得老师弄错了，小乔的智商应该更高一些。”使罗丝惊讶的是，老师确认了测试的结果无误并肯定了杰克的异乎寻常的高分。

罗丝在教育儿子上到底花了多少精力，一直存在疑问。罗丝玛丽只比杰克小一岁，接受东西一直很慢，身体协调能力也

差。起初她不会握刀叉，溜冰时不懂得如何保持平衡，不会在雪地滑雪橇，不会游泳，也不会划船。在让罗丝玛丽按照她日益刻板的期望行事方面，罗丝倾注了很多的时间，只是后来才意识到，这可能对杰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在杰克死后多年承认：“他的病相当多，因此需要更多关心，或许在我为罗丝玛丽担忧而分心时，我应该给他更多的关心……他可能小时候感到被忽视了，只是后来才认识到为什么我在罗丝玛丽身上花那么多时间，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至今仍然使我感到有点难过。”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杰克对母亲花在罗丝玛丽身上过多的时间感到过不满。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他父母之间私下的紧张关系和罗丝的经常外出。

然而，尽管从罗丝的角度来说她的“过错”是可以谅解的，但却达到她在家时令人痛苦不堪的极点。她外出回到家时以检查纽扣代替母爱和拥抱的做法，只会使孩子们缺乏母爱的心田雪上加霜。对5个孩子的“管理”，罗丝残暴地按照《妇女家庭杂志》的模范家庭形象来打造自己的孩子们。

这种社会剽窃使罗丝·肯尼迪逐渐变成一个可悲的人物，这个身材娇小的波士顿爱尔兰裔罗马天主教徒常常被人嘲笑说，她表面上装得有涵养、举止端庄、说话得体、信仰虔诚、学识渊博、教子有方，其实是借此在掩盖婚姻的悲剧。肯尼迪家族在1924年若不是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的话，恐怕她会永远成为人家的笑料。

飞黄腾达

1923 年冬约瑟夫·P·肯尼迪发了第一笔横财。他利用盖伦斯通提供给他的小道消息，仅通过借贷 2.4 万美元，就获得利润 67.5 万美元，事实上是来源于庞德克里克煤炭公司的股票。有了这笔意外之财，乔便辞去了在海登—斯通公司的职务。

乔早就想离开这个公司。一年前，他和罗丝被科哈西特乡村俱乐部拒之门外，据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称，由于“他的家族背景”，他希望成为海登—斯通公司合伙人很“渺茫”。

对此，乔很伤心。但是他对辞去海登—斯通公司的职务一点也不觉得惋惜。3 年中他从盖伦斯通那里学到的经验是：只有靠蒙骗才能迅速致富。在海登—斯通公司，欺骗交易不可能就这么蒙混过去。

乔·肯尼迪在门上写道“银行家约瑟夫·P·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坐着，身边有两个亲信——埃迪·穆尔以及从福尔河造船厂挖过来的会计师 E·B·德尔，干着与人合伙蒙骗投资者，利用他人之手炒作股票的金融勾当。1924 年春，他运用日益娴熟的手腕发了第二笔大财之后，离开怀孕的妻子和 5 个孩子，住进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他用 500 万美元做成本，继续他最擅长的工作——炒股。他在饭店房间里住了 9 个星期，通过特意安装的自动收录器了解股票行情。他了解到约翰·赫茨的黄色出租汽车公司的股票被竞争对手——为格子花汽车出租公司效劳的经纪人一再压低，他突击式地一买一卖，让全美各证券所的投机者措手不及，慌忙将手中股票全部抛出，最后救了约翰·赫茨的黄色出租车公司。

肯尼迪传

约翰·赫茨秘密给了肯尼迪一笔现金和一大批其他公司的股票。没过多久，赫茨就后悔了，因为肯尼迪在股票一到手后，就迅速抛售，致使约翰·赫茨公司股票价格暴跌，气得赫茨扬言“下次遇到他，非把他的鼻子打歪不可”。

黄色出租汽车公司的解救成功，使肯尼迪获得了股市上的“精明杀手”的殊荣，但这并没能使他结交到任何新朋友，也没有博得妻子的欢心。他妻子又于 1924 年 5 月 6 日生下了女儿帕特。当肯尼迪 6 月份好不容易出现在波士顿南站时，孩子们齐声喊“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宝宝！”“孩子帕特出生快一个月了，我这个做爸爸的却还未见过她，”肯尼迪后来回忆说，“他们都面带着笑容……但是都有几分茫然和失望，似乎心里都在想，这家伙现在肯定不需要再来一个宝宝了。”

据罗丝向家族编年史记事员讲述，她丈夫之所以帮助赫茨出租车公司免遭破产，是因为他需要钱，用“金钱能换来自由——在他喜欢的任何时间，用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去他喜欢的地方。”罗丝已经离开过一次，现在惟一能拴住她的是她的宗教责任感、丈夫送给她的昂贵礼物和一个接一个地出生的孩子。

虽然罗丝·肯尼迪从消毒奶嘴到检查课业，尽心尽力地抚养和管教孩子，不过在 1924 年夏天她终于意识到，她偶尔会因丈夫长期不在家而失去动力。孩子们在无人管束的时候常常胡闹。小乔提议，他和杰克分别从相反的方向绕街区骑自行车比赛并对撞，结果造成杰克缝了 28 针就是最好的证明，小乔曾经爬上邻居的汽车库房顶：杰克经常“装成各式各样令人做呕的堂吉诃德式的模样”。他们不打架的时候，按照她的标准，

肯尼迪传

他们已经是罪犯：偷当地玩具店的玩具，最使她感到耻辱的是，偷人家的空奶瓶，存放在地下室里，以便积攒起来一并出售。因此，她叙述说，她“决定让小乔和杰克从原来的学校退学，到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诺布尔—格里诺学校的小学部去上学，那里的课外活动有专门的人员指导监督。”

事实与罗丝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据学校记录，小乔被转到了诺布尔—格里诺学校，但是杰克还是在 1924 年 9 月转回到了爱德华·德沃申学校。

也许，杰克的母亲想把杰克留在爱德华·德沃申学校，以便帮她照料 6 岁的妹妹罗丝玛丽。罗丝玛丽 6 月结束了学前班，9 月就该正式升入德沃申学校的一年级。然而，那年夏天，罗丝玛丽学习的糟糕，比罗丝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学校建议，与其让她受跟不上班的罪，不如让她转到特殊学校去。为了罗丝的名誉，在同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和专门研究智力发育迟缓问题的天主教神父请教过后，罗丝决定把她留在家里，给她请一个家庭教师。她把精力一心扑在罗丝玛丽身上，对爱德华·德沃申学校不再过问。1924 年 10 月 22 日，杰克升入曼特小姐教的三年级后一个月便退了学，他被送往位于布鲁克林弗里曼街的诺布尔—格里诺初级小学，每年学费 400 美元，与他的哥哥做伴。

当时杰克 7 岁，他哥哥小乔 9 岁。这年春天小学部主任迈拉·菲斯克小姐对兄弟俩进行面试后，给诺布尔—格里诺学校（它的高年级部在戴德姆）校长威金斯先生写了一个便条，她写道“我们很高兴接收这个小约翰·肯尼迪，他是个好孩子。”杰克脑袋灵活，风趣逗人，确实是个好孩子。约翰·肯尼迪引起出色的校长——迈拉·菲斯克的关注。

不过，这次转学对两兄弟从社会地位上讲是一个转折点。杰克和他哥哥现在进入一个崭新世界，那里是清一色姓名叫巴伯、布莱克、布鲁尔、邦迪、亨廷顿、海滋、兰梅德、梅森、桑伯恩和赖特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杰克后来若有所失地回忆说：“我们可能是学校第一批和惟一的两个天主教徒，而且是惟一的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学生。”约翰·菲茨杰拉德他们的外祖父，两年前参加马萨诸塞州州长竞选，得了让人遗憾的40万选票（以微弱之差输给了当时的共和党州长坎宁·福克斯）——曾经声称，隔开菲茨杰拉德家族和卡伯特·洛奇家族的，仅是“几条船的分歧”。他的外孙们将会发现，种族、宗教和民族偏见的鸿沟在这个新世界中要比几条船的分歧所带来的距离大得多。

初入学堂

罗丝·肯尼迪对把两个孩子送去一个到处是新英格兰人的世界没有丝毫的顾虑，而恰恰是这个英格兰人的世界两年前拒她于科哈西乡村俱乐部的门外，不久当她和乔申请参加排斥性的布鲁克林乡村俱乐部时，又被拒之门外。不过她认为，新英格兰世界对孩子要比对他们的父母可能宽容一些。事实证明，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罗丝·肯尼迪老迈时回忆起来的“有专人监督的课外活动”，纯系子虚乌有。一位与肯尼迪儿子同时代的奥古斯塔斯·索尔回忆说：“我们活动在诺布尔—格里诺学校时惟一在场的是一个所谓的体育教员，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受过电击，还中过毒气。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人，他完

肯尼迪传

全是个傻子。因此头几年并无真正意义的体育监督可言。下午我们相当轻松。”

作为新来的学生，兄弟俩不可避免地成了众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据索尔描述：

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新教徒，也许有少数几个天主教徒，但是绝对没有犹太人。我觉得这里的学生受大人的影响，都很势利。在我看来，那时许多送孩子去这个学校的波士顿上流家庭都非常蔑视爱尔兰人。我的意思是说，那正是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因贪污罪入狱的时候。以至马萨诸塞州民众把所有不顺心的事情都归咎于爱尔兰人。做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别的孩子与肯尼迪兄弟发生争执时都骂他们爱尔兰人或天主教徒。

有关约瑟夫·P·肯尼迪，索尔接着说：“我的父亲与他毫无瓜葛。许多人的父母甚至跟她连话都没有说过，他是那样的可恶。他们认为，肯尼迪先生用银行界称之为令人感到卑鄙的方法赚钱，肯尼迪夫人的父亲，甜蜜的非茨杰拉德先生是个十足的流氓，大家常把这两个家伙联系起来，并说，‘这一对尽干坏事’。”

60年后重提旧事，索尔显得有些尴尬地说：“这些是心胸非常狭窄的人的观点，而送孩子到这个学校去的就是这一类人，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孩子根本不与肯尼迪家族的孩子往来，我敢肯定肯尼迪家的男孩们的日子一定也不好过。他们的妹妹从不被邀请来参加任何社交聚会

——肯尼迪的女儿永远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这些聚会，因为她们反感情绪是那样的强烈……我真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个，但是这确定是事实。”

小乔对这种偏见的看法与杰克完全不同，据索尔回忆：“哥哥乔与杰克的不同犹如白昼与黑夜。乔的身上具有我能想到的爱尔兰人的一切坏特征——非常、非常好争吵，非常暴躁，并且非常好斗。我记得课间休息时——我们的课间休息很长——他总爱向大孩子发出挑战。”

然而，杰克从不跟别人争吵，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货币赌他哥哥的输赢。

那时，大理石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货币，大家都把它当宝贝。大家的裤兜里经常装着一小包。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对父亲说，“再给我一些大理石。”

“你的那些呢？”他问我。

“哦，在一次打赌中我全都输掉了。”

“跟谁打赌？”

“跟杰克。”

我永远不会忘记，小乔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而杰克却面不改色地走来走去，心情平静地赌大理石。我想，从这个就可看出兄弟俩的性格是多么的不同！

罗丝·肯尼迪起初并不清楚她儿子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后来她才逐步地了解。她对此的反应如同对她丈夫不忠的反应一样，是尽可能地回避现实。学校里没有人记得她是否去过学校，是否上午送过孩子，是否下午接走孩

肯尼迪传

子。学校许多的公共活动，罗丝都没有去参加，更不用说帮助了。因而，孩子们都是车接车送。索尔清楚地记得，“是一辆光亮的大汽车把杰克和乔送来……这是一辆很大的、黑色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司机戴着帽子，肯尼迪夫人从来不来。”而她对两个孩子的关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的：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一件趣事是关于校服的。所有的孩子必须穿红色的紧身套衫和短裤的校服——当时没有人穿长裤和长筒袜。然而杰克的母亲罗丝·肯尼迪，我猜想，她肯定是觉得在寒冷的冬天针织套衫不保暖，所以她对两个孩子在针织套衫上都加织了一个风帽。他们是全校惟一的两个有这种风帽的孩子——这使他们遭到了许多嘲讽！

罗丝对衣着的讲究几乎达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孩子不恰当地打扮或不扣好纽扣就不得出去，这是她坚信不移的原则。正如她后来骄傲地回忆时所说：“在学校、教堂和其他公共场合，我要让他们看上去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们小的时候，我给他们买好看的衣服，常常给他们做相同的打扮：小乔和杰克有式样相同的海军服，罗丝玛丽、凯思琳、尤妮斯和帕特有式样相同的海军领罩衫和裙子，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因为罗丝不习惯以拥抱和亲吻表达母爱，所以她决心以缝缝补补来补偿他们。“纽扣，纽扣，还是纽扣……冬天，无论小孩子们什么时候出去，我都给他们穿上长长的裹腿。我算不出佣人和我在把它们扣上和解开上花了多少时间。而且，无论多么结实，缝得多么牢固，它们还是被拽松，磨薄，或破损。”

在丈夫在股市上大肆行骗，孩子在学校饱受新英格兰种族

歧视的时候，罗丝却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纽扣这类琐事上，实在让人想不通。杰克在公众场合谦逊恭敬，彬彬有礼，从来不批评她——但是后来在与朋友交谈时，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母亲或多或少的怨恨。她常常外出或去教堂，从来都没有抱过他，然而后来却声称自己有益于他的超常的能力，特别是他日益增长的对历史的兴趣。“她对历史典故略知一二，然而对时事却不甚了解。”杰克后来评述说，“不，我不能说我对历史的兴趣来自于她，而是我爱寻根究底，我喜欢历史。”

不过，敏感的菲斯克小姐第一次见到杰克时，他超常的智力就被她注意到了。菲斯克小姐和其他所有女教师很快测试出他的智商。奥克斯塔斯·索尔回忆说：“那是一所待人非常友好的学校——没有一个男教师，全是女教师，她们对同学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我想象的始终非常擅长乘法表、语法和训练的英国学校体制……她们很严格，我想即使是男人也未必有这些女人那样严格。”

另一个杰克的同代人霍尔顿·伍德在回忆诺布尔—格里诺学校女教师是何等地严格时说：

英语老师叫道小姐。有个叫本尼·汉密尔顿的学生，他父亲是个牙科医生。有一次他在开玩笑，正好被她碰上。他不知道她站在后面，她从后面好像拍了他一下。她并不是一头公牛或别的什么躯体硕大的东西；她只是个相当矮小的女人，虽然粗壮……她从后面拍了他一下，他的下巴碰在课桌上就立即昏了过去！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多少人开玩笑了！

肯尼迪传

菲斯克小姐的父亲是个传教士。她曾在蒙森学院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接着又在韦斯特菲尔德读了4年教育研究生。1896年开始教书，1904年被调到诺布尔—格里诺学校小学部。“菲斯克是个非常精致的人，特别注意举止和风度。”伍德回忆说：

我记得，她不管教什么，都教得非常好。她钢琴也弹得好。每天早晨我们集合，全校师生一起学习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林肯的第二个就职演说、圣经节选、英国文学名篇之类一些作品……我们学呀，背呀。我们坐在那里，背诵完一行，再加一行，她让我们不停的那样背诵。我想说，我现在仍然能像在今天早晨刚刚背过的那样，背诵出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和他的第二个就职演说。

记者在99岁迈拉·菲斯克去世前不久采访她时，她对教学的热情仍不减当年。“班级虽小，但我们彼此都非常了解。”她说，“我爱孩子们。对我来说纪律从来不是个问题——它从来没有使我为难过。我怎么维持纪律呢？很简单，那就是多接近他们，多去了解孩子的感受。我那样强烈地感觉它，所以他们——孩子们也都感觉到了它，那就是爱！”她继续说，“难道那样要费很多心思吗？要知道，他们要比你聪明得多！”

风趣逗人、酷爱历史的杰克·肯尼迪是她最宠爱的学生。她后来回忆说，一天杰克提议，放学后如果她能带他去附近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参观历史名胜地，他就让他父亲把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借给她用一用。“我记得，罗丝没有来。孩子们都跑出去看那辆很了不起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令人扫兴的

是，开来的竟是一辆破烂的旧福特！我想杰克永远不会忘记别的孩子是如何嘲笑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该不会是出毛病了吧！”

尽管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和种族的偏见，小乔和杰克俩人还是喜欢来这所新学校上学。1925年11月20日，他们家又添了个弟弟，名叫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1925年圣诞节后不久传出令人吃惊的消息——校长威金斯先生已把小学部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诺布尔—格里诺学校的小学部于1926年5月关闭。

校舍风波

菲斯克小姐记录道：

受托人决定在星期天开会。

可怕的暴风雪肆无忌惮地刮着，我们都向学校大楼走去。嗯，你知道，威金斯先生并没有宣布他要废除学校。为了使学校能够在戴德姆继续开设下去，他要另建一所校舍——但是他无力承担。

威金斯先生是一位很受大家敬佩的好校长。可是他要卖掉小学部，这事非同小可。

他带着夫人一道前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提出异议——你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场面。

威金斯问：“出什么事了？”

我说：“威金斯先生，为什么你不事先同我们商量就把小学部卖掉？”

肯尼迪传

他说：“我早就通知了。”

我问：“用什么方式通知的？”

于是我知道他将要失去理智，后来果然如此。

“哎呀，我曾经告诉某某人——我的一位老亲属，要他转告诸位……”

“什么，”我说，“你不能那样随便说一声，就准备把学校卖掉啊！”

在诺布尔—格里诺小学部的所有新英格兰家长中，约瑟夫·肯尼迪是比较不受欢迎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感谢诺布尔—格里诺学校给他儿子的学习生活带来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因此，肯尼迪与另外 9 位家长一起成立了一个援助学校委员会，用集资来的 11 万美元把校址从开发商手中买回来，成立新的学校，并由菲斯克担任校长。

1926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 点 15 分，7 名新的委员会成员在距约瑟夫·肯尼迪办公室所在地仅一个街区的贸易俱乐部开会，决定成立德克斯特学校（以原在弗里曼街建这座房子的家族姓氏命名）——一个“潜心于教育”和“永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校。菲斯克小姐在每一份学校简介中自豪地写道，学校的宗旨是“教育孩子如何学习、如何养成竭尽全力工作的习惯，如何最好地培养诚实、勇敢、坚韧、自信和自制的品德——总而言之，是教学生如何通过自己认真的努力，达到老师在课堂里和操场上教给他们的理想。”

然而，约瑟夫·肯尼迪的这些举动并未使他结识任何朋友。他将此归咎于使他与波士顿上层人士不能一起打高尔夫球的那种反爱尔兰人的种族歧视。殊不知，原因主要在于其自身。他

身材魁梧、不徇私情、精力旺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缘不好是可想而知的。他集冷酷、狡诈和商人的机警于一身，他的财产膨胀的速度之快，早晚会让海登—斯通公司大吃一惊，也会让他的波士顿爱尔兰同胞难以置信。他当时说，在纽约的饭店里操纵股市价格尽管行为卑劣，但有利可图。他对密友说，“我们最好在禁止它的法律通过之前再大捞一把！”

因此便出现了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的现象：“约瑟夫·肯尼迪一方面出钱拯救了他儿子就读的学校，一方面又急于要把学校和肯尼迪全家一起从布鲁克林搬到纽约。种族歧视使他恼怒，好在他脸皮很厚。他最想要的是，能合法地赚更多的钱——华尔街不是波士顿，股票市场未受管制，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去处。

然而罗丝不赞成这个主意。纽约对她来说太陌生。她觉得，住在布鲁克林那不勒斯路和阿伯茨福德路街角那所有三角墙的房子里要舒坦得多，尽管她丈夫那时供得起一个庞大得多的家。奥古斯塔特·索尔感到奇怪，“我非常非常清楚地记得，肯尼迪的汽车司机总是开一辆大型豪华轿车，为肯尼迪家来回接送两个孩子，那是一种自认卑微的做法，因为这位老兄——我们总这样称呼他——完全可以买得起一所非常非常漂亮的房子，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这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

其实，这个谜并不难解。对罗丝来说，要放弃一所她自己住惯了的并且是登记在她自己名下的房子并不容易，要放弃一个对她的孩子似乎是稳定的、罗丝与玛丽可以得到特别教育的家庭条件就更加困难。尽管罗丝有7个孩子，但她仍然是“高手俱乐部”的主任；尽管经常独自与她的妹妹阿格尼斯外出旅行，她还是把波士顿当成自己的家。她不希望抛弃它，不希望

肯尼迪传

离开她的父亲。对她的孩子来说，他是个非常慈祥的外公。

在学校，无论其他孩子狠毒地诅骂什么，小乔和杰克都坚定不移地忠于这位波士顿前市长——他们的外公。外公乘由专门司机驾驶的火车去进行竞选活动时，常常带着小乔和杰克去波士顿公园坐天鹅游艇，去他曾经在那儿作过参议员的州议会大厦参观。菲茨杰拉德外公的开怀大笑所表现出的风趣感、天生的机警、对爱尔兰家族传统的自豪感和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均堪称他外孙的楷模。相反，当孩子们星期日下午被带到温思罗普家去拜访爷爷 P·J·肯尼迪时，杰克清楚地记得，“他不准许我们当着他的面嬉笑，甚至眨眼睛也不允许。”

虽然对上流的波士顿人来说菲茨杰拉德的名字是令人讨厌的，但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却是声名远扬。他 1922 年竞选州长失败，又于 1925 年向波士顿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发出挑战，后又因不明原因退出。这使一家波士顿报纸颇感痛惜，它这样写道：“没有约翰·F·菲茨杰拉德，竞选运动将缺少只有他才能带给人们的某种刺激。喜欢看热闹的人可能会因看不到这位非常富有魅力的人物到处指责市政机构，为获胜而奔波、为失利而苦恼、诋毁对手或被对手反咬而感到遗憾。由于‘这位博士’退出，战斗将大大不同了。”

据传，菲茨杰拉德是在他妻子接到许多的举报他玩弄女人的匿名电话后被迫退出的。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么证明对他风流的本性而言，年龄并不是什么障碍。在 1923 年他 60 岁的生日聚会上，甜蜜的铁茨杰拉德搂住他的两个外孙，向新闻记者道出了他的秘招：“多与年轻人打交道。保持心情开朗，待人友好……他人幸福，你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接着他唱了主题歌《可爱的阿德琳》，并且那晚在电台上还播放了。在 62

岁生日时他宣布，“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广交朋友，珍惜友谊，始终以仁慈为本。”

正因为如此，当罗丝崇拜的父亲来家里时，她像她的孩子一样缠起他来。

约瑟夫·P·肯尼迪的事业在 1926 年初发生戏剧性转折，和谐的日子几近结束。

婚姻破裂

1925 年，约瑟夫·肯尼迪来到英国，试图并购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当时这公司在伦敦、纽约和好莱坞均设有办事处。他出了 100 万美元，对方以价格太低为由拒绝了。1926 年 2 月，在解救了儿子就读的学校后不久，在纽约肯尼迪接到了问他对影片公司是否依然感兴趣的一个电话。正准备与一伙商业挚友去棕榈滩度假的乔，当即做出回复。

肯尼迪见到朋友时称：“对不起，伙计们，看来没法跟你们去佛罗里达了。我今晚就要去波士顿，我已购买了一家电影发行公司。”

肯尼迪在岳父的帮助下，得到了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商人路易斯·柯尔斯坦在经济上进行援助的许诺。菲茨杰拉德认为电影业前景看好，十分高兴。除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和国民肖马特银行外，他又把波士顿前市长的儿子弗雷德里克·普林斯拉了进来——同时指使《波士顿邮报》登出一则头版头条新闻，题为《约翰·F·菲茨杰拉德——最新的电影大王》。

然而，财团成立不久，乔·肯尼迪便立即一脚踢开他的岳父。肯尼迪向来忘恩负义。他不是个赌徒，而是个投机商。20

肯尼迪传

年代初，他就在新英格兰北部买下了连锁影院，这使他获得了颇丰的收入。由此他感到在电影制作方面大为有利可图。因此可见，他购买影片公司不是随机投资，而是一种以打入市场生产部门为目的、有计划的活动。1926年春，他前往设在曼哈顿区一座摩天大楼里的影片发行公司总部正式上任。此后，他进行了严格的成本核算，通过发行股票，减少了占公司贷款的资本总额的18%。他还以为，影片发行公司应该集中精力生产文化层次不高，但又普遍受欢迎的家庭娱乐片，这样做虽不能像好莱坞电影制片厂那样获得巨额利润，但也不致于像一些制片厂那样面临破产。

肯尼迪的助手埃迪·穆尔原以为，购买了影片公司后，他们肯定将在纽约定居。穆尔在1926年秋给他写信说：“我们将很快向实业界证明，我们赚的钱来路不正，一旦我们干起来，我们就将拥有属于我们的一切。到那时，你就能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正儿八经地战斗了。”然而，罗丝·肯尼迪拒绝搬迁。她说：“每一次乔换业务单位，我都不想搬迁。因为我觉得中断与学校的友谊和打乱家庭正常生活秩序不好……况且，换学校也是令人厌烦的，更何况一个学校与一个学校之间，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之间的变换，课程和课本的标准都不一样，转校学生可能发现自己在学校里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为此，我与孩子们又在布鲁克林住了两年。”

于是，小乔和杰克仍旧在菲斯克小姐主管的德克斯特学校上学。这样约瑟夫·肯尼迪则除了经常去加利福尼亚之外，还要奔波于波士顿与纽约之间。杰克的同學惠特尼·怀特回忆说，自己曾在1927年5月29日应邀参加阿伯茨福德路杰克的10岁生日聚会。当他在客厅看到银幕和放映机被支，准备放映关于

牛仔的影片时惊叹不已。杰克的父亲不仅带回了好莱坞影片，还为孩子们买来了全套的牛仔装。罗丝叙述说：“任何上了一定年纪、能够记起汤姆·米克斯的人，都知道这些服装当时在男孩们和他们的朋友中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

那年夏天，肯尼迪一家终于在海恩尼斯港科德角东岸买下了一栋避暑别墅住下。德克斯特学校第二年度的学习介绍手册当时正着手付印。杰克和小乔分别被分在五年级和六年级，下学期定于9月开学。学校又新招收了30名孩子，购置了土地，学校“大约4.5公顷，其中包括若干个设备良好的运动场”。约瑟夫·肯尼迪仍然为11人管理委员会之一。一个新图书室——为纪念威廉·洛弗尔·帕特南而建的——设在三层，图书室内有“数百本百科全书、字典、各科参考书，以及旅行手册、诗歌、小说等名著。”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对杰克·肯尼迪来说都永远用不上了。快9月的时候，他母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马萨诸塞州当时正流行脊髓灰质炎——就是1921年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患病致残的那种病。德克斯特学校宣布开学延期到10月份以后。罗丝很担心，当下决定离开波士顿。

他们于当年9月26日乘包租的铁路客车，举家搬到了肯尼迪租赁的纽约郊区一所豪华大宅。这所住宅家具齐备，处在里弗代尔第252街和独立大道的街角上，从家里能一览哈得逊河。周围树木葱茏，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第二天，小乔和杰克就开始到惟一的不归属任何教派的里弗代尔乡村日间学校报道上学。

在回忆录中，罗丝·肯尼迪写道，她是在最终“确信”乔向电影业的进军“确实是明智的，并且可预见的在将来他的大

肯尼迪传

部分时间会被占去”时，她才同意搬家的。她声称，因为里弗代尔与布鲁克林的居住条件差不多，所以她选择了这里。“在有好的学校，且离家较近，孩子们能步行上学的条件下，我愿意从我们的波士顿郊区搬到纽约郊区。”她认为，“步行上学是一种健身锻炼的好途径，天气好时人心情舒畅，天气坏时可以锻炼人的毅力。它可以使孩子们改变自己的行动缓慢和拖拉的习惯，养成准时和负责的习惯。”

如此说教性的回忆，揭露出罗丝从来不与孩子一起步行或坐车去学校。她对孩子的德操和纪律以及其他一切细节如衣着的严格的要求，只是为了充淡她与日俱增的孤独与不快。

事实上，定住在纽约是罗丝终生的遗憾。正如她后来形容的，它就像“当腹一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当腹一击——罗丝已第八次怀孕。“几个月来，我每天在新房子里醒来，总有一种锥心刺骨的失落感。”她对家族编年史记事员这样说。

罗丝的不快除了来源于迁出波士顿和不断地生孩子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丈夫的不忠彻底毁灭了她少女般的纯真。但不管怎样乔对外至少可以说他非常好地供养了他的一家。他的婚外恋也并没有妨碍他的家庭生活。在罗丝离开她的老家，带着7个孩子来到纽约后不久，乔·肯尼迪就与好莱坞的著名艳妇卷入了炽热的爱情旋涡之中。

桃色事件

1927年11月11日，第5大道萨伏伊广场饭店，乔·肯尼迪与格洛丽亚·斯旺森初次见面。当时任第一国民电影制片厂

导演的罗伯特·凯恩请肯尼迪赞助一笔资金，帮助格洛丽亚改善其摇摇欲坠的公司（她已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了乔的“鼎力帮助”，她才“重新成为表演艺术家，而不再做一名创制自己影片的女实业家”。

可笑的是，当初肯尼迪与格洛丽亚打交道的惟一动机就是要阻止其拍摄一部根据萨穆塞特·毛姆的同名言情小说改写的电影《赛迪·汤普森》。他还在发给美国电影审查人威尔·海斯的抗议电上公开签了名，但格洛丽亚并不予理睬，继续拍她的影片。不幸的是拍影片的预算已经超支。为筹集资金，她只得提出把马利布的房子卖给罗伯特·凯恩。凯恩建议她去向肯尼迪借款，顺便听取他的意见。1927年11月11日，在第5大道萨伏伊广场饭店，她果然这样做了。然而，她轻傲地提醒肯尼迪不该在那份电报上签名，并且告诉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影片发行公司最成功的电影《狩猎大猩猩》。习惯于借款人低声下气的肯尼迪对此很是一惊。

肯尼迪死后10年出版的“格洛丽亚记事”，对这位青年银行家的描述最为中肯，其中一些细节就连罗丝都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她所讲出的实情了。格洛丽亚眼中的“肯尼迪不像她见到过的任何银行家，”他不仅操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而且衣服很肥大，“领结打得不紧。他的眼睛和尖尖的下巴使他看上去更像个普通工人的叔叔。”

然而，这位“叔叔”很快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称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上过学。用手上下比划着平行结算栏，以便说清成本与未来利润的关系。他告诉格洛丽亚：“在好莱坞，没有人懂得为银行家提供必要情况的资产负债表。电影业才刚刚起步，以致没有人知道如何计算折旧，如何摊销，甚至如何

肯尼迪传

资本化。他说，在任何其他行业中，这些都是导致成败的关键因素。这正是他投资电影业的原因，他说似乎还没有人看到电影业光明的前景。”

约瑟夫·肯尼迪非常清楚，他的银行和会计技术能使他名垂好莱坞。不久他便向格洛丽亚吐露，希望把办公室搬到好莱坞。而且他在这位与鲁道夫·瓦伦蒂诺一起演过主角的年轻电影明星的面前，还显露了更大的雄心。据他向格洛丽亚坦言，“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大片”。其实，当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作为一种挑战，他一定要与格洛丽亚较量一番。

当晚带格洛丽亚出去吃饭的时候，肯尼迪向她表明自己想成为她的秘密商业合伙人。他听说她接下来要拍一部名为《乖乖快睡》的影片，但是他对此毫无兴趣。相反，他建议她关闭她那家境况不佳的制片公司，由他的人——能监察每一份开销的经验丰富的会计师——来接管公司。同时他告诉格洛丽亚，要她与当时好莱坞最著名的导演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合作。

“肯尼迪先生再三强调‘重要’这个词。”格洛丽亚回忆说。她承认她在事业的那个阶段，确实很需要一个有商业才干的人扶她一把。她也确信“我正好碰上了这样一个能使我的事业得到好转的商业合伙人。所以，就答应他的合作要求。”

但是格洛丽亚看走了眼。事实上，肯尼迪不但没有帮她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反而毁了她的婚姻和她的事业；非但没有拍出什么大片，反而上演了好莱坞历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失败，一次永远无法挽救的灾难性的影片大失败。

虽然格洛丽亚忍了半个多世纪才肯讲她的故事，但是她对约瑟夫·肯尼迪的评述并不尖刻。尽管她后来与一名地道的法

肯尼迪传

国男爵结了婚，并因此成了男爵夫人，但她还是为这位波士顿情人没有上流社会的做作，“有的只是来自反抗压制和偏见的、好斗的爱尔兰人的自尊心”所吸引。她敬佩肯尼迪野心与冒险的性格，认为他是智力非凡的成功的银行家，“健康而富有……一切都归功于智慧和野心”。最重要的是，格洛丽亚认为约瑟夫·肯尼迪就像她一样——更准确地说，像她的电影业一样，正处在人生的分水岭。好莱坞电影正在蓬勃发展，它是财源滚滚的行业。向全世界进军，从全世界赚钱，它正处在引进有声电影的技术突破的边缘，需要财力帮助。肯尼迪说服哈佛商学院邀请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出席前一个春季电影研讨会——这是一个使他得以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传奇色彩的制片巨匠——从塞西尔·B·德米尔到福克斯、沃纳、朱克和洛接触的英明之举。但是格洛丽亚仍向他指出，想赚大钱，他的做法不行。

然而肯尼迪的决心已定。他于1927年12月跟格洛丽亚回到好莱坞，同去的还有他称为他的“骑手”的4个人——助手埃迪·穆尔和3名会计师查利·沙利文、E·B·德尔和特德·奥利里，“他们看上去像一伙歹徒”，但是对这位至今提携他们的波士顿爱尔兰裔老板却忠心不二，“他们本是4个劳工阶层的爱尔兰人，靠不懈的努力，才在他们非常崇敬的这位爱尔兰裔老板手下升到主将的职位。”

不到几个星期，格洛丽亚便被骗得将她的制片厂心甘情愿地交给了约瑟夫的幕僚德尔，以便让自己能够集中精力，专门从事“演出和其他活动”。在肯尼迪的策划下，她的制片公司被解散并在特拉华另立门户。新公司闪电式的组成方式，正如沙利文所说——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以致这一次我如果

肯尼迪传

不进监狱，就再也不会进监狱了。”肯尼迪的影片发行公司与帕泰兄弟公司即将合并，从而有能力为格洛丽亚有爵位的丈夫安排一个他不会拒绝的职务——帕泰兄弟公司驻巴黎办事处的最高负责人，以便把他从格洛丽亚身边支开。同时，为了达成他与格洛丽亚的协议，肯尼迪邀请她和她的丈夫德·拉·法莱斯·德库德雷男爵于1927年12月底去佛罗里达见他。肯尼迪把男爵送到棕榈滩去钓鱼，把他从现场支开，然后谎称去他的房间打“业务电话”，在凤凰木饭店格洛丽亚的套间强奸了她。格洛丽亚后来回忆说：

他动作如此迅速，以致我们还未来得及说话，他的嘴就紧紧地贴到我嘴上了。他一手抱着我的后脑勺，一手抚摸我的身体，扯下我的晨衣……他一直用拖长的呻吟声说，“不，不，就现在。”他像一匹脱缰的马，疯狂而粗暴，渴求挣脱。一阵急促的性高潮后，他躺在了我旁边，轻抚着我的头发。除了表示歉疚的深情的嘟哝声外，他没有说任何实质性的话。我始终没有说话。自从他到火车站接我时吻过我之后，我就猜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而且当我们静静地躺在那儿的时候，我知道这种事以后还会不断发生。

她的一个朋友称，她已经“把肯尼迪迷住了”。事实上，是肯尼迪把格洛丽亚诱骗到她无法自由活动的商业圈套中的。他解雇了她的广告宣传人之外所有原制片公司的人，把他的人安插进了她的新基金会。他迫使她交出了《赛迪·汤普森》和她的处女作《森尼亚之恋》两部影片的发行权，以便从此抵偿

她的债务。现在她惟一的财产就是银幕表演以及她的肉体，而这两样均在肯尼迪控制之下。“短短两个月，约瑟夫·肯尼迪控制了我的整个生命。”她后来承认。她的丈夫很快“当了肯尼迪的雇员，我被他完全地占有。我的整个生命被牢牢地捏在他手中。”

格洛丽亚当时声称，她相信肯尼迪会为她尽责的。然而，她看错人了。肯尼迪渴望摆脱以前的自我，渴望甩掉那个他坚持带到纽约及波士顿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开始他的新生活。为此，他坚持搬到纽约，情愿牺牲过去的一切，当电影界开山始祖，做年轻漂亮的格洛丽亚·斯旺森的情夫，并雇请像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这样世界著名的导演为他工作。

时至今日，除了造舰船和赚钱，约瑟夫·肯尼迪别无它事。纵然他有银行证书，尽管他在哈佛大学作过有关电影业的系列讲座，但是在好莱坞他仍然没有声望。他希望通过格洛丽亚和雇用施特罗海姆达到自己的欲望。“他重新整理手中的筹码，偶尔虚张声势地宣称自己，少说也能赢一局，”格洛丽亚后来概括说，“现在他的决心是继续赌下去，并开始准备大把大把地赢钱。”

这可能是约瑟夫·肯尼迪惯常的生活模式：积极经营一大批企业，虽然赚的钱数以千万计，却总是因逃跑或不光彩的事情而告终。然而，他那双无情的、看穿大多数同代人虚伪奉承的蓝眼睛，仍然是信心百倍的。世事多变，只有他对商业的敏锐感永远不变。他对格洛丽亚说，“以波士顿人为例，卡伯特夫妇和洛奇夫妇从来不看电影，也不许他们的孩子们去看——这就是他们的佣人对时局的变化比他们了解得多的原因。随着广播和电影的出现，劳工阶级正一天天变得聪明起来，而那些

肯尼迪传

高傲的巴克湾的银行家们，反而逐步成了井底之蛙。”

不过，正是那些高傲的巴克湾的银行家们清楚的认识到不能去做拍摄巨片的梦。肯尼迪私自请施特罗海姆拍摄一部由格洛丽亚担任主角的新故事片，施特罗海姆欣然答应。格洛丽亚写道：“施特罗海姆早就在守候有人资助他拍摄一部独具风格的大片，就如同肯尼迪先生急于在一个知名人士的陪同下走进艺术殿堂一样。”

约瑟夫·肯尼迪的最高艺术水平也就相当于他妻子复制的挂在他们起居室里的创作的水平。他在影片发行公司投拍的都是一些关于牛仔、足球运动员和非洲大猩猩之类的影片。以这样的水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放弃原来的信条的、有创新精神的电影艺术资助人和制片人呢？格洛丽亚后来评论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头脑和激情有余，鉴赏力和才能不足的人。”不过这是后话。

那时候，肯尼迪似乎被这位 27 岁的大灰眼睛、尖鼻子和白晰的肤色的女明星迷住了。她在毛姆影片——一个神甫与他设法从街上救回来的妓女相爱的故事中所受到的嘲讽，对这位 40 岁的波士顿爱尔兰人没有半点作用，因为每夜他都在好莱坞罗德奥路的房子里与格洛丽亚同床共寝。格洛丽亚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度过一段欢快的时间，将近深夜的时候，乔派他的一名‘骑手’驱车送我回家。”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风流韵事与一个法国闹剧极为相像。剧情是这样的：男爵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姑妈在一个年轻情人的陪伴下来到好莱坞，而这个年轻人却希望由姑妈的侄女陪伴他去洛杉矶观光旅游。格洛丽亚叙述说，“我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亨利在的时候跟他睡觉，亨利出国时，与约瑟夫·肯

尼迪在罗德奥路睡觉。”

同样肯尼迪也有两种生活，由于沉迷于格洛丽亚，以至当他妻子于 1928 年 2 月分娩时，他都不在身边。罗丝回忆说，他后来回到波士顿探视她，还“带来三个钻石手镯任我挑选”。“我的一位女朋友顺道来看望我，我立即把 3 个手镯都戴上，以便比较一下哪个好——至少可以说那是一种炫耀。我的朋友两眼瞪得大大的，朝着乔倒吸一口凉气问道，‘要是她生第 9 个孩子，你打算送她什么？’乔瞥了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我会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说完便放声笑起来。”

这个玩笑显然是冲着罗丝来的。她呆在纽约不方便，便回到波士顿靠近父母和朋友的地方，度过她最后的月子——把 7 个孩子交给她丈夫的杂务总管埃迪·穆尔照看。这次又是生的一个女孩，洗礼时取名琼。生产后，罗丝便前往巴黎调养去了——以致杰克在里弗代尔学校的一个老师评论说：“肯尼迪夫人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另雇一个保姆，并出国旅行一趟。”

罗丝后来向她的一個邻居透露，她要丈夫为他的不忠付出代价。“我要他给我一切想要的东西。衣服、珠宝，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她恨恨地说，完全不管这种恶意对孩子们成长将会造成的影响。肯尼迪家族编年史记事员记载道：“杰克告诉一位朋友，每当他看到母亲打点行装，他都会哭。后来才明白，哭只会使她更烦恼，从而使她更多地离开他。”

“4 名骑手”之一的穆尔，像只飞蛾似的在好莱坞围着格洛丽亚团团转。除了按老板的吩咐小心伺候她以外，还得看她的脸色行事，并时刻关注老板与格洛丽亚俩人在事业或性方面的合作状况。多年后，乔居然向杰克夫妇公开地炫耀他与格洛丽亚的风流韵事和格洛丽亚身上的秘密区域，特别是她的生殖

肯尼迪传

器。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他拿格洛丽亚开玩笑说，她欲望极大，“一夜干5次”，每次都来性高潮。即便如此，格洛丽亚仍无法满足乔·肯尼迪的欲望。很快全好莱坞都知道了内情，尽管肯尼迪企图对此事保密，格洛丽亚把它称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与马里恩·戴维斯的翻版”。

施特罗海姆刚完成剧本手稿，约瑟夫·肯尼迪便返回纽约去审阅。施特罗海姆“用一个银盘装着手稿，由两名穿着虎皮，化装成努比亚奴隶的黑人”抬着呈给他。肯尼迪看了欣喜若狂，他写的是一个以德国和东非为背景的荒诞离奇的爱情故事，暂定片名为《沼泽地》。

与其说《沼泽地》是施特罗海姆的一部新电影，不如说这是对肯尼迪私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位波士顿爱尔兰人银行家乘火车回到他的加利福尼亚年轻情妇那里，便立即把剧本拿出来给她看。他用钻石手镯骗到了她妻子禁欲主义的忠贞，用“4名骑手”拴住了格洛丽亚，现在他要潜心制作巨片了。格洛丽亚回忆肯尼迪道：“‘嘿，告诉你，格洛丽亚，’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认真而又得意地说，‘这将是一部很大、很大的影片。’”他“像一个大男孩，高兴得想跳起来，只因即将要做的事情而不得不严肃。”

出于一个银行家的慎重，肯尼迪首先把手稿拿去给《生活》杂志的电影编辑和戏剧编辑看。编辑看后告诉他，这是“迄今最好的电影故事”。此外，为了减少他的投资，肯尼迪还雇用了两名制片人，帮助花钱如流水的施特罗海姆“节制预算”。但是实际上，约瑟夫·肯尼迪正在跳入对一个银行家来说是一片混沌的水中。与罗丝禁欲主义的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相比，格洛丽亚有不可比拟的魅力，为这种魅力所吸引的乔

肯尼迪传

·肯尼迪希望在演员灯光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必须向他自己和我证明，”格洛丽亚讲述说，“他能办到的一切就是让我在他制作的影片，而且是大片中，担任角色。”

肯尼迪打算送给格洛丽亚的下一件重要东西就是孩子。据格洛丽亚回忆说，1928 年秋，他要求她来纽约。她后来声称，她对这个要求大为震惊。她知道，那将毁掉她作为银幕偶像的形象和她的事业——这个念头表明肯尼迪的头脑已经糊涂到了何等程度。他不仅带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露面，甚至还坚持要带她一起回家，在里弗代尔举办的万圣节晚会上见见他的妻子和孩子。

格洛丽亚后来写道：“总而言之，在那种形势下，男人的一切复杂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他主宰着一切，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办不到的。我甚至不想与他争辩，因为争辩只是白费力气。”

格洛丽亚和前夫生的一个女儿也叫格洛丽亚，就要庆祝她的 8 岁生日了。最后达成妥协，格洛丽亚的 2 个孩子参加万圣节晚会，只是格洛丽亚本人不参加。像影子似地常随左右的埃迪·穆尔把孩子们送到肯尼迪家，他们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小格洛丽亚“不明白，怎么一个家里有 8 个孩子。她特别喜欢名叫杰克的男孩。她说，他只比她大几岁”。

11 岁的杰克对小格洛丽亚的父亲更感兴趣，这令格洛丽亚疑惑不解。“是真的吗？”斯旺森抱紧她的女儿，“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他，汤姆·米克斯吃饭去了。”小格洛丽亚回答。

据格洛丽亚回忆，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形。罗丝·肯尼迪和她的孩子们全被蒙在鼓里，杰克甚至给他父亲寄去一张明信片

肯尼迪传

片，附言中请他代自己“向格洛丽亚问好”。肯尼迪的妻子和儿女们不知乔的用意所在，格洛丽亚·斯旺森本人是否知道乔的用心，也是值得怀疑的。

喜新厌旧

1928年夏，因影片发行公司与帕泰兄弟公司合并，纽约《新闻报》把约瑟夫·P·肯尼迪称为“电影界未来的拿破仑”，他还被聘为第一国民电影公司的“特别顾问”，年薪15万美元，并且享有制片及发行的垄断权。

然而，不管是纽约《新闻报》，还是格洛丽亚，都猜不着这位古怪的爱尔兰小伍长的想法。1928年8月肯尼迪在起草合同时设想，他下一步要把影片发行公司与帕泰兄弟公司、第一国民电影公司合并，使它成为大型电影公司。但不久第一国民电影公司总裁突然变卦，肯尼迪的合同被宣布作废。他别无选择，只好辞去第一国民电影公司的职务，公司的所有合并如昙花一现般地匆匆而过。肯尼迪立即与他的同事——影片发行公司的导演约翰·默多克一起飞往法兰西，“详细研究他们公司的未来发展动向”。他返回后把影片发行公司与美国无线电公司合并成拥有约8000万美元固定资产的控股公司——雷电影片公司。他不仅因周旋这笔交易让15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且迅速出售他在影片发行公司连同在盖伊·柯里尔公司的股份，得到500万美元。1928年12月，即他与格洛丽亚通奸后一年，他卖掉了他在当时已由美国无线电公司经营的新的雷电影片公司的股份，又得到200万美元。到圣诞节时，他又赚了至少500万美元。但是从电影上获得的成绩的角度看，他

已经被发遣到了厄尔巴岛。除在帕泰电影公司挂名担任荣誉顾问外，在电影业界他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头衔和股份。这位电影界“未来的拿破仑”刚刚出现，就被打败了。

格洛丽亚·斯旺森那时是否意识到肯尼迪正在逃离电影界，至今尚不清楚。为换取她的肉体，肯尼迪答应帮助解除她的一切商业顾虑，她则确信他真心迷恋着她，对他百依百顺。但是他仍然迷恋着她吗？他曾经声称，他要制作一部“大”片，在胶片上刻上他和著名导演天才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的名字而在好莱坞青史留名。可是，施特罗海姆还没有开始拍摄，肯尼迪就像一个胆小的军官一样，在开战之前丢下了他的要塞逃了。原因何在？是他抵抗不住暴利的诱惑还是他害怕失败？还是他有了自知之明，深知自己尽管精力充沛，有商业头脑，但却是一个不能与同事和下属互相迁就的一意孤行的人，不适合在变化莫测且需长期认真经营的大公司里工作，就像 10 年前在福尔河造船厂一样？1928 年 8 月，整个好莱坞电影业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中，不料几个月后他却再一次被踢出局。虽然他在格洛丽亚制片公司中仍拥有股份，但没有人对这个公司的股票感兴趣。

这确实是件棘手的事情。1929 年 1 月他给格洛丽亚近 75 万美元，拍下好莱坞有史以来卖座最差的一部片子。这部片子成了他企图成为著名电影制片人的一个悲惨的墓志铭。

对于一部无声电影，施特罗海姆的史诗片在开拍以前就是多余的。私下肯尼迪对施特罗海姆说，“冯，最乏味的有声电影也胜过最好的无声电影。”把《沼泽地》改名为《凯利皇后》也毫无起色。费用大大超支，格洛丽亚快要急疯了。她讨厌施特罗海姆拍片的风格，从摄影场跑出来给肯尼迪打电话。

肯尼迪传

“约瑟夫，你最好赶快到这里来一趟。我们的导演简直是一位好指使人的老太太，”她埋怨他，“你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地阻止我拍《赛迪·汤普森》。好，我向你保证，跟《凯利皇后》相比，《赛迪·汤普森》就是《森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完了，全完了！真可怕！现在你是不是到这里来作个了断？”

身在棕榈滩的肯尼迪只得两边说好话，他一方面支持施特罗海姆完成无声片，一方面让另一个制片人本·格莱齐尔担任这个剧本的有声片执导。

肯尼迪刚到好莱坞，格洛丽亚便立即把作废的数万英尺的无声电影胶片拿给他看。在好莱坞电影摄制场，肯尼迪有一所孟加拉式的专为格洛丽亚盖的带私人卧室的平房。一小时后，“他一屁股坐在平房里的一张深椅子上，转过身去背着我，竭力不让自己失态。他双手抱头，发出低沉微弱的声音，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陷阱里呜咽的声音。最后他终于开了口。话说得平静。开头就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失败过’。”

1928年11月，格洛丽亚与施特罗海姆合作拍片。乔的妻子称，施特罗海姆已经“以乔意想不到的方法改变了故事情节”，并进一步说，“凭着冯·施特罗海姆极富想像力的头脑，随便编出来一个女修道院的女孩被引诱这样生动的一幕。”

然而，那一幕并非是编的。罗丝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往深入想。它从施特罗海姆第一次向肯尼迪递交手稿时就有了。在肯尼迪的坚持下，施特罗海姆只删掉了部分情景，而没有更改内容。格洛丽亚担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可能会把影片淹没掉的不断膨胀的堕落感。她确信，这将使影片不能通过好莱坞影片审查人威尔·海斯的眼睛。

半个多世纪后，人们无法接受那个时代的虚伪、双重标准和焦虑。29岁娇小的格洛丽亚准备演一个16岁的少女，与一群女修道院女孩一起站在非洲的草原上，向一个骑马经过的德国王子屈膝致敬。她准备让她的“短裤掉到脚踝处”并“用脚使劲踩着把它脱下来”，以这个动作引起王子注意。当王子笑话她的窘态时，她“把短裤揉成一团向他砸去”。这些是导演要拍的镜头，惟一的争议在于王子的反应。施特罗海姆坚持要求男演员沃尔特·拜伦不仅要接住短裤，而且“要把它拿到自己的眼前。这个画面在1928年是无法想象的，”格洛丽亚一本正经地回忆道，“连提出来都是一种罪过。”

然而，就在那时，在柏林环球电影股份公司，另一个德国天才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抢先拍摄了一部有类似镜头的影片：女主角把她的花边短裤（确切地说，在她的闺房）扔到一位为跟踪逃学学生来到“蓝天使”夜总会的普鲁士教师的脸上。冯·斯登堡这部由玛琳·黛特丽主演的有声音影片，成为那一年在巴黎、伦敦和纽约轰动一时的大片。相反，施特罗海姆的无声片《凯利皇后》却无人问津。

尽管乔·肯尼迪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竭力挽救影片使其免于破产，以收回他给格洛丽亚制片公司的贷款，可惜为时已晚。格洛丽亚本人开始考虑抛下她的负债累累的制片公司，转而与过去的老板——好莱坞制片人杰西·拉斯基签约。

肯尼迪不是那么甘愿服输的人，至少不是不经过战斗就投降的人。他同格洛丽亚做了“激烈的摊牌”，坚持“无论如何影片的最后道工序必须完成，因为如果影片不完成，不仅损失的钱太多，而且面子也会被丢尽。”于是他们雇用了一位名叫理查德·波莱斯瓦夫斯基的波兰移民，对施特罗海姆的初步

肯尼迪传

剪接进行重新编辑和配音，另外聘请了3个人——萨姆·伍德、德尔马·戴夫斯和劳拉·克鲁斯负责有声版的制作。

为稳住他的妻子，那年春天乔在纽约紧靠里弗代尔的布朗克斯维尔区的庞德菲尔德路给罗丝买了一栋有12个房间的殖民时期式样的豪华住宅。与此同时在好莱坞，为博得格洛丽亚的欢心，他答应资助她拍摄一部新的有声的名为《非法入侵者》的电影。直到得知父亲因得肝癌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才从加利福尼亚匆匆赶回波士顿。但是，5月中旬肯尼迪又返回了好莱坞。就在他刚到达拍摄现场时，他收到了一份家里来的电报，说他父亲于5月18日逝世于波士顿狄肯尼斯医院。

肯尼迪真是冷酷无情，他甚至没有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后来罗丝声称，“那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后来他确实写信给13岁的儿子小乔，感谢他代表他主持了葬礼：“得知你参加了祖父的葬礼，甚是欣慰。”他在6月3日的信中写道，“有你做我的代表，我感到很骄傲。多帮母亲做些事，我将尽快回去。”然而，当格洛丽亚得知乔的智力发育迟缓的女儿罗丝玛丽住进了医院时，当即提出让她的营养专家去帮忙，肯尼迪气得脸都发青。“我以前只看见他跟别人发过脾气，但是这次是他第一次朝我发脾气，那样子真可怕。他的蓝眼睛先是变得冰冷，然后变成冷酷无情……可怜的乔，我伤心地想。我永远猜不透他的心思。这是不是我当时已经觉出一点苗头来了呢？”

她确实看出来了，她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肯尼迪对制作一部“大”片的强烈渴望。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出肯尼迪正在迅速收敛他那拿破仑似的野心，更不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给他的良知带来的不安和痛苦。尤其是，她原以为他不在乎借给她公司的那几个钱，事实上他在乎，在乎到为了不赔进更多的钱，

他甚至舍不得抽时间去陪陪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虽然他继续鼓励格洛丽亚拍新片，但是他非常害怕悲剧重演，所以故意不去参加脚本的审查，而是派了埃迪·穆尔做他的代表。

这是一部喜剧片，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制作完毕。如果宣传工作做得好，有可能弥补肯尼迪制作《凯利皇后》损失的一部分费用。大规模首映式都安排在纽约、伦敦和巴黎。因为肯尼迪资助了这部片子，所以他坚决要求他妻子和他陪同格洛丽亚去欧洲。

银幕偶像格洛丽亚·斯旺森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于1929年夏乘飞机抵达海恩尼斯港的。当地的一位作家写道：“格洛丽亚女士一行乘坐西科尔斯基水上飞机，降落在离肯尼迪避暑别墅不远的防波堤附近的港口。当格洛丽亚女士——娇小，漂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副贵族气派，因为她已经嫁给了德·拉·法莱斯·德库德雷男爵——走下飞机时，海恩尼斯港的居民夹道欢迎。”

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一生都难忘的时刻。因为格洛丽亚甚至在9岁的凯思琳·肯尼迪及其朋友们用做俱乐部的汽车库的墙上都留有签名。不过当时的情形至少对格洛丽亚和罗丝来说是很尴尬的。罗丝并非不知道丈夫与格洛丽亚的关系，但她的泰然处之令格洛丽亚置疑。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问自己，难道她是个傻瓜，是个圣人，抑或是个演技比我还要高的演员？”

然而，究竟是谁欺骗谁呢？格洛丽亚一直以为肯尼迪深深地爱着她。或许，一年前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尼迪就已经是这样。但是，到1929年夏，他与她才结束。他以往的谄媚隐藏着他用新电影赚足够的钱，来弥补他在《凯利皇后》上的巨大

肯尼迪传

损失的企图。虽然在她的回忆录中，罗丝·肯尼迪把年代和月份搞错了，记录的是关于施特罗海姆“大失败”的再传，但是关键的地方还是记得比较准的：她的丈夫在《凯利皇后》上投入了一大笔钱，只得寄希望于通过积极宣传推销《非法入侵者》来弥补他的部分损失。

肯尼迪对格洛丽亚虚情假意地说，他带罗丝和他妹妹一起去只是为对她妻子有个交待。“她从来没有去过欧洲，”他谎称，“我已经答应了她这次旅行。拜托你，格洛丽亚，她想见见你。”肯尼迪对这位女演员讨好说。“一旦他下定决心，什么杠子也撬不动他，”格洛丽亚评价说，“我可以整天和他争论，但是我知道，我只会被他驳倒……他说我一直使他非常快乐，他说一切都将是美好的。”

事实上，罗丝已去过欧洲许多次。单在去年夏天就在欧洲逗留了三个星期。乔对格洛丽亚担保——“到欧洲去旅游，会见很多人，搞很多活动，受各种各样的吹捧”都实现了。无论到哪里，格洛丽亚都是明星、偶像。闻讯赶来的群众，一见到她就欢呼雀跃，激动不已乱成一团。罗丝·肯尼迪个子不高，只有 5.3 英尺。而斯旺森更矮，他以拥有一只 2.5 英寸的灰姑娘似的鞋而自豪。

这次巴黎之行对罗丝来说，只是一种形式。格洛丽亚明明与丈夫不和，却还应乔·肯尼迪的要求，在公开场合和他手拉手，表现得十分亲热。格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谴责肯尼迪是破坏她婚姻的元凶，声称肯尼迪的“热情关照”，使男爵感到耻辱。格洛丽亚写道：

如果当初亨利让我离开电影业，与他一起到法国他的

农场上生活，我一定会听从的。但是他不曾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乔·肯尼迪对我们俩人作了让步，保证永远不会破坏平静，而这正是亨利和我所期望的。我以前从来像信任乔一样相信过别人。但是，我确实喜欢他。这个男人确实令我着迷。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祈求亨利能够容忍，继续爱我，直到我恢复平静的生活为止。但是，目前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像一个复杂的结，无法解开。我只有等待，不能放弃希望。

不过，格洛丽亚并没有等待，她发现了好莱坞一个青年女影星——康斯坦丝·本内特寄给男爵的情书，就在出席巴黎首映式之前与丈夫摊牌，以离婚诉讼相威胁。

于是，巴黎之行变成了另一场法国闹剧。男爵呆在巴黎里茨饭店一个单人套间里，因为格洛丽亚拒绝与他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据罗丝回忆，肯尼迪的单人套间成了男爵与格洛丽亚的调解处，罗丝和乔的姐姐玛格丽特对此“感到不安和困惑”。

这场闹剧，自然是格洛丽亚对丈夫不忠的兴师动众的大发作，可是在她反抗丈夫外遇的同时，自己却正与情人一起旅行。更不可思议的是，一起旅行的不只是他的情人，还有他情人的妻子和妹妹。

也许格洛丽亚故意设计了这场摊牌，迫使肯尼迪表态。的确，她在几年后透露，肯尼迪曾求助于天主教会，希望主教同意他离开合法妻子，公开与她同居。她还说：“自伦敦首映式后，乔比过去更加沉迷于我。除了他的一片痴情外，他现在还把我看成他在电影界惟一信赖的能够给他指导的人。”

事实上，乔·肯尼迪早就不从事电影业了。他最不喜欢别

肯尼迪传

人的指导。他想要的是他的钱能失而复得，然后一走了之。虽然后来的作家都嘲讽罗丝·肯尼迪故意低调处理或者不计较乔的风流韵事，然而实际上，恰恰是罗丝占了上风。她对这位受骗的银幕女神感到怜悯。虽然记者“臆断，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过不快的事情”，但是罗丝后来透露：“我知道，我从来不用担心什么，我只为可怜的小格洛丽亚感到惋惜。”

罗丝这样说是充分的证据的。虽然格洛丽亚使伦敦和纽约的观众继续为之倾倒——有时不得不被观众脸朝下地用手托着从头顶上传送到电影院里，但是，不管是作为肯尼迪的情妇还是作为银幕偶像，她都完了。她后来拍的电影都很不成功。纵然风光一时，晚景却不免凄凉。

罗丝·肯尼迪觉察到了自己的成功，便匆匆“赶回布朗克斯维尔孩子们身边”。她回忆道。杰克学习成绩特别优秀，1928年春季从5B班成功地转到了5A班，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升入6A班（一年中他两月一次的历史考试分数是90、90、95、90、97和91分），甚至还获得了里弗代尔学校优秀作文奖。

不过，罗丝对杰克的作文并不感兴趣，在巴黎她揭开了自己生活的新的篇章。在巴黎，“当漂亮的时装模特儿摆弄着身体，在装饰豪华的T型台上来回轻盈地走动表演的时”，她一直坐在那里入迷地看着。这里正在向格洛丽亚展示吕西安·勒隆的最新服装款式，尽管她的服装账单已经多得惊人。“不可否认，这使格洛丽亚十分得意，因为女售货员和管理人员始终不离她左右，注意她的每一个突发的念头；女孩子和顾客们都不停地偷看她。她是大明星，相比之下我只是个无名之辈……”

令她的孩子们吃惊的是，这个无名之辈现在竟然决心要成为重要人物了。

警 示

在与格洛丽亚较劲心理的刺激下，罗丝·肯尼迪开始沉溺于珠宝和几乎可以与后来成为温莎公爵夫人的沃利斯·辛普森的衣服相媲美的礼服，特制香水（她甚至不愿与她的女儿分享）、卡地亚的珠宝和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子时装店的服装，这是罗丝重新展示自己的三件法宝。“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服装特别感兴趣，”她解释说，“这一改变不仅是由于这段插曲，而且还因为总体环境的变化，只是这段插曲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部分。”

“显然在天生丽质上我无法与格洛丽亚·斯旺森相比，”罗丝承认，“不过只要保持身材苗条，肤色娇嫩，打扮入时，并经常穿令人魅力四射的漂亮衣服，我就可以充分展示我的优势。”

但是，如果罗丝·肯尼迪认为格洛丽亚·斯旺森式的服装能够使她平步青云地踏进纽约上流社会，那她注定会很失望的。正如杰克的一位朋友直言，纽约上流社会仍然以肯尼迪一家信奉“爱尔兰天主教”为由回避他们。比如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罗丝·肯尼迪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就是她的声音难听了一点儿。”

无论罗丝怎样无视丈夫与他的婚外恋，天主教徒们仍然为格洛丽亚的“桃色事件”深深地震动。罗丝在她的回忆录中也体现得十分大度，但感情的创伤至少需要数十年才能愈合。菲

肯尼迪传

茨杰拉德家认为罗丝是乔的极端自私的牺牲品，因而永远不会宽恕他。多年后还出现过一场难忘的辱骂。“我们在拉瓜迪亚机场，”美国航空公司一位空中小姐回忆说：

我当时飞波士顿到纽约的航线。大概在 1944 年末或 1945 年初，机场上聚集了许多新闻记者，他们听说有一位知名人士要从加利福尼亚来。尽管飞机晚点了，他们还是在耐心地等待。大概是在凌晨 1 点 30 分。就在大伙儿向飞机蜂涌而至时，一辆高级豪华轿车突然出现，一个小老头儿从车里下来。我问州警那个人是谁，他说他是波士顿前市长约翰·菲茨杰拉德。

看到格洛丽亚·斯旺森与乔·肯尼迪一起走下飞机，这位前市长发疯似地朝他们奔去，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两人骂得狗血喷头，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你，你这个畜生，怎么敢与那个淫妇寻欢作乐，而把我的女儿放在家里……”我那时刚刚 20 岁，不知道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被人破口大骂，那肯定是令人很没面子的事。

菲茨杰拉德那时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然而，这个骂却使人回忆起许多年前的事情和罗丝的父亲为她承受的痛苦。乔在 1929 年秋表面上与格洛丽亚结束了关系，罗丝重新夺回了她的丈夫。事实上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十年的嘲讽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排斥，这常常使她感到孤独和郁闷，一方面不得不更加虔诚，另一方面更频繁地出国，去选购最新款式的女时装或者钻石饰物。

“你知道，他们有不同用场的保姆，”罗丝医生的儿子后来回忆说，“他们无论任何时候都雇用一名护士，去科德角时也是这样……我认为他们没有像我一样可以称之为亲密朋友的人。虽然他们有许多伙伴，但是我想他们没有亲密的朋友。不管何时举行聚会或集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都发觉，除了他们彼此间，他们不接触任何人。”

受丑闻的影响，肯尼迪夫妇发觉他们更加不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在天主教良好的教育的背后，衣服纽扣永远整整齐齐的肯尼迪家的孩子们，经常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状态中，不得不彼此依靠。不幸的是，连这种庇护就要从他们身边很快消失，因为自格洛丽亚桃色事件之后，他们又要背上新的木枷锁——寄宿学校。

第三章 寄宿学校

乔特中学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许多作家都添油加醋地把肯尼迪家吹嘘成美国父母教养子女的一个完美的典范家庭，而对其家庭悲剧避而不谈。一篇篇的文章、一本本的书接二连三地描述约瑟夫·肯尼迪是如何向子女传授要广学博识、灌输竞争精神和好胜心的。他们对肯尼迪夫人关心社交、虔诚宗教和一口好牙齿也大加称赞（她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赞美她自己）。

可悲的是，这些虚构的评价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背后的事实却是不为人所知的——父母经常不在家、父亲与格洛丽亚之间的风流韵事、以及父母之间长期关系不好造成的各自内心的痛苦手感情空虚，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其中一个子女后来埋怨她的母亲说：“我8岁时就被关进了寄宿学校。我真不明白，天底下怎么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那么，你们要我怎样？”罗丝反问道，“你们的父亲总不在家……我没有时间照顾你们，孩子们。”

但是她的已是成年妇女的女儿并不谅解她，她叫道：“那就是我至今仍然毫无感情的原因。”

确实，肯尼迪家的孩子们与无数只注重社会地位，不注重

伦理感情的英国家庭的孩子相差无几。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家较年长的孩子能与英国伙伴相处融洽，进而发生一系列越洋恋情和两桩婚姻悲剧的根源。

1929年在喧嚣的20年代行将结束的“特殊情况”下，寄宿学校问题已经出现。在英国，把孩子送往寄宿学校进行“生活体验”已成为传统。这种传统在19世纪得到了推广，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私立学校，为维多利亚女王不断扩充大英帝国培养了一批感情上迟钝但却能力很强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美国也仿效开办了像格罗顿、米尔顿和安多弗这样的学校。

约瑟夫·肯尼迪虽然并不崇拜英国，但是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掌握超强的生活能力，并帮助他们冲破社会限制。因为尽管他有钱，却仍然感到受限于这种社会。因此，在1929年春，乔给曾是他的棒球教练，后来当了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镇乔特中学历史教师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拉斯·艾尔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乔询问他的两个稍大些的儿子将来从里弗代尔日间学校转到乔特中学上一两年的可能性，目的是为他们进哈佛大学创造更好的条件。

艾尔斯把肯尼迪的信转交给乔特中学的副校长沃德尔·圣约翰。圣约翰在回信中写到，学校确实每年招收三四名与你孩子情况类似的男孩，如果肯尼迪兄弟俩“继续保持他们目前正取得的良好成绩，”他们被录取的可能性是“较大的”。不过，他同时要求肯尼迪“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你若准备让孩子通过这所学校进入大学，那么他们就应该至少在这所学校里学3年，当然我们认为4年更好！”他接着说，“我们越来越发觉，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学生真正有望成为学校的尖子，并能在同学

肯尼迪传

们中间找到他自己适当的位置。”

乔·肯尼迪在他的西 45 街帕泰交易公司办公室里立刻复信说，他颇感兴趣于“你所说的好处。我惟一不放心的是，我觉得，孩子一旦现在就去寄宿学校上学，实际上他们就永远离开我们了。因为在那里住上 3 年，然后大学又上 4 年。你知道在那以后要见到他们是多么不易的事情。或许为了要孩子们留在身边而让他们再等一年去上乔特中学，这种做法也许太自私了。”他在信中这么说。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去加利福尼亚情妇那里了，而且，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所以这封信结尾写道：“我将与他母亲好好研究此事，尽早拿定主意，按你所建议的那样提出申请。”

沃德尔·圣约翰可能感到鱼已经上钩，于是开始收线：“信已收到。首先感谢你 4 月 20 日的回信，很高兴你犹豫让乔和杰克离家到乔特中学来上学。我很欣赏这封信，因为它充分地体现了你们矛盾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对已经把家变成孩子们的天堂的父母来说是非常平常的。”圣约翰在回信中这样坦言，“我们的校长常常非常诚恳地说：‘当一个孩子离开幸福的家来到一所非常合适的学校，他必然比以往更加喜欢他的家。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配当一所寄宿学校的校长。’”他敦促肯尼迪先生及其夫人和两个孩子，“在你们任何方便的时间来访问我们，以便能对我们和我们的学校有个全面的了解。”

然而，肯尼迪回波士顿看望病危的父亲，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直到父亲去世。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他确实抽不出时间。况且，他在好莱坞一住就是数月，并且还打算去欧洲 3 个月。即便他的儿子仍在里弗代尔乡村日间学校上学，他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照看 8 个孩子的罗丝，甚至比她丈夫更不愿意

把十几岁的儿子留在家里。虽然她较喜欢罗马天主教寄宿学校，但她并未因此而提出异议。事实上，据小乔称，她非常愿意把他们送出去。因此，1929年夏天，乔·肯尼迪在生活的一片忙乱中——推销格洛丽亚的影片《非法入侵者》，并企图从他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非法婚姻中解脱出来——决定9月送小乔去乔特中学，同时说定在适当的时候把杰克也送去。

里弗代尔乡村日间学校的教师们对此很不高兴。校长弗兰克·哈克特认为小乔是“学校最优秀的孩子之一，”有“高于一般孩子水平的学习天资——正是你渴求的那样一类孩子，”他在给乔特中学的沃德尔·圣约翰的信中充满愤怒地评论说，“也是在我们这里应该留的那一类孩子。”

尽管如此，小乔在日间学校的学习生涯还是得结束。他的老师称赞他是个“单纯、有男子气概、头脑清醒的孩子……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作风正派，对事情能进行公道的判断。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然而，1929年9月，他只能独自一人离开家去沃灵福德，因为他父母当时正与格洛丽亚一起呆在欧洲。此后小乔在乔特中学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很快成了班上的最后一名。他的父母从不来看望他，他逐渐学会了接受这种无法改变的现实。他的新校长在10月31日给约瑟夫·肯尼迪的信中写道：“我们希望你能来乔特中学，与小乔和我们一起过父亲节。当然不管你能来不能来，小乔和我都会理解你的。”

实际上，形势确实相当危急，肯尼迪从欧洲回来不久，10月29日，华尔街股票骗局突然败露，股票暴跌。在这中间，肯尼迪和其他投机者共同制造的肥皂泡，一个接一个地破掉。肯尼迪早预料到会发生股票暴跌，已经把他的大部分投资转出

肯尼迪传

股票市场。目前他要应付黑色星期一的残局，还想出手帕泰公司并甩掉格洛丽亚，显然他没空参加父亲节。罗丝只好从布朗克斯维尔庞德菲尔德路 294 号她的新家写信给校长，感谢他送来小乔的第一份成绩通知单，说她得知小乔“在学习上没有发挥出他应该达到的水准，感到非常遗憾……我将写信给小乔，督促他更加用功地学习。我相信他会听话的，因为他决不会甘心成绩是全班最后一名。我已将学校的各种通知转交给他的父亲，他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与此同时，她还计划把她的长女罗丝玛丽送进一家社会福利院。

小乔收到他母亲的警告信，心烦意乱。11 月回布朗克斯维尔呆了一小段时间，他大肆吹嘘或者像杰克在最早写给父亲（他仍然与格洛丽亚呆在外面）的一封信中吹嘘的那样：“小乔一回到家就给我讲他多么强壮，多么结实。他向我透露他多么结实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装病，以便他可以不用感恩节正餐。好一个有男子汉气概的青年。接着他要给我表演拽推比试，当时我猛力一推让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杰克还向他父亲汇报，小乔因“打闹”六年级学生被抓住，立即受到了处罚：“这些六年级学生当真揍了他！天哪，他浑身是包，他们差点儿没把他揍死……我要是上到六年级，我决不干这种事情！倘若这些包真是被打出来的，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些非常强壮的家伙。”

不幸的是，杰克自己在里弗代尔乡村学校的成绩也直线下降。1930 年 2 月仁慈而通情达理的校长弗兰克·哈克特在他的成绩报告单上写了一句勉励的话：“甚佳，杰克，75 分——可以是优等。”可惜，为时已晚。杰克呆在里弗代尔乡村日间学校上学的日子，就像前一年小乔那样行将结束。他也将被送往寄宿学校——不过不是乔特中学。

坎特伯雷寄宿学校

1929年5月，正当丈夫与格洛丽亚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罗丝·肯尼迪擅自填了杰克于1931年上乔特中学四年级的申请表。但是，1930年春，沃德尔·圣约翰接到罗丝的一个电话（已被记录在学校日志本中），询问有关杰克在1930年秋与小乔一起去上乔特中学之事。并想知道“杰克是否可以不去参加学校的入学考试。如果能安排可靠的监督，可以将试卷寄去。她解释说，杰克比小乔小2岁，他肯定不能在明年9月上乔特中学，希望我能理解，”沃德尔·圣约翰回忆道，“看来他们决心已定，但为孩子是否参加考试而为难。小乔今年上三年级，所以我认为应该让杰克上二年级。如果有必要进行考试，我这里有二年级的英语、算术和奥蒂斯测验试卷可以当试题。”

1930年6月，杰克在有关人员的监视下，在海恩尼斯港进行了乔特中学的入学考试。不过罗丝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乔特校长的儿子（后来接任校长）回忆说，虽然肯尼迪夫妇对小乔在乔特中学安定下来感到很满意，但是由于这所学校有新教偏见，校长乔治·圣约翰又是美国圣公会任命的牧师，所以罗丝始终不是很喜欢乔特中学。罗丝听取了她的牧师的意见，趁丈夫不在，突然决定把杰克送往比乔特中学还要偏远的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这个地方正符合罗丝现在的心意。它在新英格兰小镇新米尔福德边缘一座陡峭而严寒的山丘上，由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甫担任校长，教师全为天主教徒。那里不足百名学生，破破烂烂的、七零八落的房子散落在一个巨型石头教堂的周围。学校的名字令人捧腹大笑，叫坎特伯雷。

肯尼迪传

就这样，1930年9月24日，13岁的杰克·肯尼迪什么都没有带，就来到了坎特伯雷学校。他是32名新生之一。

肯尼迪家的孩子们在布朗克斯维尔本就缺少家庭的温馨，到了坎特伯雷中学后，情况更糟。在庞德菲尔德路，杰克至少还能时而见到母亲，纵然她没有太多母爱。父亲虽大部分不在家，但总还是能见到父亲。不光这些，体弱多病的杰克，在布朗克斯维尔家里，和兄弟姐妹在一起，至少有一种归属感。在多少有些文化修养欠缺、家教严格的肯尼迪家的孩子们中，他最爱读书，是“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特表达天赋的才子；他虽是家庭的一员，却以局外人自居；他好挖苦人，常常像大人似的讥讽人；他故意不守时，不修边幅，爱找邻居的麻烦……所有这些早年形成的习惯促使他要按自己的模式，而不是按他母亲的模式生活。

现在，母亲自作主张，杰克突然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个陌生的学校，这里地处康涅狄格州树木繁密的山麓丘陵地，周围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有的只是一些神甫和另一种类型的兄弟姐妹。

杰克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到：“这里环境非常优雅，只是第一个晚上非常想家。”他书写龙飞凤舞，字间距很大，“t”上的一横写得高高的。他的观察，无论是关于他自己的，还是学校的，都很大胆和引人入胜，透出一种非凡的自我判断力，“虽然足球队看上去很差，但游泳池却很大，”这个新来的孩子评论说，“你得参加全部的宗教活动，学习相当紧张。你惟一能离开这里的机会，是看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以及军队与耶鲁大学之间的比赛。这里夜间都结冰，白天也非常冷。”

没有合适的衣服使他感到苦恼。他给母亲写信说：“请寄

一条像小乔那样的灰色裤子来，我可以把它跟我的蓝色上衣和黑色新鞋配套穿，而且下次我回纽约时就能穿惯灰色服装了。在纽约的商店里他们有我要的尺寸。还请把我的灰色灯笼裤和其他东西一并寄来。”

罗丝不理睬杰克的要求，只给他寄了一套校服。他很快把它退了回去，说他“不喜欢这种颜色”，而且“布料看上去像生了疥疮似的。”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刚来时相当想家，但是现在习惯了。”还说，由于每天早、晚必须参加礼拜，“我想当我回到家时，将会对上帝变得非常虔诚。”坎特伯雷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天主教家庭，修道士般的学校生活或许符合他母亲的意愿——她只到这个学校去过一次，但是这对杰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他汇报说，“这里一切均好。一天我考了95分和92分，另一天考了85分和73分。科学常识相当难，但我昨天得了90分。我们星期二有宗教讲座，星期三要学天主教教义。我的许多东西都被偷掉了，其中包括价值5美元的运动衫、1.5美元的邮票、自来水笔、枕头和35美元现金以及许多其他东西。”

曲棍球和足球场上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的鼻子、腿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到处是伤，以致现在看上去非常滑稽。我正打算报名参加校报《骑士披风》编辑人员的选拔。请看下星期二刊上《关于侏儒的比赛》一文。深爱你们的杰克。”

冬天来了，杰克为自己买了一付平底雪橇。他给父亲写信说：“这里雪多，滑雪的也多。我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价钱杀到3美元买了一付平底雪橇，或许还可以杀得更低些。”他用学校的反犹语调向他父亲炫耀说，“本齐格（雪橇货主）非常笨……请原谅我的匆忙，上课铃马上就要响了。”

肯尼迪传

然而，事实证明滑雪和足球一样危险。他的一个伙伴滑雪时像发射鱼雷似的，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从山上向下滑行，撞在了山下的石墙上。杰克发现这孩子“捂着肚子躺在地上打滚。我们把他抬起来，他已经昏厥，所以我们把他放在我的雪橇上，把他向山上拉了三分之一英里的路程，然后又向学校拉了四分之一英里。他脸色惨白，我们把他抬上楼，他昏厥过去。一小时后他被送进医院，他脸色苍白。我想他明天或许得动手术，但我不能断定。他受了内伤，我非常喜欢他。情况就是这些。请代我向大家问好，爱你的杰克。”

杰克所有的家信都充满了动力，这也许是从他活力四射的外祖父菲茨杰拉德那里继承来的，他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和与众不同。“请给我寄来《文摘》杂志，因为我过了很久才了解市场萧条。”他从这所他愈加认为是一个天主教集中营的学校给他父亲写信说，“即便来一份报纸寄也行。”他补充说。

然而，虽然作为一个市场经营者约瑟夫·肯尼迪是冷酷无情的，但是他还是被杰克的思家情绪弄得茶饭不香。他埋怨他妻子选择这所寄宿学校。于是开始与沃德尔·圣约翰联系，商量关于杰克在圣诞节后转到乔特中学的问题。然而罗丝不赞成这个做法。当初她被送到荷兰布卢门塔尔圣心女修道院学校时，她也是想家的，但是她挺过来了。她坚持，杰克在坎特伯雷必须读完第一学年。乔特中学的教师勉强答应，并说：“我们得不到消息时，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杰克应该返回坎特伯雷……”

“虽然我们本该欢迎杰克尽快来我校，不过让他在坎特伯雷读完第一学年是个较好的决定”，沃德尔·圣约翰在 1931 年 1 月 20 日写信说，“不管怎样，”他向肯尼迪先生保证，“我们一

定要杰克列在学校今年秋季学期的名单上。”

孤寂使杰克在坎特伯雷更专心于学习。英语课的任务是读他最喜欢的作家沃尔特·斯考特的著作，因而英语是他最好的一门课，得了 95 分。其他的依次为数学 93 分，历史 80 分，科学常识 78 分，拉丁语 68 分（他语言从来都学得不好）。

然而这些都是白费，不知是心理还是生理原因，他向来虚弱的身体现在到了无法坚持下去的地步。一个传教士来学校讲关于印度的讲座——“我迄今听到过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次讲座，”这个 13 岁的孩子描述道，“但是当他讲到忏悔经时，我开始感到不适，头晕目眩，浑身无力。我眼前发黑，感到我快要晕倒了，于是便往外走，接着我就倒下了，幸好被休姆先生（校长）碰上。不过我现在好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还特地加了一句话，据说他哥小乔“在教堂也曾昏厥过两次，所以我想我不会有事的。”

可是他真的会没事吗？不久便知道了。杰克身体上的毛病与他哥哥在乔特中学日益显著的痛苦有天壤之别。杰克的体重不是增加，而是下降，注意力也很不集中。1931 年春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昨天我称了一下体重，少了一磅，根本没有增加。我认为，我惟一的问题是我感到相当累。”

几个月前他曾夸耀：“虽然我可能记不住实在的东西，譬如车票、手套等等，但我能记住像《劫后英雄传》这样的东西。上次考试我还得了 98 分呢。”然而，98 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他的拉丁语得了 55 分后他的校长汇报说：“他完全可能把这门课学得更好些。”他的拉丁语课把他各科的平均分数拉到了 77 分。休姆博士抱怨说，“按理，他的平均分数应该在 80 分以上。”为此杰克的父亲对杰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肯尼迪传

致使杰克给他母亲写信说，他“有点儿担心我的学习，因为他认为我开头很好，然后就逐渐下降了。我承认，我不如以前那样努力，但是我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

肯尼迪先生因为担心杰克的健康和心理状况，于是安排他复活节去了棕榈滩。杰克4月15日向他父亲表示：“我希望我能把成绩提上去，我想那是对这次旅行表示感激的最好方法。”然而，他没有提高学习成绩的机会，因为他一回到坎特伯雷便又因腹痛病倒了。一个老师回忆说：“一名护士和一名外科医生乘飞机赶来为他诊治。”外科医生韦尔迪博士决定切除阑尾，并且在附近的丹伯里医院紧急实施了手术。虽然这是一个一般的手术，但外科手术是创伤性的，考虑到杰克可能恢复缓慢，5月2日肯尼迪夫妇决定那一学期不送他回坎特伯雷，而让他呆在家里休养，并请家庭教师为他辅导。虽然杰克补上了功课并通过了那一学年学校的期末考试，但是这是他在天主教学校惟一的一次逗留机会的结束。罗丝后来坦言：“这个暑假他过得不好。”

肯尼迪先生再次给乔特中学写信，试卷又一次寄到海恩尼斯港。奥蒂斯的测试智商的成绩为119分，英语和代数均取得了高分，杰克轻而易举达到了乔特的入学要求，不过拉丁语除外。罗丝向沃德尔·圣约翰表示歉意，并保证杰克将“每天在这里跟一位资深的老师学习。我希望并且相信，到9月底他将熟练第一年的拉丁语。”

沃德尔·圣约翰回答说，他“很高兴，因为看来杰克在今天暑假确定集中精力补习拉丁语。我们很愿意让杰克在秋季（10月2日）再进行一次补考，因为和他一样，我们渴望他能顺利地开始学习3年级的课程。我同意杰克的说法，英语和历

史比拉丁语的确有意思得多，但拉丁语再枯燥也总归是一门必修课。我想杰克必须把这件事完全当做他必做的一件事情来看待。尽管这门课的基本要素似乎不大能激发人的想像力，但只有当一个人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时才会产生某种灵感。祝杰克过个愉快的暑假，尽管要补习拉丁语。我们甚至认为，只要抱着必胜的信心，在暑假里用功学习，定会有所成效的。”

沃德尔·圣约翰的信，反映了乔特中学古板而又冠冕堂皇的典型教学风格。乔特中学将是一所令杰克·肯尼迪又爱又恨的学校，更是他青春期自我放任的主战场。

乔特中学的故事

对杰克来说，整个暑期在贝尔莫尔辅导站猛补拉丁语，犹如坐牢一般。不过他的辅导老师布鲁斯·贝尔莫尔却深为这个14岁的孩子所感动，因此在写给沃德尔·圣约翰的信说：“杰克是个好孩子，他将是一个为乔特增光的人。”

这时候小乔不仅是为乔特中学争光的人，也成了他父母的骄傲。据罗丝称，在他们原本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中即将经历一个“黄金时期”。就如格洛丽亚所说的那样说，乔只是把情爱的触角伸向新的女演员南希·卡罗尔，但是这种关系没有发展到破坏家庭关系的危险程度。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当乔意识到他快要走到毁掉家庭的地步时，他决心从此不再与其他任何女人过从甚密，最多只能偶然沾沾腥。”1931年初夏，他与罗丝最后一次性交，致使罗丝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孩子于次年2月，罗丝41岁时降生，是个男孩。杰克建议洗礼时给他取名乔治·华盛顿·肯尼迪（因为他与美国总统华盛顿同

肯尼迪传

一天出生)，但是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孩子按照肯尼迪忠实的助手，知己的名字取名爱德华·穆尔·肯尼迪。

1931年夏天，小乔成了在科德角家中风头最足的人物，因为他成功驾驶家里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去海恩尼斯机场迎接飞行英雄拉塞尔·博德曼。博德曼刚驾驶他的“科德角号”飞机创下了历史上不着陆飞行最长的纪录——在49个小时中飞行了5500英里。在一大群的观众面前，小乔载着这位众人皆知的飞行员及其副驾驶员、领着6支管乐队、1支军乐队和60辆花车在街头浩浩荡荡地游行，去参加盛大的宴会。这使小乔心中萌生了将来也要成为一名飞行英雄的想法。

16岁时，小乔已是一个高大强壮、聪明机警的小伙子，他打算博得他父亲的欢心。下学期开学后几天，校长夫人便向肯尼迪夫人报喜：“乔已经被公认为我们学校值得栽培的‘优秀学生’。”然而，杰克却损失了告诉他参加第三次入学考试的时间。害得他母亲不得不从科德角给学校发电报。1931年10月2日，星期五下午1点20分，杰克去乔特中学报到并补考了拉丁语考试。他最终通过了考试，学校同意他上三年级。

不久校长夫人给肯尼迪夫人写信说：“人人都喜欢你的孩子，他正在迅速地寻找自己在学校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她向肯尼迪夫人担保，杰克已经“与其他新来的孩子一起吃冰淇淋，交朋友，围着钢琴唱歌。”她的丈夫乔治·圣约翰也很关心这位新来的肯尼迪。特别安排“杰克在饭厅一张邻近自己位子的桌子上就餐，在那里我每顿饭都注意他，他很好。”

然而不出几个星期，校长的语气就变了。杰克的方形头似乎无法塞进学校为他规定的圆孔。据他的舍监厄尔·莱恩巴克报告：“杰克很讨人喜欢，很快与宿舍里其他的孩子混得很

熟，大家都非常欢迎他，可他似乎不大习惯学校的制度。”

这是一种间接的说法。杰克被分配到华盛顿《明星报》报主的儿子戈弗雷·考夫曼住的一所被称为校舍的老式木结构房子里。杰克一直令他哥哥烦恼的邋遢同样也令考夫曼烦恼。因设计问题两张床靠得很近，当中仅隔一个梳妆台，考夫曼的床临窗，杰克的床紧靠壁柜。很快壁柜便变成了垃圾桶。考夫曼拿来了自己家里的古式“双基座式”橡木书桌以及莫里斯椅和嵌花埃及挂毯，把挂毯当地毯用。据他后来回忆：“还有一块普通小的地毯——也许是两块。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在大吵了一架之后，我们就把房间分成了两半，一人占一边。”

杰克占的那半边房间，除了他心爱的书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因为他的家只有钱而没有真正的东西。莱恩巴克说：“由于他们暴躁的性格，杰克和戈弗雷经常要求学校把他们分开。”最后，在一连大吵了两天之后，莱恩巴克别无他法，只好把问题提交上司处理——据考夫曼后来回忆，当局“出人意外地解决了争执”。

莱恩巴克可能已经调解了纠纷，但是他对杰克·肯尼迪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莱恩巴克是美国情报军官（因此，外号叫“火帽”），他教数学，兼任足球教练，妻子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女郎，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校长的儿子西摩·圣约翰后来回忆说：“我认为，莱恩巴克曾在敌后做情报工作的时候被德国人捕住了。他被带出去枪毙。但是他用一种我从来搞不大清楚的方法解决了押解他的人的武装，然后逃掉了。他就是那种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的那种人。‘火帽’喜欢杰克，他喜欢小孩，喜欢以爱来训练学生。”

肯尼迪传

这种“训练方法”对一个很有天赋而又缺乏母爱的孩子来说是极其珍贵的。校长后来总是提到莱恩巴克在训导杰克上的“独特”。毫无疑问，其奥秘就在于杰克钦佩这位舍监的军事勇气和感激他的爱心。莱恩巴克报告道，第一个月结束时，这个孩子的行为已“明显有所改善”。他写道：“杰克觉得老是呆着很难受，自然就向往活动和容易冲动。不过他现在已经大有进步，也懂得要以大局为重。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将是一个好公民。”

如此的评价似乎还为时尚早，因为杰克在班上的表现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三年级不学历史，沃伦教讨厌的拉丁语和法语一样占去一学年课程的大部分时间，而这两门中的任一门都“激发不了杰克的想像力”。杰克的英语特别好，但是校长对此并不满意。他给肯尼迪先生写信说：“杰克目前的成绩尚未达到我们给他设定的标准……他仍然是不够专心。”肯尼迪回信称，他“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校长对杰克第一个月成绩的评述。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我觉得杰克有很好的天赋，但是却没能充分利用它。除非对他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束，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可能对他不利。”

这就是约瑟夫·肯尼迪对未来4年杰克紧张的寄宿生活的态度。它进一步发扬了罗丝·肯尼迪14年来训导这个孩子的假装圣洁的做法。罗丝·肯尼迪只知道从远处不断地向孩子们发出俗套的命令：要注意卫生、姿势、牙齿、视力和饮食。而约瑟夫·肯尼迪的教育方法则更简单：要求他的孩子们去竞争，获胜。肯尼迪家族编年史记录员后来透露，“在200多封家信中，他没有一次提出过让孩子们去考虑基本的道德准则。相反，他总是向孩子们灌输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重要性和获得第

一名的快感。”

但是，既然小乔在乔特中学已经扮演了明星的角色，杰克又如何去获得第一名呢？

学校的克星

跟在坎特伯雷中学一样，来到乔特中学不久，杰克就病倒了。11月，他住进了学校医务室。他回家过感恩节时，他父亲见到他的样子非常吃惊，心里很不舒服。在给乔特中学校长的信中肯尼迪先生报怨道：“杰克看上去有点瘦，”他说，“或许他仍然有偏食的毛病。”基于这一评论，罗丝·肯尼迪便接二连三地给校长夫人写信，要求让杰克坚持服用正常剂量的鱼肝油。

杰克在圣诞节后返回学校，又病倒了，不得已再次住进学校医务室。“杰克穿着淡紫色的浴衣，配上淡紫和绿色相间的睡裤，看上去很可爱，好像是在愉快地度假似的，”克拉拉·圣约翰（校长夫人）向肯尼迪夫人汇报说，“我告诉杰克，如果圣约翰先生知道他把所有的学习书籍都随身带着，一定会给他‘最佳 A 等评语’。”

不过，这种“度假”一点也不快乐。肯尼迪夫人就杰克的身体状况向她的护士进行咨询后，给圣约翰夫人回信说：“护士和我都记得，大约 3 年前他曾有过与你描述的类似的症状，他曾经得过流行性腮腺炎，医生诊断那是受寒所致。我告诉你这个情况是希望这能有助于医生分析他的病因。”

然而，罗丝所反映的情况似乎没能派上用场，罗丝推崇的解决办法——凯普勒麦乳精也无济于事。“请不要因为我告诉

肯尼迪传

你杰克仍然住在学校医务室里而对我灰心，”克拉拉·圣约翰向肯尼迪夫人表示歉意道，“我对你始终都是忠实相告的。他的病情没有恶化，我们不必对他担心。只是他现在仍然咳嗽得厉害，暂不宜搬回宿舍，因为在那里他不管什么天气都得出去用餐（天一直在下雨，一时还停不了！），而且我们不能时时照顾他。”

杰克终于获准出院，不过医生到最后也未能做出确切的诊断。杰克给劳伦斯维尔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医生说我得的是流行性腮腺炎，我终于出了医务室。”圣约翰夫人代表罗丝转告杰克的舍监，给“杰克吃凯普勒麦乳精……直到他完全康复”。但是罗丝接到杰克的信后十分惊讶，立即给学校写信抱怨：

尊敬的圣约翰夫人：

我从杰克的信中得知他现在好多了。他还讲了一些关于去点心店里吃饭能使身体“强壮”起来的事情。我对此颇为担心，因为我想点心店一般都是甜食，这样杰克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吃足够分量的我认为应该吃的蔬菜。

罗丝本人身体欠佳，正处在最后一次怀孕的最后一个月中。而她的丈夫此时却在佛罗里达与密友在一起玩乐或和别的女人鬼混，她只好把她的满腔怨气都发泄在这封信中。据圣约翰的儿子后来回忆，这封信“差点没把母亲气昏”。

杰克不是罗丝恼怒的惟一对象。她也生 12 岁的女儿凯思琳的气，嫌她越来越喜欢招惹男孩。罗丝说，凯思琳很活泼，

“打电话时与男孩子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耽误了她做家庭作业和其他事情。男孩还邀请她星期六下午看电影等等。我对这种情况的措施是送她去学校”。罗丝坚持把她送进一所当年比凯思琳现在的年龄还大的自己都不愿意去的圣心女修道院学校。

对杰克来说，课业的压力和遵守校规的压力，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他频繁地往学校医务室跑，但这并没能使他从布朗克斯维尔家里得到一点慰藉。罗丝后来写到杰克时说：“以前我常常担心他的身体，他父亲也如此。然而那时，我想我们两个人都已形成了这样的想法：不用多久他就会因病或事故而卧床休息。我们同样或者说更加担心的是他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或者比方说，缺乏一种一定要把他恰恰不感兴趣的那些课程学好的‘牺牲精神’。”小乔在乔特中学“高度有组织的”体系中，学习“没有半点困难”，而“杰克就不能或者说不愿意听从校方的安排，他想学的都学得很好，而学校要他学的则学的不怎么样。”

结果是又一张令人失望的成绩报告单，“除英语以外，杰克的问题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圣约翰先生给肯尼迪先生写信说，“从内心讲，杰克很想学好，对他目前的成绩也很觉苦恼。然而，事实是杰克目前仍然缺乏动力，不能集中精力去做真正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这正是杰克‘成长’中的问题。”

圣约翰详细地记录了：“杰克的舍监莱恩巴克……如何经常仔细地注意杰克的服药情况和他丢三落四的毛病。虽然缺乏责任心仍然是他在宿舍里的一贯特征，但是杰克在这方面正在逐渐好起来……杰克乐观、开朗，非常讨人喜欢，所以我们大家都想帮助他。他向我们当中最好的人挑战——我们总是给他

肯尼迪传

机会，并对结果充满信心。”

复活节杰克回家过了，回校后因为脖子上莫名奇妙地长了一个“肿块”，在4月份再次病倒。以致他在学校医务室又住了一个星期。这次被确诊为“非传染性耳下腺炎”，亦称流行性腮腺炎。可是，当工人来学校安装肯尼迪先生赞助的有声电影设备（以成本价供应）时，他的糟糕的法语和拉丁语使圣约翰大吃一惊。校长以一种内疚的口吻问“火帽”莱恩巴克：“杰克学习稳定些、用功些了吗？”

杰克的舍监耐心地回答说，他已经为杰克预算好了“每一学科的学习进度。我要求他每天参加他弱项科目的课程辅导，每天晚上我都让他给我背法语和拉丁语单词。学习期间不允许他离开房间，我一直陪着他做代数作业。该做的几乎都做了，问题主要是他做得太毛糙，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想要教训他，可一见他笑就没火气了……他是个非常有魅力和讨人喜欢的孩子，常让人啼笑皆非。”

无疑，杰克的机智和风趣正在声名远扬。显然，他想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与他恭顺的哥哥不同、也不是按母亲的《妇女家庭杂志》价值观所打造的那样的个性。每当母亲差人从佛罗里达送来新鲜的柑橘，以使他改掉去点心店的毛病时，他只是把它们当做炮弹击打过路人。他的部分心思仍留在布朗克斯维尔那个类似于“孤儿院”的家里，他甚至写信恳求家人让他做最后一个出生的弟弟爱德华的教父，因为他哥哥已经获准做了琼的教父。他的信经常通篇地谈到他的弟妹们，因为至少他们尊敬他，并且与他一起都熟悉家庭的内幕：父母之间那种不公开的、具有激烈和抑制性影响的战争。

尤妮斯后来回忆她的母亲说：“我们确实是个很有组织的

家庭，她管教我们的方式非常特殊，可用服从纪律一词来概括它。”在布朗克斯维尔楼下有一个浴室，早饭后“我们要鱼贯而入，鱼贯而出。然后站着接受检查，看衣服上是否有斑点和整体上看去是否整洁。”然而，只要约瑟夫·肯尼迪在家，罗丝从不露面。她“似乎是故意让他代管的”。肯尼迪先生不是个喜欢死读书的人，“他在家时从不让孩子们老是呆在家里，”尤妮斯回忆说，“就我能记得的而言，我一生中第一次好长一段时间呆在室内是我30岁时生孩子的时候，必须呆在家里……所以我认为，有些人整天呆在室内看书，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凯思琳的传记作者后来听说，倘若肯尼迪先生“发现孩子们呆在家里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地，他就会赶他们出去找点事做！”

杰克后来谈到，他父亲“一直非常严厉。我想他的身体并不好，他总是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生活，他一直在做投机生意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他总有点儿霸道武断……他总是强调要竞争，以至我们总是拼命地去干……我想说明的是，他的确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模式。”

在这种缺少和谐的生活环境中，杰克被他的弟妹们视为与众不同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尤妮斯所说：“杰克在需要用脑筋的事情上做得最出色，几乎垄断了这些事情。”他还是家中最风趣的人：风趣诙谐、不负责任、不虔诚、粗心大意、懒懒散散，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规规矩矩地遵守罗丝的可悲的规矩——一种纯粹是掩盖她婚姻的不幸和被社会排斥的心态的规矩。

虽然学校执行制度的狂热性上比罗丝还厉害，但是至少给杰克提供了大量的讽刺内容和比家中更多的听众。

有一次，杰克从沃灵福德电影院把性感女影星梅·韦斯特的跟真人一样大的纸板像偷回来，偷偷塞进被窝，他想借此来

肯尼迪传

吓唬第二天早晨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他不仅上课迟到，做礼拜也迟到。到 1932 年春天，情况恶化到了极点——杰克成绩差到有可能通不过学年末考试的地步。消息传到罗丝耳朵里，她简直气坏了。据圣约翰夫人向杰克的训导主任讲述：“我接到肯尼迪夫人的电话，她情绪很激动，说必须设法让杰克今年暑期不必去参加补习。她说，她要管 9 个孩子，不可能再承受额外的负担了。”

圣约翰夫人同时转告杰克的舍监：“肯尼迪夫人非常希望杰克今年暑期不用参加学习，因为那将对家庭人事安排造成极大的不便。你是否与杰克谈谈，向他强调一下这一点？”甚至连学校秘书也给莱恩巴克先生施加压力，催促他“与杰克谈话，鼓励他如果他能很好地完成这学期的课程，他就不必做任何暑期补习。她母亲打电话给圣约翰夫人，特别提出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要补习。”

然而，杰克的训导主任的态度很坚硬。他不急不火地回答说：“杰克·肯尼迪的智商很高，但在三年级中是一个最不可信赖的孩子。我不认为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他今年暑期不必接受辅导。而且一旦她送他去参加暑期补习班，我们就能给她解除部分忧虑。”

果然不出所料，杰克那年夏天终未能逃脱继续被关在乔特中学补习的恶运。尽管老师作了各种努力，杰克的法语和拉丁语仍均未通过学年末考试。不过法语老师戴维斯先生喜欢杰克，给他起了“小甘蓝”的绰号，暗指他蓬松而浓密的头发。但是他没有办法激起杰克对法语的兴趣，他在给校长的一张条子中遗憾地写道：“除了体罚尚未尝试之外，其他办法我几乎都用尽了！他的作业做得乱七八糟，经常不是忘了带书和铅

笔，就是忘了带纸。”

“火帽”莱恩巴克在报告中同样感到绝望：“举止冲动是他一切行动的特征，虽然这些举止并无恶意，只是青春期的叛逆和怪念头。这使他的学习积极性时冷时热，以致成绩老也提不高。”莱恩巴克写道，“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项特定的事情上对他来说是最难做到的事，因为他总是有许多别的不成熟的想法要去思考。”

莱恩巴克继续写道：“每当杰克想要一件干净的衬衣或外套时，他都必定要从抽屉里或者柜子把每一件衬衣或外套拽出来，而且他总是‘没有时间’把它们放回原处。我每天早晚收拾他的房间，总发现地板上横七竖八地堆满着一大堆的东西。他一看到我进房间，就立即把东西收拾起来。他做起来很自觉，并且常常说，‘我总来不及收拾这里的东西’。”

校长向杰克的父亲承认学校教导无方：“我们不得不承认，你交给我们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年根本无法完成。我们确实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杰克所需要的训练和自我训练的工作量非我们所能办到。若杰克是我的孩子，我将把他送去上8月7日至9月15日开办的暑期补习班。我想杰克现在必须意识到，在正常情况下学年里没有完成的学业必须在暑期把它补上。”

肯尼迪先生很赞同这一做法。暑期补习班助理主任7月30日直接写信给杰克，通知他与其他不听管教的孩子一起于8月7日来补习班报到，“以便熟悉他们的课程安排，8月8日上午开课。”

就这样，杰克的暑假梦破灭了。他原来想在暑假去科德角驾驶父亲新买的维亚诺星型帆船，可如今却必须去补习班。

肯尼迪传

“我很高兴你来参加，”助理主任写道，“因为我认为你的确需要暑期补习班所要教授的东西。”

然而，暑期补习班所给的东西并非杰克·肯尼迪所想要的东西。虽然他坚信他决不会这样了，但是他仍不改变他的一贯的方式。

伤风败俗

1932年8月当杰克因懒散而不得不返回乔特中学补课时，小乔却在海恩尼斯港高高兴兴地享受大海和阳光。他还邀请了一位同学与他一起。这位同学后来向肯尼迪夫人写信表示感谢，罗丝却对这封信大为不满。她立即用她那纤细的手给圣约翰先生写信表示不满：

我发现，乔特中学的一些孩子似乎不太知道如何写信，也不知道如何写信封。我认为，如果花一点时间给他们系统的讲授不同的书信格式，那将是一个很现实的主意，一个很实用的主意。例如一个孩子想订购书刊，目录该怎么写；如果一个孩子到我家来拜访了乔之后想给我写信，该怎么写，我对他们不熟悉常用的书信格式感到吃惊。

罗丝越来越疯狂的强调形式。更可悲的是她自命“9个孩子都很幸福。小乔和杰克一年比一年有进步，越来越有出息。”事实上，杰克自从8月7日去乔特中学就读之后，她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见过他。“肯尼迪先生和我打算不久能去

乔特中学，并希望见到你，”她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虽然在杰克的一生中她从未拜访过学校，甚至连小乔也没有证据证实她去过学校。

不过，前好莱坞巨头约瑟夫·肯尼迪又有了新的不回家的理由。他已经开始了一次新的“制作”。“主角”是一位政治家——1917年替他解决福尔河造船厂大罢工风波的那个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州长。乔·肯尼迪决定帮助他实现当总统的梦想。

肯尼迪后来对人吹嘘自己是“在银行里有12美元存款以上的人中惟一公开支持”罗斯福的人，这纯属子虚乌有，梅西公司的杰西·斯特劳斯、豪斯上校、爱德华·弗林、沃斯·宾厄姆法官、威廉·伍丁以及赫伯特·莱曼早在肯尼迪介入之前，就都在财政上资助罗斯福了。但无可厚非他抓住了使罗斯福成为总统的这一挑战性的机会，并于1932年5月就离开家去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在这位民主党竞选人面前宣扬他的银行天赋。6月，他从沃姆斯普林斯前往芝加哥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罗斯福刚获得提名，肯尼迪便立即应邀登上罗斯福的竞选列车——“罗斯福专列”，分别去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州、犹他州、蒙大拿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等州，作候选人拉选票第一阶段的旅行。

肯尼迪后来对《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乔·丁南吹嘘道，他作为“总负责人安排了罗斯福的全国之旅，在列车上和旅馆里给宣传组人员安排住处，在重要的城市安排与民主党领导人会晤，布置记者招待会。”丁南报道称，肯尼迪“话不多，办事效率高，是个不屑表现自我的人。”

这纯属虚构。罗斯福有一组自己精心选拔的负责一切工作

肯尼迪传

事宜的安排班子，只是为了拉赞助资金才让肯尼迪随行的。当他只募集到 15 万美元时，他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把这个数字凑到 20 万美元。然而糟糕的是，他给的钱不是赞助，而是暂借给罗斯福的，他还要收回，后来确实也收回了。

同希望成功地当选总统的所有人一样，在争取入主白宫的努力中，罗斯福不得不利用各种带着不同目的的盟友，所以他接纳了肯尼迪的吹嘘，不过对这位波士顿爱尔兰牛皮大王并不抱任何幻想。肯尼迪对他自己的付出同样也不抱任何幻想。和往常一样，他虽然只是一个外行，但是只要他想成为行家他就能成为一个精明的行家。正如他通过用眼睛和耳朵观察和了解银行业、造船业、股票交易和电影制作业的内幕，为自己在行业中争得一席之地直到《凯利皇后》的失败那样，他在享受罗斯福竞选随行人员的虚荣感的同时，仔细地观察美国总统选举的内幕，说不定有朝一日可以拿来作为他自己的借鉴。

就在杰克的父亲积极协助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杰克开始了他在乔特中学的第二个学年。不过这次是住在由尤金·马厄先生监管的东楼。

令杰克失望的是，马厄没有一点意思。“我想搬回原来的校舍。”杰克很快向“火帽”莱恩巴克求情，“如果现在我能回到那里，我一定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这绝不是开玩笑！”

玩笑——像他今后的生活一样——很快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他在乔特中学越来越目无校规，马厄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他抱怨杰克有“败坏风气的迹象”。圣约翰先生沮丧地写道：“整个上学年，我都为杰克·肯尼迪担心，但绝不是因为他是在莱恩巴克的监督下。莱恩巴克是个难得的舍监，对付杰克是个天才。目前，鉴于肯尼迪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贡献（即给学校提

供电影放映机)，杰克被安排在了东楼。他是个非常聪明伶俐而且能干的孩子。我想在当时的这个阶段，马厄先生根本不是管理他的适当人选。能不能把杰克安排在一个年长些的、经验丰富的、既幽默又手持铁棍的老师的管治之下呢？”

然而，铁棍还是先放着。校长还没来得及行动，杰克又病倒了。

错失良机

1933年1月至2月的大部分时间，杰克都因奇怪的“流行性感冒”的症状被关在乔特中学的医务室里。他膝盖也受伤了，在家里的母亲不假思索地将此归咎于“在过去的二三年中他一直穿劣质的橡胶底鞋的毛病”。校长的儿子西摩回忆说：“罗丝·肯尼迪和克拉拉·圣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频繁，杰克的冬季学期记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医院的病历报告。而且从头到脚，他的眼睛、耳朵、牙齿、膝盖、足踝，都需要照料。”

连杰克的父亲也加入其中，抱怨他“3月份熨衣服竟花去了10.8美元，花得太多了。虽然我赞成你打扮得出众点，但是如果你稍微多用一点时间顺便把衣服整理好，而不是满屋子乱扔，我想就没有必要经常这样地熨烫”。

这会儿约瑟夫·肯尼迪对自己的事也十分头痛。虽然罗斯福的提名、当选和就职给肯尼迪带来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兴奋，然而这位新总统没有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于是肯尼迪便又重新炒起股票来了，没出几个月，他就卷入了著名的利比—欧文斯—福特股票颤动丑闻的漩涡，因为他们用两个同名公司搅乱公众视听、诈取钱财。1933年夏天的这场骗局使他又净赚了

肯尼迪传

一大笔钱。“在整个竞选运动中，身为助选人员的他口口声声提出必须完善投机体制，以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肯尼迪家族编年史记录员略带遗憾地记载道，“不过，既然他受到罗斯福的冷落，他就可以不顾虑他说过的一切”，“不顾他的投机行为可能对不断萎缩的市场造成的影响，放开手脚谋取私利。”

杰克对他父亲的欺诈行为全然不知，只是拼命地学习，以免再参加暑假补习班。事实证明，1932~1933 学年中的成绩是他进乔特中学以来最好的：英语 81 分，代数 71 分，法语 73 分，拉丁语 69 分。拉丁语最令他担心，当他以拉丁语 75 分，代数 82 分的优异成绩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之后，他立刻把令他讨厌的拉丁语课本丢得远远的。

老师们为他的显著进步感到高兴。杰克写信说，他的英语“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虽然总是把“attemp（企图）、jealousy（妒忌）、coming（即将到来的）和 sieze（夺取）”之类的一些词拼错。莱恩巴克先生评价说，代数“对他来说也是不错的，因为它整洁、准确（没有一个微小的错误）和巧妙”。莱恩巴克在总结杰克的数学进步时说，“我欣赏他在遇到困难时坚韧不拔的钻劲儿。他追着我问，直到彻底弄清楚难点才肯罢休。我期待他不断进步……杰克比以前努力多了，并且取得了应得的好成绩。”

不过，法语老师却“老是抱怨杰克问一些与法语无关的问题”，总想摆脱法语语法习惯的束缚。因此，学校对杰克进步的全面看法是留有余地的，特别是和他哥哥的模范表现比较起来。小乔的模范表现使他最终在那年 6 月因获得人人渴望的、奖给体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的哈佛奖杯而知名全校。

“小乔获得了这种殊荣，你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感到十分骄

傲。”圣约翰在给又一次缺席体育比赛日的肯尼迪夫妇写信说，“我们希望你们星期六能来这里观看你们两个孩子参加赛艇比赛，观看小乔与其他 120 名六年级学生通过走道，走上领奖台的场面。他是我们最值得依靠的学生之一，一想到他就要离开我们，我们就难以抑制不舍的心情。”

相反的是，一些老师惟恐杰克·肯尼迪重新回到他们的学校。杰克对再过两年多监禁劳役式学校生活也不感到高兴。他 6 月底给他的同学 K·勒莫安（勒姆）·比林斯写信说：“秋天再见——那是一种对享受而言马上就要到的弥留的情景。”

杰克才 16 岁，但是他在内心里已经开始变得厌恶上学了。作为对小乔在乔特中学出色表现的奖赏，小乔将赴英国。据最高法院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的引荐，他将去伦敦经济学院，在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一年。他的父母将同往，同行的还有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及总统夫人。在最后一次避免像以往那样再次被囚禁的努力中，杰克恳求父母允许他随他们一起赴欧旅行。自从格洛丽亚风流韵事平息以来，罗丝 17 次出国旅行均没有带孩子。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罗丝提出给圣约翰先生打电话商量让杰克同行之事。

学校秘书欧文先生 12 月 23 日记载道：“她说，她想知道我们是否批准杰克在头 5 周内请假。好像肯尼迪夫妇将与总统家的詹姆斯·罗斯福及总统妻子一起去欧洲，会见那里的重要人物——墨索里尼等人。肯尼迪夫人认为让杰克错失这样一次机会太可惜了。他们已计划在三四天内起航。”

罗丝的要求使学校感到很为难。“我们正为杰克的进步绞尽脑汁，他此时离开学校似乎太不合适。我答应肯尼迪夫人，我将与杰克的各位老师商量一下，并在星期天中午打电话给她

肯尼迪传

答复。”欧文先生向外出的校长报告说，他星期日中午给肯尼迪夫人去了电话。“我详细地给她分析了利弊，让她自己作决定。她想向圣约翰先生或者斯蒂尔先生打电话，但是我完全明白，她只是想让他们说‘是’。凭心而论，我认为她应该自己做主——或者不管怎样，她和肯尼迪先生应该作决定。”

杰克得知不许他同行，特别在得知他父亲在登船前给校长写了一封令人难过的信后，春季刚培养起来的上进心又缩回去了。在信中，他父亲要求圣约翰先生对杰克抓紧点，一刻不能放松，“我认为，要注意的事情基本是让他始终忙于各种计划……具体地讲，他仍然有粗枝大叶的毛病，他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一定要获得成功。”

肯尼迪先生的信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圣约翰立即回信表示，他将马上把杰克安排到最能严格执行校纪的 J·J·马厄管理的学校西楼去住宿。圣约翰向肯尼迪先生担保：“世上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了。马厄教育了我的 3 个儿子，我们全家终生都感激他。”

然而，在即将进入极度敏感的青春期的下一个阶段时，杰克将要承受的并不是恩情。

大病一场

对乔特中学的学生来说，J·J·马厄简直就是上帝。圣约翰的儿子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他居住在布里奇波特，20 年代初是一名拿奖学金的来乔特中学读书的学生。他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篮球打得极好，后来进哈佛大学，是哈佛球队队员。他毕业后又回乔特中学任教。我们家都

非常喜欢他，夏天，作为我们的家庭教师，他与我们全家一起呆在罗得岛上。据我所知，他本人很守纪律，我很喜欢他。”

然而，杰克·肯尼迪看不惯他。他认为他和他父亲差不多，脾气暴躁，性情霸道，一天到晚只是说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杰克想要的不是告诫而是关爱。像波士顿的菲斯克小姐、乔特中学的莱恩巴克先生，还有虽自负但性情温和的圣约翰先生这样伟大的老师，都给予了杰克他想得到的爱。而缺乏这种爱，杰克就不会照要求去做。不幸的是，马厄先生就没有给予他这种爱。西摩·圣约翰回忆说：

我发现，谁要与他对抗，他惟一的应付手段就是严格执行纪律。他本人也很遵守纪律，并且对那些需要执行纪律的人毫不客气地执行纪律。他明白，甚至他的地板、他的走廊，都有守纪律的品行。他教育孩子们要守时、整洁，他们知道那是校规。他们都全力以赴。

杰克·肯尼迪被安排到了那里，而他并不想成为那里的一员。他衣冠不整，不守时间，是个不讲卫生的孩子。他不好好学习又酷爱装腔作势，不过从来不真正地下功夫——我觉得，J·J·马厄已经到了讨厌杰克·肯尼迪的程度。我想他虽然没有就此对他发过脾气，但那并不是一种融洽的关系。

那确实确实是一种不愉快的关系，而且自杰克的父亲1933年11月从欧洲回来之后，不愉快的程度更进一步加深了。肯尼迪先生改变了他拜访墨索里尼的打算。预计到禁酒令即将被废除，肯尼迪利用吉米·罗斯福打开了原本不会向他开放的

肯尼迪传

大门——设法获得了黑格—黑格牌威士忌酒、戈登干杜松子酒和其他的英国酒在美国的总经销资格。肯尼迪先生先入为主，得到了这笔暴利，颇感兴奋，居然拜访了乔特中学。然而当时的场面却使他大吃一惊：身体瘦小的 16 岁的儿子衣着不整，正与一群伙伴在一起玩得起劲，全然没有他哥哥身上那种为了成功而自律和坚定的气质。

肯尼迪先生从纽约写给校长的一封信抱怨道：“我无法形容我看到杰克和与杰克谈话时那种痛惜的心情。他似乎没有一点责任心。他那种近乎玩世不恭、无所顾虑的态度对他将来的发展不是一种好的兆头。”

收到肯尼迪的抱怨信后圣约翰既感到烦闷，又不完全同意，他回信说：

杰克昨天和我在一起谈了很久。因为有你的允许，我让他看了你的信。我非常希望我对杰克的信任不会让你怀疑，并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任。老实说，我对杰克目前的状况并不感到极度的不安或担心。我与他生活的时间越长，谈话的次数越多，对他就越有信心。我敢打赌，不出两年你就会像对小乔一样以杰克为骄傲。

圣约翰坚信，在杰克邋遢的外表背后，有“一个聪明的、富有个性的头脑。这是一个比小乔更坚定的更加难以驾驭的头脑，甚至连杰克自己都难以做到。一旦他学会正确地运用幽默，学会如何恰当的使用他对事物的独特见解，那会是一种资产而不是障碍。他独特的观察问题和表达诙谐的天赋就会对他

日后大有帮助。就目前而言，比较传统的想法和比较稳重、成熟的观点对他肯定是很好处的，但是，亲爱的肯尼迪先生，我们必须给杰克这样的孩子一个过渡的时间，”杰克“天资聪明”，还隐藏在不成熟的躯体里，这个躯体正承受着课业的压力，而这样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又不容易专心致志地学习，“就杰克目前的学习状况而言，我认为他各方面都不是很出色。根据他目前的状况，他应该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努力。对杰克来说，英语和历史无疑是不费力的，不过法语，特别是几何就有点难度了。”

然而，圣约翰是个方法独特的教育工作者，他不认为杰克的“问题”在于他的功课。“我问杰克，你在场时，他是否有机会和你深谈。他说，实际上这样的机会很少。他说，你与一些他的老师谈话比与他谈话用的时间要多得多，并且当你和他谈话时，你无缘无故地‘相当恼火’。”

肯尼迪先生确实如此。他对儿子有能力但不好好利用感到非常生气。他给在伦敦的小乔写信说，杰克新的历史教师告诉他，杰克“是他迄今见到过的在历史方面少数几个最有思想的人之一。然而他们普遍认为他缺乏责任感，如果他有这种实力却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这简直是太不幸了。你若能想出什么办法，那就帮帮他吧。”肯尼迪先生恳求说。

这封信对大儿子的自信心没有半点好处，他自己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争取他自己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肯尼迪先生自己十分失望、懊恼，根本没有注意这些微妙的细节。尽管他在英国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但是他未能实现他真正的愿望——在罗斯福政府中捞得一官半职。罗斯福成功地当选已有一年了，白宫还没有给他来过任何电话。“我经常读到和听到

肯尼迪传

关于你的消息，”他在春季给罗斯福的秘书兼情人写信时说，“想必看到你的上司和国家一切都如此顺利，一定感到很欣慰。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你，和你说笑话，但是或许不用等太久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肯尼迪愈加把自己看成惟一没有受到奖赏的罗斯福当选胜利的策划师，是他最先资助罗斯福，是他在1932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上把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当选的决定性因素争取到罗斯福阵营里来的。连罗丝·肯尼迪都意识到了她丈夫的愤愤不平：“的确，选举以后的那几个月对他来说似乎非常漫长，”后来她写道，把一切过失都归罪于罗斯福的办公厅主任豪·路易斯。他是“一个干瘪的、狡诈的、不怀好意的小矮个儿”，他“大半生都任罗斯福的私人助手和政治秘书。他对主人非常忠诚，但是对他认为可能取代他成为罗斯福的密友和助手的任何人都妒忌和憎恨。”以她的妇人的立场来看，豪根本是妒忌乔与罗斯福的关系，“我看得出豪为什么害怕乔。因为乔虽然也粗鲁和毛糙，但是他绝对地有魅力，他的幽默感使他与罗斯福总统非常投缘。”

在这一点上，罗丝和她丈夫都在一厢情愿。事实上，罗斯福从一开始就讨厌这个暴富的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只是由于他受过高等的教育，不好把他的感情过于直白地发泄出来。罗丝曾说：对于总统不提携他为财政部长，“乔非常失望”。肯尼迪的女儿尤妮斯骄傲地回忆说：“父亲用一个秘书和一部电话打造起了他的金融帝国。”然而不管是她还是她母亲罗丝都没有提及这样一个事实：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用一毛不拔和讳莫如深的经营手段靠炒作股票致富的投机分子和骗子。他们更无法接受他与仕途无缘的事实。

杰克在乔特中学与新舍监的较量，在 1933 年圣诞节之前愈演愈烈，后因 1934 年 1 月杰克再次病倒而暂时休战。这一次杰克病得很重。圣约翰夫人写信告诉杰克的母亲：病来得太突然，“我们对杰克的病因还不十分清楚。他过完圣诞节回来时就很不好的，不过没多久就逐渐地好起来了，星期六下午，我们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得知他病成这样，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杰克虽然住进了学校医务室，可是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加严重。2 月 4 日，圣约翰夫人探望了他之后告诉她丈夫说：“昨天我顺便去医务室看他，心里觉得很难过，我对别人从来没有比为他那样感到难过过。”她本想再去看杰克并顺便给他读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去，我就听说你已经到纽黑文‘检查病’去了。”她在匆匆给杰克写的一张便条上说，“我衷心希望医生能尽快找出病因，以便更快地把病治好。”

不过，这一次再也不能把劣质鞋底的运动鞋作为杰克生病的原因了。“他差点儿命归黄泉。”杰克的朋友勒莫安·比林斯后来透露。据说学校为他在学校里举行了祷告仪式，外面谣言满天飞。“以前一直被诊断为荨麻疹。不过，它不可能是荨麻疹，”比林斯回忆说，“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血液疾病。”

杰克病情的突然恶化不仅使医生始料不及，也吓坏了乔特中学的全体教师。这位邋遢而无责任感的淘气鬼，一夜间变成了令人关注的焦点。几天后，圣约翰先生为杰克准备半年成绩报告单时，给肯尼迪先生非常动情地写信说：“杰克已经走上正轨。健康是他现在惟一缺乏的东西，他的功课就像他的真诚待人和善解人意一样，会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满意的。杰克是迄今世上最好的人之一，是最有才干和最风趣的人之一。对于杰克我还可以说许多！”在第一个附笔中他又写道，“我们祝杰克

肯尼迪传

时时刻刻都在好起来。”在第二个附笔中他又概括地写道，“只要看看大家在杰克病了之后难过的样子，就可知他是怎样一个人了。”

“杰克甚至在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也没有失去幽默感，”圣约翰夫人在险情开始有所缓和的时候向罗丝报告说（罗丝仍然住在棕榈滩海边新的家庭别墅里，这是她丈夫前一个夏季花11.5万美元购置的），“当他抱怨——不是生气地，而是稍微有点埋怨地——由于荨麻疹，星期天他都被彻底地关起来的时候。穆尔先生对他说：‘哎，杰克，你知道，医生非常乐意让疾病显露出来而不是藏在里面。’对此，杰克趁机回答说：“是吗？医生今天一定是想高高兴兴地过一天吧！”

1934年2月6日，星期二，在他看来杰克“是很长时间之后，第一次吃了饭。他对我说：‘幸好他们同意让我吃早饭了。否则，我想不用多久护士进来时就只会看见我的床，而根本不是我了！’”

医生感到不吉利，但杰克却一点都不在乎。他写信告诉克拉拉·圣约翰说：“若是这事发生在50年前，他们保准会说，‘嗯，这孩子得的是荨麻疹，不过他现在完全好了，’可现在他们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就给我作一次血球测量，在医生认为达到正常状态以前，他们是不会把我放出去的。”

“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希望我们能弄清楚杰克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圣约翰夫人向肯尼迪夫人慰问说，“不过，目前……你尽管放心，我们与你的孩子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天来实在让你牵挂，你不在杰克身边一定更加担心，对此我们表示歉意。”

个人主义者

在棕榈滩，罗丝·肯尼迪担心儿子，只不过她是用一种不同一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她在4年中出国17次，但是却没有到过康涅狄格州，看望已住院一个多月的儿子——杰克。1934年2月克拉拉·圣约翰去医院看望了杰克后记录道：“上午我把电唱机和唱片带去给了他。”杰克周围到处都是书和唱片，应该不会不快乐。自从他家从布鲁克林搬到布朗克斯维尔，后来又搬到棕榈滩别墅，他就一直是个精神流浪者。一个父母经常外出、佣人经常换、客人们来来往往的家，就好像是一个旅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只有书籍和唱片，其它一无所有。勒姆·比林斯评论说：“肯尼迪家的孩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他们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可以在墙上任意挂照片或者在书架上摆放纪念品的房间。每次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都是随便找一间房间住下。”“这次我住哪个房间？”杰克总是这样问他的母亲——如果她在家的话。

从学校宿舍到学校医务室、医院以及城里的住所或度假别墅，不停地搬迁使杰克原来脆弱的心理变得坚强起来，这种搬迁赋予他一种奇特的独立思考的力量。用他母亲的话说，他总是“按他自己的方法思考”，“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在青春期遇上像J·马厄这种滥用职权管束学生的人，他的个性独立思考立刻显现出来，以保护他个人的自由。

学校做出他应该在这学期剩余的时间回棕榈滩养病的决定，杰克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受马厄先生指责监督。很快他给克拉拉·圣约翰寄了一封令她欣慰的信，感谢

肯尼迪传

“在我住院期间你给了我许多关爱，我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惟有写信向你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杰克确实是感激她的。不过复活节后一回到乔特中学，他又呆不住了。“这里气候很不好，几乎每天下雨，我非常怀念棕榈滩的太阳，”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马厄先生度假回来后看起来比以前更黑了。”

在棕榈滩，通过辅导老师的帮助，杰克赶上了英语、历史、化学和法语的学习过渡。然而他的身体刚康复，他就使马厄先生感到不满起来。“我认为，杰克的问题主要在于马厄，”西摩·圣约翰承认，“我认为，他没有极富创造性的想像力诱导杰克听话。他虽然尽了力，但是我认为，杰克需要一个另一类型的——像莱恩巴克那样的老师，而不需要马厄这样的老师”。

马厄当然也不需要杰克这种学生。不久他在舍监报告中万般无奈地写道：“杰克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集体精神和社会道义（如走路不要踩别人的脚）的一般要求对他根本没有半点作用。说我了解杰克只不过是表达我的一种热切的渴望，而不是一种事实。”

他虽然小小年纪，行为幼稚，但思想却很老套。他起初的态度是：管你是老师还是六年级学生，我是聪明伶俐、有一肚子点子的小家伙。你要扫我的兴，我就跑给你看。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当他觉察出没有人对他无聊的游戏特别感兴趣，或者发现他自己竟扮演了可笑的傻瓜的角色后，游戏才停止。此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一点儿希望，杰克大概知道放纵与自由的区别了。

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尽管杰克当时有病（推测可能是“肝炎”），但是他仍搞不懂自由与放纵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勒姆·比林斯回忆道：

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的幽默这样绝妙——使人愉快、使人发笑的才能。他想刻薄的时候他说话非常尖刻。我认为了解他的人都一定非常喜欢他。有的人不喜欢他，可能是因为他说话尖刻，爱拿人取笑——像他这种总想恶作剧和尽情享受生活的孩子免不了惹教师生气。教师们大都不喜欢他。我们都不太重视在我们看来不重要的校规，譬如按时上课、吃饭，保持房间整洁等等。

“杰克总爱恶作剧，”他的另一个好友休·温回忆说，“妙趣横生，出人意料——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要干什么。老师们自然也不知道——问题就在于此。”

不过，非常了解杰克的人都对他恶作剧后面的聪明才智、对这个 16 岁孩子的见多识广感到惊奇。比林斯回忆说：“他读了大量的历史书，以至他在上学时就已经博览了许多历史方面的书——他对历史有极大的兴趣。我想他终身都是如此。他对当时的时事也很感兴趣。我记得别的孩子都没有订阅《纽约时报》，惟有杰克订了一份，而且他每天必读。他非常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个同代人承认：“他不在课本上下功夫，但他是同龄人中吸收知识最多的孩子。”

杰克的朋友里普·霍顿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他们一起收听深受听众喜爱的《请提问》时“我只知道 10% 左右的答案，

肯尼迪传

而杰克·肯尼迪却知道 50% ~ 60%。”当霍顿问杰克是怎样记住这么多事情时，杰克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我先拣一篇文章通读一遍，然后强迫自己放手大约半小时，把整篇文章在脑子里过一遍，尽可能多地记住它，之后再分析文章，并进行抨击和批驳。”

回想 40 年前发生的事情，霍顿仍清楚地记得杰克在乔特中学的成绩“非常一般”，但是这并不能反映他天生的智力。杰克有“一个非凡的头脑，”霍顿强调说，“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课程，对他丝毫不具吸引性。”“他博学多才，但不自夸。他似乎就是凭着这种他所推崇的强记训练吸收东西的——他掌握他所读的东西的速度似乎比其他人要快得多。”

杰克的英语教师哈罗德·廷克也有同感。“一天，我们下课时，”霍顿回忆说，“我记得廷克博士把杰克叫到一边。博士要求我们都要会写文章或论文。他告诉杰克大学毕业后最好从事新闻一类的工作，因为他的文章较他同龄人的具有非常流畅而成熟的文采。”

相比之下，小乔却没有这种文采。正如拉斯·艾尔斯曾经说过的，他“善于写实实在在的东西，却不善于想象”。他的认真和誓要成功的决心不仅给他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也给乔特中学的教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欣赏你做事就一定能做好的能力。”约瑟夫·肯尼迪给在伦敦的小乔寄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同时他也欣赏从小乔的教授哈罗德·拉斯基那里寄来的备加称赞的成绩报告单。

要是拉斯基知道小乔在家信中对德国纳粹政权是多么地吹捧——他去那里过了复活节假日——就一定不会对他的这位学生有那样高的评价了。在他星期日下午举行的茶话会上，这位著

名的左翼政治学家向小乔揭露了纳粹的暴行。可是当小乔与一位由他父亲出钱挑选的伙伴一起到了希特勒的新帝国后，就把拉斯基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对最新的纳粹暴行大加赞扬。“德国人心涣散、沮丧和绝望，”在信中他写道，“希特勒上台执政，他意识到寻找一个敌人——一个替罪羊的必要性。只要消灭这个共同的敌人，德国就会走出困境，这是一种绝妙的计谋。非常不幸的是，他们寻找替罪羊的眼光落到了犹太人身上。不过憎恶犹太人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小乔对他父亲说，因为他认为犹太人“都是商界巨头或司法界要员等大人物”，“纳粹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是必要的——为了确保人民不朽的支持，必须实施目前的计划——尽管手段恐怖。任何一次革命，流血总是免不了的。希特勒正在他的士兵中培养一种任何国家都会羡慕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可以很快转化成战争精神。不过希特勒很好地控制着局势。希特勒手下的部长们是惟一的危险，万一希特勒遭遇不测，某个发疯的部长就有可能上台执政。”

小乔的反犹情绪和对希特勒的崇敬，或许也是想给他仇恨犹太人的父亲留下深刻印象，让他知道他的思想。他在信中写道：“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德国人，我一定会义无反顾，举起我的手行纳粹礼。”他毕竟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9岁的青年，一个初次出国旅行的百万富翁的儿子。不过，拉斯基教授认为，他还是一个“决心从政”，并且决心“要当美国第一个天主教徒总统”的孩子。

小乔和拉斯基教授当时都不知道，这正是这位波士顿爱尔兰百万富翁所渴求的。这里暂且不说他儿子以后的事。罗斯福总统1934年6月28日，终于对肯尼迪在1932年竞选运动中为

肯尼迪传

自己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奖赏。他以“贼喊捉贼”的观点驳倒众人，任命肯尼迪为新的整顿国家证券市场的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使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臭名远扬的股市投机分子约瑟夫·P·肯尼迪居然要摇身一变成为股市改革者了。

躁 动

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完一年，小乔由拉斯基带领前往苏联作研究论文。杰克则期盼着去科德角享受驾驶帆船和日光浴的快乐，而且他已邀请了他的同学 K·勒莫安·比林斯作陪。比林斯出身于匹兹堡一个上流新教世家，父亲去世不久，由于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父亲只留下了一份并不算大的产业。勒姆永远忘不了他的海恩尼斯之旅：“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与杰克呆在一起的情形——我们正住在科德角。我无所事事，只记得什么声音弄醒了他，他尖声叫喊，‘该死的，比林斯，闭上你的嘴。’好嘛，那时我还不十分了解他，我大动肝火！我甚至一气之下想离开那里。我觉得我不能与那样跟我讲话的人呆在同一所房子里。”

当比林斯认识到杰克夜间的咒骂并无恶意时，他的气很快就消了。但是在善意、喜欢逗乐的外表背后杰克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青年，他“不喜欢有人在房间里发出响声，例如鼾声，因为那会把他弄醒。我当时确实很生气，但是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回去睡觉，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杰克的身体一直都没怎么好。他刚刚安顿下来，准备好好玩一个暑假，不料又病了，只得住进医院。这次他的父

母决定送他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著名的梅奥诊所进行全面的检查，希望这些检查能最终确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约瑟夫·肯尼迪的一位朋友凯·哈利后来说，当她去医院看望杰克时，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鼻梁上的雀斑特别明显。他周围堆满了书，我几乎都看不见他了。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孩子还在读温斯顿·邱吉尔的《世界危机》。”

这种印象是所有探望过杰克的人所共有的。杰克周围全是历史书，现在他自己正在经历着危机——青春期危机。他很快从梅奥诊所给比林斯潦草地写信说：“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似乎要在这里住上大约 12 天才能出去。我可以说罗切斯特是我到目前为止见到过的最该死的肮脏的地方。我希望回学校去。”

一想到在海恩尼斯港海滩尽情享受生活的比林斯，而自己却要忍受数周的医疗折磨，杰克就非常气恼，甚至得知比林斯在肯尼迪先生的专用洗浴间被烫伤，需要住院 3 个星期时也是这样。比林斯的不幸是他自己的过失，但杰克的不幸却不是他的过错。杰克给他的这位校友罗切斯特发出疯狂的、忧郁的、常常是下流的信件。当乔特中学校长痛惜地坐在那里看杰克的成绩报告单的时候，可能认为杰克“是世上最棒的人之一”，但是他不知道杰克正在经历感情上的剧变。在一个有天资，但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又常常生病的孩子所遇到的问题，现在又增添了性的问题——沉溺于阴茎和肛门的淫秽行为，如手淫，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寄宿学校中。“我还从未见到一个聪明、幽默的孩子，在他早期发展的某个阶段不被认为是不遂众望的。”圣约翰在前一个秋季为杰克的行为辩护时辩论说。然而就连圣约翰也不可能预料到前面面临

肯尼迪传

着的将是什么考验。在罗切斯特，杰克既浪费了他的暑假，又忍受着持续的腹痛，同时还要接受一系列令人尴尬的试验和检查。这些试验和检查连成人都会感到苦恼，更不用说一个才刚刚 17 岁的孩子了。“我正在这里忍受着可怕的痛苦的煎熬，我到现在肚子一直疼痛。”他向比林斯诉苦说，“我仍然得把豆荚和嫩玉米当饭吃，好在有一个漂亮的金发碧眼姑娘给我灌肠。天哪，那是最廉价的刺激。”

他的病因像 2 月份一样还是不易诊断。“昨天夜里我和爸爸通了话……在通话的 20 分钟里，他想弄清楚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当时，我们试图推断出我们不知道的事实。”甚至连比林斯烫伤的消息都未勾起杰克的怜悯之心，“尽管你被烫伤是不幸的，但是还请回到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上——我的肠子已经完全用不着了。我通便的惟一办法是有人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给我灌肠。下星期六应该可以出院了。看完这封信后立即把它烧掉。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乱丢。你要是敢这样，我就把你所有的来信都包起来，封好，等你姐姐未出生的孩子长到 21 岁时交给他，让他看看他的舅舅是一个心灵多么肮脏的该死的家伙。”

肯尼迪夫人 2 年前曾经唠叨有教乔特中学的学生如何正确地写信的必要，以“亲爱的废物！”开头的信大概那时她还没有见到过。

在某种意义上讲，杰克青春期的淫秽行为，部分地是为抵抗母亲枯燥乏味、女修道院式的价值观。向在海恩尼斯港的比林斯描述折磨他的医疗过程，使杰克获得了极大的刺激。当他得知有几封信比林斯没能收到，杰克假装忧虑地写道，“我希望没有人看到这些信，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灵魂

非常肮脏的家伙——上帝，我该忍受多大的损失啊！我的体重已经减轻了8磅，而且还在往下减，”他6月21日写道，“我给他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生的到底是什么病。他们只会谈论我是一个如何有趣的病例。如果我没有病，那才真有趣呢！我开始为此失眠了……很可能还要在这里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医生仍然无计可施。只得把他转到附近的圣玛丽医院治疗。“刚刚听说，我可能要到7月4日才能出去。可恶！”他在信的开头写道，“3天中我灌了18次肠!!!我干干净净。他们给我灌肠直灌到出来的东西像他们都能抿一口的饮用水为止”。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并向他们描述了他“生活中最尴尬的经历”：

昨天，他们给我灌了5次肠，直灌到我肚子里空空荡荡为止。当时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像理发椅的设备上。但是不是让我坐在椅子上，而是要我跪在一种类似于搁脚板的東西上，把头放在座位上。接着他们中一个金发碧眼姑娘脱掉我的裤衩!!然后他们把椅子放倒。周围站满了护士。医生首先将他的手指插进我的肛门。我面红耳赤，你大概想象得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扭动手指，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些什么东西来，我说“你扭得蛮来劲的嘛!!”把他们一个个逗得捧腹大笑。他拔出手指。接着这蠢货又把一根长12英寸、粗1英寸的铁管安插在我的肛门里。他们借着装在管子里面的灯光到处查看，然后他们向我里面吹进大量的空气以便让我的肠子撑起来。当时许多陌生人看我的屁眼儿，我确实感到很难受，我敢打赌要是你这样

肯尼迪传

也会的——他们终于弄完了，我很高兴。我可怜的破直肠这些天来一直责备地审视着我。

对杰克来说，那确实是一种令人尴尬的经历。在学校是他的想法，现在在罗切斯特则是他的肉体处于被围困之中。由于父亲的去世和哥哥的出色而显得黯然失色的比林斯，着迷地关注着杰克对待他的命运以及他自己的种种方式。表面上，杰克的一切魅力使人联想到他的外祖父甜蜜的菲茨的幽默风趣、讨人喜欢、过于谦逊。而且他那浓密蓬乱的头发、宽脸上镶嵌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以及他结实的下巴，令他拥有一种坦率、迷人的气质。然而，在内心深处，杰克却受到梦魇的追逐。

“周围站满了护士”，杰克经受着越来越多类似的检查。他几乎成了医务人员的“玩偶”。虽然他的体重降到了 135 磅，但是从医疗上来说他并不怎么关心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而更关心没完没了的灌肠和嫩玉米、一碗豆荚膳食对他的身体器官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对他的“工具”的影响。“我的精力正在逐渐地耗尽，”他向比林斯悲叹道。自他入院以来他只手淫过两次高潮。“我现在只是以前那个人的躯壳，我的阴茎看上去会好像被压汁器压过似的。”一个护士答应杰克，晚上熄灯后可以拿她做个“试验”。但是很可能由于他年龄太小，她后来又决定不做这种冒险的事情了。这使杰克感到非常懊丧。然而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杰克给比林斯讲的在电影院遭遇的一次小小趣闻：

昨晚在剧院里，我和埃德正坐在座位上，这时一个家伙和一个女孩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他用手搂住她，那情

景使我十分不自在，因为你知道我对那类事情是很敏感。而且，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闻到过像那女孩身上那样令人恶心的味道。她让人觉得恶心。

我示意埃德向旁边挪动一下。他挪了一下，我也挪了一下。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女孩看了我一眼，然后跟那家伙嘀咕了几句。他放开抱着女孩的手站了起来。我不甘示弱地对他怒目而视。女孩扯了一下他的手，他坐了下去。算他走运，因为他的身高才 6 英尺 3 英寸，我足可以把他提起来塞进他的肛门里。

“我想，我已经给你讲过我们的车祸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以上就是全部的新闻，你这个睁眼瞎（比林斯的视力很差是出了名的）。赶快回信！”他命令他的使徒。

比林斯每隔几天就要收到一封这种类似但远非虔诚的信——侮辱、挑衅、模仿英雄气概、有点尖刻，既有少年的血气方刚，又有青春期烦恼，颇让人怜惜。反复无常的腹痛和医疗试验使他易怒和烦躁，但是他的信也显示出了一个与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眉清目秀的男孩”角色不符的、焦躁不安的、探索中的自我。他为性所困扰，想与给他灌肠的、十分性感的金发碧眼护士做爱，然而他讨厌喷着浓重香水的女人，而且对公开正常的感情表示感到难为情，这颇让人难以琢磨。他母亲对子女的冷漠和她对珠宝、服装及打扮的倾注，使他终生厌恶这种缺乏性欲的虚伪行为，以至在他把破碎的心灵投入到徒劳地追求女色、满足性欲的时候，仍旧无法感到满足。

除了享受性快感之外，他讨厌别人碰他，讨厌对女人海誓

肯尼迪传

山盟或永不变心之类的话语。无论他装得多么孤傲，多么目空一切和憎恶详细记述他言行的勒姆·比林斯，仍看得出其中哪些是假装的，哪些是一个青年发自内心的呼喊。出生于双亲不恩爱、不愉快、家人感情不融洽、社会上遭排斥和充满竞争的家庭，他别无选择。他从圣玛丽医院发出的乖戾、下流的信都有一种古怪的迹象，就像他抱怨监督他医疗的白衣看守和他的不知名的医疗命运那样。譬如，他评价白衣看守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灵魂最肮脏的女人”。他对他的医疗命运的态度用他的话概括道：“我的肠子出了毛病——也就是说，我便血。”

令人高兴的是杰克绝不一味地自省或自怜。圣约翰夫妇亲眼目睹过他真实的勇气，比林斯对杰克遭遇这样的折磨还如此幽默感到不敢相信。不过他的风趣是讽刺性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尽管在杰克的大男子气外表下面跳动着的一颗忠诚、常常使人释然的善良的心。“集体参赛太棒了！我们肯定可以玩得很痛快。”杰克在草草写下了信的补遗中说——担心比林斯去参加社交聚会而把他丢下。

6月30日他在给比林斯的信中说：“我仍是在这个该死的火炉里，看来还得再呆一周。护士都非常有意思，我简直成了他们的宠物。她们整天往我这里跑，告诉你，护士们几乎和你这个卑鄙龌龊的，满脑子淫秽念头的家伙一样的下贱。很抱歉，艾克叔叔、本叔叔和比林斯夫人。”为防止这封寄往匹兹堡的信在比林斯回家前被别人误拆，他又补充道。“我今天刚刚灌了两次肠，所以感觉胀胀的。她们终于找出了我的病因。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很可能是痔疮之类的令人恶心的病症，或者是重要器官上的疾病。要是有人问我得了什么病，我该怎么答复呢？”

事实上，医生尽管做过各种检查，但是并没有诊断出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后来肯尼迪先生向杰克的校长解释说：“暑假后不久，我们把他送进了梅奥诊所，在那里他呆了大约1个月。医生们对他的身体作了彻底的检查，但还是没找出杰克冬季生病和后来总是不大舒服的原因。后来他们把他送回了家，并给我留了封信。在信中他们明确交代，如果杰克哪怕是一点点复发的迹象，就必须休学大约1年，最好能送到南方去。这使我极为担心，杰克也甚感烦恼。”

然而，好像是有意与梅奥的医生们唱反调似的，杰克一回到家腹痛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并且恢复了以往猥亵的活力——至少就他的低级下流的信而言是这样。“在我收到你的上一封污秽的信之后，”7月份他在一封信中潦草地写道，“我现在给你写一封肮脏的信来结束这种肮脏的书信。你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你将发现你的名字是这封信中的许多名字的第一。”他给比林斯描述科德角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内幕，“特罗克斯·博克斯即将从北方回来，所以她的心情应该是玫瑰色的。米米已经回来，她还和以往一样讨人喜欢。”他估计他9月份就能回乔特中学，“我想，今年我还得回到那个人间地狱去，因为我的身体正在可恶地好起来。小乔大概3天前回来了，已经成了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狗屁，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他的哥哥从苏联返回这样评论道。他父亲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职务对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罗思·津丽从克利夫兰给隔壁的女孩打电话打听我的身体怎么办。我实在没有办法。可能不是我长得帅气，因为我并不比别人漂亮多少，一定是我的人格魅力。”他自嘲地向比林斯吹嘘道，“现在我整天穿着艳丽的丝绸游泳裤在海滩上走来走去，得到了今年在纽波特和海恩尼斯港

肯尼迪传

流行的那种像巧克力似的棕褐肤色。耐不住寂寞的人。”

花花公子式的杰克的新生活正在拉开帷幕，这将使他与学校的戒律直接发生矛盾，面临被开除的危险。并使他父亲有限的忍耐达到极限。但是那或许也正是问题的关键。

玩 笑

比林斯在那年夏天已经觉察出了杰克父母之间微妙的关系：肯尼迪先生在时，“一切都由他做主”，而罗丝似乎什么都不管。“乔在家时，她似乎有意让他去管。”不过，约瑟夫·肯尼迪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后，就很少回家。他不在时，罗丝就按她那一套家规来管理这个家，而这总是遭到杰克的轻视。杰克的表弟乔伊·加根后来描述说，杰克和他母亲“在很大程度上对家规的意见不一致，因而杰克总不好好地遵守”。罗丝过分迫切的训练孩子适应上流社会的愿望，在杰克看来是愚蠢而可悲的。“她几乎总是管着我们，”罗丝的父母双亡的外甥回忆说，“她总是要求我们注重装束和举止：‘不要白袜子与燕尾服搭配着穿。蓝色或灰色的衣服要配黑色的鞋，不要同时穿棕色的鞋。外衣的袖子要短一些，衬衣的袖口要长出外衣的袖口一英寸。和人说话时不要用‘喂’。”在吃饭时喋喋不休地“训示要如何有良好的用餐礼仪，如何正确使用刀叉，如何保持正确的坐姿和‘让女士优先’的风度等等……吃完饭后，要让女士——特别是罗丝‘大妈’先离开餐厅，那才是礼貌。但是杰克常常忘记。他总是谈笑风生或者心不在焉，或者无意中就忘掉了退席的礼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所以罗丝‘大妈’一吃完饭总是迅速地退席。显然，她是和杰克比赛，看谁先起身。为

此她经常提醒杰克，可杰克总是回答‘是的，妈妈，对不起’……可是过不了一两天，就还是老样子了。”

杰克不是故意反对他古怪的母亲，而是不重视她的要求。在科德角或布朗克斯维尔找来一屋子校友，如赫布·梅里克、里普·霍顿、斯莫基·怀尔德和休（“巴德”）·温等等。“我开始觉得他有不少的朋友，”罗丝后来回忆说，“因为在假期里特别是在周末里，他回家的时候至少带回一个，通常是2个、3个、4个或者更多。我们从来不知道谁会来或者会来多少。一个简短的、使人产生许多联想的术语‘杰克的突然袭击’已经成了家里的常话。”

据杰克的一位校友保罗·蔡斯后来回忆，杰克的家族最初给他的感觉是一个模范的家庭，9个快乐的儿女在肯尼迪的阳光下嘻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蔡斯发现，在这个看似美好的童话里，其实一切都不顺利。美好的故事外表下掩盖着一幕幕近乎变态的闹剧。肯尼迪夫人因横行霸道、冷酷无情的丈夫而显得黯然失色。一切事情都弥漫在父母间那种没有公开的对立的紧张气氛之中。肯尼迪先生使他的9个孩子引起的竞争非常有趣。他在家时，他就像是动物园里的驯养海豹的工作人员，把水桶里的鱼抛到海豹的嘴边，大声地告诫训斥，要它们潜下水去再把鱼衔上来。“肯尼迪先生给孩子们灌输胜利就是一切的思想，”蔡斯回忆说，“好几次海恩尼斯港帆船比赛，杰克找不到别的人，就要我当他的船员。一次我们惨败，回到岸上时，被他‘老子’训了足足半个小时。他说他观看比赛，他替我们两个人感到耻辱。他说，除非你想方设法去获胜，否则就不要参加比赛。他为这次惨败确实很生我们的气。”

里普·霍顿也有同感，“他确实非常好胜。我们和他玩‘大

肯尼迪传

富翁’游戏，他总是把我们打败。我们3个人——勒姆、杰克和我——联合起来对付他，仍然不是他的对手。不过那主要是为了教育他的孩子而不是别人。”进餐时同样如此，肯尼迪先生总是鼓励儿子们谈论“时事、政治、国际局势，我听得入迷，因为我喜欢政治”。霍顿回忆说，“但是，如果我问肯尼迪先生一个问题，我敢肯定，他总是装作没听见不理我”。——这是杰克带回家的所有朋友所共有的一种经验。

因为无法重新获得属下的帮助，约瑟夫·肯尼迪便转而训练自己的从来未受过关怀的孩子们。他知道，一个好的驯兽员驯养时都是边哄边喂食，于是使用当年套住格洛丽亚·斯旺森的方法来笼络自己的孩子，佯称他已经为他们每个人在银行开了100万美元的户头，他们到21岁时有权动用这笔资金。他是股市上神出鬼没的炒作高手，如今把这言而无信的伎俩也用在了他为父之道上。据保罗·蔡斯回忆，他经常念叨说杰克洗熨衣服花费太多，然而“在特别丰盛的一顿晚餐后，这位‘老爹’让我们看一下各自点心盘下面。我们一看，发现在每个人的点心盘下面都有50美元。肯尼迪先生告诉我们，我们都将作为客人被邀请去布雷德利赌场参加一个赌博晚会。至于为什么鼓励我们在那个年纪去赌博，我至今都没有想清楚。”

在所有的东西当中，对杰克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约瑟夫·肯尼迪为他孩子在性方面树立的榜样。有一次杰克从学校回家，发现他的床上铺满了性杂志。这些都公然以最下流的方式展露女人的裸体——这是后来西摩·圣约翰神父讲述的。难道肯尼迪先生希望杰克以后步他的后尘？大家都知道，他对妻子的禁欲行为感到失望，因此到处拈花惹草。“我认为那是爸爸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据说杰克看到大量的色情照片后这样评论。

不管是何用心，这无疑使杰克的感情更加复杂，无形中促成他对女人抱鄙视和利用的态度。

杰克的反应是经常到朋友的圈子里寻求逃避。他感到与乔特中学的一帮臭味相投的恶作剧伙伴在一起有一种集体安全感，使他能放心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所谓不循规蹈矩就是后来比林斯所说，他认为现在哥哥就要毕业，“乔特中学就是他的天下”。

倘若真是这样，乔特中学将与他哥哥在那里称霸时有很大的不同。1934年7月末，杰克给比林斯写信说：“你的修面刷我还在用，等我取回我的幼鹿皮外套，我就把它还给你这个可恶的杂种。你与普西发生关系了吗？你这个同性恋者。”

在最后一个学年中，杰克和比林斯住在西楼同一个房间——但是他们惊异地发现，它紧挨着杰克的死对头马厄先生的房间。“我们就住在马厄先生的走廊上，隔壁就是他，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可能走进来恶狠狠地批驳，并加上自己的论调，”杰克向他父亲哭诉说，“我们和他简直就是住在同一个房间，这实在出乎意料。”

然而，如果马厄先生想把杰克置于其严格监督之下，迫使他埋头苦学的话，那么他将会很失望。比林斯清楚地记得那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那是杰克过完暑假后返校不久，我们把他的大旅行箱从楼梯拖往地下室，弄出了很大的响声。舍监马厄先生听到声音，马上从房间里出来，他警告我们，现在是学习时间，噪声太大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并且叫我们把箱子抬回去，明天早上再把它拿到储藏室去。

肯尼迪传

于是杰克和我第二天早晨 6 点起床，我们把箱子拖出来，沿着楼梯，一路上碰得咚咚作声。马厄先生从卧室里穿着睡袍，跑出来，瞪着两只水牛般的眼睛，厉声问我们在干什么。

“马厄先生，”杰克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不是叫我们早晨把箱子拿下去吗？”

杰克很清楚自己冒着多大的风险。但是，他与死神几次打交道，忍受不知病因的腹绞痛，随后又健壮起来。这些给他增加了一种连乔特中学最严格的纪律执行者 J·J·马厄都毫无对策的无所谓的气质。马厄强压怒火，仍然感到他占有优势。1934 年 10 月，他向校长报告称：“杰克正在转变中。开始时态度不好，邋邋遢遢，很少守时；但是现在他看上去已有转变，并正在作更大的努力。但最好不要逼得太紧——他会有很大进步的。”

然而几个星期后，舍监马厄就由希望变为失望了。“同宿舍的人比林斯和他一样，邋邋遢遢，经常迟到。一切强制措施均无济于事。”马厄报告说。乔治·圣约翰将此告诉在华盛顿的肯尼迪先生。这位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期望家里人与他一起搬到华盛顿去，已经租了一个靠近波托马克河马伍德区的有 33 个之多房间的 125 英亩庄园。但这一切只是徒劳，圣约翰在信中称：“杰克的成绩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水平。他一开始就很糟，一直改不掉粗枝大叶的毛病。这不该是杰克应有的态度，只是考虑他生了那么久的病，我也不忍心过分严格要求他。”

校方让杰克看了马厄先生的报告和他的秋季成绩单。“他

怕他父亲吗？”比林斯后来思索，“他做了错事时确实非常害怕。”因为肯尼迪“老人言语刻薄，目光犀利。杰克既不想听他的训斥，也不敢面对他的目光”。

“亲爱的爸爸：我想我应该给你尽快写信，”193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杰克用特别工整的字迹充满歉意地写道，“勒莫安和我一直在说这一季度我们表现得不好。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虚度光阴。我意识到，我如果想要去英国的话，今年争取一个优异的成绩是如何地重要。”他承认，他知道父亲希望他跟哥哥一样，在上大学之前先去伦敦拉斯基教授手下学习一年，“我现在确实感到，我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我一直在以我做了不少真正的事情而欺骗自己。”

但是终究杰克无意改过自新。“那时他确实没有想博得人们的喜欢甚至尊重的愿望，”比林斯回忆说，“他一心想痛痛快快地玩。他对他喜欢的功课感兴趣，对他不喜欢的功课厌恶之极；他对女孩子非常非常感兴趣，对体育运动感兴趣。他确实很有幽默感。他高兴起来就拿人开涮。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男孩不喜欢他。在乔特中学，他无疑不是学生主席那样的孩子。”

在这方面，一些观察家认为比林斯对杰克的阿谀奉承是可悲的，把他称为“可怜的勒姆”。因为他既贫穷，又对杰克一切稀奇古怪的念头都谄媚奉承，百依百顺。然而，在杰克遇到来自父母、医生和教师等没完没了的恫吓的世界里，比林斯支持杰克躁动不安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的心意是忠诚的。杰克想——不是从乔特中学老师的角度，也不是从他父亲的角度，而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如果像比林斯这样的孩子能够时刻跟随他，并且一直信任他，那么生活，他的生活，一定是很美好

肯尼迪传

的。

杰克学生生涯的下一个危机即将来临。以校长的观点，它将是致命的危机——他的权威对杰克的权威；从肯尼迪先生的角度看，它将是源于杰克毫无责任心和人生目标的危机；但是在一个 17 岁孩子的眼里，它根本不是危机，而是机遇。他的大人似的风趣和爱读书在整个成长的岁月里保护着他。没有人鼓励过他，袒护过他，也没人对他太放纵过。他机敏并且决心对生活做出自己的结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立，就像他一直不愿意满足他关系僵硬的父母亲的愿望一样。他并不准备放弃那种自我意识，去学他循规蹈矩的哥哥的样子，或者去适应一所上等的圣公会学校的传统作风。因此，他将继续我行我素，直到他最终得到每一个青年都渴望得到的东西——父亲的爱。

“ 无赖 ” 俱乐部

虽然丈夫搬到华盛顿的马伍德区去住了，但是罗丝·肯尼迪拒绝跟他一起去。肯尼迪先生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因此他准备 1934 年的圣诞节与全家一起去棕榈滩过。遗憾的是，杰克糟糕的功课和叛逆使圣约翰老师不可能让他太早地离开学校。“我非常了解你要杰克尽快前往棕榈滩的迫切心情，”圣约翰解释说，同时向他保证：学校的全体教师“都会全力配合你，竭尽全力替杰克安排好”。话是这么说，圣约翰却不让杰克“存任何侥幸心理”。12 月 20 日，杰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获准离开乔特中学。但是使他恼火的是，校长要求这位少年，必须“在新学期开学前”返回学校。

肯尼迪先生对杰克在棕榈滩的表现同样感到失望。“我承

认，他对问题的认识仍然缺乏正确的标准。”他写信给圣约翰说，“我始终认为他很聪明，只是他的行为依然像个孩子。虽然我注意到他今年进步不少，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最需要锻炼的是踏踏实实做事的技能。”

这句话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事情，约瑟夫·肯尼迪似乎认为，强迫杰克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不管怎样，肯尼迪先生对校长的批评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承认：“我们让秘书和保姆整天跟着他，看着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以至把他惯坏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杰克会反抗终生的是秘书和保姆，而不是父母。

杰克于1935年1月7日按照校长12月给他的“指示”提前返回学校。

然而杰克的行为毫无起色。“冬季学期一开学，”西摩·圣约翰回忆道，“J·J·马厄就显出了招架不住的迹象。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马厄1月末在给校长报告的备忘录中说：“一年半来，我软硬兼施，绞尽脑汁，让杰克接受几种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和观念，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他都失败了。杰克只有参加俱乐部活动才守时。他缺乏运动员素质，甚至连‘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这样最起码的素质都没有。别人必须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否则他就不干。”他痛惜地说，杰克“去年生病和随后的身体欠佳，使他不能参加能够提高思想素质的体育运动”。

体育锻炼和冷水淋浴是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的做法。马厄说：“我从清晨‘淋浴队’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勒姆和杰克两人都是该队正式成员，经常带来一些不良作风，公然做些下流的动作，其影响可想而知了。”马厄提议把他们分开，“因为

肯尼迪传

我坚信，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对彼此都没有好处。而且我认为他们不会在孩子们中间重新获得六年级学生所应受到的尊重，所以应该把他们分开，派到年龄较小的孩子宿舍去，以新的面貌重新负起责任来”。显然，马厄——一个受抑制的同性恋者——对这两个孩子的密切交往感到妒忌。

西摩·圣约翰在代表乔特中学全体教师发言时，对比林斯走狗一样跟着杰克一起搞恶作剧表示痛心，批评他们说：

勒莫安的哥哥乔西·比林斯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家里的长子，普林斯顿大学足球队队长。他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后来勒莫安也来了。他是次子，是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年青人，学习不错。但是他无依无靠，当他结识了杰克·肯尼迪时，他想正好，这正合他意。他对杰克·肯尼迪百依百顺。无论杰克做什么事情，他都毫不犹豫地跟着做。他是杰克的走狗，在过去两年中和杰克形影不离。而这对杰克来说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杰克喜欢比林斯。他非常喜欢有人听他使唤，经常和他开玩笑，搞恶作剧或者其他事情。但是勒莫安从来没有说过：“我想那样不太好。”只要是杰克的主意，对他来说就是好主意。

据里普·霍顿称，杰克接下来的打算是他和比林斯牺牲童贞去玩同一个妓女。霍顿后来透露他已经有了女朋友，所以没有跟他们同去。“对杰克和比林斯来说现在正是时候了。他们乘出租车去了哈勒姆区的一家妓院。他们先看了一个下流的表演，接着就带女孩走。前后大约花了3美元。由于担心有性病，比林斯和杰克回来后非常害怕。他们去了一家医院，买了

许多药和药膏以及一种能全面清洗阴茎的器械，半夜又叫醒一个医生进一步帮他们处理。”

现在这两个孩子在性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已经不可分离。他们正常恋爱的开始既是一种传宗接代的仪式，又是一种见证团结的仪式。回到乔特中学后，令比林斯激动不已的是杰克开始扮演起哈姆雷特的角色来。他把一个自私而又神气活泼、令同伴们开心而使自己的对头望而却步的人物表演得活灵活现。

这种创造性与圣约翰先生或者对负责的六年级学生行为的马厄先生设想严重脱节——特别是当它触犯到乔治·圣约翰在过去 30 年中苦心经营起来的学校风气的时候。杰克日渐增多的不满开始在他的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中散布——这是在六年级孩子中存在的一种反专制的不满情绪，而学校还指望他们给其他年级的孩子树立榜样呢！马厄再一次陷入了绝望。于是他向圣约翰报告：“杰克和他的室友都不承担他们作为六年级的义务。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恢复他们在这里丧失名誉已经太迟了，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用荒唐、可笑、不可分离的伙伴关系表明：学校利益是次要的，他们的快乐是首要的。”

不过，“集体利益”的定义因人而异。对马厄来说，就像对圣约翰来说一样，集体代表的是学校的权力集团。而对杰克来说，集体则是指他周围的朋友。正如他后来结识的女朋友奥利夫·考莉回忆，杰克“风趣、聪明、淘气，喜欢寻求刺激。在他那个齐心协力的集团中，杰克发号施令，其他人言听计从。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叫干啥就干啥。其中最忠实的要属勒莫安·比林斯”。

杰克拒不服从马厄。他独树一帜地反对乔特精神，使圣约翰感到恼火。“把杰克和勒莫安找来教训教训。”他在一张便条

肯尼迪传

上写道，“他们需要教训，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把他们分开吗？不行。腺体专家是否能帮助消除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孩子气呢？”他反复考虑。圣约翰在给杰克父亲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这一想法，“杰克是他的那个宿舍里最淘气、最没有责任心的孩子。如果杰克是我的儿子，我想我会带他给腺体专家检查一下的。”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这真的成了杰克经常生病的根源——虽然当时未能诊断。不过杰克在学校的“孩子气”的根源不是在医疗上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成长中的问题。就杰克的表现而言，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恋母情结的一厢情愿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与苛刻、霸道而疏远的父亲的新关系。

杰克的调皮捣蛋让校长圣约翰招架不住，他不得不召集全校学生训话，要他们遵守乔特中学的创校精神，并把那些不尽全力实现他的圣公会学校理想的学生称为“无赖”。

“这个词是那年冬季向集合的学生作礼拜训话时提出的。”校长的儿子西摩后来回忆道，“当时含沙射影地提到了包括杰克在内的那一伙人。为了反抗当局，杰克和十来个朋友突发奇想，成立了‘无赖俱乐部’。”

俱乐部的共同发起人比林斯认为，整个成立过程中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他说：

我们有一个紧挨着餐厅的房间。在吃饭与做礼拜之间大约有 20 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一部效果相当好的留声机，可是我们发现每一次来到那里，我们都无法进去。校长在教堂里一再教及，他所认为的最坏的一类孩子就是他称为“无赖”的孩子。他还

说，学校里大约有 5% 的孩子是“无赖”成员，如果他知道了他们是谁，就会立即把他们开除出去。于是我们当下成立了一个名为“无赖俱乐部”的小集体，虽然很幼稚，但却是正常的孩子气的反应。

“我们为什么如此调皮呢？”霍顿后来回忆说，“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被管束起来。在我们这群人中，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幽默感。杰克最最幽默。我们就是想气气他们，看看他们的反应。我们谁都不喝酒，也不抽烟——只是在某些方面无组织性而已。”

俱乐部的入会资格要求很严。“在饭后只有无赖俱乐部的成员才有资格到我们的房间来。”比林斯回忆说。因为当时正在讨论即将上演的恶作剧。自认为是最“老练的”会员的里普·霍顿被选为俱乐部秘书。禁酒期间他家给了他各种可以进入地下酒店的名片。作为一个 17 岁的孩子，他对纽约夜总会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爱德华·布兰德的加入，给它增添了“更加滑稽有趣的”活力，于是杰克很快创作了一首打油诗：

人人希望成为布兰博，
没人想成为霍蒂诺。
索菲公主去年令人着迷。
今年布兰博使人中邪……

副校长的妻子奎尼妖艳迷人，人见人爱。她特别喜欢无赖会员莫里斯·谢伊，杰克因此十分妒忌他，于是又做了一首带有叠句的打油诗：

肯尼迪传

莫里斯·谢伊，
每天泡在茶里。
莫里斯·谢伊，莫里斯·谢伊你要什么？
奎尼，我们要刺激！

杰克的这首打油诗在整个校园很快被传开，甚至有人请杰克替自己给奎尼唱他的茶歌。“我们不得不给她唱，”霍顿后来回忆说：“那次我们差点儿完了。至于我们没有被赶出学校，我永远不知其中的原委。”

有趣的事才刚刚开头。杰克的行为不只是无政府主义的，而且还是政治性的。无赖俱乐部的势力不断扩大，凭借会员人数多，大有取代官方学生会的态势，并在学校里被列为反对党。一个“无赖”回忆说，“我们毕业那年的一天晚上，我在从礼堂回宿舍的路上被杰克叫住，他莫名奇妙地说，‘你是俱乐部——无赖俱乐部的会员。’……我不知道到底是6人、8人，还是10人，但是我们是‘重要人物’，校长不会把我们都赶走。”

也有人中途退出。有些学生，如休·温，担心在大萧条期间失去奖学金或保证人，只得与“无赖”俱乐部脱离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乔特中学的无赖俱乐部固定在13个会员左右，他们打算用黄金铸造会员们佩带的徽章。霍顿记得，“我们每人打造一把小金铲，上面印有各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以及乔特‘无赖俱乐部’的缩写CMC，我们还自豪地给人看了那些铲子。”

在当时这些徽章是昂贵的。“我记得大约是一枚12美元，”

另一个无赖俱乐部成员保罗·蔡斯后来回忆说，“徽章是由沃灵福德珠宝商手工打造成的。”蔡斯对徽章很感骄傲，甚至向他的室友吹嘘即将上演的无赖恶作剧，“我告诉他们，在春季庆祝活动会上，我们将弄一堆马粪进来，与我们的金铲子一起在舞会上亮相！显然他当了真，还向校长请示了。”

校长得知这一最新恶作剧后怒不可遏。春季校庆活动是学年中一场盛大的周末舞会，许多有身分的女孩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寻求中意的伴侣。在国家经济不景气期间，学校的入学率跌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低点。在国家非常贫困的情况下，这种贵族学校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已成了问题，圣约翰对此事非常关注，誓将尽力维护学校的声誉。

在当时的记录中，圣约翰把13个无赖组成的无赖俱乐部说成是“一个极其自私、贪玩、不辨是非的集团，专门与学校里克己奉公的老师 and 勤奋学生作对。这个集团的标志是铲子。他们中有人提议，校庆活动时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女朋友拉到铲子旁照相，然后再站在粪堆旁照相，以示铲子已经用过”。

不过在他做这些记录之前，他已经采取了行动。在学校餐厅，圣约翰“迅速宣读了”俱乐部成员的名单。“当我读完名单时，听到餐厅里一片低低的叫好声。”13个人都被勒令到校长书房去。在那里他“威胁这些人，我将开除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如果事情到了那种地步，如果学校的精神受到侵犯，我将毫不吝惜地那样做……我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这是叛逆行为，同时也向他们表明，只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或任何人老老实实地对学校提供帮助，我会考虑的。其中3个可能被开除的最佳人选是拉尔夫·霍顿、吉姆·怀尔德和杰克·肯尼迪”。

圣约翰是第二天做的记录。不过据莫里斯·谢伊称，这些

肯尼迪传

孩子在这之前就已被开除。“我不记恨他，他认为我们不是他想要的能够体现乔特精神的那种孩子。所以……我们统统被叫到他的书房。我记得，他逐个地与我们谈话，指出我们的过失，并宣布，大约在五六点钟有一趟火车，让我们就乘这趟车走，我们不再是他学校的学生。”

保罗·蔡斯也被开除了。他写道：“在用午餐时，校长在会场上一片低微的口哨声中飞快地宣读了我们 13 个人的名字。他命令我们在午餐后立即去他的书房。校长跟我们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宣布：他认为我们不符合继续呆在乔特中学的条件，因此我们已被开除。”里普·霍顿也证实了这些孩子已被开除：“在午餐的时候，圣约翰先生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开除出学校——把我们赶出学校去……我们的家都事先得到了通知。”

“无赖俱乐部”的 13 个成员听说自己要被开除，个个无精打采的。不管他们如何嘲弄甚至憎恨学校，开除总是影响他们前途的一个污点。而且能否进入大学——特别是进入象常青藤联接成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推荐信和在校纪律的特别证明。更糟糕的是该怎样向父母解释被开除的原因。

这些孩子真被开除了吗？圣约翰消了消气，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引起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传闻。霍顿想：“肯定考虑了某种经济利益。”他毫无根据地断定杰克·肯尼迪的父亲替孩子们说了情，并“因此而捐赠了 2 台供星期六晚上放电影用的高级放映机”。

不过电影机两年前就已经安装了，况且圣约翰不是太容易

被收买的人。据莫里斯·谢伊后来回忆：“我认为肯尼迪先生不可能摆平这种事。后来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有个孩子，他不是‘无赖’会员，他得到了不能返校的通知。当时乔特中学还没有游泳池。他的母亲来校说情，如果能让她儿子返校，她保证第二年给学校建一幢新房子，并在房子里面修一个乔特中学迫切需要的游泳池。据说，校长拒绝了，‘乔特需要游泳池，但不需要你的孩子。’”

谢伊所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是：“不知道为什么，从2点到5点，当载着一帮被开除的‘无赖’火车马上就要离开沃灵福德的时候，圣约翰先生心软了，或者说改变了主意，给予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乔特的教师们向校长说了情的可能性比较大。毫无疑问，勒莫安·比林斯把无赖们的“缓刑”归功于比较周密的商量。“实际上13个人都是学校优秀的孩子——全是六年级学生。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惹过大的麻烦。一些比圣约翰先生开明的老师劝他三思。”

外界的压力也是一个原因。里普·霍顿记得，“我们的父母都找校长求情。”结果，在同意解散“无赖俱乐部”和更加自觉地服从学校的管理和规章制度后，我们又被带了回去，而没有被开除学校。我们受到了在复活节假期中三四天被关在学校，不得像其他学生一样回家的惩罚。

事实就是如此，毫无疑问。然而，对富有的爱尔兰“无赖”来说，圣约翰先生不想这么便宜了他。圣约翰早已减过杰克的圣诞节假期，但一点用都没有。据他后来说：“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当时我对自己说，‘嗯，我要做两件事，一是管理好学校，二是管理好杰克·肯尼迪和他的朋友们。’”于是圣

肯尼迪传

约翰给肯尼迪先生发了电报，向他说明这件事的原由。

校长意识到他是心理家庭剧中的小丑，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据一小道消息称，对像肯尼迪这种身份显贵、家庭不美满的爱尔兰裔天主教“新贵”，乔治·圣约翰有成见。他还给肯尼迪先生打电报，可能希望不仅进一步惩罚杰克，而且还打算惩罚杰克父母。在给纽约肯尼迪先生办公室和华盛顿证券交易委员会两处发的电报中，校长要求，“请你务必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来乔特中学，与杰克和我们进行一次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的面对面的交谈”。

当时，罗丝正与父母呆在波士顿。星期六，她替丈夫发了一份电报，爽快地请求允许“让杰克在星期六来纽约见见他的父亲和妹妹，并跟他们在一起住一夜。请转告杰克给我打电话，地址：波士顿贝来福饭店。谢谢”。圣约翰巧妙地拒绝：“斯蒂尔先生给我看了你的电报。不巧我刚刚给肯尼迪先生发完电报，请他星期日来乔特中学与杰克和我们进行一次我认为必要的交谈。谨致非常诚挚的歉意。乔治·圣约翰。”

肯尼迪夫人不再说什么。肯尼迪先生发电报说，他将于1935年2月18日星期日12点15分抵达学校。杰克对取消他们计划好了的纽约周末很惋惜，他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的妹妹凯思琳。凯思琳知道后很受震动。她立即去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回了电：

亲爱的公敌一号和二号，我们所有的祈祷者都支持你们和其他11个“无赖”。不过当这些老兄们倒下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将不去参加葬礼。

电报当然被乔特中学的老师拦截，并被当即交给了圣约翰先生。这进一步激怒了这位本已恼羞成怒的校长。

“肯尼迪先生、杰克和我坐在我的书房。我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圣约翰多年后回忆说，“噢，我们简要地说明了杰克的目中无人，和极其令人痛惜的孩子气。我们毫不隐讳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肯尼迪先生完全同意。”

但是，他真的是完全支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圣约翰自己都承认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虽然会见的目的是为了肯尼迪惩罚杰克，然而实际却正好相反，会见反而促使肯尼迪先生客观地看待他的儿子。“说句实在话，我非常感兴趣，”圣约翰后来承认，“我不明白，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为何有如此的不同。”肯尼迪先生也不明白，事实上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杰克的父亲毫不留情。他说得很坚决。”圣约翰记述道，他“始终非常感激”肯尼迪先生所给予的信任。然而，圣约翰毕竟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和伟大的教育家，不免觉察到了肯尼迪义愤以外的一些东西。他进一步写道：“肯尼迪说话也带有爱尔兰人的诙谐。要知道，在与杰克打交道时，你不光要有点严肃，而且要有点风趣。杰克不喜欢太严肃：他经常有一种让人快乐的幽默感。当他初次来到学校时，他像个小孩一样笑起来——真的，不管在哪所学校，光凭他的这个微笑，即使他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惩罚。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非常可爱的人。”

问题就在于父母。当罗丝与她的父母一起坐在波士顿贝来福饭店时，杰克的两个父亲——他的“校长父亲”和他的真正父亲——正与他一起坐在乔特中学校长的书房里。表面看来这

肯尼迪传

是一次用来警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他儿子的面谈：如果杰克再有调皮捣蛋的行为，或者无赖似的恶劣行为，将被立即开除出校。肯尼迪先生也这样立即警告了其在女修道院学习的女儿凯思琳。“我知道，你想为杰克尽一点力，”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杰克发现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他被学校视为公敌，他的集团有一个可怕的名字——‘无赖’。我的确认为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希望它会成为把他开除的理由。因此我想告诉你不要再在信或电报中论及此事。”

但是，实际上肯尼迪先生认为杰克的无赖帮是优秀的。他妻子从未去过乔特中学，不光是她缺乏母亲的慈爱，而且因为她对这样一所透出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气息的学校感到胆怯。至于约瑟夫·肯尼迪不爱去乔特，原因和他妻子的相差无几。现在被他儿子小乔所敬重的共和党校长训斥了一番，乔·肯尼迪心里很不是滋味。电话铃响了，圣约翰被叫出书房，肯尼迪先生急忙探过身去和杰克耳语说：“上帝啊，我的孩子，你一点也没有继承你父亲的直率的性格，也没有继承他骂人的尖刻。如果那个荒唐的无赖俱乐部是我的，我敢保证，它一定不会以‘M’开头！”

赢得父爱

“虽然从整个插曲来看，杰克尚未成熟，”比林斯后来回忆说，“但是当时他已经显示出某种未被挖掘的领导才能，我们成立了俱乐部。”这是杰克的父亲最终认同的一个事实。肯尼迪先生自己读书时也是一个差学生，曾在波士顿拉丁学校复读

一年。虽然参加棒球比赛和当学校操练队队长为学校获了奖，但是他却为大多数人所厌恶。当年他是在被允许参加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棒球比赛的情况下，撤走获胜球的大学无赖，是被哈佛一切“终极”俱乐部拒之门外的位卑学生，当时的布鲁克林乡村俱乐部、科哈西特乡村俱乐部和棕榈大沼泽俱乐部都将他拒之门外。

虽然罗丝·肯尼迪作为杰克的母亲是失败的，甚至连她也意识到，“愚蠢的无赖插曲”——1935年2月在乔特的这次会见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她猜测道：“我敢肯定，他不喜欢校长和他父亲的那种对抗、那种三方会谈。”她甚至还觉察到，“有种东西肯定深深地渗透进去。必须把事情交代清楚的那种尴尬的局面以及在公开场合受到父亲严厉地训斥，这种影响是无法衡量的……不管怎样，从那以后他的生活肯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

每个青年都必然经历一段探索亲情和寻找自我的苍凉历程，现在终于到了紧要的关头。罗丝对杰克虽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但这次她的感觉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父子俩经过沟通后产生了息息相通的和睦关系。约瑟夫·肯尼迪似乎突然发现杰克非常可爱、非常脆弱。他不仅担心他的身体，而且担心他的聪明才智与桀骜不驯的心灵相结合，可能干出比荒唐的“无赖俱乐部”更离谱的事情。“我担心，杰克满脑子的鬼主意，加上业余时间太多，会惹出比他的健康问题更严重的麻烦来。”肯尼迪先生向梅奥诊所主治医生奥利里博士透露说。

杰克的朋友比林斯也认为，这是杰克父子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他把责任都归咎于校长。“实际上我说的是校长乔治·圣约翰，”30年后比林斯评述说，“他缺乏领导一个男孩学

肯尼迪传

校的真正素质。虽然他有能力筹集到资金并博得家长的好评，但是他无法理解处在最重要发展阶段的青年。他对杰克和我的行为方式抱着一种非常怀疑和严肃的态度……肯尼迪先生虽然生性鲁莽，但也认为校长小题大做了。他对杰克的幼稚行为虽然很不满意，但是他在杰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对该学校感过兴趣。”

但是比林斯把他的观点说过分了。尽管圣约翰古板保守，他的心还是善良的。在杰克青春期的关键时期，校长让他们父子走到了一起，形成了新的关系——虽说是不稳定的，但它一直延续到杰克后来的生活中直到他死去。就像他赢得其他那么多人的心一样，杰克终于赢得了他父亲的心。

心理专家的诊断

1935年春季，在杰克的大学入学申请表上的“本学年中，因学业不佳或行为不当，受到过何种批评或处罚？”一栏里，乔治·圣约翰不计前嫌地写上“无”，在“能否担保申请人的道德品质”一栏中，他写上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能”字。

但是6月份杰克能否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他是否打算上普林斯顿大学？他的那些朋友——里普·霍顿、勒姆·比林斯、巴德·温和其他人上什么大学？“许多理由促使我希望去普林斯顿大学上学。”杰克在1935年3月的入学申请书上写道，“我觉得与其他大学相比而言，它能更好的给我提供学习环境和锻炼的机会，更能使我享受真正开明的教育。从我开始上学到现在，我一直有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愿望，我衷心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愿望。另外，我还觉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环境是其它大学无

可媲美的，必然对我产生重大的影响。‘普林斯顿人’真不愧是一个值得羡慕的称谓。”

在普林斯顿大学不知道的情况下，杰克在给哈佛大学送去的申请书中作了几乎同样的介绍。他喜欢普林斯顿，不仅是因为它的开明的教学作风和一流的学习环境，而且还因为里普、勒姆、巴德和他的其他许多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朋友都打算去那里。另外，他哥哥小乔留英一年，回来已经考取了哈佛大学。两年未生活在哥哥轨迹下的杰克，自然更有理由放弃哈佛而上普林斯顿。

杰克与他哥哥的“隔膜”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要深得多。在无赖事件后不久，按照圣约翰先生的建议，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普雷斯科特·莱基博士为杰克做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对17岁杰克的心理进行了令人极为感兴趣的透视。莱基博士分析的最后结果是，杰克“无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不过确实处在心理学所说的误区中，无法解脱。他在家中早已有了毛毛糙糙、邋邋遢遢和能力缺乏的名声，他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任何批评只能使他更自信，因为自己确实是那样的人。这种实际上是他最佳的自卫方式”。

莱基对杰克很感兴趣。“既然你如此忠实于你的粗心大意和邋邋遢遢的个性，那你将如何能有所作为呢？”他问杰克。

杰克显然被难住了。当莱基博士“给他分析将来他在事业上可能遇到的巨大难题时，他说‘没错，对极了’。他自命是一个自信、聪明、勇敢的孩子，但从来没有考虑过若继续粗心大意、邋邋遢遢，将来会遭遇什么困难”。显然杰克相当满足于目前的处境，“他说他倒是不担心他的邋遢，因为他长这么大就没有整洁过，但是很明显，他担心早晚必须放弃他非常珍

肯尼迪传

视的这种限定。”

莱基首先要设法解开的谜团是：为何杰克忠实于扮演邋遢这个角色以及为什么杰克如此捍卫性地忠实于这个角色？“这主要在于他与他哥哥的比较。”莱基指出，“杰克说，‘我哥哥在家中很能干，而我则是不怎么做事。如果我哥哥不那么能干，或许我就比较容易显出能干来。但事实上他做得比我好得多。’”

莱基认为这相当高明。“显然杰克一直在回避比较，甚至回避竞赛，以便使自己自信一些。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积极分子，所以我个人敢担保，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相信他的矛盾和观点有修改的必要。”

可是谁去说服他呢？虽然他与父亲的关系日趋和谐，但同时也与乔特中学教师们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和勒姆甚至写信申请参加法国外籍军团，只是没有成功，信被圣约翰先生拦下，他答应改善他们的伙食，如果他们确实想的话，可以提供给他们外籍军团的饭菜样品。

就在已经引起了无赖丑闻的周末聚会上，杰克又忍不住戏弄了一下乔特中学的领导们。

“每个男孩都可以邀请一个女孩。”比林斯回忆说，“晚上由戏剧社表演节目……经常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选编的音乐喜剧节目。全校每年都要强忍着地看三四次这种节目……这一次的节目恰巧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不想再看。”因此杰克和勒姆打算带着女伴去喝酒。

那天以前的一位名叫皮特·西泽的室友，开来了一辆车。我们很想借他的车用用。杰克把奥利夫·考莉当做女朋友，我把匹兹堡的一位叫普西·布鲁克斯的女孩当做女

朋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冒险的经历。记得那是我们的毕业学年，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离开学校了。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喜剧上演过程中，皮特·西泽驱车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可能在那里要了一杯啤酒——这无非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都不喝酒……我们在乔特中学外面逗留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等演出结束再进去。我们本打算在大家离开剧场去餐厅时返校。大家都穿着晚礼服——而且我们穿着“燕尾服”。糟糕的是，我们坐的是敞篷车。就在我们快要到校时，我们发现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车上的人是训导员，其职责是监督孩子们的活动。我们知道，如果被他们抓住，我们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幸好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当局人士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皮特·西泽以最快的速度开进乡村。杰克和我自己害怕极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与校长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所以知道这足以结束我们在乔特中学的学习生涯。无可厚非我们将被开除出去。

记得当时我们都穿着非常正式的晚礼服，女孩当然都穿着很高的高跟鞋。我们把车开进一个晒谷场，熄灭车灯，杰克、奥利夫和我都躲进了谷仓，普西呆在车上佯装正在与皮特·西泽接吻。

后来学校训导员点燃火把照见了这一对正在接吻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却奈何不了他们，因为据比林斯回忆说：

他们无权管已毕业的学生。不过他们显然怀疑其中有

肯尼迪传

未毕业的学生，只是他们不能认出我们……学校的车停在那里，皮特·西泽的车也停在那里。最后皮特·西泽开车向与学校相反的方向驶去，学校的车也跟着离开。在谷仓里面，我们不知道训导员是否留下了什么人。

你能想像得到这种境况多么恐怖。终于皮特·西泽又折了回来，快速地开进晒谷场。确定没有别的车。奥利夫跳上车，猫在普西脚下，用一件外衣盖着。我冲到后面皮特打开车后行李箱，我赶紧钻进去，他把我关在里面。我们未敢叫杰克——我们丢下了他。

就在此时，学校训导员的车突然出现，追逐重新开始。最后皮特·西泽把车开进了沃灵福德市中心，开大马力倾斜着拐过街角，终于甩掉了跟踪者。“他把奥利夫和我送到了舞会场，我们跳着舞混进了人群中，尽管奥利夫一只鞋后跟丢掉了，而且看上去非常肮脏。大约半个小时后，”比林斯记得，“杰克出现了。他整整走了一英里才回到学校。”

虽说是侥幸脱险，但很刺激。另一个同代人比尔·加尼特记得，杰克“特别自信——冷静而不傲慢，并且意志坚定。他的脑子也特别聪明，能够很快理解和记住许多的信息和‘从高尚到低贱’的事情”。对于他的聪明，杰克的英语教师考特尼·海明威回忆，他说起话来总是妙语连珠。甚至 25 年后，海明威还记得杰克写在学年年鉴《简报》上的一些俏皮话：

父亲节，来了 300 多位父亲。

在赴史密斯班级舞会途中，耶鲁大学校友顺便来趁饭。

都是爱高谈阔论的家伙。

因为格特鲁德·斯泰因与听得懂自己讲话的人交谈，把英语教师欣喜若狂。

海明威先生暗自叹命，他在高尔夫球运动中的弱点是太老实。

作为年鉴《简报》一部分的内容，乔特中学还有个特别的传统，就是从当年的 112 名应届毕业生中评出“最漂亮的人、舞跳得最好的人和最风趣的人等等”。里普·霍顿回忆说，杰克决心捉弄一下学校领导，因此他宣布将参加“最有望成功的人”的竞选。这对他在乔特的学习表现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这也是杰克一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竞选。大家估计，学生会主席——也就是向校长告发无赖俱乐部将在校庆活动时闹事的那个人——也要竞争这个头衔，但杰克一点都不心虚。经过一番巧妙的幕后交易，拉选票获得成功。杰克可以使教师们和圣约翰难堪了。“尽管校长可能对我们占有舆论上的优势不屑一顾，”前“无赖”成员保罗·蔡斯后来回忆说，“但是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在我们的同龄人中相当受欢迎，在他们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依靠那种优势，杰克说服他的伙伴们做他的帮手，替他拉选票。“我们都非常乐意。如果我们成功说服一个人，我们再让他做另外三个人的工作，以此类推。”

有些学生对杰克取胜的手段很不满——他平时并不用功，考试却能通过；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共和党人的后代，他却是一个酒店老板的孙子。他的父亲正在为共和党人眼中的一个正在对美国大企业发动挑战的、独裁的民主主义者的总统卖力。这种憎恨情绪完全可能导致寻找发泄的对象，从而导致种族歧

肯尼迪传

视。然而，杰克小丑般的滑稽可笑、常常对像 J·J·马厄这样的老师的惩罚以及他对医疗试验的坦然，最终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蔡斯说：“结果是杰克取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肯定那时许多人对此都感到不可思议。非常有趣的是，在 1935 年我似乎并不觉得这个结果意外或者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杰克虽然在那里只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学生，但是他具有巨大的潜力、魄力和很强的进取心。”

最后杰克·肯尼迪以比最直接的竞争者多 37 票的优势获胜，是选举中应届毕业班获票最多的。据他的一个教师后来回忆，虽然是拉票竞选，但选举结果表明杰克在同龄人中很受欢迎，这是教师们未料到的。“大家都认识他，喜欢他，都承认他有能力，但是教师们却没从这个角度来投赞成票。”英语教师海明威承认说，“这也再一次证明同龄人的眼光比长辈的要准确得多。”

鲍勃·林赛回忆说：“在学校，杰克最突出的就是能赢得大家的友谊和尊重的才能。对待学习和运动他都同样积极而热情。他对每个人都关心、友好和坦率。”埃德·梅里迪思也有同感，“甚至在成长发育阶段，他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如住在棕榈滩时那些日子，他对比较有魅力的妙龄少女有显著的吸引力一样！”另一个孩子概括说：“杰克的领导才能使他不管上什么学校都能达到顶峰。”

杰克在乔特中学的学习生涯行将结束。他在 4 月份擦伤了膝盖，伤口感染，数周不愈合，使人进一步怀疑他的免疫功能有问题。然而就在他在学校的日子眼看就要结束的最后关头，杰克开始全力冲刺，连他的同学都感到吃惊：一个平时很少打开课本的学生居然以英语 75 分、物理 74 分和历史 77 分的成

绩毕业。在 1935 年 6 月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他的英语、历史均得了 85 分，平均成绩为优等。对一个经常生病和仅仅在三个月前还戏剧性地险些被开除的学生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此外，他作为业务经理编辑出版了迄今经济上最成功的《乔特中学年鉴》，并打败教师的红人当选为“最有希望成功的人”。

考特尼·海明威后来回忆说：

他知道自己在历史方面有很高的天赋。这是他在拉塞尔·艾尔斯的精心教导和对细节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他欣赏艾尔斯渊博的宪法学识和知识。事实上，杰克对政府和政治深入而全面地了解或许就是由此开始的。杰克还欣赏英语系——可能是所有中学英语系——中最好的教师们。如哈罗德·廷克、道格拉斯·谢泼德森、达德利·菲茨、达拉·凯利、凯里·布里格斯、艾伦·斯马特和威廉·弗里曼等，所有这些人都与他相处过。他能自学尚未学过的课程，写起文章来流利而辛辣……他喜欢听斯坦利·普拉特的《演说技巧》课……他不像哥哥乔那样稳扎稳打，但却偶尔显示出峥嵘的气象。

跟往常一样，J·J·马厄总是“与众不同”。在毕业学年的最后一份报告中，马厄集中列举杰克的缺点，而不是优点：

我愿意为杰克的房间凌乱和个人的邋遢承担责任，因为我同他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只是就整洁而言，尽管杰克付出了真诚的努力，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失败了。

肯尼迪传

我把凌乱或者杰克的缺乏整洁完全当作一种象征。因为他几乎在所有的有组织的活动中都是懒散和混乱的。他到最后关头才开始学习，并且经常迟到，没有什么物质价值概念，常常丢三落四。

马厄写起来像一个喋喋不休的母亲——更像个王太后。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过去杰克把每个老师都当敌人看待，挖空心思地捉弄他们，现在他很少这样做了。”

副校长沃德尔·圣约翰在最后一封写给杰克父母的信中比较客观。当初是他努力说服肯尼迪先生把杰克从坎特伯雷转来的。虽然发生了“无赖”事件，但是他对他即将离开的被监护人无不感到骄傲。他预言：“杰克有势力成为人类的伟大领袖，我总预感他会是那样的。”

1935年6月，杰克把他的大旅行箱搬上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告别了4年来一直是他青春期的、他的监牢、战场、他成长进步的“地方”。他正值18岁，终于该上大学了。

第四章 大一生活

欧洲之旅

1935年7月23日，杰克获悉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他拍电报给比林斯：“你怎么样？”当得知比林斯是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之后，杰克便绞尽脑汁地说服父亲答应让他转到普林斯顿去。

不过，杰克的父亲另有打算。他只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呆了一年便辞职了。他声称，这一年他至少损失了10万美元，因为身为主席，他无法参与股票交易。更重要的是，他不赞同罗斯福政府的施政方针，特别是最近参议院调查美国铁路公司的做法。他说，他之所以接受罗斯福总统的任命，是想在目前社会主义势力猖獗、失业压力严重的时刻，拯救证券这一资本主义的市场。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推崇国家控制，或者支持建立庞大的联邦政府机构的做法。

实际上肯尼迪是企盼更高的职务。罗斯福因担心第二年自己竞选连任得不到肯尼迪在财务上的支持，不得不提出政府中的几个职位任他选择，例如担任历史公共工程计划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等职位。对此，肯尼迪一口拒绝了，因为他想要的是财政部长一职。他想不通，虽然自己曾在证券市场上投机欺骗，

肯尼迪传

名声不佳，但自己毕竟在改革证券市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罗斯福凭什么不让自己担任财政部长呢？

于是，肯尼迪一边对新闻界放出他的公职生涯将“从此结束”的口风，一边打点行装去欧洲度假。他坚持让杰克陪他一起去欧洲并到伦敦经济学院拉斯基教授门下学习一年。不管杰克如何不想去，他都置之不理。而且，他还按他妻子的请求，带女儿凯思琳同行，将她送到管制严格的法国天主教女修道院学校去上学——就像当年甜蜜的菲茨把罗丝送到布卢门塔尔那样。

杰克既有点儿兴奋，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9月，他拍电报给在匹兹堡的比林斯：“速将灰帽送来，周三上午10点45分起程。”

这次英国之行是杰克第一次出国。然而一路上并不愉快，他没过多久便在诺曼底号的船舱里给在普林斯顿的比林斯写信：

亲爱的勒姆：

这是我们起程后的第四天，天气开始坏起来。前一段我的境况还不错，而且每天去健身房练一小时拳击。吃的尽是些助长青春痘的东西，我的脸惹得老爹经常数落，真他妈的好不爽。我刚吃完一份甜食，里面可能有许多助长青春痘的因素，他就嘲讽说，我的脸快变得跟你的一样了——他可真是一语双关。

杰克还称自己已经和一个“极普通的”、“满脸雀斑和青春痘的”姑娘“亲热起来”，“我们还就你的脸部问题进行了探

讨”。但是，拿比林斯取笑并不能冲淡他对船上生活的厌烦和对已踏入普林斯顿校园的伙伴的羡慕之情。“船上很少有年轻人，”他抱怨道，“只有一法国小伙子还不错，另外还有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孩。”不过，他向比林斯坦白说，他曾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船上有一个胖乎乎的法国佬，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好几次把我带到他的船舱，并想和我做爱。”他用调笑的语气给比林斯写道，“今天晚上船长开‘巴’——你可别想歪了，伙计，我可不是说他的命根子的那个‘巴’，而是舞会 BALL 的‘巴’——并且免费提供香槟酒。”

“你们都好吗？我想你们一定很开心……回信地址请写克拉里奇。我将把下一封有关我的这次旅行情况的信从伦敦寄给里普，顺便请代我向他问好”。他还请比林斯代向“温、梅里克、布兰多等人问好。”落款是“值得怀念的”。他还在附言中写道：“我的法语水平会让这帮家伙大吃一惊。到此为止吧。”

到达伦敦一周后，杰克又给比林斯写信。“亲爱的魅力全无的人，收到你的信很高兴。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他龙飞凤舞地用克拉里奇饭店最漂亮的信纸写道，“我们本来应该是星期天午夜三点在普利茅斯登岸，但因遇到了风暴，漂了一个晚上，最后被吹到了法国的一个什么地方。”他们乘坐渡船前往多佛尔，这时“才发现这是多佛尔海峡一年中气候最恶劣的季节，上船不久大家都开始哇哇大叫。我跟一位在舞会上认识的女士合唱《高空秋千上的男人》，唱到‘哦哦哦哎……’时，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妇女大叫‘天呀，受不了啦！’就冲着我哇的一口吐出来——你可以想象我从头到脚淋了一身热乎乎的呕吐物的模样”。

信中还提到了青春痘，他说他怀疑他朋友的脸变好了，还

肯尼迪传

拿妹妹凯思琳取笑，因为她的下巴上长了粉刺。

虽然信中谈论的大都是青春痘、晕船、性以及其他一些年轻人津津乐道的问题，但其中有一项内容却十分重要。那就是，可能杰克不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去当拉斯基先生的学生，而是返回美国，上普林斯顿大学。

伦敦经济学院

那年3月，希特勒置《凡尔赛和约》于不顾，公然宣布修改《征兵法》。接着德国军队强行越过萨尔（不久前国际联盟已将该地移交给德国管理）非军事区。意大利已经扩军，号称百万大军。7月，已决定将空军兵力扩充三倍的英国，宣布废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签订的《主战舰艇吨位限制条约》。欧洲军备竞赛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同时9月30日，数万名意大利士兵开赴非洲，接应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和平的可能比肯尼迪先生估计的要渺茫得多。不过，杰克倒非常高兴：“我肯定能上普林斯顿，因为伦敦局势好像很不稳定。爸爸一定会让我回去，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我的气色还是不太好，不过正在转好。”

可是，返程的事还没有开始准备，杰克却又病倒了，加急电报一份接一份发到波士顿梅奥诊所。1935年10月10日威廉·墨菲医生给在克拉里奇饭店的肯尼迪先生回电说：

根据1934年2月诊断结果分析，杰克患有粒性白细胞缺乏症，必须每8小时注射一次肝精直至好转为止。若需其他援助，请找佩思的道森勋爵或托马斯·霍德爵士。

在伦敦住院期间，杰克的病情起初不断恶化，但后来却奇异地突然有所好转。“自从上一次给你写信以后，我的病情已有所好转。”10月中旬他在给比林斯的信中写道：

我的病症又一次让医生感到束手无策。我是一个“罕见的病例”。他们在我身上做着各种奇怪的实验，当然少不了拿大针扎我的屁股。今天的事最为尴尬：我刚刚睡醒，天气有点儿冷，于是我钻在被窝里，那个东西处于半勃起状态。一位医生进来，打算伸手去摸摸我。我咳嗽一下。他掀开被子，发现“J·J·马厄先生”正在勃起，立即改变了主意。当时三位护士都站在病床前，弄得我真是很尴尬。

在这里，杰克再次以自鸣得意、自我嘲讽、极度诙谐的态度，把自己的生活演艺成堂吉诃德式的探险。所以，在杰克离开乔特中学后，圣约翰校长承认：“我们之间虽然有过不快，但我们还是很想念他。”

刚刚捡回小命的杰克忽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年。他开始喜欢上了伦敦。“我有一个很投缘的室友，也是一个美国人，今年25岁了，他真是棒极了。”他给比林斯写信说，“我们同住在一所房子里，还有一个女仆，听起来蛮不错吧。他们说，这里离白金汉宫只有一步之遥，所以一会儿我打算朝国王扔块石头。还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大约24岁，离婚了，我老爹好像认识她。她在附近学习，每天都来看望我，圣诞节她打算和我一起去看圣莫里茨，不过到现在我

肯尼迪传

还没有和她上过床。”他承认，“这里的护士都很性感。一位夜班护士一直向我挑逗，我得提防着点儿”。

尽管杰克对伦敦经济学院的姑娘们装成不理不睬的样子，但伦敦的环境对杰克这位早熟的花花公子而言仍有不少刺激。“当天晚上，我参加了这里一个‘新生交谊会’。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场景：到处都见到黑鬼们搂着满脸青春痘的英国女学生，大家好像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要是你这位老巴尔的摩的孝顺子孙见了，一定会怒不可遏。不过，我认识的不少美国人，还有几个英国人，他们都还不错。”18岁的杰克介绍说，“现在海曼·普尔洛夫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犹太人。”他和比林斯开玩笑说，“你就算不了什么了”。他称：“在医院里碰见了你的一位表亲沙尔洛夫王子，听说他会是下一位沙皇什么的。他现在在牛津上学，认识查理·斯坦伍德。他还说，老查理确实是个英雄，我很赞同他的说法。我认识了许多爵士和伯爵之类的人物，以至于我连自己都以为自己是皇室的一员似的。”

接下来杰克又将话题从英国的皇亲国戚转到巴尔的摩他的贵族朋友。杰克说：“据你的描述，我和值夜班的护士研究之后，确认你得的是梅毒。这是给你的一个教训，警戒你不要对女孩子见一个泡一个。夜班护士也认为你应该有所节制，‘至少要等阴茎上坏死的皮肤脱掉，换上新的’。显然，今后四五年内你会因为你的命根子忙得焦头烂额。”他还告诫比林斯说，如果“你还想着去破坏拿骚钟的钟锤的话，普林斯顿肯定会把你赶出去。换成是我，我会更在乎自己那只‘锤子’和它上面的疤，而不去理会什么拿骚钟的钟锤。”

写信时尽管语带嘲弄，不过杰克仍然很讲义气，对比林斯

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并没有充耳不闻：“你经济拮据让我很不安。少了你这张满是梅毒引起的红斑的脸，普林斯顿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在信中他主动提出借钱给比林斯用。他说“那 500 美元我至今分文未动，反正我也不缺钱用，你先拿去用，大学毕业以后还我，这样你就不用向艾克叔叔那个老家伙借钱了。老实告诉我，看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反正我这儿不需要。奥利夫怎么样？告诉她我现在的情况，你可别对她打歪主意。”最后他终于言归正传，宣布说：“我老爹说，回不回来，由我自己决定。但是，既然决定留下来混出点儿名堂，这会儿回来岂不太可惜。”

杰克显然已经开始洋洋得意了。尽管他认为他圣诞节会回美国去，他还是让比林斯“放弃”已经为明年夏天订好的计划，“向大伙儿问好。”他最后写道，“让普林斯顿大学拿骚钟的钟锤和你那只‘锤子’暂时休战吧。”

不过，这将是杰克从伦敦给比林斯写的最后一封信。和哥哥不同，事实上杰克对伦敦经济学院的印象并不好。他不打算投到拉斯基或别的什么人门下学习，他只求能逍遥自在。但是因为有病在身，逍遥自在已不可能。因此，他给在普林斯顿的比林斯拍电报，说他决定返回美国。

比林斯自然高兴得很，10 月 17 日他回电说：“没有比这个更叫人高兴的了。”

比林斯后来回忆杰克在伦敦莫名奇妙地病倒一事时说：“他们好像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上伦敦经济学院的打算便从此泡汤了，“既然在英国他老生病，不如回美国好。于是他离开伦敦，返回了美国”。

普林斯顿人

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赫尔曼思 1935 年 10 月 22 日在一封给哈佛大学教务长的信中写道：“一位名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学生，今年 6 月毕业于乔特中学，现在重新申请进入本校学习。他曾考入我校，后又转入贵校，继而决定入伦敦大学。本周他从英国返回且请我校重新考虑其入学事宜。贵校若能将该生 1935 年 6 月 B 卷考试成绩寄往我校，我校将不胜感激。”

尽管父亲迫切希望杰克上哈佛大学，然而，杰克还是坚持要上普林斯顿。正如他的朋友休·温后来所说，杰克坚持上普林斯顿“是实现其独立的一项重大举措”。肯尼迪先生言出必行，他致电美国驻伦敦大使说，他“觉得有必要将儿子送回国”，并安排他在纽约的办公室人员与哈佛联系。然而，早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赫尔曼思写信之前，哈佛就已经将杰克的成绩单寄往新泽西。“新生接收委员会不寄送已获准入学的新生 B 卷考试所有成绩，他们只列出他获得优等 80—90 分和特优成绩 90—100 分的科目。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肯尼迪先生的英语和英国历史均获得了优等成绩。”

杰克被普林斯顿录取了。于是，他给比林斯去了一封电报，“周四即 10 月 24 日抵达，望安排好住房。肯。”不巧的是，校舍早已安排完了。所以比林斯让杰克住进他和里普·霍顿俩人共住的“套房”。房间在南联大楼五层，宿舍楼建于 1807 年，里面有本校最便宜供一年级新生住的房间——“三间窄小的房间，不带卫生间，只有一排暖气片和一个小小的壁

橱。房间里只有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灯泡，没有电器插座。”这是一位记者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该楼拆毁前对它的描述。

对比林斯的建议杰克十分满意。原来仅有 12 英尺长，7 英尺半宽的宿舍里又挤进了一张“老无赖”的折叠床。离得最近的卫生间在四层，要经过一段石头楼梯才能到，再远一点儿的便在地下室里。好在他们的日常起居室稍大一些，有 7 英尺宽，14 英尺长。从房子里可以看到不远处拿骚楼的“壮观景色”——那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古老的建筑，常青藤缠绕的楼顶是白色圆顶钟楼。

肯尼迪先生来看望杰克时，对于这些不太欣赏。比林斯回忆说：“我记得第一次来看我们的时候肯尼迪先生一共爬了 64 级台阶。他认为有必要找个别的地方给儿子住。”里普·霍顿也谈道：“肯尼迪大使从一辆豪华气派的凯迪拉克轿车中走出来，车是司机开的。要到我们的房间还得爬四段楼梯。才爬完两层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他是来普林斯顿看一场橄榄球赛的，所以当时穿着厚厚的外套——只好到安全出口那儿，将皮衣脱下来扔给了楼下的司机戴夫。”

肯尼迪先生的担心不全是因为杰克住的楼层太高，他坚持让儿子回国是为了让儿子身体能得到更好的保障。虽然杰克从不提起此事，但他的身体确实很令人担心。正如巴德·温后来描述的那样：“杰克脸色越来越黄，而且黄中带黑，好像洗过日光浴似的。”肯尼迪先生这次来普林斯顿，与校医雷伊克罗夫特进行了交谈。在杰克入学两周后，他于 11 月 11 日写信给杰克说：“我们已决定……先等到感恩节，看看你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如果到那时还不见好转，我再和你决定是否该休学一年，先把身体养好。总之我惟一担心的是你的幸福，我不想你

肯尼迪传

因为身体不好和学习紧张而不能享受大学生活的乐趣——上大学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其乐无穷的。一年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因为一年而影响一生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

肯尼迪先生对美国驻伦敦大使宾厄姆先生说：“杰克身体一直未见多少好转，这让我十分担心。为此，我将在以后的六个月集中精力引导他康复，不会有多少时间关心生意和政治。”——这显然是推托之词，意在为自己的尴尬处境找借口，因为罗斯福至今还没有给他设定一个新职位。

杰克不想休学。他好不容易才上了自己喜欢的学校，与好友们重聚。里普回忆说：“我们三个新生经常是形影不离。”周末他们总爱坐上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去纽约享受夜生活的快乐。杰克在学习上没有花太多心思，即使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也不例外，所以第一次考试成绩很差。当时的成绩分为1—6共6个等级，一分一个等级，其中6分最低。他的“军事科学”是3分，历史4分，英语5分，数学7分。他的朋友温后来回忆时很吃惊地说：“我都不相信还能打7分！”

杰克当时身高6英尺，体重135磅。除了轻量级拳击，别的任何体育活动都无法参加。杰克很乐意能与老朋友朝夕相处，但是，与在中学时相比，他对自己将来的前途一片茫然。在3月份填写的申请表中，他把银行业作为大学毕业后首选的职业。但是，以第一学年的这种成绩，他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都成了问题。11月底的气候已是寒气逼人，南联大楼起居室里那盆小小的炉火已无法抵挡寒气了。

更糟糕的是，杰克对普林斯顿感到失望。虽然詹姆斯·麦迪逊和伍德罗·威尔逊都曾就读于此，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也在这里任过教。但是，普林斯顿校园狭小，附近是新泽西的乡

村小镇，甚至比乔特中学还要闭塞，新教气氛更令杰克感到压抑——到处都是长老会的小教堂。杰克常常用庸俗的幽默嘲讽长老会神学院机构庞大，整整占据了大学的半边天，甚至连杰克住的宿舍——南联大楼的本意就是“长老会各分派的重新联合”。据财政部长的儿子说，该校仅有10个犹太学生，其中只有2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虽然杰克和同宿舍里的普·霍顿一起到校外的教堂做弥撒，但他们的朋友巴德·温后来透露，因为他们是来自波士顿的罗马天主教徒，所以永远别想加入低年级或高年级的伙食俱乐部。

普林斯顿的排外性对杰克来说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杰克一家曾对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普林斯顿给杰克的印象并不好。”虽然根据比林斯的建议，在杰克担任总统介绍他的情况时删去了这句话，但毫无疑问这是事实。杰克在哈佛最好的朋友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普林斯顿那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气氛使杰克对它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正如巴德·温后来所说：“杰克上普林斯顿，很大程度上只是故意与父亲作对，不想走他父亲为他选好的道路。”可是，除了来自乔特中学的同窗好友之外，普林斯顿对杰克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给他留下的也大多是不愉快的住校生活的回忆。

杰克天性好交际，但在普林斯顿却没有交多少新朋友。比林斯回忆说：“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呆了差不多两个月，但一直在生病。虽然每堂课都去上，但身体一直不好。”

12月初，校墙上贴出了一幅漫画，是杰克和他的“室友们”的杰作，上面是一张常见的动画式圣诞照片，旁边附有一首打油诗。诗是根据弗雷德·阿斯泰尔的一首最新流行歌曲《高顶黑礼帽》改编的：

肯尼迪传

戴着高高的黑礼帽，
系着雪白的蝴蝶结。
摇着摘下的燕尾，
祝你圣诞乐陶陶。

照片上，他们几个人都只穿了白色冬装长袖衬衣，里普·霍顿头戴高顶黑礼帽，比林斯脖子下方系着一个巨大的白色蝴蝶结，杰克则剪掉了他的一件晚礼服大衣上的燕尾。这幅照片风趣幽默，我行我素，意在表现这帮人在普林斯顿快活的生活。不过，这幅画还未贴出来，杰克就因病被送到波士顿的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请墨菲医生诊治。

里普和勒姆起初并没有把杰克的病当回事。12月10日他们拍电报给杰克开玩笑说：“请告诉我们何时参加你的葬礼。你猜猜打扫卫生的沃伦太太是怎么想的？她想知道你上哪儿找乐去了。”不过大伙儿都想知道他的情况。

其实，对杰克病因波士顿的医生们的了解比沃伦太太多不了多少。因此，他们提议请里士满的一位专家沃伦·T·沃恩医生再诊断一下。沃恩医生1935年12月12日从弗吉尼亚发电报给杰克说：“明天上午，我来给你进行医疗检查。”并提醒说，“可能检查需要三四天时间”。

然而，校医雷伊克罗夫特不想再等了。12月13日，他写信给校长高斯博士说：

您也许对39届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特殊情况有所耳闻。他来本校后，我们一直和他的医生保持联

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他最好是休学，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以便明年夏天能复课。休学时间最好从 12 月 12 日开始。

杰克原本是很执着的，这一次也只得半途而废。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普林斯顿大学。他在这里前后共呆了六周——这足以实现他要“做一个普林斯顿人”的心愿了。

白血病

对杰克的突然离开，校园内谣传四起，有说他曾秘密结婚，后来又被迫解除婚约。他父亲凭借自己的权势，把法院案卷中的结婚登记销去，所以这一秘密一直鲜为人知。他的一位同学煞有介事地说：“他确定在普林斯顿结了婚，只是他父亲解除了这门婚事。了解肯尼迪家族的人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此事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很少有人提起。”还有一种说法是，杰克和一位出身卑微的英国姑娘结了婚，还有人甚至说是和一个妓女结了婚，他父亲发现之后便将他从伦敦经济学院带了回来。

两种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真正在伦敦金屋藏娇、有一个 24 岁的妓女情妇的是杰克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而不是杰克。杰克在普林斯顿只呆了短短的六个星期，并且确实是因为身体生病才退学的。

杰克从沃恩医生的诊所去了棕榈滩。途中杰克因为前一天晚上未能将比林斯偷偷弄上火车而耿耿于怀，正在奋笔疾书：“亲爱的‘洛斯·穆伊内’，我是在去佛罗里达‘旅途’中给你

肯尼迪传

写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你无法理解。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我在奥利夫家等到 7 点 45 分，一直在给老爹打电话。我订好了星期五晚上的临时包厢，然后给他打电话，并和他争论了 20 分钟。后来又和妈妈商量此事。她以为，没有必要订包厢，因为那样要多花 30 美元。这一下我的计划全泡汤了，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把你弄上来。我确实尽了全力，这一点奥利夫可以做证。我的努力用我们的校长圣约翰博士的口头禅来形容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信的内容很快又从道歉转到了沿途的轶闻趣事上，“我刚想抬头看看窗外南卡罗米纳的景色，便见到一个黑人男孩在他十几个目光痴迷的女朋友面前拉屎。这对你可能派得上用场。”他企盼比林斯能乘汽车来佛罗里达，如果汽车不行，可以和温、梅里克一起开车来。

当时，父子俩都背运。虽然约瑟夫·肯尼迪给白宫送去了一箱威士忌，但罗斯福仍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新职位，不过他不久又接受了无线电公司、派拉蒙公司以及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公司的请求，帮助它们削减经费。当年帮助整顿帕泰公司时，给他的酬金是 50 万美元。如今要少得多——无线电公司只给他 5 万美元，派拉蒙公司给他 15 万美元——在数百万美国人无衣无食、生活无着落之时，能有这样的收入已是相当不错了。

圣诞节过后，对住在波士顿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的杰克来说，尴尬的日子又开始了。他已经 18 岁，这种解衣脱裤的身体检查令他感到很不自在——“这是我动荡不安的生涯中最难熬的经历。今天早上，他们拿着一根长长的塑料管子进来。”他给在普林斯顿的比林斯写信描述道：

又是老样子，我转过身去。心想他们又要来塞我的屁股了。但是，他们却抓住我，把它塞进我的鼻子里：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把我的脸错当成了屁股了。总之，他们抓住我，把一根长管子从我的鼻子一直伸到我的胃里，接着往里面灌酒精。当他们把那个在我鼻子里折腾了两个小时的玩意儿抽出来的时候，我感到舒坦极了。我“四脚朝天”躺着，同时下面的那个东西也“垂直向天”，因为他们检查完后，一位漂亮的护士来擦拭我的全身。

他们给我作瓦色曼氏反应试验，我看眼检测表，得知我得的是不是梅毒。试想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

令杰克担心的不仅仅是梅毒。“今天上午我的白血球数是3500。我记得刚进来时是6000。降到1500时人就没命了，他们戏称我为‘还有2000可降的肯尼迪’……晚上我和达娜·马厄继续玩乐，我希冀着有什么好事发生。”在做身体检查期间，他每小时花50美分在波士顿“一家脏兮兮的小舞厅学跳伦巴舞。达娜一直在找我的碴子，说我亲吻时‘笨嘴笨舌’的，因为新年前夜我不小心亲了她的脸一下”。他在信中为自己掩饰，同时一点也不把自己奇怪的甚至有性命危险的疾病当回事，还在吹嘘说自己“是达娜舞厅里风头最足的人，几乎把那儿给镇住了”。

他在另一封信中开玩笑地说：“我真搞不懂，你和里普怎么就不讨女孩子喜欢了——你也不算太丑。我估计你身上有些什么东西让她们一见就烦，今儿早晨我终于想出来……真是太可怜了，我想你们不受女人青睐是爹妈给的，甚至连尼汉斯先

肯尼迪传

生都泡了一个妞，艾克·英格兰先生也是。说实在的，可怜的孩子，我也是爱莫能助了。快将我的腰带送来，你这个坏蛋。祝好，肯。”

杰克的信不断地从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寄出。这些信写得很随便，机智诙谐，自鸣得意，没有丝毫悲观的言语，只有当看到自己不能参加各种刺激性活动时才流露出失望。“收到你讨厌的信了，”杰克在1936年1月27日写信说，“从汉克斯温克斯那个烟花之地寄来的有关‘棕榈滩每天美女如云’的消息让我对这里感到厌烦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杰克急于想到佛罗里达去与海滨美人们嬉闹作乐，然而，医生很快破灭了的美梦。“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杰克告诉说，“不过他们说我得的是白血病+粒性白细胞缺乏症。昨天我瞟了一眼病历，看得出他们心里已经在算计我棺材的大小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和奥利夫玩一玩，说不定明天或下周你们就得参加我的葬礼了。我想，洛克菲勒研究所会研究我的病例。”

这样生死攸关的诊断他竟然毫不在乎，而且在信的末尾他还补充介绍说：“太妙了！星期六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汉森搞定了。她真是不同一般，所以我正准备更大的行动。昨天晚上在J那里也收获不小，我正在替你挣面子。不过，我得承认我在邦妮·戴伊那儿没能得手，于是我放弃了。”这一次他终于认输了，而此前他曾夸口说他不久就会“攻下”她的“城堡”。

几周的身体检查、测试和会诊，杰克虽然很烦，但一点也不害怕。他盼望着周末，因为周末不做检查，那样的话他可以纵情穿梭于舞会和美女之间，寻欢作乐，倍受青睐，真是好不

风光。连续不断的“攻城略地”——凭着性感和个人魅力——使他受到刺激，从而显示出令人着迷的吸引力。逆境促使他迅速成长。杰克的信虽然猥亵、琐碎而且故作庸俗，但比林斯明白他字里行间透出的一种脆弱——而对这种脆弱，比林斯的这位朋友总是竭力掩饰。这既有些孩子气，又有几分令人着迷。因为他总爱用幽默和警语式口吻，摆出一副女人们朝思暮想的威猛男人的神气。杰克暗恋上了奥利夫·考莉，想请比林斯帮他出谋划策。“在考莉的问题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她故意不理我，我该不该再试试她？这是你的室友在征求你的意见，请你不要在意我的信纸。这些信纸是一位十分赏识我的女性送给我的，她对我连呼出的气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指比林斯的母亲，“可惜他的儿子一点也不争气。”

这些话是杰克对自己、对生活以及对死亡毫不在乎的一种表现，不过，他写信的方式中同样蕴含着某种严肃和深度。里普·霍顿回忆说：

杰克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喜欢——如果不喜欢，他是不会去做的。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仍然兴趣广泛。他喜欢体育运动、喜欢玩闹、喜欢表现得很潇洒、喜欢打高尔夫球、喜欢结交女孩子。不过他从来不会专心于某一件事，从来不会全心投入到某一件事情上。他喜欢来纽约和我在一起，我们总是去夜总会。我记得我们曾去听海伦·摩根唱歌，我记得还有杰克·沙因克尔，斯莫基·乔·怀尔德……我们过得很快活……所以杰克耐不住寂寞，跑出来。他是一个一天到晚都闲不住的家伙。

肯尼迪传

“勒姆，还有一件事得考虑。”1936年1月底，当杰克·沙因克尔打算筹备一个舞会，请杰克掏钱时，杰克提出了异议。因为，正如奥利夫·考莉所言，不管如何民主，杰克毕竟是他们这帮人的领袖。“对于这件事我有不同意见。”

每人出10美元对吗？我不在乎在里普、你、沙因克尔组织的舞会上出10美元。但我不愿意出钱请一大帮人吃喝，因为不管你是怎么想的，这只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大傻瓜。这并不是“有福同享”的勒莫安计划——我绝对赞成出钱参加沙因克尔的聚会，他一直很不错，但是我要了解一下筹办的情况。如果下雪什么的，我只能乘飞机来，这得花25美元，而且星期五晚上我还要和斯莫基出去，又得花上一笔钱。我不想把10美元浪费在一大帮你突然喜欢上的家伙身上。所以好好考虑考虑，因为它可以买一大瓶香槟什么的。勒莫安，你应该放弃这种义举，除非你有充足理由。我与这个舞会没有他妈的任何关系，我甚至连酒都不喝。因为是你出点子的，所以我才给你写信。我已经写信给沙因克尔，告诉他我打算出钱，所以不要对他说什么。当然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想法，所以，请不要发怒，絮絮叨叨说什么“天啊，要换了我，我就不会拖后腿”之类的，别忘了，我请你出钱的时候，你可是一毛不拔。所以，别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相，这就足够了。否则见到你非把你臭骂一顿，我只是希望给你一个多想出点词儿来的机会，因为每次我说你是个一文不值的笨蛋的时候，你半天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我星期一肯定回来，不过我们还是星期天晚上见了面的吧。到时候我们可以去

海边玩滑板玩到十点，接着乘独木帆船沿海岸划行。勒姆，我特别想知道你在范埃姆那儿有没有成功。我玩她的时候她很担心，所以不要以为她什么都敢干。不过我感觉不到她是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她太有味了。说老实话，虽然我“身材高大，脸庞英俊，智慧超群”，老克鲁—梅格依还是感到不知所措。好极了，他们又要像在梅奥诊所那样给我屁股上扎针了。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太好了……速回信，肯。

他又在附言中加了一句：“我臭骂你的事不要记在心上，你其实挺不错。”这让比林斯不能不喜欢杰克，不能不为他身受疾病的煎熬感到难过。不过，杰克根本不需要那种“讨厌”的怜悯，他只要帮他找乐就够了。尽管他在社交方面精明狡诈，但对朋友却忠心耿耿。“一旦你与杰克交了朋友，你就永远是他的朋友。”里普·霍顿后来回忆说，“我是说，即使朋友有错他也不会在乎的。他对朋友可真是忠心不二，可有些朋友却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虽然对女人杰克总是言而无信，逢场作戏，但他对自己的哥们儿却是情真意切，亲如兄弟，令人感动。他写起信来或许粗心大意，错字连篇，而且信口开河，乱扯一气。但是，信却写得生动活泼，语气也是果断坚决，读来心旷神怡。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罗丝就发现，他总是有自己的主张，我行我素，而且耍起笔杆来也是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我行我素，充满自信，妙语连珠，言辞犀利。这与他父亲的文风恰恰相反。更有意思的是，与人相处时约瑟夫·肯尼迪爽朗率直，极具威望，却写不出半点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句子来。而年仅 18 岁的杰克，

肯尼迪传

正是爱慕虚荣、无忧无虑的年龄，但其文风却粗犷豪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杰克生着病，性格浮躁，而且喜欢恶作剧，但仍然“把持着局面”，发号施令。虽然对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不感兴趣，后来又因健康问题休学了，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花花公子。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医生莱基观察到的，透过表面的现象，可以看出他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而且对自己的朋友也很有信心。期中考试比林斯不及格，杰克便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亲爱的‘将被开除’的先生，”他2月13日在医院给比林斯写信说，“这对你逃出普林斯顿十分有利，因为你反正对学业一点都不感兴趣，整天泡在桑迪的房间里。”

显然他希望昔日的室友能更优秀些。哥哥在哈佛的成就并没有令他感到妒忌，反倒使他们之间关系更密切了，他还常常周末到坎布里奇小乔的宿舍里看望他。杰克还在信中向比林斯描述了小乔从棕榈滩带回的一只短吻鳄的情况，说它身体一定“很虚弱”，因为“昨天晚上它只咬了我的指尖一下，而没有像以往那样咬整个胳膊”。他还从报纸上了解到有关小乔的最新的风流韵事报导。“你读了温切尔的专栏里小乔的消息了吗——‘《波士顿的罗曼夫》——华尔街的公子哥与巴克湾的富妞海伦·巴克打得火热’，全是胡说八道。”杰克不屑一顾地说道。他自己急于要商量下一次舞会的事。“由你和里普来安排。”他下令说，“我可能飞过来。到时我会告诉你。我的‘没完没了’先生又活跃起来，我正在密切注视着它的变化……B. D. 今天来医院看我，我在浴缸里把她玩了，一切都搞定了，这样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出去……别忘了提醒墨索里尼带金首饰。”

写完这封信，他就出院了。医生们除了将他诊断为白血病之外没有给他提供任何资料。经过近两个月的住院检查之后，1936年2月的最后一周，杰克又回到了佛罗里达的海边，不久就现出古铜色的皮肤，理了头发，修了指甲，做了美容，“简直帅极了”。

蛮荒之地

“这次度假我希望你不要安排得过于紧凑。”约瑟夫·肯尼迪用警戒的口吻跟正在棕榈滩的儿子说道。

杰克已经邀好了一批朋友。“女孩子少得可怜。”他对比林斯遗憾地说，“不过，虽然少得可怜，我想我还是会很快就得手。”

在某些方面，杰克身上表现出的是D·H·劳伦斯身患肺结核期间最后所写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汤米·杜克斯所信仰的那种哲学：“我相信我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根活跃的阴茎和一个智慧的头脑，我有在淑女面前骂一声‘他妈的’的勇气。聪明是件很好的事情，这样无论是提到的那些，还是未提及的部位都会充满活力。阴茎会昂然对每一位真正的聪明人说一声——‘你好！’雷诺阿曾说过他用自己的阴茎来作画……并且画出美妙的画来！我希望我也能用自己的阴茎做些什么。可惜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杰克也是如此。虽然大部分时间他只能过过嘴瘾，不过他的朋友们倒是真的在“作画”。比林斯高6英尺2英寸，重近200磅，很想参加普林斯顿春季里举行的橄榄球比赛和划艇运动。“我认为，”杰克从棕榈滩给他提出警告说，“如果你真的

肯尼迪传

要去打橄榄球，我建议你今年春天就开始着手，要不就去玩划艇——但要用心着点。别听 J·J·马厄说你是一块天生的材料之后，就自命不凡。我们大家，包括塞维利亚的那些人，都清楚你一无是处。”

几天后，当杰克得知比林斯因为成绩差没有获得普林斯顿的奖学金时，大为震惊，“没有获得奖学金真是他妈的太糟糕了。”他对比林斯表示同情，“我认为，你一直是在胡混——没有钱还乱花钱，还去度周末，整天游手好闲。”杰克承认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只是光说这些不顶个屁用。你得重新振作起来，两年来你把一切全弄砸了，从来都是虎头蛇尾。从橄榄球开始——没有一件事没让你弄糟过。如果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你就没得救了。

我认为，你现在最好是整个假期都呆在普林斯顿埋头学习。好些人就是这样干的，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这样做很辛苦，你也得做。如果你度假，你就会因小失大，这可不是开玩笑。不过要是你真的想来度假，这里地方倒是很宽敞。可是你这个蠢驴，如果现在还不醒悟，你就彻底完蛋了。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把奖学金再争取回来。

一年前，杰克正是因为胡混被学校开除，所以他的这些话让人不免有不自量力的感觉，但是他毕竟是出于诚挚的关心。所以比林斯将他的忠告牢记在心，事后不久比林斯又重新获得了奖学金。

这年的3月中旬，杰克又给比林斯去了一封信：“我刚听说你星期六晚上在斯托克俱乐部喝醉了酒，你让我着急死了，天哪！火都烧到眉毛了，你怎么还在如此逍遥呀？”同时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对了，昨天晚上我读了自己写的横幅——超凡的头脑+性格——你的老室友是想提醒你：你是他见到的最无能的笨蛋。”

杰克皮肤黝黑，身体日渐消瘦，这使他父亲非常担忧。肯尼迪先生向当时正好也在棕榈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主任阿瑟·克罗克提及此事。当年肯尼迪先生被任命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时，名家报纸对于罗斯福总统任命这样一位臭名昭著的股票投机者担任政府要职的做法都是众口铄金，大加诋毁，只有克罗克先生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对此肯尼迪先生表示自己将终生感激。但当后来克罗克了解到自己完全是受了利用时，很是失望。“打那之后我常想，可能他根本不喜欢我。”克罗克坦白承认，“只是因为我对他还有用，他还可以利用我……因为我恰巧处在一个对他有用的位置上。记得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想再跟你废话。圣诞节早晨你往窗外看，会看到一辆汽车。’我说：‘我什么都不会看见。即使有的话，我也会让人把它拖出去扔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种很卑劣的行贿手法……但这也是他的思维方式。”

从此，肯尼迪对克罗克的行贿变得更隐蔽了。与此同时，克罗克对杰克发生了浓厚兴趣。“最初我是在他们海恩尼斯港的避暑别墅见过他们一两次。当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肯尼迪先生认定他的长子乔会成为下一代政治领袖。”克罗克回忆说，“他坚信乔一定会。据我所能想起的……大约是在1936年，肯尼迪先生对我说他的小儿子——他的老二，即杰克。杰克身体

肯尼迪传

很差，麻烦又多，另一个孩子则身体很好。他认为好好锻炼一下身体……对他们会有好处。这个问题我当时跟孩子们谈过几次，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他们。我把他们带到一个叫杰伊·西克斯的农场，它是我一个朋友杰克·斯派顿的，在亚利桑那州的本森附近。”

杰罗克把事情弄混了。正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是对杰克很了解，而他回忆却说是把小乔和杰克都送到了亚利桑那，其实这不是真的，因为当时小乔一直在哈佛，连复活节都没有去棕榈滩住上几天。

杰克过腻了棕榈滩的生活，于4月中旬飞到了纽约。正如他向开车早到的比林斯所说的“带着你留给我的‘全部行头’，将于6点左右飞抵纽约。在机场的茶舞会上和你碰面——让奥利夫在那儿见我。一切由你安排”。信的结尾署名为“唐·约翰”。

在纽约的快活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比林斯必须回普林斯顿，而“唐·约翰”在4月底也接纳阿瑟·克罗克的建议，起程前往亚利桑那州的本森。他在沃思堡匆匆给比林斯留了一个简便的字条，最后署名是“于牧场”。

沃思堡没有准备让杰克在杰伊·西克斯牧场的牛群中过艰苦生活。这里的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维尔生活、在棕榈滩最远也只是去过海边的孩子来说很新奇，这是可想而知的。“最烦的是虱子，痒得要死，让人觉得亚利桑那州真他妈的不是人住的地方，”他给比林斯写信诉苦道，“所以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回来再开一个很棒的舞会。”他还答应，由他付一半他们开快车被罚的罚金。有人把受罚的事举报给杰克的父亲，杰克开玩笑说：“如果我继续和你混在一起，比林

斯，我会被剥夺继承权的。”

和杰克一起到牧场的是杰克在乔特中学时的朋友斯莫基·怀尔德。他的身体也不好，正如杰克在给比林斯介绍情况时所说，他不久就和这位昔日的伙伴一起捣起蛋来。值得一提的是，在信中杰克从未谈及母亲。事实上当时罗丝完全不再过问杰克的生活和交友情况，以致后来她在回忆时只能引述尤妮斯信中的话说“杰克在西部过得不错，有斯莫基和他做伴”，她还煞有介事地解释说斯莫基“是杰克当时养的一条狗，好像是一条牧羊犬”。

1936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杰克在写给比林斯的一封题为“和你的室友一起在墨西哥逛妓院”的信中描述了他最近的一次猎艳，“在墨西哥的妓院里花65美分换来了一次性交，一次口交，所以感觉既舒服又爽快。”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娓娓道来，“斯莫基和我昨天动身，过了边界，来到墨西哥的一座城镇，遇见了一位墨西哥姑娘。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尤物，只可惜不会说英语。晚上我写信给她约她出来幽会，因为上次她不同意和我一起外出，所以这次我一直很担心，但我确实是对她一见钟情。这个小镇是美人窝，斯莫基和我在这里的小窑子里玩了一通。他们说有一个家伙在这里染上了不算严重的花柳病，五年后便死了。斯莫基听后吓得脸色惨白，我也常常想到这事儿。所以，哥们儿，你的室友正在过一种地道的南方生活，实践‘永远到最不干净肮脏的地方去找性交对象’的座右铭。”

杰克在转给“沙因克尔”的附言中警告说，夏天不去海恩尼斯港的任何理由将是不可理喻的，“如果你像去年一样在肯尼迪庄园的网球周不去参加日光浴和鸡尾酒会的话，我会很生

肯尼迪传

气的。”在附言的结尾他的署名是“你的身患性病的室友”。他又附加了一句：“下周将到好莱坞去看看。”——因为他父亲已经接受了担任派拉蒙电影公司顾问的邀请，他打电话给杰克让他来好莱坞庆祝 19 岁生日。——“所以我和斯莫基星期五打算加紧多玩她几个，一定很过瘾。”

虽然兴奋地期待着爽快的“洛杉矶行乐”，但这位“唐·约翰”又对自己的“来没完”先生很担心。他用后悔的语调给比林斯写道：“我读的一篇文章上说，欧文·柯定是死于和我一样的病，所以我只好躺下来打针。”“在等待结果的时候我读到一则报道，在当地的男青年中，有 8000 例梅毒患者。所以你得好自为之，除非你想成为第 8001 个——真不明白，为什么玩了女人之后总会读到有关多少人染上梅毒之类的可怕文章。”

在信中，杰克还讲述了亚利桑那州本森镇的最新消息：“在这儿有 80000 名肺结核病人疗养。今天早晨起床时我不停地干咳。斯莫基说这肯定是肺结核晚期。如果来疗养院却染上了肺结核的话，那我真他妈的完了。”信尾署名是“亚利桑那人”。

其实，尽管杰克很担心染上性病，他的身体却在明显地好转。他和斯莫基·怀尔德一起参予正在杰伊·西克斯牧场参予一座新的办公楼的建造工作，所以对这里还不太腻烦。他写信给比林斯评述比林斯刚制定的夏季工作计划时说：“这项工作计划听起来很好，不过，你最好把精力集中在学校。”他警告说：“你应该清楚，你的努力 4 年后就能见分晓。尽管什么样的分晓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可能主要取决于你花了多少时间。”他接着写道，为了不把事情说得过于严峻，“一定要参加网球周，”他命令道，“我们会过得很愉快，你的学习可以暂且放一放，这会有好处。不过管它好处不好处，一定要想办法来，因

为这将是夏天最后一次开怀行乐，你9月份可能会工作或者参加橄榄球队。”

事实证明，洛杉矶之行事事都令他非常满意。“这趟真是不枉此行。”回程中他写信给比林斯，“回去后将详细给你介绍，斯莫基明天就走，以后可能会安定下来。就目前而言，我打算6月24日星期二到家。你得到场，沙因克尔。”他对奥利夫·考莉一时失去了兴趣，他称让考莉“一边玩去，因为我在好莱坞寻得了一位绝代美人儿，她是我见过的姑娘中最漂亮的。回来以后我给你看她的照片”。他还在信中大肆吹嘘自己与康斯坦丝·贝内特——也就是与电影明星格洛丽亚·斯旺森的前夫结婚的影星——一起打网球的事。他自我解嘲地说：“我连续4次双误，所以一时名声大振。”同时告诉比林斯另外一个“好”消息——他已与奥利夫·考莉“一刀两断”。信的结尾署名为“妙人儿的心上人”或者“我是如何在好莱坞搞到女人的”。

在给比林斯的另一封信中，杰克说：“如果你亲眼看过我在呼吸新鲜的空气、骑马和墨西哥之行后身体有多威猛，你就会用‘其貌不扬’之类的词来形容过去的我。”不过，他的骑术仍不很高明。他在给比林斯讲述“最新的坏消息”的信中承认：“我身上的玩意‘勒姆·肯尼迪’差一点儿就从此消失了。因为昨天我的命根子被踢了一脚，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再来这种自由、容易的骑术，后来有点儿担心。”因为“3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只得到几张肮脏的明信片……请保持联系+告诉我你的计划+何时去实施……我有一些会让你大开眼界的计划”。

这些计划，自然少不了录欢作乐、外出游玩或两者兼而有之。日程已定好，途经芝加哥。他将在那儿与里普·霍顿和巴

肯尼迪传

奇·斯里贝尔一起呆几天。同行的还有小乔，小乔此时与斯里贝尔的表兄汤姆在一起。不过，尽管杰克迫切地想见到老朋友，但在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几个月的“康复疗养”实际上是他青春期的葬礼。尽管牧场生活丝毫没有使他改掉昔日孤芳自赏的习性，但毕竟使他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

“去他妈的女人之类的玩意儿。”6月份，杰克在给比林斯的信中写道。他希望比林斯在回来时着手安排一个家庭聚会，不过又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气显示他的影响力，“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可以作出更改，所以你尽管放心去做。”他先是将“你”字写成“你们”，后来又将“你们”改了回去。他写信给父亲的秘书，要求替他预订星期四他到达纽约的那天晚上上映的《少男少女》的电影票。“我们说不定晚上会去奥菲姆音乐厅。”他补充说。过去霍顿所认识的那位对餐馆和夜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学生也已长大成人。在给比林斯的信中他用霸道的口气写道：“你用航空信告诉我这些计划与你的计划是否相适应并且必须相适应。”

亚利桑那、墨西哥、好莱坞和洛杉矶不仅改善了这位少年的健康状况，又给他提供了一种距离，它是一个人从青春期过渡到成人所必经的。一年前，当杰克填报大学入学申请时，在校长意见栏上乔治·圣约翰就写道：“杰克有着过人的智力。”但同时补充说，杰克的缺点在于缺乏“在学习方面兴趣浓厚，没有充分意识到时刻都应全力以赴。不过相信他会努力完成学业。我们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他的自我意识，以便使他的学业成绩巨大的潜力、可爱的性格与公众的期望相得益彰”。

可笑的是，远离学校几个月使杰克“自我意识”得到迅速增长，速度之快令任何学校教育都望尘莫及。“海尔·塞拉西是

一个叛乱者。”他对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一事进行评论道，口气就跟墨索里尼自吹的一样，“还把他的帝国交给了意大利。”6月19日杰克从亚利桑那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将在风和日丽的明天离开这里，”“以便”在出席简·罗文斯基家的聚会时“把我所有的‘种子’撒播到一些幸运的妞儿身上”。“尽力+全力把你的工作干完，以便能准时到达那里”。字迹很潦草，结尾称被太阳晒得出油的自己为“黑鬼杰克”。

在尽情享受了南部的阳光和领略了西部的荒野之后，杰克以充分的信心和强健的身体整装待发，向东进军——前往哈佛。

难熬的夏天

进入哈佛的这年夏天，杰克打算去科德角以玩帆船、逛海滩、打网球、开舞会来打发。1936年7月6日，他在海恩尼斯港的家中给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们：

我给您们写信是想讲一些关于我今年秋天进入贵校1940届学习的事宜。去年我曾提交过进入贵校的申请……并被贵校接纳。后来情况稍微有所变化，因为我决定出国先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年，但未满一月我便因病回国。回国后我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因为它离纽约较近，便于我看医生。在第二次统考的五门功课中，我有四门通过。

12月上旬，我又因病离开普林斯顿去了南方的波士

肯尼迪传

顿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接受威廉·P·墨菲医生近两个月的治疗。回来后，我又去了亚利桑那州，直到一周前才返回。医生检查后说，我现在已完全可以入大学正常学习。所以我特向贵校再次提出申请。如果贵校还想进一步了解我的情况，我很高兴与你们书信联系，当然我也可以前往波士顿与你们面谈。

你们诚挚的学生

约翰·F·肯尼迪

这封信除了隐瞒了他进普林斯顿的真正原因之外，其余都是实情。为了安全起见，杰克又给普林斯顿去了一封类似的信，不过信中对哈佛之事只字未提。三天后，哈佛的招聘新生部主任即回了信说，感谢杰克“十分详细”地解释了他去年被哈佛录取后没有来上学的原因，并告诉杰克新学期将于9月份开学。终于重入哈佛——杰克如释重负，转身又尽情享受楠塔基特湾的乐趣去了。

杰克逐渐成熟起来，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肯尼迪一家的生活却没有多大的改变。此时，17岁的罗丝玛丽、16岁的凯思琳、15岁的尤妮斯、12岁的帕特、10岁的鲍比、8岁的琼，甚至连4岁的特迪都不是用对待他们大哥——“有责任心”的小乔的那种态度来对待杰克，而仅仅觉得他很有天才、个性很强而又有恒心——这一点罗丝玛丽感受最深。正如尤妮斯后来回忆的，杰克想方设法不让罗丝玛丽在舞会上被人冷落，而且做得天衣无缝。“杰克总爱带着她去参加俱乐部的舞会。而且他总是先和她一边跳舞，一边开玩笑，然后再让他的哥们儿插进来和她跳，让她感到自己很受关注。半夜里他会

先把她送回家，然后自己又回去跳舞。”

不过，虽然杰克对人“体贴入微”，但正如他的一位崇拜者后来所说，1936年夏天和秋天见过杰克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身材瘦削、行为放荡、酷爱交际的大学生日后会成为政治明星。巴德·温后来回忆说，在科德角度过的那个夏天，主要是玩杰克的维亚诺牌独木帆船。“他哥哥小乔有一条很气派的船，那是一条独龙骨帆船。而杰克的这一条只是肯尼迪家的两条维亚诺独木插板帆船中的一条。他父亲十分喜欢划船竞技，雇请一个瑞典人来专门打点这些船。不知是他父亲的旨意还是为了取悦他父亲，据说瑞典人放宽了驾驶的政策，允许他们把船划到禁驶区。”伙伴们驾着小乔的帆船从艾德加敦出发前往楠塔基特，然后又返回海恩尼斯。

尽管巴德·温到布朗克斯维尔肯尼迪家中去过多次，但从没有见过杰克的母亲，以至于后来在海恩尼斯见到她，误认为她是杰克的姐姐——她是那么娇小玲珑。不过，卡姆·纽伯里——小乔的同学，杰克的朋友——关于肯尼迪家的第一部彩色影片的拍摄者回忆说：“我拍的那些影片中有两三个她的镜头，拍得非常好。当时我已经把她当成一位老年妇女，虽然她只有四十多岁。她与约瑟夫·肯尼迪分居了，但他们还是名义夫妻。她和孩子们也分开了吗？嗯，她好像不怎么被他们理解……你无法知道她在想什么。”

给杰克的朋友印象极深的是，肯尼迪家的孩子们能够对父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置若罔闻，依然自得其乐，过得快快乐乐。他们支持和鼓励弱智的妹妹罗丝玛丽，还尽力谅解母亲的“怪异”。1936年夏天，凯思琳甚至主动提出并陪着母亲到欧洲旅行。她们到了苏联，这让罗丝对欧洲有了更深的了解，而

肯尼迪传

不再局限于她过去对法国裁缝和天主教牧师所了解的。

凯思琳——人称姬克——性格与杰克十分相似。虽然谈不上有多漂亮，但她身材娇，性格开朗活泼，男人们无论老幼都喜欢她。据说杰克的朋友都喜欢凯思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将少女的魅力、天主教徒的纯洁与活泼，大家闺秀的聪明能干融于一身。和小乔一样，她也是因父母失败的婚姻和过高的期望值断送了一生的幸福，但是，她的存在弥补了母亲深居简出的生活所引起的空缺。因为她的性格与母亲正好相反：活泼、开朗、聪明、幽默而且备受欢迎——事实上她担任的是罗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成了父亲的“代理妻子”。

虽然罗丝变得冷漠，性格怪异，但约瑟夫·肯尼迪与孩子们却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这似乎是想向罗丝证明：尽管她败坏了他的名声，但他仍然可以赢得孩子们的忠心和拥戴。而她苦苦管束着他们，却是徒劳无益。

和杰克一样，凯思琳用熟视无睹的方式来避免父母的冲突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像她对待母亲的建议一样。在海恩尼斯港的一天下午，太阳光很烈，罗丝把凯思琳叫进屋，假惺惺地对她说：“凯思琳，我要教你学插花。”“插花？”姬克莫名其妙地问道。“对，懂得插花很重要。”肯尼迪夫人说，“我要你先去出去采些花来把它们插好。”然而凯思琳采的花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后来又不知把花篮忘到了什么地方。更令肯尼迪夫人恼火的是，太阳一晒，花很快就凋谢了。“她本来是想做好的，”凯思琳的传记作者写道，“但是，正如肯尼迪夫人当时教给她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只是些无关紧要之事。”

凯思琳的女性朋友们有一个苦恼，就是要想方设法避免肯

尼迪先生对她们产生性兴趣。“凯思琳的一些年轻女朋友不大敢到肯尼迪的地下室去看电影，”凯思琳的传记作者通过对那些人的长期采访之后写道，“肯尼迪先生总是要她们坐在自己身边，看电影的时候，一个劲地往她们身上靠。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所有的电影在放映之前肯尼迪夫人一直坚持审查，以杜绝色情镜头。肯尼迪先生甚至亲吻所有在他家过夜的女性的嘴唇，连未来的儿媳妇也不放过。”一次在纽约沃尔多夫饭店的套房里，他惹恼了凯思琳最要好的朋友——夏洛特·麦克唐奈。因为他强迫夏洛特在卧室里同他假装亲热，以便让在场的美国电影审查员威尔·海斯尴尬。对父亲玩这种逢场作戏的恶作剧杰克和姬克只是一笑了之，但夏洛特觉得这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她声称，如果自己的父亲对她的朋友玩这种游戏，她会“愤然离家出走”。

一个男人趁妻子不在的时候把纽约的妓女带到海恩尼斯港的家中作乐，同时又派私人侦探盯女儿的梢，这确实有些荒唐可笑。不过，虽然肯尼迪先生总是言行不一，但对孩子的生活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虽然批评他们，但同时又为他们感到骄傲，而且在生活中规定他们必须出色——尤其当他在罗斯福政府手下任职不久即辞职，不得不暂时在家闲着时更是如此。目前他正想方设法请阿瑟·克罗改变这种状况，助他一臂之力。

想当初肯尼迪被任命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时，台上台下一片反对，只有克罗克的《纽约时报》坚决支持，后来还为肯尼迪的任职立下汗马功劳。1936年夏天，又是克罗克挺身救助。这一次，他想出了一个能赢得罗斯福欢心的绝妙计划，即在1936年大选之前出版一本书支持罗斯福。肯尼迪文笔不佳，便出钱请克罗克代笔，克罗克在几天之内不仅一挥而就，更重

肯尼迪传

要的是，他脑子一闪念，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我支持罗斯福》。

肯尼迪预料到弄出这么一本拍罗斯福马屁的书，别人一定会怀疑他觊觎高官厚禄。因此，在书的开头他让克罗克写了一通言辞谦卑的申辩：“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之所以对我们的总统写出这些想法，完全是出于一位父亲对于他的儿女未来的担心。同时，作为一位公民，我不希望总统的思想被一文不值的意气用事所笼罩。”

这确实是虚伪到了极点。正如罗丝一针见血指出的，财富给他带来了物质的和性的自由。这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自然希望新政府能让他继续拥有这些财富，除此之外，他最向往而且一直为之不懈努力的是权力。

目前，惟一能满足这种权力欲的筹码便是自己的儿子，特别是长子小乔，是他的重点栽培对象。令他高兴的是，杰克的身体也有好转——夏季结束时他的体重已增到 150 磅。杰克写信给哈佛，要求他们同意他三年修完四年的课程。这令他感到很意外，肯尼迪打算前往欧洲呆一个月，临行前他私下写信给哈佛新生部主任说：“如有可能，我希望由您的一名助手与杰克商量此事，看看他三年修完的主意是否可取。杰克对感兴趣的事会做得十分出色，但对不感兴趣的事总是不闻不问。这自然是一个缺点，但也让我感到高兴，因为这至少说明他开始懂得上进了。”

杰克当时已 19 岁，他自然很怕落后于同伴们。不过，对哥哥，他却是忠心不二。他在乔特中学时的一位朋友查尔斯·威尔逊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到海恩尼斯去看他，杰克领我们坐摩托艇去看帆船赛。参加比赛的有我的同班同学赫布·梅里

克，还有小乔。当赫布想加速超过小乔时，杰克启动我们的摩托艇，以使赫布无法开快。”

年幼的杰克即将长大成人。正如杰克后来谈到小乔近乎是自杀式的丧生时所写的那样：“尽管表面看去乔一帆风顺，但那一切来得谈何容易。”杰克认为，小乔的成功并非来自天赋，而是源于坚强的意志和超凡的毅力。“我从没见过他有清闲自在的时候。”杰克写道，“即使是在安静的时候，也总是有一种使命感，只是被强压下来……我认为我和别人一样了解乔。但有时我又疑心，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他对周围的事情总是缺乏热情——好像隔着一堵墙，没人能穿过它。我并不是说乔沉闷乏味。恰恰相反——我特别喜欢晚上和他呆在一起，打高尔夫球，或者随便干些什么。”

杰克待人随和，而小乔正如卡姆·纽伯里所说，确实很沉默寡言，很少有人喜欢和他一起呆很长的时间。“他与杰克截然不同，没有杰克那种人见人爱的魅力。乔的沉闷更像他爸爸，我想……”正如在哈佛杰克的另一位朋友后来指出的，最后大多数人都与小乔不欢而散，“而且这种不喜欢的感觉会愈演愈烈。”他为人刻薄，常常取笑别人，弄得人无地自容。他不懂得控制。“小乔是一个挖苦人的高手。”另一位杰克的朋友也证实说，“你从来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他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你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在嘲讽挖苦还是严肃认真。”

小乔不但言语尖刻，而且气量狭小，甚至连他的小弟弟特迪后来也回忆说，有一次在帆船竞赛中他们没有取胜，一气之下小乔把他扔进了海里。“回家的路上，他不让我提下午的事。”12岁的小弟弟天真无邪，不赞同姐姐尤妮斯往大哥脸上贴金，把他说得“十分优秀而且坚强沉着”。特迪指出，“乔的

肯尼迪传

特点是一比赛起来就丧失理智”。这位哈佛毕业生后来被罩上了神话光环，而事实却与此相差悬殊。1935 年秋天，像他父亲多年前一样，小乔被哈佛所有的终极俱乐部拒之门外，最后他只好去了皮埃塔。“这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事，”杰克的一位同学写道，“但小乔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过杰克从 1936 年 9 月进入哈佛以来，未说过哥哥半句坏话，而且一位传记记者后来在总统竞选期间，在他的授意下修改了草稿，把他说的关于小乔“霸道”的话全部删掉，杰克很清楚，哥哥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厚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他自己的付出则只字未提。

花花公子

杰克原本打算三年修完四年要学的课程，但后来取消了。因为哥哥的关系，他结识的朋友比在普林斯顿的多。而且因为他在哈佛园分了一个房间，他又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了。他的课目顾问于 1936 年 10 月 13 日批准他免修政治学 I，法语 F。所以第一学年，他的学习课程只有英语、经济学、历史和法语 F——他必须修完其中的两门半课程。

杰克的新朋友们起初没有看出他在学业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一年前他无法参加体育活动，现在他决心不再袖手旁观，而要亲自参与。住进韦尔德楼——一座新生宿舍楼，比普林斯顿的南联大楼更古老，更难看——不久他就和其它一百多名新生一起参加了秋天在查尔斯河畔举行的橄榄球选拔赛。

“他瘦得可怜。”后来，杰克在哈佛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的吉米·鲁斯马尼埃解释说，“我说可怜是因为他体重太轻了，他的

肋骨可以隔着衣服一根根数出来。”

“若是从身体来说，他根本不够格。”他的另一位新朋友伯特·麦克唐纳回忆说。麦克唐纳是与杰克夏天在科德角偶然相识的。他当时只是觉得杰克“动作缓慢，其貌不扬。所以没怎么注意他”。但是，在橄榄球选拔赛中，尽管与众多赫赫有名、在中学就当过队长的人在一起比赛，杰克仍显得动作敏捷。这给麦克唐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麦克唐纳撒的一个谎几乎要穿帮时，杰克反应敏捷，立即幽默地为他打圆场。“我们对视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他显然也知道我是在撒谎。”麦克唐纳回忆当时他们对在场的橄榄球迷们撒的那个弥天大谎，“我们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同杰克与比林斯的友谊一样，杰克与麦克唐纳的友谊也是终生不渝。

杰克对小乔的忠心不二也给麦克唐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身体健壮，个性直爽。杰克则却不同。但他们之间并没有隔阂……他们相处得很好，几乎每天都见面。”更重要的是，当兄弟俩意见出现分歧时，杰克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麦克唐纳清楚地记得，一次他想替他们兄弟俩调解，“不关你的事！”杰克对他吼道，“你出去！和我讲话的是乔，不是你！”

据小乔的指导老师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回忆，乔“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头发浓密，表情严肃，缺乏幽默感。但是他对政治学和公共事务很感兴趣。‘我爸爸说’成了他发言时的口头禅”。杰克也很英俊，不过，跟乔不同的是，他爱热闹，兴趣广泛，特别是爱交际，对女性都十分殷勤。教师们通常不愿和这样的学生打交道。

自然杰克也不想与这样的老师打交道。相比较而言他已经

肯尼迪传

康复，所以决定全身心投入学校生活。拼命主动参加橄榄球运动自然是其中之一。杰克的朋友们逐渐发现他的写作才能和他的幽默感，并且认为他——正如卡姆·纽伯里所回忆的那样——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记者，成为一个像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式的人物。由于和这位 19 岁而且贪玩的同伙关系过于亲密，朋友们不容易看出。不过杰克并不喜欢做一位“纯粹”的记者。因为就其本性而言他更喜欢亲身经历而不是袖手旁观。就像他生病的时候从不唉声叹气一样，身体康复之后，他喜欢说干就干，不喜欢拖拖拉拉；喜欢快快活活，不喜欢无精打采；喜欢呼朋唤友，不喜欢独自一人。后来正是这种外向的性格成为一种推动力，使他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中都能投入战斗，乃至后来投入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时，杰克为那些一同玩橄榄球的同伙们带来了欢乐。因为他很聪明，同时野心勃勃，一门心思想为新生橄榄球队拼命到底。“杰克顶多不过 150—160 磅。”麦克唐纳回忆说，“当时要求橄榄球员必须能攻善守。杰克进攻是一把好手，能很机敏地突破防线，掩饰性的抱人动作也不错。但封锁和拦阻得靠身体的块头，他在这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了。打橄榄球关键是要有胆识，而杰克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胆识。”

“我加入了新生橄榄球队。”杰克在 9 月 29 日给比林斯的信中向他通报喜讯，“谁也不知道到底能呆多久。迄今为止一切都很好，我想我会喜欢。这里有施穆奇，还有 A·S·勒纳，乔·夸特罗内表叔，艾伦·鲍德温表兄，我们过得很开心。”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季节，杰克已经完全康复。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整天醉心于橄榄球场的激烈争夺，淋浴室的痛快淋浴，就像与乔特中学的“无赖”朋友们一起时

一样。这种同学之间的友情既可以带来欢笑快活，又可以用来“玩弄一下规矩”，冲一冲哈佛那些死板而又目中无人的教师们的傲气，玩一玩恶作剧。“一切都很好。”10月中旬他写信给比林斯说，“我虽然被贬到了二队，但我可能会东山再起。尽管埃克塞特队两次以14:7打败了我们……但我们这个队还是很不错。我虽起不了大作用，但至少打得越来越好。我和五个同伴一起去了科德角——埃·莫，由另一个家伙找了几个小妞来——我们中有四个人有自己的妞，有两个家伙干了三次，其中一个妞竟然是处女！我只干了二次。他们都是球队的球员，我想后来教练或许是听说了这事儿，因为他们把我们猛批了一顿。”

正因如此，加尔布雷思和其他教授才不敢与杰克这帮年轻人打交道。“那个干了处女的家伙收到一封特肉麻的信。”杰克接着写道，“信上说，她是如何爱他。因为他没用避孕套，所以很担心会出什么事。这家伙竟然去看医生，问医生有没有办法。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我想下周我们还会再来它一回。”

当时杰克的身体很好。“体重160磅——长了10磅，身体目前很好。如果约好了时间，会让你过夜。你们比赛那一天，我们正好在纽黑文和耶鲁比赛——当晚住在纽约，所以是可以见面的……请代向里普和伙伴们问好——我买避孕套的地方叫比林斯—斯托尔商店。此致 肯尼德洛斯。”

哈佛橄榄球队请了一名叫迪克·哈洛的新教练。和J·J·马厄一样，这位新教练认为杰克·肯尼迪罪大恶极——于是又将杰克降了一队，这令杰克愤愤不平。“该死的橄榄球已经没戏了。”不久杰克就向比林斯诉苦道，“教练了解了我们这帮人的所作所为，我成为人尽皆知的‘花花公子’。除总教练之外的

肯尼迪传

所有教练都是不学无术的老古董，不了解情况，就拿我开刀。他们强词夺理说一队只能有 30 名球员，硬把我降到了第三队。”

碰巧，两周后的哈佛—耶鲁比赛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赛事。当晚杰克可以堂而皇之地停练，去纽约参加一个有比林斯、梅里克、温和霍顿也在场的聚会。听埃德·沙利文说，杰克的前任女友怀孕了。“他们一定会说杰克在等待着一位仙女。请不要谈这些，早就不谈了，我的意思你们明白，我不想担心什么。”

不过，杰克承认他确实喜欢哈佛。“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喜欢哈佛。在普林斯顿呆的时间太短，所以根本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不过，我很想念以前的伙伴，不过这里的伙伴更好打发。”他调侃说，“我的意思你明白——在感恩节期间你可以呆在纽约，因为社交活动马上就要正式开始。我认为考莉应该认识几个优秀的模特儿。不过这里可比普林斯顿严多了，还有许多没用的废物！”结尾他还加了一则传闻：梅·韦斯特正在街上闲逛竟让罗斯福总统碰上了。总统说，你好，你是谁？她回答，我叫梅·韦斯特——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她说，哦，你就是富兰克林，如果你能用你压美国人民的一半压力来压我的话，随便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

这封信是在罗斯福大获全胜继任后不久写的，显然是在效仿当时支持共和党的许多大学生对罗斯福不尊敬的态度，同时也是与父亲的吹牛拍马之举故意唱反调。约瑟夫·肯尼迪在夏天不仅推出了《我支持罗斯福》一书，而且自己还于 10 月 5 日掏腰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怂恿大家支持罗斯福继任四年，而且当晚还把讲话重播了一遍。

泡妞，玩橄榄球，不尊敬师长，这些或许是杰克在他父亲处心积虑企图主宰的世界中日益显著的标志。具有戏剧性的是，小乔竭力反对杰克参加新生橄榄球队，可没过几天他便膝部受伤，要动手术。他父亲到医院看他之后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的儿子都不参加校际橄榄球赛我也决不后悔……以打塌鼻子弄瘸腿的代价换回一个优秀运动员徽章得不偿失……我给孩子们谈了这些想法，不过，我觉得只是白费口舌。”

小乔对哈佛大学优秀运动员徽章仍垂涎三尺。虽然在哈佛四年中除有伤的情况外球队训练他几乎场场必到，却始终未能如愿。不过在杰克看来，橄榄球只是一时的兴趣——玩时很快乐，过后不考虑。“人的立场真是易变。”他的父亲曾经写道，“大学期间，加入球队是首当其冲的，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人过中年之后，他却认为根本不值得那样做。好在杰克刚19岁便认识到了这一点。虽说他对橄榄球的兴趣从未减过，但对这方面的荣誉却不太注重。事实上有机会发挥一下自己的法语才能，对杰克·肯尼迪来说比当哈佛优秀运动员重要得多。

“文艺复兴王子”

在哈佛就读期间，杰克一直与他普林斯顿的“哥们儿”保持联系。“你的确是一个彻底的大坏蛋，居然把我的帽子留下。”杰克在最近一次波士顿的聚会后写信骂比林斯，“我找不到一顶合适帽子，只好光着头去出席了聚会。赶紧把帽子送来，我把你的还给你——刚开始时我简直不习惯。哈佛没让我变小气，可是你的这种无所顾及的共产主义+均贫富的态度实

肯尼迪传

在让我们这些富人寝食难安呀。”他开玩笑道，“不过，我也要采取紧急措施。我猜，你也肯定会把自己的东西当宝贝的……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女朋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找，因为考莉有了一个约会。有什么事或者能让我与哈特维尔幽会的话别忘了拍电报给我，结束比赛后就上火车——大约 8 点钟到纽约。至于与你何时何地会面由你决定，再告诉我。我参加的最后一场新生赛已经开始。”信是在板凳上写成的，很仓促，署名是“勇敢的女性掠夺者——肯尼迪”。

杰克在情场上的英勇，虽然没有赢得哈佛教师们的好感，但无疑给他的课业——如果他耐心去做的话——凭空添了一种个性魅力，或者说是洞察力。有一回，法语 F 课程教授要求他就法国费兰西斯一世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写一篇 10 页的论文。论文要求一半用法文、一半用英文来完成。

这类题目正合杰克的口味。弗兰西斯一世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他的一生正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化过渡。杰克开头用法语写道：“弗兰西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时代骄子——他是奥尔良大公之子，与路易十二只是远亲。”杰克接着写道，“一些人的意外死亡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虔诚的母亲——最大的愿望是要在路易十二死后看到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的母亲——的帮助下，为了争夺王位而开始了艰苦的奋斗。”

正是这条奋斗之路以及弗兰西斯传奇般的性欲令杰克着迷。杰克发现，一心想让儿子当上国王的弗兰西斯的母亲对儿子极强烈的性欲十分担心。“路易十二的第一位王后死后无子嗣”，“老国王为了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人，娶了年轻貌美的英国公主玛丽·都铎为后”。杰克认为：

摆在老国王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预防弗兰西斯与年轻的皇后发生性关系。如果那样的话这样年迈的国王就不能实现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人的心愿。弗兰西斯强忍住自己。国王与玛丽结婚后不久便去世了。玛丽也因身后无子，被送回英国。后来 20 岁的弗兰西斯继任王位，即弗兰西斯一世。他雄才大略，精力充沛，是时代的骄子和智慧的化身。他以各种形式来表达对自己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打猎、战争、女人。

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杰克接着写道：

在弗兰西斯一世的生活中，女人是最大的兴趣之一。他一生风流韵事很多。他与海峡对岸的同代人亨利八世不同的是，弗兰西斯一世的婚姻不是他的选择或出于爱情，而是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因此史书记载中他并不是一个婚姻幸福的人。弗兰西斯结婚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所以婚姻在他的生活中形同虚设。他的王后克劳德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她只知道为他生儿育女，而这些儿女大多夭折。他则一直在与勒夫娃等女人们“寻欢作乐”。但他明白女人该处的地位，直到晚年，除他母亲和姐妹之外，没有女人在他的后来的生活中占据具有重大影响性的地位。

显而易见，其中有许多是 19 岁的杰克·肯尼迪的影子的真实写照。除了诸多的风流韵事，杰克对弗兰西斯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弗兰西斯年轻的时候便梦想将来能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意大利，他后来登上王位之后果然实现了这个梦想，使整个

肯尼迪传

欧洲为之震撼。作为一个侵略者，弗兰西斯后来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并把它引入法国。杰克认为这是创世之举。意大利人也认为他“勇敢而又强霸，具有王者风范”。通过与利奥教皇签署波洛尼亚协议，弗兰西斯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无可厚非的专制”君主。“刚刚继位不久，他便很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杰克写道，“虽然弗兰西斯大力扶持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但他对运动的理解却是肤浅的。他只想坐享其成。”

在杰克看来，肤浅正是作为政治家的弗兰西斯垮台的原因。“西班牙的斐迪南一世死后不久，弗兰西斯又遇到了新的对手，——”杰克写道，“‘策略大师’查理五世的性格与弱肉强食的弗兰西斯的性格正好相反。”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查理五世联合整个欧洲势力对付弗兰西斯。弗兰西斯四面楚歌，终于在帕维亚一战中被俘，后来虽因签订《马德里条约》而获释，但是：

从此他不得不龟缩在自己的王国里，颓废至死。年轻时他人格与相貌上的缺陷曾被吹嘘成是“年轻”的缘故，现在却被看成是缺陷。如果说他的身体虽然没有能给他带来和平的话，但至少可以使他和自己成百上千的臣子，从一座行宫到另一座行宫里寻求乐趣，分散精力……集奢华与淫欲于一身的弗兰西斯是一位纯正的奥尔良人。他崇拜美。这种美也可能很浅、很虚无飘渺。他欣赏尚博尔宫的富丽堂皇，更醉心于枫丹白露宫的雍荣华贵气质，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的个性。他高高在上，体现出王者风范和贵族式自负。由于早年荒淫无度，以至老来疾病缠身，身子日益虚弱，终于在1547年离开人世。

通过对弗兰西斯的性格分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纵观他的一生。我认为，他没能死在帕维亚很是可惜。因为从那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是偶有惊世之举罢了。弗兰西斯精力充沛，热爱生活，虽然华而不实，目光短浅，但却具有相当的鉴赏力。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人物最典型的代表……他将自己的个性展现到法国皇宫上。他对建筑艺术很有一番研究，既是艺术的捍卫者，又是艺术的鉴赏家。我们可以从尚博尔宫体会到真正的弗兰西斯时代精神，至少是它的最精华部分。这是他统治期间辉煌成就的活生生的里程碑。他的一生并没有虚度。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引导法国走出了中世纪。

杰克的法语教师格雷格森对他的这篇文章并不太满意。文中不光语法错误层出不穷，而且历史及人物资料都是二手货，主要参考的是弗兰西斯·哈克特的《弗兰西斯一世》，因此他只给论文打了个 D+。

一名 19 岁的大一新生的论文，得这样的分数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从 19 岁的杰克·肯尼迪的生活来说，杰克对这位文艺复兴王子——勇于改革、奢华同时又将法国从中世纪引导进入现代的人——的描绘应该是约翰·F·肯尼迪青年年代最重要的写照之一。尽管这位哈佛一年级学生几乎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号令千军万马，或带领美国进入新的复兴时代，但毫无疑问，阅读了有关弗兰西斯一世生平和时代的书籍之后，杰克·肯尼迪心目中有了一位新偶像，并且迫切地想前往法国瞻仰弗兰西斯一世的故乡和皇宫。

放纵的季节

1936年棕榈滩的圣诞节与坎布里奇相比，就像停尸房一样冷淡无奇。“这儿太冷清了。”杰克给比林斯写信说，“一点都不热闹，也没有小妞。出去参加的几次舞会，也是令人厌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女朋友的父亲——罗文斯基“带了一个坏头，把小乔称为‘我的未来的女婿’”。不过没多久，杰克又捞了回来，因为当他的哥哥小乔“约请简·罗文斯基幽会时，她嫣然一笑，回答说：‘不，绝对不行。’所以，‘我又捞了回来’”。

罗文斯基先生是有意挖苦杰克。但是，肯尼迪先生则不是这样。返回哈佛不久，杰克的父亲便写信给他说：“一年来你有了翻天覆地的、显著的变化。我非常高兴，你知道，我向来认为你可塑性强。而且我断言现在你正在证明这一点——大人们都很喜欢你。”信中丝毫没有提到罗丝责备杰克在纽约夜总会出入过于频繁之事。“老爹来信，把我夸了一通。”1937年2月，杰克给比林斯写信说，“近来他对我可谓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父亲的赞扬对杰克来说，显得很滑稽。因为没过多久他便比过去更忙于寻欢作乐。1月2日，他离开棕榈滩，13日写信给比林斯宣称，他已经将枯燥无味的圣诞节的损失补了回来。“如果你染上了性病，同时又要当父亲了，你会怎么样？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他吹嘘道。

虽然担心染上梅毒，把姑娘们的肚子搞大，但他照样寻花

问柳，并未见有丝毫收敛。入哈佛后的第一次考试，年终考试定于13日后两周进行。到1月26日，他已经考完两科，还有两科没有考。“今天要考试，所以我得翻书，看这门他妈的课讲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给比林斯草草写道。他已报名参加拳击队和游泳队，这种赋有挑战性的生活看来很合他的兴趣，“我仍在练拳击，因为教练说新生中我是最有天赋的拳击手。”他夸耀地写道。但是，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因为哈佛的仰泳冠军在100码游泳测试中被杰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对于一个休病假一年的学生，杰克不仅非常活跃下流，而且也非常下流活跃。他对于这些，津津乐道。学习、拳击、游泳，他样样都干得热火朝天。当比林斯写信抱怨最近为加入普林斯顿的一个学生联谊会花了很多精力时，杰克写道：“亲爱的‘勒莫安’，我推算这个什么狗屁联谊会熬不到周末就会散伙。所以你不如和这个自命清高的玩意儿一刀两断，来纽约和女招待们尽情玩乐。”

“杰克不尊重女性，极不尊重。”他在哈佛结交的加拿大朋友维克·弗兰西斯回忆说，“他去征服女性是出于自尊——他视她们如敝屣，在她们面前肆无忌惮。有一次，杰克邀一位纽约的模特儿去参加哈佛周末舞会，并在坎布里奇饭店为她订了房间。后来他临时有事，让我替他到南站去接她。接回来之后，我给乔打电话，问杰克躲到哪儿去了。乔惊讶地说：‘啊，天哪，下次可别这样了！’最后乔只好自己带着这位模特儿去舞会，而杰克整个周末都不见踪影。”

“还有一次，”维克·弗兰西斯回忆说，杰克应邀与一位新踏入演艺圈的女演员一起去纽约骑马。“他要我一起去——其实是他硬拉我去，我原本不怎么会骑，也没有合适的衣服。我

肯尼迪传

们俩都只穿了普通的衬衣和裤子到了那个姑娘的公寓。只见她身穿马裤，脚蹬马靴。她见到我们的那副模样，故意说道：‘你们俩这副打扮，我不想和你们去！’”

“那好，维克，我们别浪费时间！”杰克说完便径直下了楼。

弗兰西斯认为，杰克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不想被那些别有细心的女孩子耍弄或利用——实际上她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父亲的百万家财而非杰克·肯尼迪本人。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杰克眼里，女人除了是征服对象和床上玩物——如果可能的话——之外，一无是处。与他母亲不同——实际上正是为了与母亲的清规戒律唱反调——他喜欢裸体，沉溺于性交。维克·弗兰西斯记得在布朗克斯维尔的一次聚会上，杰克邀请奥利夫·考莉一同前往，还有普林斯顿的一群男孩，他们带去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孩，她是斯拉克夜总会的女招待。他们把女孩带到了里面，大概是痛快了一通。考莉很生气。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她们打听那女招待在哪儿工作，并且称自己也是女招待。最后把这位金发女孩问急了，她掀起烟灰缸便朝她们扔去。奥利夫和她的朋友连忙躲闪，并高声喊杰克救命。杰克出来了。维克·弗兰西斯永远不会忘记杰克当时竟说：“嗨，奥利夫，你他妈的真是个贱货！”

如果说杰克仅仅在性和社交方面不把女人当回事，令女孩子恼火的话，那么，他开车时的近乎疯狂则让他的朋友担心吊胆——尤其是有了一部新福特车之后。肯尼迪·加尔布雷思后来回忆起当时小乔对此怒不可遏的情形。此前小乔组织了一个聚会，就罗斯福是否能重新当选总统打赌，并且邀他的老师一起参与。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他干得棒极了……赚钱买了

一辆新车。我们选举结束后开着车到韦尔斯利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心情不太好。因为几天前杰克未经父亲允许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辆新车。他弟弟凭什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弄一辆新车？”

比林斯是杰克新车的第一个乘客，他回忆说：

杰克把车开得飞快，我们绕科德角来回兜了好多圈。违反交通规则次数多了就会被抓，驾驶执照就会被扣押。一天晚上，我们开车出去兜风。记得当时一名警察追了上来。要知道再多一次罚单，杰克的执照就会被扣。于是，我们一边交换座位一边开着车，这样做难度非常大，你试试就知道了。换了几次后我们突然发现，杰克穿的是白衬衣，我是黑色的。开着车换衣服也是很危险的事，我都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换的。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赢了。当然，最后我领了一张罚单。

维克·弗兰西斯也记起过类似的情况：

记得有一次，我们急着过桥，杰克不停地按喇叭。警察把他叫到一边训了半个小时。“你为什么总要惹麻烦，杰克？”我问道。还有一次，我们去新伦敦参加哈佛和耶鲁的划船比赛。我碰巧见到了杰克。凌晨两点我们开车出发。杰克的女朋友没地方坐，吵个不停。最后他给她找了一个脏乱不堪的地方把她丢在那儿，而且在三楼！有一次我们开车出发时，不巧没汽油了。黑灯瞎火的好容易找到一个加油站却早关门了。杰克便自己动手加起油来。这时

肯尼迪传

一扇窗户打开了，加油站的主人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杆猎枪！他吓唬说要砸了杰克的脑袋。杰克也冲着他喊，让他出来加油。“杰克，你总是捅娄子！”我埋怨他说。

当时，他们已开始考虑暑假怎么过了。

1937年3月，杰克写信给比林斯说：“你知道今年夏天斯基莫基打算干什么呢？你呢？请尽快告诉我，好让我做决定。”他的体育活动比以前更多了。不过他不想让它影响社交活动——他准备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舞会。“尽管我要参加橄榄球赛，不过我想19日我会抽出时间去看看普林斯顿。请做好准备……给我弄间单人房——我不想和别人同住。特别是要避开你的妞。我不想让你像往常那样，突然跑进来搅和，谈论我的鸡巴有多疼。我会弄到那辆车。告诉我班级舞会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以及我该哪一天到……游泳进展得很顺利——在混合接力中我们每赛必胜。我们星期五到达达特茅斯。我只能暂且停笔了，因为教练开车过来了。”

这年4月，杰克从韦尔德32号给比林斯写信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这么忙过。”同时解释了自己没有按时写信的原因，“本人最近忙得焦头烂额。昨天晚上持续写了12个小时——因为早晨要交出一篇6000字的论文。顺便告诉你，本人在学校仰游锦标赛中获得亚军。速回电。”他对比林斯命令道，因为他想尽快把参加普林斯顿大学舞会的事确定下来。

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玩命工作，玩命游乐，玩命泡妞，似乎使杰克心得颇丰。19岁的他声称，自己在寻欢作乐方面已是行家，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不需为此有任何付出。以他为主力之一的新生游泳队不仅在当年比赛中所向披靡，击败了埃克

斯特队、达特茅斯和耶鲁队，而且使他所在的游泳队成为哈佛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新生游泳队。在橄榄球队中，他迎战了百慕大海军学院队、陆军海军队、普林斯顿队。他代表哈佛新生队参加了5月与耶鲁的高尔夫球赛。他还被选为新生联谊会组委会主席。同时，又被提名为1937年至1938年度学生会成员。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他在匆匆写给父亲的信中介绍道，“只是太忙……昨天晚上我和维恩·弗雷德利一起去看了多伊利·卡特《威尼斯船夫》的演出。它远比我想象的要好，所以我想应该转告乔特中学负责人，学校所教的东西根本无法让人喜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在新生联谊会上我的事务特别繁忙。我和斯滕伯格先生准备一同前往，把演出从梅特弄过来。我们还可能会请到格特鲁德·尼森。他会很棒。我想我应该请外公去请坎宁安·克拉朗斯·德马克，而且我在考虑是让你去请尼尔·奥哈拉，还是让外公去请。演出两周后举行。”

杰克的新生联谊会，又称春季舞会，于5月4日在哈佛的纪念会堂举行演出。结果表明，它是哈佛历史上举办最成功的舞会。大约一共有40名艺员参加。有两个爵士乐队，有好莱坞的喜剧明星菲齐·奈特，还有极富传统风格的舞台和电影双栖女星格特鲁德·尼森。

所以，理所当然，当杰克申请大二转到温思罗普宿舍时，和他交涉的人士注意到，他和他选定的室友托伯特·麦克唐纳是“两位学校著名的体育运动员”。“再三考虑，不能拒绝了一个好学生。”大一助教认为杰克“目标明确，一切正常”。而且，一旦进入第二年，习惯了学校生活，学业上“可能会更好”。

杰克的理想是从政。“他准备去政府机关。”助教在他的档

肯尼迪传

案中推荐道，“他在国外曾经学习过这方面的理论，他父亲又是从事这类工作的。”罗斯福成功连任之后，约瑟夫·肯尼迪在政府中谋得了一个新职位——美国海事委员会主席。

教育的价值

“罗斯福与乔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追溯到 1916 年。那时候罗斯福是海军部长助理，乔是福尔河造船厂的经理。因而，让乔担任海事委员会主席理所当然是总统的首选。”后来罗丝·肯尼迪凭印象回忆说。她不仅搞错了年份，而且也好像忘记了丈夫曾在福尔河造船厂引发的灾难性的大罢工。

说实在的，罗丝一点也不喜欢乔的新职。罗丝在社交上沉闷已久，觉得自己也该在闪光灯前露露脸了。她千方百计地提高衣着品位，保持身材苗条，甚至接受演讲训练，改善“晦涩”的口音。帕切利红衣主教 1936 年 11 月，拜见总统时顺路到她布朗克斯维尔的家中拜访了她。1937 年 1 月，她父亲被马萨诸塞州官方指定为候选人，而且从此以后一直享有“荣誉候选人”的官衔。在罗丝看来，乔为罗斯福奔走多年，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她后来说：“我觉得乔应该得到更好的职位，坐上某个特别的位子。”

罗丝指的是大使一职。她知道，乔缺乏外交官应有的气质。她本能地发现，自己心里自结婚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帮助丈夫的念头。“肯尼迪先生有我这位妻子真是幸运，”她后来向秘书吹嘘说，“我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东波士顿的那帮姑娘只念过高中。我还出过国，见过托马斯·利普顿爵士，会说法语和德语。”她在回忆录中同样沾沾自喜地写道：“乔对外

语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语言天赋。所以大使一职并不完全适合他……乔周末回家，我总是问他：‘总统怎么说？你不能向他毛遂自荐吗？’乔总是耐心地说：‘我总不能径直走到总统办公室，对他说我想当驻英大使吧！’”不过，罗丝坦言：“通过政府内的好友和新闻界信息灵通并且值得信任的朋友，如阿瑟·克罗克等有意无意的向总统透信。”罗斯福总统完全了解肯尼迪的心思。

刚开始，罗斯福觉得肯尼迪的这一想法十分可笑。“后来通过幕后的方式达成了协议，即如果在海事委员会他工作出色，说不定下一步便让他做大使。”罗丝后来写道。因此，重新管理好美国的海事便是前往王子门——美国驻英国宫廷大使的官邸——的垫脚石。

至于杰克，他在哈佛很一般——一门 B，三门 C，杰克自己倒是无所谓。在一篇关于卢梭的新生历史课论文中，他宣称“教育的价值”不是教会学生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是要培养判断力和个性。虽然哈佛的教授们对他看不顺眼，但他依旧我行我素，独树一帜，以过人的精力追求自己的目标。19岁的他，观念尽管幼稚，但那毕竟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附和教授们。“我们总是只知埋头读书，而不知做出自己的判断。”杰克对卢梭倍加赞赏，“我认为在财富和教育问题的讨论上，卢梭表现了最大的真实。”像卢梭这样的人“根本无法适应法国的种种戒律，法国人城府极深……他的一生都在与这种虚伪和文明的罪孽进行着圣战。他的理念是：自然是圣洁的，社会是丑陋的……不管在哪里，知识带来的永远只是虚伪和做作……所以我们看到，卢梭是在反抗 18 世纪那种死板的宗教观念。”这位年轻的波士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充满怜惜地写道，

肯尼迪传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丑态百出，凡尔赛宫更是以矫揉造作闻名于世。上层阶级终日游手好闲，寻欢作乐，黎民百姓民不聊生。路易十五上台不过是将残暴公之于众。正当人民陷于绝望之际，卢梭的著作出现了。他的激进思想赢得了普通民众广泛的称颂。这无疑是饥渴者的精神食粮。它可以说是 1789 年革命的种子。”杰克引述波加迪乌斯《社会思想史》中的话说。卢梭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这一点《独立宣言》便是最好的证明。”“主权，”杰克进一步论述道，“不是在统治者或君主手里，主权在民众之中——这大概是卢梭在社会思想方面的对广大下层群众的主要贡献。”

观点虽说不成熟，不过杰克·肯尼迪终于开始深入探索缔造了欧洲和美国民主的政治思想。现在，是让这位准备从政的年轻学生亲眼去欧洲看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遗址的时候了，或许他还可以亲身感受正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酝酿着的 20 世纪的社会革命。20 世纪的统治阶级是否仍然在用“民众”的钱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魅力究竟何在？

杰克原打算去海恩尼斯港度暑假。“我想去玩赛艇。”他告诉比林斯说，“可惜家里人不赞成，他们说可能不久要打仗了，我应该去欧洲看看……我给斯莫基写了信，问他是否去欧洲。要是他不想去，我肯定也不去；要是他去，我会和你商量这件事。”

斯莫基过了好久才答复。他告诉杰克他去不了。不过，这时杰克已经打定主意自己开车游历欧洲。杰克的父亲很慷慨地答应比林斯的母亲，比林斯欧洲之行的费用由他来付，他只要

在毕业后继承的遗产中拿钱付这次旅行花费的一半即可。可是比林斯代替了斯莫基。行期将至，杰克以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给在华盛顿的父亲写信说：“我们正在为欧洲之行做准备。”“勒姆和我都认为，这次旅行最精彩的部分是作为记者或红十字会成员进入西班牙呆三个星期。如果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的计划大为增色，所以希望您能帮我们做好安排。”

他用这种感人的笔触对父亲“安排”事情的能力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在哈佛大学第一年的生活至此便告结束，不久他便与普林斯顿的好友一起前往欧洲。这将是 he 一生中最有教育意义的实践。

欧洲见闻

1937年7月1日，两位年轻人登上了华盛顿号轮船。杰克带了三套睡衣裤，四条短裤，七条手绢，八件内衣，十四件衬衣，十六双袜子，一件丛林夹克衫，还有他的车。

肯尼迪先生让杰克去欧洲旅行是明智的。“我们虽只是四处云游，但旅游结束时我们发现自己收获极大。”比林斯写道。他并没有虚张声势。他在普林斯顿二年级刚学完建筑学课程，杰克也是刚修完法国和欧洲历史课。所以这次欧洲之行对两位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实践，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惟一次。“我想我们谁也不可能再像这次这样遍游欧洲的博物馆、城堡、庄园以及其他名胜古迹了。”比林斯动情地回忆道，“毕竟，那时我们才20岁。”

杰克随身带着妹妹凯思琳送给自己的一本皮面笔记本。笔记本扉页上印有“我的欧洲之行”几个字，上面有一艘轮船的

肯尼迪传

图案，像是泰坦尼克号在沉没的样子。杰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用这个笔记本记录这次旅行。“一切顺利。头几天很无聊，后来发现了几位姑娘，尤其是安·里德。和船长先生喝过几次鸡尾酒。他认识托马斯·利普顿爵士，还认识外公。我最感兴趣的是希尔将军和他的女儿。希尔将军是议员，他女儿可能什么事都干过。”

这两位常青藤联合会大学的学生访问了爱尔兰。第一次杰克看到自己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第二天上午，船在勒阿弗尔靠岸。汽车刚卸下，他们便开着它飞快的驶过海滩，开往蒙圣米歇尔，然后调转车头向东，穿过诺曼底森林，到达鲁昂——威廉临朝听政之地。“我们继续前进，到达博韦。”杰克写道，“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小旅馆里停下来过夜，并且第一次喝到了法国烈性酒。”

旅馆名叫拉科特里。“我必须尽量节省开支。”比林斯后来回忆说，“我不得不省吃俭用。杰克也和我一样节俭，我敢肯定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和我同甘共苦，然而杰克毫不在乎，反倒觉得很快乐。”而且，杰克与他的朋友对教堂、对在大学课本里了解到的建筑物所抱的热情也很感兴趣。“我对这些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激动。他虽然没有学过建筑，但是却和我一样感兴趣。”

各种纪念性建筑物对比林斯来说，是建筑史上的瑰宝；在杰克眼里，它们是欧洲历史的见证。“中午 12：00 起床，”7 月 8 日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写信、取钱、吃午饭并给比林斯买胃药。‘胃病’把他折腾得要命。然后去苏瓦松，参观舍曼代姆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之一。我们还参观了遭过轰炸的教堂，然后去兰斯，看到了大教堂，接着来到皇

家饭店——我的法语有所进步，比林斯也能来几句。很早就睡——总的感觉是，好像不会再来一场战争。”

在法国的广泛见闻是这次旅行的成就之一。两位大学生访遍了那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一片狼藉的战场。“去参观庞波奈尔城堡。它是战斗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第二天杰克在日记中写道，“然后动身前往庞波利的香槟山洞参观。这些山洞位于高卢地区古老的石灰岩岩洞中，构造十分巧妙。之后，喝着上等香槟酒，我们和一位看管员攀谈起来……总的看法仍然是近期不会有战争，法国已经做好了应战德国的充分准备……我们又从这里去了蒂耶里城堡。途中两位法国军官搭上了我们的车。大概8点左右到达巴黎。”

在巴黎度过了第一个消费较高的晚上之后，他们改宿了一家较便宜的旅馆——蒙大拿旅馆。它正对着巴黎北站。“两人每天只要80美分。”后来比林斯还清楚地记得此事，“这时我们已经习惯把车停在街区附近，因为这样更省钱。修理车灯，又被敲诈了一笔。”杰克在日记中写道，“这些法国人每次都恨不得囊洗我们的腰包。”杰克花钱很节省，而且一直如此。不过，这一次节约却是替比林斯着想。当然，在巴黎这样的城市，指望杰克光看看教堂是不可能的。“去了巴黎圣母院，接着又逛了逛街景，然后去了红磨坊和艺术家咖啡馆，在那里邂逅了几位法国著名的艺术家。”杰克在日记中写道，最后还补充了一句，“比林斯原想早些回旅馆，后来却乐而忘返。”

有负罪感便会想到宗教，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两位年轻人对此从不提起。“我们从不谈论宗教问题。”比林斯回忆中学生活时说道，“我是新教徒，他是天主教徒，但我们从不提及此事。”然而，童年时代的经历，使杰克已经明白，在美国他们

肯尼迪传

属于少数教派，在他的新教朋友和他们的家人眼里，他们这个教派的教徒们过于顽固不化。

现在，杰克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栖身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度，这里天主教的历史随处可辨。不管信仰多么肤浅，处于这种传统之中，他无疑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做弥撒。他的那位信仰新教的朋友也与他同往，心中对那些天主教教堂建筑充满了崇仰之情——坎特伯里、乔特、普林斯顿和哈佛的那些小教堂与它们相比逊色多了。7月13日，星期二，亦即法国国庆日前一天，杰克很早就起来，去听圣母院帕切利红衣主教讲道。“人多得要命，我紧跟着一名官员，好不容易在圣坛边找到一个好位子。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仪式，持续了3个小时，比林斯只好等在外面。”他很庆幸地写道，“虔诚的教徒把教堂围得水泄不通。”比林斯三十年后回忆道：“能够进教堂的人只有少数——我想得凭票入内——被堵在外面，但他进去了。他怎么进去的我不清楚。杰克跑到贵宾入口——那是勒布伦总统出入的专口。我紧跟在杰克后面……后来他告诉我他离法国总统只有5个座位的距离。杰克想好了要去的地方总有办法去成。我想这完全靠的是胆大。”

倘若不是胆大，肯定是靠机智起的作用。巴黎圣母院的祈祷仪式结束之后，他与比林斯以及美国驻法大使的秘书卡梅尔·奥菲共进午餐。“与奥菲一起吃完饭，就去了凡尔赛宫，这座宫殿确实气势非凡。”杰克当晚邀请在华盛顿号轮船上结识的安·里德观看了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演出。“他让我想起老霍华德。”“第二天”——7月14日，俩人“一起逛街”，后来还碰到了哈佛的布鲁斯·莱纳。“他蓄了小胡子”，后来同几个勒姆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一起吃饭，“虽然花费不低，但很开心。下

午匆匆参观了卢浮宫——以前我也这样参观过一次……虽然我对这方面知道得很少，但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还遇到杰克哈佛的同学亚历克斯·普塔利斯，亚历克斯·普塔利斯家在里维埃拉的圣让—德吕兹有一栋房子。他邀杰克和勒姆去西班牙途中顺便去他家中一住。

巴士底日，即法国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不仅使杰克想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想到一个半世纪后威胁法国自身的国内革命浪潮。“我打算读巩特尔的《欧洲内幕》。”他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巴黎他们的观光日程安排得很紧凑，“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早早起床，去参观了拿破仑墓，并去了十分有趣的残疾军人院。之后又去了展览馆，去了艾菲尔铁塔。说服比林斯登上了塔。登塔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下午我们前往曾经囚禁玛丽皇后的监牢，它与凡尔赛宫正好形成鲜明对比。”他补充道，“豪华的宫殿使人不禁产生昔日帝王如今安在的感慨。”当他得知预订的返程客轮——哈定总统号“很次”的消息后，便改订华盛顿号。“这样，返回美国的时间得推后两天，那样就赶不上橄榄球联赛了。不过现在我好像不大想玩球了。”杰克泰然地写道。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警告他们不得去西班牙，但他们还是朝南部的沙特尔出发了。“在凡尔赛停了一下，参观了特里阿农别墅，明白玛丽—安托瓦内特所说的‘艰苦生活’是怎么回事。”杰克开玩笑道，“到达沙特尔，发现那里的窗户很特别。当晚驱车前往奥尔良，约10点到达。”

杰克对这里早就向往已久，这是他所敬仰的文艺复兴英雄弗兰西斯一世的故乡。“去教堂做弥撒。”7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肯尼迪传

四处走走。意外的发现奥尔良竟然如此狭小。法国真是一个颇具远古风貌的国家。尚博尔宫很有看头。有一家猎人旅馆，可容纳 2 000 人。宽大的屋顶向四周延展，宛如一个村落。这是弗兰西斯一世时的建筑。不知怎么比林斯把笔记本弄丢了，急得跟什么似的，后来幸好一位法国姑娘帮他找了回来。车上坐了几位英国人，其中一个名叫沃德，要去剑桥的三一学院。他说他将继续“闯自己的路”，后面的路应该不难走。他觉得罗斯福是最伟大的“独裁者”。后来他到卢瓦尔河游了一次泳，水流很急，然后继续前行。去布卢瓦古堡参观，在昂布瓦斯过夜，过夜的目的主要是想参观那里的古堡。因为对蒂耶里古堡美国人墓地的狗仍心有余悸，便决定不再在晚上去古堡。改去逛了逛街市……布卢瓦的林阴道令人难忘。

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布卢瓦城堡。“城墙很高，里边很漂亮。看到了密谋者墙，这里共死过 1 500 人。查理十三世也是在这里撞墙而死的。后来离开此地前往舍农索，它建在水上，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开车到昂古勒姆，途经图尔河到达普瓦捷，两座小镇均已荒无人烟，住宿费每人花去 10 法郎。”

愈是靠近西班牙，似乎离美国愈加遥远。“和往常一样，兑换旅行支票遇到了麻烦。欧洲旅游系统不如我们想象的好，”他写道，“我们开车经过的那些农庄给人的印象很难忘。美国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像这里的人，极差的物质条件就能让他们很满足。正因为物质条件差，人们才十分保守，至少除巴黎之外都是如此。”

在圣让—德吕兹，他们住在普塔利斯公爵家，因此得以略作休整。“和法国女孩一起玩耍，”杰克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但失望的是“她们的戒律很多，不仅要有年长女伴同行，而且不能晚于21点回家。”不过，加里·库珀在《哲学家》一剧中“说法语和印第安语”，使他们忘记了这件事。“而且门票也是挺划算的。”7月24日，两位不辞劳苦的旅行者已经腻烦了网球和海滩，便驱车前往比亚里茨，买好了26日斗牛演出的门票。

比林斯回忆说，杰克“很想去西班牙，但是这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护照上白纸黑字地注明‘不宜去西班牙旅行’，因为那里在打内战。杰克只好‘花费很多时间和难民们交谈，做了很多记录，写了又写……在圣让—德吕兹我们见到的那些难民很可能是亲佛朗哥的上层社会的人，所以我们听到的全是关于反佛朗哥派在西班牙穷凶极恶的故事。当时我们听了都很震惊，不过我想可能这是因为我们只碰到这一群难民，没有别的派别的难民。”

实际上，杰克没有什么未卜先知，表现出“自己读过巩特尔的书之后已经略知时局，即使圣让—德吕兹被反叛者严加控制也是如此。英国人反对佛朗哥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地中海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内陆湖。问题是德国和希特勒的势力有多大？俄国的立场怎样？为了让自己的支持者获胜各国将又牵连有多深？佛朗哥会建立怎样的政权？英国和德国又作何感想？”

带着诸如此类的疑问，7月25日杰克和比林斯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弥撒。“地点是在路易十四与美丽的路易·特雷茜公主曾经结婚的教堂里。午饭后我们又开车前往与西班牙交界的威尔逊……参观了伊伦镇，那里曾被叛军轰炸过。在那里听到一

肯尼迪传

则故事说：一位父亲被关了一个星期之后，饿极了，有人给他送来一块肉，他想都没想吃了下去。后来发现自己儿子身上少了一块肉，原来父亲吃的肉就是儿子身上少的这一块。这使我有些憎恶西班牙政府。政府四分五裂，以致西班牙永远无法统一。对佛朗哥英国的态度有些改变。”

杰克和比林斯第一次观看了斗牛之后，对难民讲的吃人肉的故事便坚信不移了。“我认为那些难民都是西班牙的斗牛士。由于内战，便跑到比亚里茨（位于法国境内）来进行斗牛表演。我们俩人对斗牛都深感厌恶，不喜欢这种残酷的表演。”比林斯回忆说，“我们觉得应该有人为那些牛祷告。或许我们不懂这项运动的精华所在。我记得杰克让我注意一位法国母亲和他的孩子。一个小男孩，就坐在我们旁边。当一匹马被牛顶穿肚子，肠子露了出来，拖着肠子一路跑出去时，那位母亲大喊大叫，惟恐自己的孩子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

“很有趣，”杰克在日记中写道，“但很残忍，特别是公牛顶伤马的那一幕。自此，我们对那些吃人故事再也深信不疑了，因为这些南方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看到残忍场面无比兴奋。他们认为那匹马穿肠破肚，逃出斗牛场的情景便是最精彩的一幕。”

从此，即使是海明威也无法令杰克接受斗牛是高雅的娱乐。这次欧洲之行，杰克不但逐渐了解了过渡时期的欧洲政治格局，而且也清楚了自己是什么身份。当然，他不可能预见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自己国家的南方人面前遭枪击，脑浆迸裂，被拖出暗杀现场，而许多憎恨他的南方人却为此喝彩的场景。“我们对这种性格根本无法接受，”比林斯写道，“而且对它感到憎恶。”

7月即将结束，两位美国年轻人迫切想去了解一下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情况。27日，他们“十分激奋”地离开普塔利斯一家“前往马赛”。“途中去参观了卢尔德”，杰克写道，“那里有少女贝娜尔德特拜见圣母玛丽亚的洞穴——成千上万的信徒在这里祈求神灵救治。很有趣。”杰克用嘲讽的口吻写道，“奇怪的是，一离开此地比林斯反而闹起病来。只得去图卢兹过夜。当时比林斯高烧至103度。”

法西斯主义透视

20岁的杰克·肯尼迪在1937年8月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几个月后这场运动使他父亲在享受完一次短暂的美国式荣耀以后便与自己的政治梦想永别了。

“继续读巩特尔的书，”在图卢兹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已对佛朗哥的胜利抱积极的态度。这说明，一旦你一无所知，便很容易随波逐流，很容易像圣让—德吕兹人那样偏听旁言。关于胜利，关键的是德国、俄国和意大利试图在多大程度上保证自己支持的一方获胜，不干涉委员会的认真严肃程度如何——以及结果如何？”

他们第二天离开图卢兹，“在卡尔松略作逗留。这座古镇保存完好的中世纪风貌使比林斯高兴极了。”杰克用调侃的语气写道，“真有意思。驱车350英里，9点左右到达戛纳，并且住进一家十分昂贵的旅店，每晚35法郎，外加15%的服务费——简直是抢劫。比起图卢兹来，戛纳的生活似乎更丰富多彩。我们一直要在这里呆到‘病号’康复为止。与我们以前开车经过的那些十分贫穷的地区相比，这里算得上是一个截然不

肯尼迪传

同的法国。”

“病号”多年以后回忆说，“与两年前在乔特中学时相比，杰克对国际局势更感兴趣，更喜欢思考，并且随时记录下自己的想法。”但对比林斯来说，杰克虽然日趋成熟，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我是想说，”比林斯这样开头说，试图理清自己的思路，“那年夏天，杰克·肯尼迪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本质并没有变，他依旧是无拘无束、青春活力、令姑娘们着迷的百万富翁之子。不过，他又是一个与以前不同的杰克，因为那个曾经深藏不露的才智卓著的杰克终于崭露头角。哈佛的影响终于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

杰克在戛纳的棕榈滩赌场“想与一些美国女孩攀上关系，但未能成功”。他们前往蒙特卡洛，虽然因年龄原因未能进入赌场，但他们“设法溜进了体育俱乐部。尽管他们在赌博中没有输赢，倒也颇受刺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则谈到自己如何在一位妇女旁边下了5法郎的赌注，而她下的是40美元。结果令她十分失望，“因为我赢了1.20美元，而她却输掉了500法郎。”这是一个“最有情调的夜总会”，这位花花公子坦言相告——第二天做完弥撒，在沙滩上看到“一等漂亮的洋妞”之后感到很兴奋。

然而，洋妞们虽然漂亮，却留不住两位旅人的心。“下午费很大力气才过了意大利边境。”这一天是1937年8月1日。杰克·肯尼迪第一次进入意大利，初次领略法西斯主义。

在哈佛，杰克赞同卢梭的观点，即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价自己阅读过的东西。杰克在旅行中正是如此。在后来给父亲的信中，他评述“近95%的美国人对这个的总体局势一无所知，比如，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佛朗哥。但是我认为，虽然

佛朗哥获胜对西班牙会好得多。但是，从道义上说，西班牙政府一开始便是对的，因为它的措施与罗斯福的新政相类似……”在杰克看来，佛朗哥政府与西班牙教会的对抗甚至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对待教会只是对耶稣会势力的一种义务性交待，因为这种势力过于强大——教会机构与国家机构几乎平起平坐。”

在评价别人的观点时，我们应该记住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的反映——杰克告诉他的父亲说：“人们的经济地位几乎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观点，甚至新闻界人士——至少外国新闻界人士都是带有政治偏见的，因为他们是不同政党的工具，所以立场迥异。”

虽然此时杰克刚刚 20 岁，但正如比林斯回忆所说的那样，杰克已经开始显示出比乔特中学甚至哈佛大学的同学们敏锐得多的分析辨别能力。虽然他个人对法西斯主义并不赞同，但是，一进入意大利境内，他还是被那里的气氛给镇住了。“意大利的街道比法国的更热闹，更富活力。意大利民族似乎也更有魅力。法西斯主义似乎对他们很适合。”他写道，同时打算作进一步的了解。在“旅馆账单上出了一点小问题”——这对来意大利旅行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驱车从热那亚到达米兰，住进一家由一位退伍的法西斯军人开的旅馆。这位退伍军人参加过阿比西尼亚战役，他说征服阿比西尼亚并不难，只是那里非常不舒服。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一些与鲍比一般大的、十分聪明的孩子。他们似乎都被编入了集训营。到处是墨索里尼的画像。“如果没有钱他能维持多久？破产之后他们还能打仗吗？”杰克在日记中写道，“答案如果是否定的——我不明白在 1945 年之前发生战争的理由。”

肯尼迪传

比林斯对意大利的印象也还不错。“我不得不承认，跟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和从书上知道的相比，这里要干净，人们生活也要富足……在意大利期间我的看法是墨索里尼给意大利做了不少好事——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政权统治下更富强，老百姓并不是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不过，后来意大利人说他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当时的感想是，墨索里尼为意大利人做了不少好事。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杰克难以判断，法国、意大利，甚至连他未能进入的西班牙，都是他喜欢的国家。这里虽然有舒适的海滩，漂亮的女人，但从政治信仰和语言角度而言，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看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够强行将其社会中互相对立的派别统一起来，从而给各自的国家带来了表面的利益。不过他内心深处并没有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欺骗宣传的影响。正如后来专栏作家乔·艾尔索普所说，年轻的杰克·肯尼迪本质上仍具有某些英国人的特征，尽管他好近女色，热衷玩乐，但同时又喜欢读书，作判断时总能冷静客观。“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多年后艾尔索普回忆道：

我现在仍搞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你知道，他非常势利，但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势利，而是非常传统的、英国贵族式的那种势利。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势利……他喜欢相貌俊俏的人，讨厌懒懒散散的人。在勇气方面也很势利，在经历方面也不例外。他不喜欢平凡、呆板、懒散的生活，他喜欢深入的体验。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在我看来，他不像一个美国人，但他又不是一个外国人。普通的、成功的美国人根本不像他那样看待生活……我这

里谈的实际上是一种作风，一种理性作风，一种信念，是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我长期观察他人的最佳角度，我认为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事实的确如此——在这位 20 岁的美国人身上这种“作风”可谓根深蒂固，他在探讨当前的重大问题时便是如此：敏锐、多思、好问，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跟着美国富翁或党派记者随波逐流，也从来不失幽默感，正是这一点令他能坦然地看待生活——他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甚至对卢尔德和天主教以及意大利的种种奇异景观，他都抱一种善意的嘲讽态度。他在 1937 年 8 月 3 日的日记中记载道，米兰的大教堂确实很漂亮。“一位满身佩戴着由著名金匠赛里尼制作的珠宝红衣主教安睡在那里。每隔 100 年，人们就将他的尸骨抬出来满城巡游一次，最后一次是 1910 年。玻璃棺材有的地方已经破损，他的头盖骨已经发黑。观摩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禁止拍照的墓地里比林斯给我偷拍了一张照片，可惜弄错了光圈。而在大教堂我给他拍照时忘了过卷，以至我们的收藏里便多了两张‘好’照片。”他们驱车前往皮亚琴察，杰克在这里读完了巩特尔的书。“得出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政治适合于意大利和德国，共产主义制度适合于俄国，而民主制度则适合于美国和英国。”

不过杰克没有提到法国适合什么样的政体。“巩特尔的书虽然富有吸引力，但他似乎更偏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对法西斯主义极端仇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比坏在哪里呢？”他自问道。这个问题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因为第二天他们“离开饭店时遇到了较大的麻烦。”原因是“他们硬说比林

肯尼迪传

斯把浴巾扯成了两半，一半扔在写字台上，另一半扔在卫生间里。”此事招来“许多围观者”和意大利语的一片谩骂，好在后来他们总算体面地离开了，而且在去比萨的路上搭载了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小伙子。更有趣的是，他极其反对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杰克写道，这位青年的观点让杰克对自己刚刚形成的欧洲政治划分概念怀疑起来。“他告诉我们他们所受的种种遭遇……告诉我们德国人是多么憎恨俄国人。看来下一场战争很可能会在那里发生，尤其是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疏远俄国的情况下。中途参观比萨塔和回声像风琴似的洗礼堂，然后继续赶路前往罗马。车行 150 公里后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后来他们又搭载了一名德国“旅行者”克劳斯，杰克和比林斯住旅店的时候，他就住在车上。“他们竟能如此凑合，实在让人怀疑，”杰克写道，“昨天晚上马丁只吃了几个西红柿和一个面包，仅花了一个半里拉。决定去游泳。把车子从沙里推出来，然后花去 2 个多小时给轮胎打气，弄得我们精疲力竭，5 点半左右才到达罗马……收到父亲的电报知道妈妈和乔带着姬克正在来欧洲的路上。我们找了一家旅馆。马丁和克劳斯与我们分开了。当晚溜进圆形剧场，发现里面人山人海。月光很迷人。”

这是 8 月 5 日，他们就像遍游欧洲的启蒙之子一样，终于到达“不朽之城”罗马。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我发现，要让杰克对罗马的诸多古迹，如维罗尼卡面罩以及圣彼得人头落地的台阶等坚信不疑不是件容易的事。”比

林斯后来回忆说，“我认为要他完全相信这些事迹很困难。他告诉我，一名经得起考验的天主教徒并不非得信这些东西不可。我与杰克交往这么长时间，从没见他多谈宗教问题。我认为他不是他母亲和妹妹那样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确实是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他星期天从来都会去教堂……我一生中不记得他哪个晚上没有跪在地上祈祷过。只要必要，他会自觉去忏悔。只不过不像自己的妹妹那样完全被宗教信仰所束缚。”

应该说杰克是幸运的。他的妹妹就不能像他一样不受母亲禁欲性的过分虔诚的管束，无法摆脱母亲的“过度挑剔”、她的假正经、禁欲主义、她与父亲之间冷漠而又敌对关系的梦魇般的影响。杰克则不然。他与父亲一样，对这种冷漠而又违反宗教自由法则的做法不屑一顾，但他的妹妹们却被母亲弄得终日紧张兮兮，不知所措——其中的一位竟然在与丈夫行房前在胸前划十字，令丈夫莫名奇妙。

杰克也祈祷，但他绝对不会在性交前后在胸前划十字。他的信仰或许是耶稣，但他在人世间的救世主却是他自己令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感、充满怪异好奇心和年轻人的聪明智慧。“每一处重要的博物馆我们都去了。”比林斯回忆说，“虽然我们都还没学过绘画或雕塑……我们走遍了梵蒂冈。虽然我们对当时看到的并不太懂，但是我记得我们谁也没有厌倦的感觉。杰克自然也和我一样兴致勃勃。这完全是我们旅行的真实记录。白天我们一直是到处观光，到欧洲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去看古迹和名胜。”

这次旅行对杰克来说不单是观光。“我们被介绍给了所有梵蒂冈的人。”比林斯回忆说，“因为帕切利红衣主教与肯尼迪夫妇是朋友……甚至连天主教会的最高修士加莱亚齐公爵也是

肯尼迪传

肯尼迪先生的好友，所以我们在梵蒂冈来去自由，受到很好的接待。”

不过，事情并不像比林斯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后来杰克发现在意大利并没有简单的事情。“9点钟起床，”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可是等我花去35分钟‘擦好鞋’后去找加莱亚齐先生时，已是11点，他早就不在那儿了。又去找《纽约时报》记者科特西，也不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菲利浦先生也不见踪影。好在在大使馆我们见到了公使里德先生，他很有气质。下午参观了哈德良的圣安吉洛皇陵、万神庙、大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我发现意大利民族是世界上最喜欢凑热闹的民族。他们似乎对什么事都感兴趣，甚至连比林斯擤鼻涕都不放过。后来加莱亚齐先生来了电话，含糊其词地说要领我们去拜见什么人。”

“拜见”的是教皇。

“一早去拜见加莱亚齐先生”，杰克在193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得知将去拜见教皇……坐上加莱亚齐先生的车出发，到达教皇的夏宫。先单独拜见了帕切利红衣主教，他问了一些我爸爸妈妈的近况。他的确很不一般，只是英语特差。接着，来到一间彩绘大屋子里，那里有近千人等着拜见教皇。”教皇坐着轿子进来了。“他看起来身体似乎很虚弱，却作了长篇演说。然后吃饭，午饭后前往蒂沃利看喷泉。那些喷泉确实很壮观，最有特色的是其中一眼音乐喷泉。接着返回罗马，和加莱亚齐先生共进晚餐。他高谈阔论，讲到法西斯主义的诸多优点，似乎有点道理，特别是合作体制，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有趣的联盟。”

和杰克的父亲一样，加莱亚齐和帕切利后来都因支持法西

斯主义而臭名昭著。杰克对法西斯主义也颇感兴趣。说实在话，这次欧洲之行远比他想象的有趣。在圣彼得教堂做完弥撒之后，杰克和同伴开车前往那不勒斯。到了那儿他们“才知道，要看庞培古城，惟一的办法是悄悄溜进去。后来我们真的溜了进去。前往维苏威火山，路上还搭载了几名德国士兵。”

“尽管他们不会几句英语，但我们对他们有了较深的了解。”后来比林斯回忆几位搭车者时说，“他们和我们一起差不多呆了一个星期，我们认为，他们基本上是支持希特勒的。”此时读完了《欧洲内幕》的杰克颇感迷茫。“当时他对欧洲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比林斯回忆说，“在法国时，他总是不停地与法国人交谈，打探他们对德国的看法，问他们是否认为会发生战争，如果会，德国会不会再次入侵法国。”在意大利旅行，他又拿类似的问题来问这些德国士兵。

在一名意大利导游的带领下，他们把车开到了维苏威火山口。“我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到达山顶。”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是晚上，每隔几分钟维苏威火山便会有一次小小的喷涌，十分壮观。拍了几张照片后与导游一起下山。后来才知道，他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我们把门票弄丢了，只好走下山，不过还是很开心的。当时已是深夜，只想找个房间睡觉。一再周旋之后一位长相丑陋的女招待总算给我们弄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人很累，但很高兴。”

两位年轻人屡次被敲竹杠，便越来越觉得加莱亚齐先生对法西斯主义的赞扬是不现实的。在卡普里，他们“去了蓝洞，水是蓝色的，洞在水下，煞是好看——不过，我们好不容易凑齐 50 里拉才得以一睹这一奇观。如此不菲的价格使这种漂亮逊色不少。”回到罗马之后，杰克拜访了《纽约时报》驻罗马

肯尼迪传

记者科特西先生。“他十分幽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杰克在日记中写道：

在他看来不干涉委员会是一个安全阀，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哪个国家都不想从西班牙撤军，共产党国家尤其如此。志愿军来自世界各地。意大利好像也不大愿意撤军。他还谈到，在西班牙，德国士兵少得可怜。但他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果真有人希望打一场战争的话，那他必须找出理由来。他还介绍了墨索里尼的《战争声明》——那不过是《英国和平与军备重整宣言》的意大利版罢了。他称，法西斯主义对工人并非没有半点好处——事实上他们从中得到很多好处——他很赞成希特勒的合作体制。他说战争的最大危险在于有人迫使意大利和德国发动战争，尤其是德国。因为意大利还得先消化掉埃塞俄比亚，而德国却无任何后顾之忧。他还说，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和 1914 年的情形相比，欧洲现在的战争准备要充分得多。

这些观点需要杰克进一步理解。在这篇日记的背面，杰克提出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一连串问题。“法西斯主义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富分配体制吗？意大利和德国的联盟能否长久？它们是否有太多的利益冲突？最关键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如科特西所言，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像帕切利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独裁式天主教的翻版？抑或如巩特尔所言，或许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秩序最后的阵痛，而法西斯主义便是共产主义的前奏？

真是这样吗？”杰克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问题都发人深省，尤其是在他们参加完“墨索里尼在罗马搞的一次狂热的集会”之后，后来比林斯回忆说，“我清楚的记得。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你不知道，他讲话的时候下巴高高翘起，滔滔不绝。”

杰克虽然对此印象深刻，但在日记中没有记下此事，倒是记了与意大利妞们寻欢作乐的情形。“当晚有几次幽会，都很不错。意大利姑娘很漂亮。虽然我不会讲意大利语，开始交流起来有一点障碍。比林斯有几招意大利式社交手腕，值得借鉴。我们去睡觉时感到很疲劳，不过很快乐。”

不过，凡事都得付出代价。第二天上午，他们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兴致大减，参观了大约一小时后去吃午餐。“碰上了昨天晚上比林斯玩的那位女孩，她向我们要车费。纠缠了好一会儿，勒姆都有点烦了。”

为钱争论是杰克一生都厌恶的事，这使他对意大利人产生了厌恶感。他并不知道，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讨价还价跟阿拉伯商人在市场上讨价还价没什么两样，既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方式，又是一种乐趣。因而杰克对此颇感不悦。等他们参观完几座著名的大教堂，看过所谓的“基督走过的台阶”，走了一趟“地下墓穴”，又听了不少“圣卢克和圣彼得的头”之类的轶闻趣事之后，杰克对意大利人的杜撰已经很反感。第二天早晨，即8月12日，他和比林斯离开了罗马。“临走前，他们与长着一双斗鸡眼、表面看去像‘意大利绅士’、而实际上坑骗顾客的店主大吵了一通。”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在已见惯不惊的行李员的骂声中离开罗马，很晚才到达佛罗伦萨，住进了这次旅行中条件最好的旅店。”

肯尼迪传

尽管杰克对“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印象深刻”，但佛罗伦萨令杰克很“失望”。那天下午，他们开车越过多洛米蒂山，前往威尼斯。到达后，杰克老是抱怨自己被财迷的意大利人随意敲竹杠：“又是这样。我们一间房要付 25 里拉，而德国人只付 8 里拉。”只是，他们离开法国的勒阿弗尔港踏上欧洲大陆已有五周，一路上颠簸，现在需要在威尼斯好好休整一下。在埃克塞尔西奥海滩，他们“看到了巴巴拉·哈顿和阿尔·莱纳，尽管他们不在一起。后来又巧遇埃丽·哈吉特和乔。当晚还与他们一起吃饭。圣马科的比萨饼好吃得令人不敢相信。“意大利通心粉让人吃了胀肚子”，他抱怨说。而且他发现“哈吉特住得比我们便宜得多。又被蚊子折腾了一整夜，我们的蚊帐好像故意开门接客似的。”

不过抱怨归抱怨，在威尼斯杰克与熟识的美国朋友在一起还是非常高兴。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他们到莱纳的海滨小屋冲凉，然后走街串巷，逛美国酒吧，“比林斯终于有机会和鸽子一起照相了。”晚饭后“到广场听音乐会”，“坐平底小船游玩。要不是比林斯一些不成功的花样搞砸了，这次游玩还是蛮罗曼蒂克的。”

日后我们会发现比林斯的悲剧。他终生依恋杰克，杰克遇刺身亡后他也彻底崩溃。但我们也看得出，这种友谊并非短暂的或转瞬即逝，尽管他们之间除了都是家中的老二，都勉强从乔特中学毕业并一起在普林斯顿度过并不快乐的几个月的时光之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杰克确实需要比林斯，需要这位“同甘共苦”的忠实伙伴，需要这位有口臭、视力差、运气坏、让女人看不上眼、命定寒酸的朋友。因为他既能被杰克取笑，又能忠心耿耿、不愠不怒。当上总统之后，杰克让比林

斯任意挑选职位，包括和平队队长、旅游局局长等等。但比林斯都一一谢绝了。他知道，一旦选择，他与杰克之间奇妙而又长久的友谊便不复存在了。

可惜天公不作美，坐平底船出游的计划没过几天便不得不取消。这时杰克又耐不住了，他已经看够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接下来他想去德国看看。8月16日，他和比林斯带着一位女伴以及那几位搭载的德国士兵一起向北进发了。杰克在日记中写道：“搭载了好几个有趣的人，一起出发。车很难开。到达布伦纳山口时，气温骤然下降。奥地利人与意大利人几乎完全不同，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在因斯布鲁克青年旅馆过夜，同车的那位女士十分尴尬——40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洗澡只是一种奢望。”

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虽然并不情愿。那位女士埋怨睡得很不好”，杰克这么写道，女人的心思总是捉摸不透，“后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德国挺进，此前从约翰那里弄了点儿钱，他心情不佳。在举办过奥运会的加米施逗留了一下，然后前往上阿默高，见到了克里斯托——安东·朗。8点左右到达慕尼黑，去了那里的啤酒屋，很有趣。”

希特勒便是在这里第一次鼓动暴动。暴动终以失败告终。这里则成了纳粹分子喝酒聚会的娱乐场所。“杰克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希特勒发动的运动上。”比林斯回忆说。杰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最初的感觉：“希特勒在这里很受欢迎，就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很受欢迎一样，他的宣传非常厉害。”

“在慕尼黑啤酒屋我们结识了一名黑衫军人”，比林斯回忆说，“啤酒屋的楼层是按钱的多少设置的，穷人在最底层，其次是第二层……直到最顶层。在顶层我们见到了一些黑衫军

肯尼迪传

人。我记得其中一位操一口牛津英语，他说自己在英国受的教育。我们和他一起喝酒，很投缘。我记得我们离开时像所有旅游者一样想把大酒杯带走。我们的德国朋友给我们壮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从哪个门出去。他的指点开始还管用，但是，当我们走到他指的最后一个门口时，招待员显然早就有所准备，走过来立刻把酒杯拿走了。我们无意间一看，发现那个德国人正冲我们笑。”

杰克很生气。原本他就对意大利人嘴上高喊法西斯的漂亮口号，做的却是“劫掠”勾当很反感。到慕尼黑的第一个晚上就让一个黑衫纳粹耍了一通，“给我们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比林斯回忆说，“在德国我们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我们在意大利时并非如此。我们对德国及其行纳粹礼的那一套非常反感……他们非常傲慢——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高贵，而且毫不掩饰。或许这是自卑情结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小乔曾一度受到纳粹运动的迷惑，赞成将犹太人当做“替罪羊”的作法，并且称赞纳粹举手礼。杰克则不同。到慕尼黑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心情很不好。与店主交谈，发现他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信徒。显然，这些独裁者在国内比在国外更受欢迎，因为他们的宣传很有煽情效应。”他感慨万分地说。

不过，这两位来自常青藤大学的学生既然敢来欧洲观光，自然不会轻而易举的被纳粹的傲慢吓倒。“下午参观德意志博物馆，非常有趣。”杰克写道，“它详细地介绍了采矿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展示了航空业的发展状况。相当有水平，体现了德国人的严谨细致。”他深有感触地说，“第二次看《荡上荡下》比第一次看时更有感觉。可能是因为最近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画

作的缘故。”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车上他们发现了阿历克斯·波德利斯和另一位哈佛校友乔·加雷蒂。晚上便与他们一起度过，之后去了“慕尼黑一家夜总会，这里与别处不大相同”。

显然，希特勒虽在德国很受欢迎，但美国人不喜欢他，尤其是像杰克和比林斯这样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天生就反对各种清规戒律，不喜欢循规蹈矩。在男士房间里招待女士，被当地人咒骂为“伤风败俗”。“我们不久离开布里斯托尔公寓。”杰克在日记中记录着。在美国运通公司办事处同波德利斯道别之后，他们出发前往纽伦堡。“中途花8美元买了一只很漂亮的达克斯猎狗当礼物送给奥利夫·考莉。”杰克写道。由于这只狗与美国驻巴黎大使秘书奥菲长得有点儿像，他们便给它起名奥菲。“奥菲染上了枯草热，所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它能坚持到美国的可能性为8:1。”杰克很伤心地写道。希特勒三天后将在纽伦堡的年度集会上发表演说。不过，据比林斯后来回忆说，他们所见到的德国人的那种派头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们在那里的经历糟透了。”他们太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了。当时德国人正经历一个非常时期。杰克在日记中写得简洁生动，“离开纽伦堡时情形像平常一样，但这一次又增添了新内容，我们作好了被唾骂的心理准备。”

把纽伦堡留给狂热崇拜希特勒的人们，他们途经法兰克福和莱茵河到达英国。因杰克途中患哮喘病，只得在符腾堡暂住停留。“杰克第一次发现自己对狗过敏。”比林斯解释说，“是达克斯猎狗弄得他患了哮喘病。他本来就没断过病，这回又添了新麻烦。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和狗一起呆在同一间屋子里。”

但杰克对他的新宠物很舍不得。这位不轻易表露感情的年

肯尼迪传

轻人，突然对奥菲如此不舍，令人为之动容。不久，在杰克的日记中奥菲占有很高的地位。“奥菲是一个大麻烦。”他8月20日承认，“因此它得离开——非走不可了。”

奥菲无论如何是留不住了。尽管杰克一再拖迟，甚至还想在离开他之前给它找一位伴侣。“我们途经法兰克福前往科隆，”杰克写道，“在法兰克福我们停留下来，想再找一只达克斯猎狗给奥菲做伴，奥菲实在是太漂亮了。只可惜，运气不佳，只好沿莱茵河继续前进。沿途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城堡和非常迷人的城镇。这表明北欧民族确实优于拉丁民族。德国人太优秀了——以至其他民族不得不联合在一起以求自保。”

25年后，“德国问题”成了他出任美国总统后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的焦点，当然这一点是此时的杰克无法预料到的，甚至连他身边的这位桑乔·潘沙式的同伴也未能预料到他会有如此辉煌的政治前途。尽管他发现杰克一直是在迅速成熟。“杰克·肯尼迪每年都会进步，”比林斯后来深情地回忆说，“这次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如果你1937年和他一起去欧洲，1939年和他再一起去时，便会感到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1937年他对一切都想问个究竟，对事事都感兴趣。比如说，他坚持让想搭车的德国人上车。这一招特别管用，因为那些人大都是大学生，会讲英语。这样，我们便能了解到德国的很多方面。”

对女性杰克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科隆，那些“快乐的伴车小姐”向两位嬉闹不止的美国人道别。“这一天是最糟糕的——我居然与那位小姐很友好的道别。”杰克出人意料地写道，“这样的事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些女性似乎更诚实，更特别。”

值得高兴的是，那位女朋友告别时没有责备，没有眼泪。

杰克到科隆大教堂——“哥特式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教堂”——做了一次弥撒，“然后朝乌德勒支进发。车在当时全世界最好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德国修这种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德国的车辆太少，要是修在美国就好了，不限制时速。沿途看看有没有别的狗。越过边境进入荷兰。这里人人都长得极像他们的女王朱丽·安娜和她的丈夫伯恩哈德……溜进多伦，看了皇帝的寝宫，周围全都是铁丝网。”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参观了伦勃朗的名画《夜巡》。杰克一心要给奥菲找个伴侣，“做了一下检查，看这只猎狗是不是真的把枯草热传给了我，结果表明是真的。”

第二天，可怜的奥菲被杰克以 5 荷兰盾的价钱卖掉了。它的命运像兔子彼得的父亲一样，在纳粹统治的漫长的梦魇般的岁月里，成了别人的口腹之物。杰克从安特卫普给在巴黎的妈妈打了一个由接电话的一方付费的电话，“还是花了我 60 法郎。我当初真该把法语学得好点儿。”在日记中他写道。然而，旅行终于接近尾声，他们马上要去英国。这令他十分高兴。在欣赏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艺术珍品之后，他发现海牙十分“枯乏”，奥斯坦德海滩也太冷——既不能晒日光浴，又不能游泳。于是他们没呆多久就驱车前往法国加来，赶到码头时“发现去英国的轮渡已起航了，好在还有 5 分钟可以赶邮轮。可是比林斯因为护照问题出了点麻烦，晚了 10 秒钟没能赶上邮轮，尽管跑得气喘吁吁，仍是白费。”

看来，杰克就像猎狗奥菲一样，一旦要走，便会不顾一切而去。杰克跳上了邮轮，把比林斯留在了布伦港码头，“因为我想在乔和姬克离开伦敦之前赶到那里，见他们一面。比林斯和车子在一起应该没多大的问题。我和一位叫奈罗的先生一起

肯尼迪传

去了伦敦，他认识外公。到那后，我赶紧去看姬克。还见到了乔、苏蒂、弗雷迪·科斯格罗夫，弗雷迪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

对杰克而言，伦敦就像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家。第二天，他没有和小乔一起去拜访哈罗德·拉斯，而是和凯思琳一同上街购物。比林斯开着车子到了伦敦，他们一起去看弗雷迪·科斯格罗夫推荐的一处僻静的住处，地点在托尔伯特广场 17 号，杰克觉得很不错，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行李员、看门人和店主们的嘴脸。此行他住过饭店、大客店、旅馆、青年公寓和救世军住宿处共 26 家，在关于描述这些住处的日记中，他至少有 10 处指出“那里的人一点儿绅士风度也没有！”而住在托尔伯特广场，他觉得这下好了，再也不会有人对自己的私生活指指点点了。

可是，事与愿违。第二天，即 8 月 27 日，他陪小乔和凯思琳乘火车去南汉普顿，在那里见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告诉他们：“放开了多吃些蕃茄酱和巧克力。”他对母亲从巴黎购买的衣物礼貌性地说了些恭维话。“回到伦敦之后，才发现自己得了荨麻疹这种病，”他在日记中写道，“等回到住处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这样算来他身体的健康状况仅仅维持了一年。

浴室极其缺乏

“我们当时很着急，因为我们在那里举目无亲，又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什么样的医生。”30 年后比林斯回忆说。杰克的家人那时都已回美国，“而杰克却突然病得这么重”。

肯尼迪传

“1937年8月28日，星期六，病情不见好转。”杰克在日记中潦草地写道，“晚上病情加重，很难受。比林斯找来了一位自称‘棒极了’的医生，他问我是不是把巧克力和蕃茄酱混在一起吃下去才成了这样的，我竭力解释终于让他相信不是这样。这位医生没办法了，我们只好又另找一位医生。”

“有人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医生，不过也不怎么样。”比林斯记得：

我们遇到过很多麻烦。我是一边照顾他一边长大的，因为杰克一生没有几天健康的日子，不是这儿病就是那么病。他一直不让我们说他身体不好，可是现在杰克不在了，我说出来也没关系了。我很少听到他抱怨，我知道他经常得病。我们常开玩笑说，如果我给他写传记，我就把书名定为《杰克·肯尼迪的医疗史》，他几乎得过各种各样的病。无论你随便说出哪一种病，杰克都得过。有些病非常痛苦，比如他的胃总有毛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但我想会有医疗记录。胃病伴随他一生，就好像是一个去不掉的根，给他带来长期的痛苦。

比林斯回忆说，杰克在伦敦时病得非常重，“他全身突然生出许多疹子，脸也肿得老高，我们举目无亲，为找医生忙得焦头烂额。”

杰克在日记中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想，以及朋友比林斯的嘲笑，而现在只剩了很少的一部分。“荨麻疹一直不见好转”是8月29日星期天的内容。这个星期日是这次出行以来他第一次没有去做礼拜。我们请来的第三位医生是一位专

肯尼迪传

家，他的检查结果是血球计数为 4000。”第二天来了第四位医生。这时，危险期过去了，杰克脸上的肿也开始消了。乔特中学的“无赖”朋友爱德华·布兰德正好顺路来看他们，他们的到来给这间位于海德公园旁边的小屋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比林斯回忆说，因为在这天吉米·法尔和乔·路易斯将进行一场重量级拳击冠军赛，“当时大家很兴奋，我们不顾大家的决定，坚决站在路易斯一边。”布兰德也来了——我们一起收看乔·路易斯和吉米·法尔比赛的实况转播。从这位威尔士人那里趁机赢了 6 先令。杰克写道：“我见到了布兰德的女朋友，她很开朗。”

拳击赛、朋友和与姑娘们交流的愿望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忘记了病痛。等到肿痛全消之后，他像是只得了一场腹泻，早就把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8 月 30 日，荨麻疹几乎痊愈。“感觉很好，所以下午很晚才起。然后出去买了点东西，晚上回来看电影。”杰克刚刚能起来活动就不愿躺在床上了，急着要多看看英国的风景。他给父亲的朋友保罗·莱瑟姆爵士打了个电话，爵士邀请两位年轻人去他在萨塞克斯郡的赫斯特蒙苏特堡作客。“城堡大得惊人，里面装饰华丽，”杰克写道，“一间卧室长达 120 英尺。我们晚餐吃松鸡，直到凌晨 3 点才睡觉。”

这是杰克第一次真正见到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且他不久就像他妹妹凯思琳一样对此非常向往。詹姆斯·考尔德爵士邀请他们去他在苏格兰的庄园作客，还订好了 9 月 2 日回程的卧铺票，“但是，在赫斯特蒙苏的日子令人十分怀念，”杰克写道，“那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

詹姆斯·考尔德也是杰克父亲的朋友，在三年前禁酒令解

除前的最后一个月正是他让杰克的父亲拥有了黑格牌威士忌在美国的独家代理权。比林斯回忆说：“他拥有黑格酿酒厂，所以家中非常富有。在金罗丝郡他有一所巨宅，只有英格兰的富人才有这种大宅，我认为这是杰克首次体验英国上流社会生活。”

他们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熬过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夜晚。刚一到达庄园，詹姆斯爵士便请他们去钓鱼。此刻杰克已恢复了他常有的幽默感，钓鱼这项运动正是他发挥这种幽默感的好机会。“钓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把钓钩扔那么远。”杰克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几人中，詹姆斯爵士钓得最多。”午饭后我们去打兔子，结果是“空手而归。那天的晚餐很丰盛。”杰克补充道，“不存在像在赫斯特蒙苏熬夜那样的问题”，因为“这里的就寝时间一律是 10 点，10 点以后到处走动会惹爵士不高兴，因为爵士在用电方面很节约。”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詹姆斯爵士是一位苏格兰人，从来不许别人随便浪费。“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是，”比林斯回忆说，“在这幢大房子里只有一间浴室。这使得我们在这位苏格兰主人的家里过得很不痛快，浴室离我们的房间很远，找到它很不容易。詹姆斯爵士保留着苏格兰人的习惯，一到晚上 10 点便关上供电总闸。在这之前很难有时间洗澡。杰克和我在那段时间里只洗过一次澡。”

不过，在白天，詹姆斯爵士倒是一位很优秀的主人。不久，他就让孩子们去打松鸡。“他大约有 1000 公顷林地。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比林斯回忆说，“打松鸡的季节已经快要过去了。詹姆斯爵士和他的护林人一起去打猎。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和杰克都没有打过猎，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摸过猎枪。我

肯尼迪传

想，护林人也是第一次遇上我们这样什么都不会的猎手。杰克肯定地说他会比我打到更多的猎物。我们一整天都在湿漉漉的林地里寻找猎物。我因为戴眼镜，打起猎来特别困难，什么都看不清。”比林斯承认说，“杰克打了两只松鸡，而我什么也没打到，不过总算在最后打到了一只。”无论是对那些松鸡还是对这两位美国客人，冒雨打猎，又猎到很少，是一种不幸。

“我们想把松鸡带回美国。”比林斯记得当时的情形，“尽管我们还要在英国呆一周，我们请护林人把松鸡放到厨房的冰箱里。但是我敢肯定我们离开时他们给的是比我们打的老得多的松鸡。我们把这些松鸡带到伦敦，并且在伦敦又呆了一周，我们用冰把松鸡保存起来。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我们把它们放到冰箱里，它们与我们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真想马上回家品尝它们。”比林斯回忆道：

在回家的船上，世界职业摔跤冠军恰好与我们同行，他曾经打败过南非的兰多斯。这家伙到处找人比试，他和船上的一位厨师摔了一通，却还意犹未尽。我曾经参加过乔特中学摔跤队，在普林斯顿大学新生摔跤队也训练过。我当时体重大约 175 磅，身材并不差。杰克和这家伙混熟了，竟然背着我，在那个家伙面前把我的摔跤经历神吹一通，并且安排好时间，让我跟他比试摔跤。第二天我不得不去了健身房，除了和他摔一场别无选择。此后，我每天都跟他摔，谢天谢地，坐船的时间不长。其实我连推都推不动他。我是说，当我们各自在垫子上摆好姿势以后，我想推他却一点儿也推不动，只能由他摆布。这哪里是摔跤，那家伙体重足有 280 磅，可气的是杰克在一旁却偷着

乐。

在船上时杰克看我被摔幸灾乐祸，可一下船，他就乐不起来了。船在纽约靠岸时，凯思琳来接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松鸡交给她，叫她拿好，我们要过海关。我记得松鸡当时已经有点变质。过一会儿我们见到了凯思琳，却发现她没拿着松鸡。”令这两位苏格兰火枪手非常意外的是，“她说松鸡的臭味实在让她受不了，于是就给扔到海里去了。”杰克和我大发雷霆。

不管怎样，他们确实在英国度过了一个愉快地有意义的夏天。这是杰克·肯尼迪最后一次毫无牵挂地出国旅行，除了必须要去拜见帕切利红衣主教和他父亲在英国的合作伙伴之外，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生活花销由比林斯预算，尽量节约。三百年前培根爵士写道：“旅行，在年轻时，是学习的一部分，在年老时，是阅历的一部分。”这话确实有道理。

1937年9月返回哈佛上学之后，杰克选了《欧洲艺术史》课程。这时他对欧洲已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他的幽默感可能是爱尔兰风格的，但他骨子里的沉着冷静却和他妹妹凯思琳一样，与盎格鲁——萨克逊社会的风格相一致。杰克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这就是，英国是欧洲的一只政治之锚，是自满的法国人、傲慢的德国人、爱闹事的意大利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人之间的和平保卫者。“如果英国能够强大起来，战争的可能性不就减少了吗？”他在日记中问自己，他认为英国在军备整顿方面步伐迟缓，“像意大利这样多事的国家，经济一旦恶化会挑起战争吗？如果发生了战争，墨索里尼会下台吗？——因为意大利在一场世界大战中

肯尼迪传

可能要败下阵来。”

他带着这些问题到他的新任教授们那里去寻找答案。这位一年级时贪玩的学生进入大学二年级后逐渐成为一名勤奋的学生。

第五章 肯尼迪大使的儿子

大学里的社交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哈佛大学经过整顿重组之后效仿英国大学的制度，所有住校的二年级学生全被分配到含有宿舍辅导教师、公共休息室、图书馆和就餐场所的宿舍里住。

杰克在 1937 年夏去欧洲不久，就已经被哥哥所在的称为“温思罗普宿舍”的男舍监接纳为学员。温思罗普包括两幢相邻的大楼，从查尔斯河岸上鸟瞰着波士顿。

曾经和杰克同时在德克斯特和诺布尔—格里诺学习的同学霍尔顿·伍德回忆说：“与其他宿舍相比，温思罗普宿舍管理算是不太严格的。”

宿舍里的男舍监费里博士相当内向，是个妻管严，但他是个博学多才的化学教授。他和蔼可亲、不善言辞，有一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儿，是那种能吸引住我们眼睛的姑娘。我们觉得温思罗普更像个宽敞的大楼，里面的学生很多都是运动员，这些人组成各种优秀的运动队，参加校内活动。在街的对面是“洛厄尔”宿舍大楼。那时候，人们把它看做一个更有希望的宿舍大楼，住在那儿的一般

肯尼迪传

都是些爱学习的人。我想，这幢宿舍大楼很难归类，而且“柯克兰”宿舍大楼也是如此，“亚当斯”宿舍大楼更像“埃利奥特”宿舍大楼。与以上宿舍不同的是，“邓斯特”宿舍大楼似乎坐落在查尔斯河下游更远一点的地方。虽然它条件很好，但大家并不喜欢这个宿舍，因为它与教学大楼相距太远，来来回回很不方便。

如果不是因为杰克和他的哥哥关系不好，他就不会向温斯洛普宿舍提出申请。不过，提出申请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小乔住在那里，还因为他在一年级时已经认识了一批朋友，特别是托伯特·麦克唐纳、比尔·科尔曼和吉米·鲁斯马尼埃三人。

杰克虽然在普林斯顿时没有随便结交朋友，但他在哈佛却一直都在交朋友。托伯特·麦克唐纳的父亲担任橄榄球教练的职务，麦克唐纳后来成了学校里的橄榄球明星，科尔曼是个曲棍球运动员，鲁斯马尼埃则是个壁球运动员。鲁斯马尼埃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向温斯洛普宿舍大楼提出了申请，但那里没有四人居住的房间，所以，我们最后分成两对，成了邻居。”

他们参加的各种体育运动正好表明了各自不同的家庭出身和宗教信仰，肯尼迪和麦克唐纳是天主教徒，科尔曼和鲁斯马尼埃则是忠诚的美国新圣公会教徒。科尔曼的父亲实际上是巴尔的摩法院里的一名共和党法官，不过这几人当中科尔曼自己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强烈的人。“他是个非常重视现实的人。”鲁斯马尼埃回忆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想他现在也许已经成了……我不敢保证是红十字会会长，但我想他可能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像红十字会那样的某种慈善事业之中，并在工作中担任管理职务——他喜欢那种工作，因为他具有很强的社会

责任感。”

鲁斯马尼埃的父亲也是共和党人，他是移居纽约的一名波士顿律师，他曾于 1910 年在马萨诸塞州议会中担任职务，当时正是约翰·菲茨杰拉德出任州长。“我的父亲是一名意志非常坚定的共和党员，”鲁斯马尼埃说，“在哈佛念书时，有一次我不得不坐火车回纽约，但订不到火车票。于是约翰·菲茨杰拉德主动提出和我一起上火车站请求，并且帮助我订到了车票。也许是因为我不常跟父亲提起我与肯尼迪家孩子有着很好的关系，当我回家说‘好心的菲茨给我订了一张火车票’时，性格温顺的父亲竟大发脾气。他对菲茨怀有极大的成见，因为菲茨曾在 1909 年被起诉过，而他击败那次起诉的惟一原因是他的辩护‘我不记得了’——这正是罗纳德·里根 1987 年在法庭上所采取的辩护名言！”

杰克招人喜爱，那并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风趣。“这是杰克最突出的一个优点。”鲁斯马尼埃后来强调说，“任何时候只要和杰克·肯尼迪呆在一起，你都会感到愉快，他每时每刻都会激起其他人的笑声。”勒姆·比林斯对此也赞同道，“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杰克是最风趣的，我想认识他的大多数都有同感。”

然而，甚至比林斯也承认，实际上杰克根本不是那种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动感情的人，却能结交如此多的新朋友，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比林斯在与杰克·肯尼迪相处的三十二年中，从未见过他哭过。“他从未动过一点感情或出现任何由感情引起的情况，也从未对什么人表现出十分喜欢的样子。但如果你需要他，他就会极其迅速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来帮助你解决困难。”

肯尼迪传

“他总是尽力地掩藏起自己的感情。”比林斯在另一个场合曾表示，“当然，我认为他绝不是个性情冷淡的人。他具有非常诚挚亲切的性格，我认为他非常关心别人，他对别人的忠诚远远比一般人强烈——进一步地说，我从未见过谁的忠诚能比他更加强烈。我想，一旦他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他是决不会对你不管不顾的，即使当他的忠诚受到严峻考验之时也是如此……我想起过去一直与他为友的两个人，可是后来他们却做出了许多令他尴尬的事情。我想，他至死都很难明白他们伤害他的原因。”

对杰克来说，忠诚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博学多闻和聪明才智。在吉米·鲁斯马尼埃看来，麦克唐纳和比林斯都没有形成成熟的性格，“麦克唐纳在安多弗上完高中之后就没有发展。比林斯有些进步，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二年级之后也停止发展了……他只是个很普通的人。”

比林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说：“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我的朋友当中，我和肯尼迪认识的时间最长……他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使人们想跟他做一辈子朋友。更不可思议的是，”比林斯很奇怪，“杰克的想法和兴趣确实比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发展得快，但他为什么不终止与所有那些朋友的联系呢？”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杰克的朋友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1937年10月，这四个人一搬进温斯洛普宿舍，就出现了加入“终极俱乐部”的问题。虽然杰克的父亲约瑟夫和哥哥小乔都曾先后加入过“玉米粉糊学会”——即作为加入“终极俱乐部”一个必要步骤的哈佛戏剧俱乐部，但他们均未被邀请加入哈佛的任何一个“终极俱乐部”。曾经有段时间，

仿佛杰克将来的命运应该如此，正如他的朋友吉米·鲁斯马尼埃后来所回忆的：

哈佛一共有八个“终极俱乐部”，每一个在同届学生中仅挑选 10 至 15 个人作为会员，因此，在 1000 名同届学生中“终极俱乐部”只能接收 100 名。

十月份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竞选俱乐部成员的时候。在连续三周的时间里，每天晚上他们都必须四处奔走。也许他们邀请了 100 人，最后只有 15 人能够加入某个俱乐部并且被接纳。在我的记忆中，杰克·肯尼迪的名字从未在 15 人的名单上看见过！

已经被 A·D·精英俱乐部接纳为会员的霍尔顿·伍德表示：“我的确从未考虑过让杰克进入俱乐部。”实际上约瑟夫·肯尼迪十年前就已经离开了波士顿，但他在学校里留下了股市投机商的坏名望。“在审批加入申请的时候，没有任何俱乐部愿意接纳杰克·肯尼迪。”

肯尼迪的同龄人唐纳德·瑟伯更直接地发表了以下看法：

杰克·肯尼迪的身份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这个信仰使他与众不同。那时，“所有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在班里占据主导地位，而肯尼迪根本不习惯那种生活。如果你要问杰克·肯尼迪受到过这种令人难堪的种族歧视吗？噢，是的，我认为受过——因为他很显明是个波士顿爱尔兰人。你可以从他讲话的口音中听出，他说话带有明显的波士顿口音。那些老一辈的、很守规矩的波士顿人——他

肯尼迪传

们中大多数都是哈佛大学的 1940 届学生，他们将肯尼迪家族看作行为粗俗、举止夸张的暴发户。在那些人看来，肯尼迪家族的确是波士顿爱尔兰后裔……是被波士顿人称为追逐名利的家族。对于这里的许多上层家庭来说，菲茨杰拉德家族简直是社会难以容纳的，肯尼迪家族也好不到哪去。

杰克在乔特中学的锻炼帮他走出了困境。如果他总是独来独往，就会成为种族、社会和宗教偏见的受害者。但如果他与一批同龄人齐心协力，他还有希望战胜哈佛校友俱乐部的势力，而他的朋友也乐意听从他。他因为担任 1937 年“新生联谊会”委员会主席而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该组织被认为是他创立的一个最成功的组织。”后来吉米·鲁斯马尼埃回忆说：

一千名同届同学全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这是他大学生生活中事业的顶峰，不过这个组织还处在初期罢了……这是一项非常积极、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知名度在当年达到顶峰——而且他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一年级全体学生不论是谁、也不论学什么专业，全都成为这个“新生联谊会”的成员……当时在哈佛还没有什么领导组织，因此，要在一千名学生中获得较高名声，你就得积极从事体育运动、或者参与编辑《讽刺文报》或《猩红报》，或者加入“新生联谊会”，它属于哈佛的一项领导活动。加入“新生联谊会”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杰克首次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所以到这时杰克·肯尼迪已经出了名。

“科尔曼已经开始和我同住寝室，”鲁斯马尼埃回忆说，“我非常喜欢科尔曼。他说过，‘杰克不能进俱乐部是很不幸的，我们想想办法吧’。在我看来，杰克·肯尼迪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完全有资格、或者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成为一名俱乐部成员。”

于是他们签订了一项协议：在三人中，除非三人全被接纳，否则，谁也不接受任何一个终极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起初，他们还计划将“温斯罗普集团”的第四个人托伯特·麦克唐纳也包括。不过，据鲁斯马尼埃回忆，虽然“在许多方面麦克唐纳无疑很优秀”，但他喝酒“多了一点”，而且举止“粗鲁”，甚至连与他同寝室的杰克也承认这些方面。因此鲁斯马尼埃不喜欢将自己与麦克唐纳相联系。

我和科尔曼说：“好吧，我们要争取帮助杰克成为会员，但让托比加入实在有些困难。”虽然我们也很在乎他，但我们却发现说服那些俱乐部会员实在很困难。科尔曼的父亲从始至终加入过俱乐部，我的父亲也同样如此，尽管他们曾经都是哈佛的学生。于是我们可以支持肯尼迪，但不支持麦克唐纳。所以，麦克唐纳的确从未加入过俱乐部……不过，麦克唐纳实际上不需要加入俱乐部。他是一名出色的橄榄球手，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和一名短跑选手。因此，肯尼迪并不替他着急，他说：“如果托比不能加入俱乐部，那是他自己不想加入，但我想加入，想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肯尼迪传

要让杰克加入施佩俱乐部，关键还是要凭借那些毕业生会员或校友会员的帮助。好在施佩俱乐部的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是由杰克哥哥的同届同学拉尔夫·波普担任的。

“小乔曾和我一起在三个不同的委员会里分别担任过委员的职务。从此我认识了他的父亲，也认识了杰克。”波普回忆说：

小乔是个不一般的人。每当需要讲话的时候，他会讲得条条有理。在哈佛，他和我们班里的同学也相处得十分融洽，并在大一和大二时负责管理某些工作。很早他就可以称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他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因为他正是按照政治家的要求被塑造的。他在学校和波士顿周围的地方以及旅行所到的其他地方认识了一批人……在所有和他相处的人当中，我能认同的人惟有里尔登。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寻常之辈罢了，他们对小乔的话百依百顺，没有任何违抗。我不能说在我供职的那些组织中我和他相处得特别好，我认为有时他所讲的一些东西是别人的，而且我认为有一些是不太明智的。

杰克从未让人有过那种感觉：在你讲任何事情之前，他已经想出了要提的问题或要发表的看法，这使大家非常喜欢他。你从不必为思考“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而感到困惑或浪费时间，这一点你是不用担心的……我记得他是在1937年夏加入我们俱乐部的，而且众所周知，是我同科尔曼和鲁斯马尼埃一起尽力让杰克加入进来的，大家都很奇怪，“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肯尼迪？”

在“加入哈佛一个俱乐部这样简单的问题上”存在这种偏见让波普感到羞愧，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接纳肯尼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委员会里需要一个比较明智的人，而我们当时并不能时刻都明智。”

“拉尔夫·波普说到就能够做到。”鲁斯马尼埃也证明说，“拉尔夫·波普对我们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三人一起加入俱乐部，那么我们愿意将你们全都接纳。’”

杰克成功地加入了俱乐部，这样以来，他就成为闯入波士顿的“祖先是忠诚的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中的第一位肯尼迪家族的人。

著名的施佩俱乐部

“加入施佩俱乐部这件事对杰克·肯尼迪真的很重要吗？当然重要！”鲁斯马尼埃再次强调说，“就生理作用方面讲，施佩俱乐部每周有五六天每天都提供三餐膳食，这对他的健康很有帮助。就心理作用方面讲，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使他获得了他哥哥从未得到的一种社会地位。小乔和杰克是要好的朋友，但我认为杰克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是，小乔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他却能做到。施佩俱乐部就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1937年12月2日夜，八名新入选的成员举行入会仪式，被施佩俱乐部吸收为正式会员。入会仪式直到今天依然是个秘密。虽然这些仪式已经不像该俱乐部在19世纪80年代最初成立时那样让人尽情欢乐，但其内容仍包括那些该俱乐部的象征的内容——管风琴音乐、夸口、拥抱新会员，最后大家宣誓永远互相帮助。

肯尼迪传

在坎布里奇的霍尔约克街和奥伯恩山的拐角，矗立着一座宽敞而且布置讲究的具有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大楼，里面有精致的楼梯、镶板墙壁、贺加斯的版画、比利时的挂毯和高高的天花板。这座大楼成了杰克·肯尼迪在哈佛的“家”。从此，他可以在施佩俱乐部享受每一顿早餐和几乎每一顿午餐。随后的三年里，他将在这安静的图书馆里用施佩俱乐部的信纸给朋友和家人写信。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对该俱乐部及其会员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因为这是他作为肯尼迪夫妇——一位受人鄙视、而自己却态度傲慢的波士顿爱尔兰裔百万富翁和一位典型的天主教徒——的次子所取得的首次个人胜利。“对他来说这是赢得社会地位的标志，”鲁斯马尼埃回忆说，“杰克的经历证明肯尼迪家族和其他家族都是一样的。”

并非所有的教员或学生对哈佛的终极俱乐部的态度都那么认真。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后来说：“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生也反对思考和推论、主张感情和行为，但不像普林斯顿的学生那样重视。当时也存在一些交谊俱乐部，但作用不大，除一两个之外，我从不知道其他俱乐部的名字。”

如果上述属实，那么加尔布雷斯不热衷于社交是他成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当然，对于杰克·肯尼迪来说，施佩俱乐部的作用相当巨大：对个人而言，它是一个庇护所，一个没有教员监督、兄弟竞争和父母压力的庇护所，也是一个能单独与朋友交流的场所。“那时候施佩俱乐部拥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会员，”与施佩俱乐部竞争的A·D·俱乐部中一名会员霍尔顿·伍德回忆说，“他们拥有非常友好、非常热情的布莱尔·克拉克和克利夫兰·艾默里还有许多其他非常优秀的人。”

据鲁斯马尼埃回忆，在施佩俱乐部不仅可以增进友谊，也

能促进思想上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哈佛大学宿舍里低年级学生在辅导教师指导下与他们进行的那种交谈，而是作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并具有和老会员及校友相同地位的、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年轻人而进行的那种交谈。正是在这种类似英国的俱乐部里，杰克·肯尼迪登上了他在哈佛的顶峰，实现了独立，而这是教员中的那些主要人物一无所知的，但它对于因为波士顿的爱尔兰裔背景而受到鄙视的杰克本人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轻视他了。

许多教授，如卡尔·弗里德里克教授只能回忆起一张“在班里十分显眼而且聪明年轻的面孔”；而威廉·兰格教授甚至连这张面孔也想不起来，他说，因为“我给他上的课是一门大课，所以学生和教员之间没有什么密切联系”。但对杰克·肯尼迪来说，由于他被施佩俱乐部接纳，于是大学二年级就成为其一生当中最令人留恋的时光。尽管有些教员妄自尊大、自视过高，但杰克喜欢他所学的课程和要求必读的读物。此外，他还为那支被称为“低年级校队”的哈佛第二橄榄球队尽心尽力。“我想你们这些‘普林斯顿人’都不会支持一个失败的队伍，”他得意洋洋地对他的朋友勒姆·比林斯说，“你们一向吹捧的普林斯顿精神在哪里？……这就是你们普林斯顿人的特点。”他嘲笑道。

不过，杰克作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的日子并不多。1937年10月30日，“一个温暖舒适、阳光明媚的秋日”，他来到特伦顿，代表哈佛低年级校队与普林斯顿队进行比赛。由于小乔可能将代表普林斯顿队参加下午的比赛，因此他的父亲从布朗克斯维尔驱车来看这场比赛。

杰克和他的朋友霍尔顿·伍德是低年级校队的替补队员，

肯尼迪传

后来据伍德回忆，他俩并没有被要求参赛。不过在比赛结束时，肯尼迪家的司机从球场对面跑过来和杰克打招呼，并且按照当天上午的比赛习惯给这位没有任何准备的小伙子来了个“夸张的橄榄球擒抱动作”，于是他就被摔倒在地。虽然杰克挣扎着站了起来，但他显然感到极其难堪。尽管随后他在同达特默思的比赛中上场了几分钟，但很明显他的背伤十分严重。11月19日在哈佛低年级校队同耶鲁大学进行的关键的比赛中，教练迪克·哈洛让他上场了几分钟，因而使他在运动衫上永远拥有一个人人渴望获得的哈佛校名首写字母“小H”。但这是因为杰克的勇气而不是表现。杰克一直希望能站到终极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走向终止的却是他的橄榄球生涯，这都是他的家庭司机造成的。

对杰克来说，橄榄球生涯的结束和他的疾病一样令杰克失望。但是，他并不想生活在这一痛苦之中。哈佛的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之间交往很多，他不会把橄榄球生涯的毁灭看得过重。此外，比他加入施佩俱乐部这件事情更令他感到欣喜的是，从家里传来了一条还没有确定的消息。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将会改变整个肯尼迪家族的生活。

危险分子

“1937年12月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一份包含我的建议的报告，”海事委员会主席乔后来告诉他的自传编写人詹姆斯·兰迪斯。当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到了总统的亲笔来信，他想让我担任商务部长的职务。这个机会颇具挑战性，”他承认说，但是——

我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不久，就很难忍受，于是与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发生了冲突。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我在同亨利或其他人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掩饰过这一分歧……

我和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观念上几乎同样存在着分歧……如果我能够将政府对劳工的政策与我认为政府应该对商业采取的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对我来说，很容易会进一步产生更明显的分歧。

罗斯福总统第二天清晨接见我时，我趁机说出了这些顾虑，因为我必然会给他的内阁带来潜在的不利，于是我坦白地告诉总统，我不能接受他的任命，这就是我最后的决定。

此时，他转身看着我，并提出让我担任驻英国大使的职务，他说，宾厄姆大使因病请求辞职。

“总统的提议让我确实大吃一惊，”约瑟夫说，“我从没想到要从事外交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项建议是由总统本人，还是由他的某个管理顾问提出的。我当时要求他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讲述这些事情也许显得没有必要。但正是这些事情表明了我们的私人关系还很好，总统是在非正式场合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最终也接受了驻英国大使的服务。”

遗憾的是，这是约瑟夫·肯尼迪编造的一套谎言。在他的社会生活中，他经常说些违心的话或者不敢面对事实。几个月之前，即1937年9月，《幸福》杂志刊登了一篇充满褒奖的约

肯尼迪传

瑟夫·肯尼迪略传。据肯氏家族编年史记事员在半世纪之后透露，这篇广泛传播的文章与该记者原来那篇措词强烈的充满贬义的文章完全相反。约瑟夫·肯尼迪设法将那篇批评文章作为“精神不良的思想产物”压制下去了。不过，庆幸的是，《幸福》杂志的读者一无所知，就像《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了解 J·P·肯尼迪的忠诚支持者阿瑟·克罗克曾获得肯尼迪慷慨捐赠的大笔钱款一样。

杰克在哈佛的橄榄球队友查尔斯·霍顿知道此事。据他后来回忆说：“那位老人花了 25 000 美元收买阿瑟·克罗克，让他把肯尼迪的名字和事迹刊登在一些报纸上……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听说什么是公关。它发生在 1937 年。25 000 美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杰克本人曾将此事告诉霍顿。正如霍顿所说，没有人想要隐瞒这件事情。在肯尼迪的生活里，“这似乎是平常事”，而且“大家都了解”。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曾经在《纽约每日镜报》上称赞由约瑟夫·肯尼迪领导的海事委员会的功劳——但后来肯氏家族记事员发现，皮尔逊这样做即使不是受约瑟夫·肯尼迪的收买，至少也是因为欠他的人情，他私下里感谢约瑟夫·肯尼迪说：您在 1937 年赠给我的可爱的礼物……十分漂亮，我会很高兴地戴着它，并且会经常想起您这样一位极好的朋友。”

约瑟夫·肯尼迪没有向兰迪斯透露的事情中，不仅包括克罗克在促使罗斯福提议让肯尼迪出任大使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包括罗斯福的顾问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所做出的反应。在执政五年之后罗斯福因经常受到报界批评而非常担心，他一直担心约瑟夫·肯尼迪通过新闻界向他发出越来越多的主

动攻击，毫无疑问，他迫切需要除掉这个政敌。当时，即1937年12月初，他向约瑟夫·肯尼迪提出打算任命他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然而，“当政府的核心集团了解到总统打算任命肯尼迪到英国出任大使时，他们的反响十分强烈，民主党内部反对这项任命的力量非常大。”阿瑟·克罗克后来透露说，正是在这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命令他的儿子吉米去见肯尼迪，商量能否取消这项任命。

虽然这是回忆，但克罗克讲的确实是实话。当时在克罗克一份秘密记录中这样写道：“我听说总统的儿子兼秘书詹姆斯·罗斯福受他父亲的命令与肯尼迪先生谈了三个小时，极力劝服他担任一项职务——商务部长——而不是像传言中那样成为驻英国大使。”“吉米·罗斯福离开之后，他来找我，显得非常生气，并且说，‘他极力让我担任商务部长的职务，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去伦敦，但伦敦正是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只想去那里，我对吉米就是这么讲的。’”由于克罗克泄露了总统将于1937年12月9日任命肯尼迪出任英国大使的消息，罗斯福不得不提前宣布了这个消息。为此，罗斯福总统从未真正原谅克罗克。后来他声称，克罗克提前透露这一消息加快了正在美国医院住院的宾厄姆大使的逝世。与此同时，在1937年12月16日，克罗克通知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约瑟夫·肯尼迪正承受着巨大压力，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大使职务，“但我肯定他会”。

克罗克说的没错。正如罗丝后来透露的，乔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寄希望于阿瑟·克罗克和其他人来获得大使职务，后来他勉强以担任海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作为以后出任大使的条件。约瑟夫·肯尼迪决不像他在兰迪斯面前表现的那样对罗斯

肯尼迪传

福的建议感到惊讶，而是感到高兴。他决不会让到手的机会溜掉，而且他也确实抓住了这次机会。1938年1月13日，他在蒙大拿州的谢尔比给罗斯福拍了一封电报。

亲爱的总统先生：穆尔和我正在乘火车开往回家的路上……我刚刚得知我的任命已被确认，回家后定将向您表达谢意。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外交官，也许会很糟糕，但我保证完成您交给我的工作。罗丝和我对您深表谢意。

常期受到排斥的罗丝因肯尼迪获得任命而感到欣喜不已。“亲爱的总统先生，”她用整齐的女学生书法写道，“我衷心感谢您对乔的这项任命。我和我的孩子深感幸福、快乐和激动。我们还想告诉您，我们对您给我们所带来这一巨大喜悦不胜感激。”

约瑟夫·肯尼迪收买的追随者们纷纷在报刊上称赞这项任命。只有一个人，即经常在《纽约每日镜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博克·卡特私下里警告肯尼迪说，这个决定是极其错误的，并且指出，在这样的时间担任这样的职务“的人需要具有多年修养。而在这方面，乔，你完全不具备。不要认为我这样讲很难听。相反，我是想减轻你的一些痛苦……乔，这么复杂的工作，外行人是干不了的……如果你不及早退出，你将会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

卡特的预言将会变成可悲的事实，但约瑟夫·肯尼迪却不予理睬，他仍然为自己在1937年6月举办的哈佛同学25周年聚会上受到的冷嘲热讽感到难过。

当时，罗斯福只不过将这项任命看做是对肯尼迪的贡献的一个暂时的报答。比如，罗斯福曾向亨利·摩根索预言说，他认为“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派他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是因为他很清楚肯尼迪担任这个职务的期限不会超过半年”，另外，通过宣布这项任命，他也还清了他欠约瑟夫·肯尼迪的人情债。为了表示他不把大使这项职务放在眼里，罗斯福甚至要求约瑟夫·肯尼迪当着白宫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面脱下他的裤子，并且他在大家的笑声中宣布，乔的罗圈腿太严重了，不适合穿那种传统的齐膝丝绸短裤在英国宫廷里担任大使。乔开心地接受了这一嘲弄。他毕竟创造了历史奇迹，成为担任大使职务的人员中第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且是第一位罗马天主教徒。

其实，约瑟夫·肯尼迪对自己的任职期限也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曾经告诉他在海事委员会的助手——也是按照他的要求随他到伦敦担任其宣传员兼演讲撰稿人工作的哈维·克莱默说：“不要购买很多东西。我只想让你的家族被收录进《社会名人录》。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我们就准备回国，到好莱坞拍电影赚钱去。”

但约瑟夫·肯尼迪制作电影的日子没多久就结束了，而出使伦敦对他来说，将会比拍摄《凯利皇后》败得更惨。

围着太阳转的月亮

这时候，杰克已经在橄榄球这项活动上获得了以哈佛校名首写字母为奖励的“小H”，并被施佩俱乐部接纳为会员。他尽量避开父亲的“大使风波”这件事情，他和家人在棕榈滩一

肯尼迪传

起度过了圣诞节，计划过几天飞往纽约，去白鹳俱乐部与比林斯和霍顿见面。“那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去，”比林斯后来回忆说，“而且白鹳俱乐部也很希望年轻人到那里去。他们特别鼓励模特儿等漂亮小姐去那儿，而且还为那些带着漂亮姑娘去那里的男士提供好处……有香槟酒，还有送给姑娘的礼物。但是，我们在那儿总是很小心，每人最多只喝一杯酒——我们只能花这点钱。杰克毫不介意和我们一样。他酒量不大，只喝一杯酒没有什么难的。不过他非常喜欢跳舞。”

杰克打算 1938 年 1 月 2 日晚上在白鹳俱乐部与他的新女朋友见面。“这家俱乐部常常会在周日晚上用气球做游戏。”比林斯回忆说，“一些气球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然后大家争着去抢。有些气球里还装有一百美元的钞票，甚至五百美元的钞票，还有白鹳俱乐部免费的餐票以及瓶装香槟酒票等等。”

事实上，杰克从佛罗里达乘火车离开时，已经邀请凯思琳的朋友夏洛特·麦克唐奈和他一起观看《蒙在鼓里的女人》。杰克曾殷勤地照顾过弗朗西丝·诺尔，然后将感情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姑娘身上。他向比林斯毫不在意地说：“诺尔伤心地哭了，这件事是里普说的。”杰克还不屑一顾地说，他哥哥向简·罗文斯基“大献殷勤，我们同在一个班。我很高兴地说，那个姑娘需要男人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不过她的情夫也得到了她的首次服务。”“他指责我是‘围着乔这颗太阳转的月亮’——他简直是个蠢货。”

杰克在社交方面和性生活上精力充沛、异常活跃，这促使他的父亲从未考虑让他来实现自己的王朝梦想，而是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小乔身上。此时小乔正在撰写最后一年的学年论文，内容是评论“不干涉西班牙的独立运动”。此后，肯尼迪先生

决定，让小乔到伦敦大使馆担任他的秘书工作。

回想起来，小乔如果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那么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而不是担任自己父亲的秘书。不过在当时，甚至连罗斯福也对约瑟夫·肯尼迪作为一名父亲所具有的荣誉感和他监督、鞭策、指导、责备以及忠于子女的决心表示钦佩，并将这一点视为在这样一位极其自私的人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令人佩服的无私精神。

很难说作为父亲的约瑟夫·肯尼迪对子女表现出如此关怀的原因是什么。乔如此关心子女，无疑是对自己与罗丝之间的关系破裂表示后悔，但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将未经权衡的感情和期望强加在子女身上，用子女的爱和孝顺来弥补父母之间婚姻的破裂。

约瑟夫·P·肯尼迪的内心里也有一些别人察觉不到的隐秘地方。“如果你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真正目的，那么他就不是肯尼迪了。”勒姆·比林斯后来对一位采访者吐露。肯尼迪先生教育子女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工作之外，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子女的问题，”比林斯回忆说，“他对参加社交生活并不感兴趣”，而肯尼迪夫人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也许因此本可以用来建立家庭外部关系的精力被占用了，好像是故意引起了一种颠倒。这种家族思想给局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人们纷纷撰写类似《非凡的肯尼迪家族》这样标题的文章和书籍，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甚至写出了一本尽是吹捧颂扬的书——《肯尼迪家族中非凡的女人们》。

然而，这些非凡的肯尼迪家子女正是因为其父母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无法享受与外界人同样的正常、健康的生活，更不用说建立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子女——特别是女儿

肯尼迪传

——经常受到父母施加的压力。母亲要求她们遵循传宗接代思想和宗教信仰，而父亲却要求她们在竞争中获胜。“我们这里不能有任何失败者。在这个家里，我们需要的是成功者。”这是约瑟夫·肯尼迪挂在嘴边的话。据比林斯回忆，“肯尼迪从不喜欢失败者。他觉得他的孩子应该尽一切努力去争取成功。如果孩子没有获胜，他就会感到非常失望。他明确表示，他希望子女做任何事情都要取得成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第二。当然，他的子女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时刻存在的压力。他们知道，他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爱他们……所以，他们自然也有了获胜的愿望，并且希望为了父亲而表现出色。后来，这种思想逐渐变成了自己争取获胜的真正愿望。”

对于肯尼迪的子女来说，获胜便可以赢得父爱；反之，失败则意味着失去父爱——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让子女变得从容自信的办法。此外，肯尼迪先生利用其子女在幼年和童年时代由于父母常常不在身边而形成的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鼓励子女长大之后彼此相互依靠，而不是依靠外人。他欢迎杰克的朋友到海恩尼斯港、棕榈滩和布朗克斯维尔来玩，但绝不允许他们超越他在自己及子女周围规定的严格的家庭界限。在佛罗里达，里普·霍顿回忆说：“肯尼迪先生确实是个领导者。他总是坐在上首，然后是杰克、乔，再后是特德·里尔登、也可能是托尔、勒姆和我……大概我有三年时间都排在最后。肯尼迪先生经常谈论一些关于时事、政治的问题。杰克和小乔会提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会做出极其详细的回答。但如果是我向肯尼迪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说真的，他会对我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是他的家人”。——对其他人则毫无兴趣。

“肯尼迪先生在家庭内部也培养了一种相互间真正忠诚的

感情，”比林斯回忆说，“这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心和他的这种认识：团结协作会胜过单枪匹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极不寻常的是，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中年后仍保持着这种强烈的家族思想……肯尼迪先生总是说，一个家庭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说，家人合成一体要比把他们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家庭幸福。”

他们这样是否会更幸福，这一点令人怀疑。但肯尼迪先生要实现其王朝的愿望十分强烈，已到了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步，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意志、恐吓以及霸道作风把自己塑造成太阳，家族成员只能绕着他旋转，靠他的引力固定在轨道上。罗丝形容这“几乎是力量和能量以及思想敏锐的一种具体表现。”

这种引力虽然给家庭成员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深厚的感情，但它难以与精神发展、独立自主相提并论。由于遭到美国社会的否定，约瑟夫·肯尼迪夫妇在社交方面无法为其子女树立榜样。罗丝承认，他们的确从心里不喜欢子女长大之后分裂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这一思想对他们所有人，包括杰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杰克的父亲对杰克的一生有重要影响。”比林斯后来回忆说：

在我看来肯尼迪先生的子女并非天生就具备了他们现有的那些素质——他们现有的许多素质是被他父亲教育出来的。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我知道教育出好子女并不容易，任务是多么艰巨；如果你像肯尼迪先生一样拥有财富，那么情况更是为难。人作为父母一方面总想宠爱孩子、为孩子包办一切；另一方面，那些对孩子要求过严，

肯尼迪传

期望过高的父母常常会使孩子产生敌对情绪，从而不喜欢自己的父母。肯尼迪先生对子女的爱不次于任何人，他的子女问题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这一定使他更难当好父亲。肯尼迪先生并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冷漠，他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我想，像他那样能够做到控制自己的感情却不溺爱孩子或者过分地要求孩子以致给他们造成很大压力，是相当不容易的。

从比林斯的回忆来看，肯尼迪先生并没有给子女过分施压。“他鼓励他们要胸怀大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我这些年来一直注意到他是如何鼓励子女并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如果他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他就会指导他们，他相信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他总会用最佳的手段来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

不过，这种最好的办法所引发的后果连比林斯也认为具有很大的毁灭性，这从肯尼迪十分喜爱的凯思琳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此外，肯尼迪先生阻止儿子们从商——“他坚决不让儿子像他以前那样成为商人”。比林斯强调说——这使得他的儿子都依靠他的财产，就像他的女儿们等着获得嫁妆一样。

小乔的反应，过去是而且至今依然是竭尽全力成为父亲希望看到的那样。凯思琳做出的回应——这一点从以后可以看出——是尽力逃避母亲的那种不得有任何过错或不忠的疯狂的天主教信仰，但她仍然获得了父亲的爱。

然而，对杰克来说，既要应对他的父亲——学会接受约瑟夫·肯尼迪这样一位颇有能力的人所能带来的好处，同时又要避免陷入这种依赖关系所带来的陷阱。这一矛盾也许会成为其

一生中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当他的父亲于 1938 年 2 月前往英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驻英大使——即纳粹的主要绥靖者之一而被载入史册时，对杰克的考验达到了顶峰。

一群浪荡公子

杰克在 1938 年初回到哈佛之后马上投入到社交、体育和学习之中。“因正在考试，我只写了封短信。”他在 1 月 21 日用标有施佩俱乐部几个字的信纸给比林斯匆匆写了封短信，信中包含“一篇内容通顺的社论”——即《乔特新闻》中的一页。

杰克虽然对乔特中学没有什么留恋，但其心灵深处的“射击场”却需要像乔特这样的学校所提供的靶子。而该校校报也乐意为之效劳。“一年多来，学校一直注意着‘保罗·梅隆的科学体系’的发展。”主要编者在“为真理服务”一行字下写道，“这一年多来，男教师们一直在猜测、计划和准备，以便可以充分利用不久以后就会到手的材料。”“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梅汉斯在‘猜测、准备和计划’吗？”杰克问比林斯，并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线。另一篇社论要求五年级学生充分认识到他们上六年级时责任的“重要性”，此文也引起了杰克的嘲笑。“文章写得不错嘛，”他在报纸边上对作者在文中用“开车”所做的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表示嘲笑。文章作者断定，“最重要的是”，本届学生在接替上届学生责任前应进入“稳定的、顺利的第三年”——“这一点应在本届学生仍处于转变之时让大家尽早获得彻底了解，就像开车时要开到底一样。另外，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有许多坐在车的后座对驾驶员给予帮助的人，不断

肯尼迪传

提出计划、建议和思考新的行驶捷径。”“这正是我们所起的作用。”杰克说。

不过，在这种嘲讽的背后有着令人烦恼的痛苦。杰克的身体再次开始变糟。“我将于二月份去梅奥诊所，然后再到南方去休养。”他在寄给比林斯的一封信的后面写道。在信中他对比林斯在很远的地方就断言他不是阑尾炎就是阴茎发炎做出了强烈反应：“说到阑尾在八年前我就割掉了盲肠，至于你对我割包皮一事特别的关心，我可以告诉你，老二现在处于最佳状态。小乔也从来没有比我更健康或表现更出色，”杰克吹嘘说，“我很赞同你关于艾琳·赫里克的小道消息，她看起来的确不错，很性感。”他继续说，“我们将在这里与普林斯顿举行游泳比赛——你敢打赌吗？我游泳很糟，因为我脚上有足癣，我在12日左右完成学业，届时将在纽约与你见面。”他还写了个附言，“请告诉我关于赫里克的消息。”

然而，杰克参加的社交集会正如他的游泳活动一样不久就开始减少了。到二月份的第三周，他已经住进了校医院。虽然他的室友托比·麦克唐纳偷偷给他送来了一些牛排和其他食品，但他的体重仍在迅速下降。“唉，我的运动生涯又一次被毁了。”他给比林斯闷闷不乐地写信说，“我又染上了流感——在校医院已经呆了四天，看来我在这里还得呆上几天。耶鲁运动会若从周六算起还有两周时间，我不知道那时我能否恢复健康。这真叫人心烦，因为这次运动会是我获得哈佛校名大写首字母奖的有利时机，哈佛将会把耶鲁和普林斯顿打败——我也许会想办法去南方呆一周，以便尽快恢复健康。”他还向独自一人正在棕榈滩疗养的母亲抱怨说，这次感冒毁掉了“我的游泳生涯……它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这意味着整个季节都被

浪费了。不过我会尽力使这个季节过得有意义——我在其他方面很健康，因为我检查了一下血常规，白血球数量为 7 000——非常不错。”虽然杰克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与那位神奇的滑冰明星发生性关系，但他仍问了一下母亲是否看过“桑雅·赫尼演出团的表演……我想自己到那儿去和演出团的那位姑娘认识一下。你觉得她怎么样？”他开玩笑说，“她是你能与之相处的那种人吗？”

正如杰克担忧的，他最终未能进入哈佛校队，因为他被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打败了。1938 年 3 月的第二周，杰克不幸住进了新英格兰浸礼会教会医院，“正在努力治疗我过去两周以来一直患有的肠感染。我上周因为患有此病未能恢复健康——所以没有获得校名大写首字母奖，这非常恼火。”他问比林斯，“你有没有给宿舍打电话，告诉他们你把车放在了哪儿？因为谁也不知道车在哪里，只好往波士顿打电话，最后在凯西家找到了车，我只对他们说过‘最后用车的是比林斯’。”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前一年十月，杰克曾与“一个开车的女人有过很不愉快的交往，这个女人令人非常讨厌，所以我狠狠地教训了她一下。结果，她竟然写信给机动车辆登记处，说我在撞了她三四次之后斜着眼色迷迷地看她，这些话是真实的，不过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色迷迷地斜着眼看她。不管怎么说，他们把我找去了并且对我很凶。”杰克说。结果他假装说自己“在那天晚上把车借给了一些学生”并且说出了比林斯的名字。“如果他向你要驾照，告诉他你是佛罗里达人——也表示你感到很抱歉，并且认识到自己本不应该这样做等等……你给他写封言辞客气的信并承认错误。”杰克告诉比林斯。

这也并不是杰克惟一的不良行为。在纽黑文，杰克失望地

肯尼迪传

看着在比赛中哈佛游泳队没有自己的身影，他因为约了两位姑娘——吉利恩·福克斯和弗朗西丝·诺尔而害了自己，“我在周六晚上离开她们，她们的女房东简直是个老混蛋，并要求她吻我的屁股，而她们在一旁听着。福克斯也用同样多的话说我是个讨厌鬼，诺尔只是转动着大眼睛，迷惑不解，”结果杰克去找奥利夫·考莉，于是考莉将成为他周五晚上的约会对象——如果到时他能够出院的话。

可是杰克没有出院。后来，他回到在棕榈滩的家中，那里空无一人。“我打算休息几天来恢复身体，并希望在周六或周日见到你。”他写信告诉比林斯。比林斯记得当时自己“几乎身无分文，甚至连去佛罗里达的钱也没有了。杰克说我想带谁去就可以带谁去，只要他们能够花路费。于是我邀请了两位同学埃本·派恩和桑迪·奥斯本。我们一起开车在那儿呆了两周，这是杰克第一次与他们认识。”

“他一个人住在那儿，看门人已打开了家门，实际上这里由杰克·肯尼迪在管理。”比林斯说。休养，杰克根本不是像自己所想像的那样躺在床上或躺在沙滩上休养，这位病人“正在学习伦巴舞。我们年轻时伦巴舞很流行，他想学跳这种舞。”

学完伦巴舞之后，他们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复活节。比林斯回忆说：

我们在那里独自享用一间住宅确实感到愉快。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些新的刺激活动，后来听说一家名叫“牛津肉类商场”的商店将在这个小港上为所有棕榈滩的从业人员举行一次野餐会。

我们也被请去参加了这次野餐会，但桑迪·奥斯本没

去。我们去了野餐地，那儿的人以前没有见过我们。我们显然在寻找一些漂亮姑娘。虽然漂亮的姑娘不太多，但杰克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裔姑娘。杰克问她是否愿意出去玩，她说，除非她的朋友和她一起去，否则她是不会去的。杰克说这很容易，比林斯会照顾她的朋友的。

她的朋友叫雷切尔，体重大约在 250 磅至 275 磅之间。她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但她是我们见过的最胖的女孩。雷切尔给自己穿一套海军装——水手裤、帽子和女衬衫。

这真是好极了，我们大家立刻就明确地明白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本想一起出去，但遗憾的是我和埃本在那个晚上都有约会，不过我们还有个朋友愿意带雷切尔出去。

这位受我们捉弄的人就是桑迪·奥斯本。“到这时为止，杰克认识桑迪已经有一周了，而且对他很了解。在普林斯顿桑迪和我同班；他中学是在格罗顿的一所学校度过的，而且他具有纽约人身上的所有特点：格罗顿的口音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他的家在哈得逊河上游，是一处很大的住宅；事实上，后来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被公认为我们班里最自傲的人。”

杰克非常兴奋地期待着。

我们把 4 月 1 日定为约会日。雷切尔对约会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们很快告诉桑迪给他找了个约会对象。杰克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有意思，他花了很多时间劝说桑迪接受雷切尔，并一再解释，我们的约会对象都不太令人

肯尼迪传

满意，我们为他安排了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约会，而且我们都主动放弃相识的对象而去与不相识的对象约会……当我们听到他在电话里与她聊天时，我们差点乐坏了。

像许多胖姑娘一样她有一种动听、沙哑的嗓音和幽默感。桑迪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他的对象最好，唯恐别人会横刀夺爱，因此他与大家签订了一项协议：谁若离开自己的女友达一整个晚上，那么第二天晚上就必须自己掏钱让我们带别的姑娘去一个昂贵的夜总会玩。

于是，我们一起去某某街的街角接这位姑娘，而桑迪的心情是十分激动和渴望；突然，灯光照到了她的身上，她当时正站在街角。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经历之一！

在杰克的印象中这是最有趣的经历之一，在他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奥斯本——那天奥斯本在整个晚上都是毫无热情地和雷切尔呆在一起，履行他的协议。“他们成了杰克的好友，”比林斯回忆说，“我必须说，在杰克后来的生活中，那两个人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

这时候，杰克似乎恢复了健康，不过他仍需要按照波士顿莱希诊所的萨拉·乔丹大夫的饮食新规定来进食——多吃乳制品和奶油。1938年4月，杰克又回到了哈佛。他计划同比尔·科尔曼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普林斯顿舞会，并要求比林斯“立即”告诉他艾琳·赫里克的地址，而且还问他“她是否会受他控制”。

实际上，杰克的身体状况并未好转，但他不甘受病情折磨。按照温思罗普宿舍辅导教师的要求他阅读了许多关于希特

勒和墨索里尼的书籍——《现代世界各国的独裁制度》、《德国跨入第三帝国》、《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民间传说中的资本主义》、《我们或他们》、《民主的本质》，这给他的辅导教师留下了好印象。“肯尼迪今年有一段时间身体仍然不好，”这位辅导教师后来在杰克的辅导记录中写道，“而且他做的辅导作业也不是很多。虽然他的思想仍然难以琢磨，而且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创造性，但我认为他有潜在的能力，也有发展前途。”

“蟹王”杰克

肯尼迪大使在伦敦的表现无法写出理想的汇报。他刚一到英国开始工作，德国空军便轰炸了巴塞罗纳，希特勒又吞并了奥地利。在德国入侵的前几天，肯尼迪还吹嘘写信让阿瑟·克洛克把他对战争的预见“刊登”在报上，即“解决世界事务要靠经济实力而不是武力威胁”。但是希特勒3月14日在德国机械化部队的隆隆声中耀武扬威地进入维也纳，这使得肯尼迪的这一预言不攻自破。

实际上杰克的父亲已经成了美国在欧洲的头号重要人物，然而，这位逃过兵役的爱尔兰裔波士顿人却看不出希特勒行动的重要意义，他从不认为欧洲事务对美国有任何影响。除了几名苏格兰酿酒商之外，肯尼迪在到达英国之后没有结识任何社会名流或专家，他对国际关系并不了解，也没有阅读过有关欧洲的任何历史书籍。然而，正如他幻想自己能利用复式记账原则改变好莱坞一样，肯尼迪在伦敦也认定，欧洲的问题可以通过更迅速的现金流动得以解决。

甚至连希特勒戏剧性的入侵奥地利的军事行为也没有使他

肯尼迪传

改变这一看法。“奥地利事件使我在英国最初的生活更刺激，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在3月21日得意洋洋地给克罗克写信，同时又给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寄去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但我仍然没有看出中欧的事态发展会影响我们的国家或者我的工作。”肯尼迪甚至对大使馆官员的反应也不屑一顾，他说：

每当又发生了一起预见的事件时，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官们就表现出近乎疯狂的态度……迄今为止向国务院报告的我所了解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并没有使我的心情感到沉重，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在这里与市民、英国内阁成员以及外交官交谈得越多，就越肯定我自己的观点：欧洲的经济状况——包括英国——那里是整个局势的关键之处。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耍的手段并不能让老百姓有工作，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根源。一个自己全家挨饿的失业者，不管其头顶上飘扬的是纳粹德国的曲十字旗还是其他国家旗帜，他依然是个失业者，全家依然要挨饿。

英国前国王和前王妃辛普森夫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如今的温莎公爵事实上曾于去年十月去萨尔斯堡拜访过希特勒，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完全被这位元首“欺骗”了。这位公爵对纳粹在奥地利和维也纳等其他地方进行的大屠杀感到震惊，而肯尼迪担忧的却是他认为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在当年会影响到英国。他坚持认为，希特勒的异常行动与美国毫无关系。

罗斯·肯尼迪同样仅看到了眼前利益，后来她在回忆录中

将这一时期称为其一生中的顶峰：经常出席皇家宫廷的典礼、佩戴钻石冕状头饰并参加盛大的舞会。通过这些场合，她可以让女儿们进入那种以前在美国曾排斥她的上流社会。如今，作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夫人，她经常被邀请到白金汉宫、温莎堡、德比赛马场和阿斯科特赛马会参观。而她的丈夫则成了从诗人和学者云集的雅典娜神殿到泰晤士河皇家帆船俱乐部等英国名流社会团体和体育机构的荣誉会员。这种生活是他们在美国从马萨诸塞州到佛罗里达州一直受到轻视之后的一个明显的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夫妇目光短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伦敦持续的时间不会长久。虽然出任大使的工作令人十分羡慕，但肯尼迪仍将这份职务看作是重返证券市场的一段序曲。“我没有私生活了，”他在一封信的附言中向克罗克发出叹息，并且声称回到美国后再也不去政府里工作了。“不用费心替我担忧，”他告诫克罗克说，克罗克“在那些什么都没确定的日子里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并坚持让我到这里来，这将永远让我记在心里——我放弃这一职务后将重回商业界，”他保证说，“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让我回国吧，甚至让我自费回国我都愿意。”在几周之后他又向伯纳德·巴鲁克发出请求，因为他已经厌倦了欧洲政治局势变化的和他的大使职务——这使得他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不仅不可能，也不适合。

不过，和 20 世纪 20 年代从事电影业工作一样，他很快由一种厌倦情绪转为一种夸大的妄想。过去对乔·肯尼迪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是一个女人，而这次却是一位英国的领袖：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虽然罗斯福对张伯伦表示出“某种冷淡”，但肯尼迪却承

肯尼迪传

认这位英国首相立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向国务院汇报说，张伯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局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并拥有一个“实际的、现实的头脑”。这位头脑现实的人——肯尼迪说——“已承担起努力使德国和意大利形势好转的责任……他认为必须向德国做出具体的让步，并且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希望借此避免战争。而且他确实不希望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肯尼迪还对《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也做了同样的发言。张伯伦虽然年迈七旬，但仍然决心“与德国恢复友好关系”，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硬汉子，并即将成为内阁的领导者”。

“张伯伦在上周四的演讲令人佩服，”不久之后肯尼迪满怀热情地告诉克罗克说，“我在外交官的座位上简直完全陶醉了，很快就听完了整篇演讲。我觉得这篇演讲既饱含高昂的士气，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依我看，这一切均意味着：如果张伯伦能够获得公众的大力支持，继续执政，战争就不会发生。”

由于肯尼迪完全听从张伯伦在下议院的主张，他一想到美国股市对欧洲局势仍存有怀疑态度就非常生气：“但愿我们国内同胞会照看好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别替欧洲担心，先办好自己国家的事情再说。”尽管战争已迫在眉睫，肯尼迪仍不明白“即使战争在欧洲爆发，对美国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呢”。他的直觉是不会爆发战争。由于意大利与英国等国已签署了一些牢固的贸易协定，他更看不出会有任何打仗的理由，尤其是如果张伯伦继续出任首相，对方就更没有打仗的借口。

肯尼迪 1938 年 4 月 14 日写给克罗克的信中把英意两国签

署的协定称赞为“迄今为止张伯伦先生在外交政策上所达到的顶峰”，这充分反映出了这位美国新任大使思维的简单。肯尼迪断定地说，“这里的人们普遍认为，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他把英国当作朋友要比完全依赖希特勒更可靠。”他和儿子小乔一样，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仇英心理仅仅是由德国企业生产率而产生的一种刺激：“也许德国人觉得他们必须树立一些明显的外来敌人，才能使自己的人民敢于做出必要的牺牲，而英国目前扮演的正是外来敌人这一角色。”

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总是想证明约瑟夫·肯尼迪在出任驻英大使时对德国采取绥靖态度是有理由的，他只是反映了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当然，他的夫人也借此替丈夫辩护说：“肯尼迪作为大使，他所代表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态度，因此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这样做。”

然而，罗丝并不了解美国政府的观点，更不用说知道美国人民的观点了。她一心惦记的仅仅是英国社交生活。作为“夫人兼女主人”的罗丝已经被卷入到伦敦的社交漩涡之中，自从年轻时为她父亲处理家务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担任重要的公关工作。当她和丈夫作为女王及国王的贵宾生活在温莎堡时，她的丈夫说：“罗丝，这儿的一切和波士顿东区真是天壤之别。”虽然罗丝从没去过波士顿东区，但“旧英格兰”的“壮丽景色和优美环境以及浪漫传统”实在令她着迷。

与此同时，肯尼迪对张伯伦的主要政敌温斯顿·邱吉尔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恶之情。“我与温斯顿·邱吉尔以及他的儿子伦道夫第一次共进午餐的事情有必要提一下。”肯尼迪后来告诉自己将来的自传编写人说，“邱吉尔对英国通过英意协定可能获得的利益不屑一顾”，并且多次警告肯尼迪说，绥靖政策

肯尼迪传

行不通。在与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会晤之后邱吉尔肯定了这一观点。里宾特罗甫要求英国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并要求“英国不要过问东欧的事情，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兴趣及其对生存空间的需要。”

可是，肯尼迪对邱吉尔的提醒不予理睬，他和张伯伦依然相信，发展欧洲经济和世界贸易是未来的关键所在。肯尼迪告诉罗斯福，张伯伦正在“筹划足够的政治法码”，并且要罗斯福相信“您向全世界做出一种新的姿态并完全以经济作为依据……的机会已经到来。”

不过，肯尼迪并非罗斯福在伦敦的惟一消息来源，当肯尼迪不经意间发现罗斯福同时从哈罗德·拉斯基那里获得消息时，不禁勃然大怒。肯尼迪知道这件事后“用有力的语言向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肯尼迪认为他父亲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

“当我回忆往事时，这一迹象象征着重即将发生许多事情。”后来肯尼迪回忆说。当国务院开始检查他在英国的讲话时，他更加气愤。他在有关“清教徒前辈移民”的传统演讲中宣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而与外国结成联盟、签订协议或达成谅解的行为，即使这种做法可能是临时的，而且只是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在目前的形势下，假如战争——我指的是大规模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美国并没有寻求合作或提供援助的计划。”

在删除这些内容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警告肯尼迪说，这一修改是由“总统本人”亲自做出的，但肯尼迪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和平相处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不是结成联盟。“经济上的绥靖主义，除了其表面特征之外，还意味着全世界人民达

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肯尼迪的这一断言使他自己和张伯伦都感到非常满意。

肯尼迪寄往国内的私人信件在半世纪之后看起来真是思维简单，十分可悲。“这不能怪他，”罗丝后来为她的丈夫辩护说，“那时候谁都不知道希特勒像罪犯一样疯狂，他除了依照自己的那些神经质的标准之外，从不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生活；没有谁会想到他的承诺一钱不值。”

但乔知道这些吗？肯尼迪在美国政府得知希特勒征服了奥地利这一消息的一周之后给克罗克写信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职务终于要结束了。”据英国外交部官员讲，肯尼迪收买了一些固定人员以便于他“兼职”从事投机生意，他利用大使这一有利身份获得内部信息，从而轻而易举地大捞了几笔钱。

在父亲从英国牟取暴利的同时，杰克在哈佛却过得不怎么样，他的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的传记作家也是这样写的。杰克不愿虚度每一天。当他的医生告诉他必须抽出一些时间休息时，他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了三天，然后迅速赶往纽约。他在五月份去竞选学生会成员，结果获得第五名。“他们只取前三名，所以这次我糟透了。”他向比林斯抱怨说，“我本来以为自己能获得成功，以便能够告诉斯蒂尔‘躲得远点’。”但到了六月初，杰克正处在“期末考试的忙碌之中”再加上他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不得不推迟了他21周岁的生日聚会。“我很想去伯纳德维尔，但由于身体欠佳，我也许要去医院住几个星期——无论怎么说，如果我可以不用住院，我就去科德角休养，因为我不能举办生日聚会……几天之后我就会知道结果的。如果我不住院，你就上科德角住一周左右，因为那时候只有乔和特德·

肯尼迪传

里尔登。”同时，杰克正在制定一项参加本年度大学帆船比赛的计划：“我也许会参加帆船比赛。如果确定下来，我将乘坐卡明斯的那只 200 英尺的帆船去，他也邀请了你，所以你需要找个女孩并在那儿等我——否则只好在科德角见了。”

甚至连杰克的一些朋友为给他增加体重在施佩俱乐部安装的新的冰淇淋机也未能阻止其体重突然地下降。6 月 15 日，他再次住进“新英格兰浸礼会教会医院。我通过了所有课程”，他自豪地说，“也许还能被列入优秀学生名单”。本学期已于 6 月 13 日结束，杰克虽然得过“流感”、“肠炎”，而且体重迅速下降，但他精神状态很好。他喜欢温思罗普宿舍，喜欢他的室友，喜欢他的那些朋友，并且还赢得过哈佛橄榄球的校名首写字母奖“小 H”；他还代表哈佛参加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达特默思大学共同举行的游泳比赛；他也喜欢他的主修课程政治学，并对欧洲历史以及欧洲当前的政治和国际关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加入了最难进的八个俱乐部之一并被“玉米粉糊学会”接收为会员，又差点当选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会主席，甚至还有可能在五月份和六月初的最后竞争中被评为优秀学生。

与普林斯顿相比，哈佛有许多特别之处。当比林斯吹嘘说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要为一些将军授予荣誉学位时，杰克马上反驳说，“给将军授予荣誉学位，这种做法只是普林斯顿效仿哈佛而采取的一种蹩脚手腕。给将军授予荣誉学位这种做法起源于哈佛，并在这里坚持好几年了。如果你越早认识到普林斯顿是什么——一个很好的、的确很好的预科学校——那么我们的哈佛学生就越会感到高兴。”

由于哈佛紧挨着波士顿，附近还建立了许多女子学院以及

科德角，因此哈佛的位置十分理想，正好与杰克的性格和活力相适应。他要等到 6 月 21 日之后才能离开新英格兰浸礼会教会医院，但他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制定新计划，在他所制定的计划中最新的一项就是参加“校际帆船比赛”。比赛计划于 6 月的最后一周在海恩尼斯周围的奥斯特维尔开展。瓦恩诺帆船俱乐部将为其会员提供参加这次比赛的船只，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与哥哥小乔驾驶家里的瓦恩诺单人帆船的杰克来说是极大的诱惑，不可坐失良机。

杰克未能被评上优秀学生，虽然他的政治学教授佩森·怀尔德把他这一年的政治学成绩全都打上了 B 这样的好成绩，但他的其余课程的成绩都是 C。“蟹王”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离开医院后，在纽约呆了几天，和彼得·格雷斯呆在一起，然后与吉米·鲁斯马尼埃和住在温思罗普宿舍的另一位朋友洛林·里德一起去参加在奥斯特维尔举行的帆船比赛。

由 60 多名优秀的帆船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十所大学的 20 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是竞争最激烈的校际帆船比赛”，哈佛年鉴记载说，“一直到这次比赛的最后冠军才能够确定”，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威廉斯和达特默思四所学校争夺第一。幸运的是，杰克的三名队友之一的巴德·赫顿颇具长期驾驶斜桁帆船的经验。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赫顿仍能回忆起当时“通过缓缓地转向顺风来调整顶点升降索，这使帆船里的风口移至中间所以取得了更佳的效果。与此同时，杰克一直处在船队的背风面看住了许多帆船。我们的得分逐渐增加，谁也想象不出我们为什么背着风却能够跑得这么快。”

每所大学都派出两艘帆船参加两种不同等级的比赛。杰克在第六轮比赛中表现杰出使哈佛名列前茅，但最后两轮比赛对

肯尼迪传

赢得这次冠军至关重要。小乔带领哈佛的一艘帆船，杰克则带领另一艘。俩人在第七轮比赛中均获得各自赛场的第二名。在接下来系列赛的第八轮和最后一轮比赛中，小乔取得了第三名。但当杰克获得第二名，使哈佛的成绩在比赛中以 7.5 的总分胜过最接近的对手达特默思大学时，其他大学对夺取这次比赛胜利所抱的希望都破灭了。总之，帆船赛的胜利使杰克在大学二年级有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尾。

“肯尼迪会参加总统竞选吗？”

不过，对杰克的父亲来说，1938 年的夏天却是灾难的降临。“当我对外表示要回美国看我的儿子从母校毕业时，”肯尼迪对他的传记编写人解释说，“据正常猜测，哈佛大学应该同时将授予我荣誉学位。的确，要是我没有了解到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不会随随便便做出这一结论的，因为我可能会认为自己为政府所做的不同的和长时期的贡献也许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适当的回报。”

别人并不认为肯尼迪做出了长期的或杰出的贡献——特别是由于他不能与伊基斯、摩根索和珀金斯等政府官员和谐相处。因此，当哈佛公布荣誉学位的名单时，肯尼迪大使的名字并没有被列入其中。然而在约瑟夫·肯尼迪看来，这是哈佛对波士顿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抱有偏见的另一例证，也是他在 1936 年未被选入“监督者委员会”所蒙受的耻辱的又一次重演。作为美国驻英大使的肯尼迪没有获得荣誉学位“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罗丝后来透露说，“在逐渐建立起了所有的希望之后，他很难接受连个候选人都不是的这一事实……他突

然觉得自己好像再次站到了波斯利恩俱乐部门前，永远也不会被承认。”

在罗丝看来，肯尼迪知道两个儿子在这次帆船比赛中获胜，足以减轻他的任何痛苦。而出任美国驻伦敦大使是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无法替代的阶梯。但罗丝没有认识到或者后来不愿意回忆的是，“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是约瑟夫迫切要为家族争取的一项荣誉”，没有获得这一荣誉对约瑟夫显然是个沉重打击。

正如罗丝不了解她的丈夫的金钱交易一样，她对丈夫的政治抱负也不清楚。看着擅长做生意的内维尔·张伯伦叱咤风云的神态，在约瑟夫·肯尼迪复杂的头脑中又萌生了取代罗斯福的希望——也许就在下届总统选举中。

要想实现这样的抱负，肯尼迪就必须在美国新闻界造成这样的舆论，因此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1938年5月24日，他从英国写信告诉克罗克，他已吩咐下属“为马莎和你预订船票”，所有花销由肯尼迪负责。克罗克对肯尼迪的动机相当清楚。“老乔·肯尼迪想成为美国总统吗？是的，他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后来克罗克回忆说，“毫无疑问，他希望在1940年获得总统提名……他是一个充满野心的人。他觉得自己有无穷的才华需要奉献。他很精明。他认为他所做的贡献已经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拥有足够的金钱来开动庞大的宣传机器，这也许会管用。他所有的目的就是要在1940年总统选举中击败罗斯福。”

克罗克并非是加入肯尼迪的最早政治宣传运动中的惟一新闻记者。“肯尼迪会竞选总统吗？”这是《自由》杂志在1938年5月2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此文一出，美国各地的其他报

肯尼迪传

纸随即纷纷对此进行宣扬。这篇文章指出：“民主党和全体国民此刻需要一位能够将经济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美国人民真正富裕起来的人。”

事后看来，肯尼迪竟然会相信自己可能成为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从未担任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职务，而且他在商业上的精明狡诈依靠的是内部情报、不道德的股票炒作以及买空卖空等行为。当时，他将自己最近在伦敦大学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的孤立政策的演讲稿交给《大西洋月刊》，希望能与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报道同时发表。他还以此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就“将它卖给另一家报社”。当时，该刊编辑说，“如果你能卖出去那再好不过了，该文所谈的内容连乡村学校毕业典礼的发言人都能讲出来。”

然而，肯尼迪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失去成为总统的机会，他向詹姆斯·兰迪斯承认：

在过去的几周里，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里，有很多关于我能否成为 194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猜测。这是在五月下旬因欧内斯特·K·林德利在《自由》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而公开的。包括《星期天广告报》和《波士顿邮报》、《每日纽约新闻》、《华盛顿先驱论坛时报》在内的众多报纸，以及数不胜数的那些发行量很少的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当朋友认为我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职务，并且认真地向我提出建议时，我不会轻易拒绝。有许多因素给我成为总统候选人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我是一个天主教信徒，

但我认为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当然，肯尼迪也清楚，他最大的阻碍来自现任总统，“到目前为止、罗斯福先生还没有表明他是否要竞选第三次连任。我知道他有许多最亲密的顾问都努力劝说他打破传统，在1940年参加第三次总统竞选。而且，他也正在考虑此事。”肯尼迪知道，罗斯福是个不喜欢有潜在的篡权者的人。“罗斯福还有一个特点——有些人称为弱点——即对让别人来继任总统职务的建议感到愤慨，并且对一位被他的朋友视为优秀继任者的人态度非常不友好。多年来，罗斯福先生一直是我的上司，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不希望在我们之间会出现任何这种不讲道义的事情。”

肯尼迪坚持认为，纽约充满了谣言。“有关我能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问题最后还是被提出来了。对此，我认为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出了明确回答。我说，‘1932年我有幸为罗斯福总统效劳，努力完成他交给我的所有工作。国内外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很荣幸目前正在国外为国事而忙碌。如果我把目光紧盯着另一项职务，那就会完全辜负了总统对我的信任。’”

罗斯福并不认为肯尼迪的话有趣，也没有被这番话冲昏了头。他并不认为约瑟夫·肯尼迪将会是个“称职的继任者”，他的确发现肯尼迪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通过各种不同的秘密途径，包括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罗斯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看到了肯尼迪写给克罗克、巴鲁克、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沃尔特·李普曼以及其他人的信件。这些信件不仅严重超越了大使拥有的权限，而且让罗斯福详细地了解了肯尼迪的绥靖思想

肯尼迪传

和狡诈的野心。

当然，罗斯福还没有肯定自己是否要争取第三次连任，因此对自己内部想要接任的人十分敏感。1938年6月21日，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肯尼迪，表面上是想从这个人的嘴中了解一些英国当前的情况。然而在接见之后他便流露出了对肯尼迪掀起“竞选总统的小热潮”的不满。此事第二天在《费城询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上被揭露出来。据一位记者说，肯尼迪和罗斯福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有明确证据证明肯尼迪希望利用英国宫廷作为其在1940年入主白宫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认为，如果能说服大家让我在立法机构的行政会议上对外交委员会及参议院发表讲话，那将是很有好处的事情。”这是肯尼迪1938年5月给克罗克写信时所说的话，“我觉得我在英国呆了多年必然有些很有趣的经历，而且我认为这些经历一定会改变他们的决定……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请你发表文章宣传一下。”这封信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注意，而且还在白宫给特定的一些记者展示过此信。

正如肯尼迪满怀愤怒地回忆的那样，《芝加哥论坛报》“将我写给我的朋友们的私人信件说成是一封充满内幕并旨在怂恿我的朋友们开展一场对我有利的宣传运动的‘政治’信件。该报还指责我想带一名记者回到伦敦，以便让美国公众能经常看到我的名字。”

当肯尼迪看到《芝加哥论坛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坏的名声。由于哈佛没有授予他荣誉学位他感到很难堪，于是拒绝参加其长子的毕业典礼，相反，他和杰克却一起呆在海恩尼斯，谢绝任何记者的采访。6月24日，他和

罗斯福一起去白宫出席一个“愉快的晚宴”时，由于没来得及知道《芝加哥论坛报》刊载的那篇文章及其在整个美国所引起的风波而感到十分尴尬。次日他听说此事之后非常愤怒。“作为一名爱尔兰裔我感到一股怒气传遍全身，”他对兰迪斯说，“当时总统和国务卿赫尔已经走了，而我只能等到星期一才能找他们。”

对肯尼迪来说，在他的自尊心在哈佛受到重创之后，此事成了华盛顿政界黑暗无情的又一真实写照。“星期一那天上午我见到了赫尔先生并向他提出辞呈，他极力劝说我冷静下来，我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必担心，因为——就像他所说——‘那些事情全是他所为。他对我要比对你还严重几十倍’。”

虽然赫尔也是 1940 年总统位置的竞争者之一，但肯尼迪并未因此而感到安慰，他坚持要见总统的助手斯蒂芬·厄尔利。厄尔利曾透露过一件事：几年前，肯尼迪曾拿一大笔钱来贿赂他，让他帮忙增补一些政府薪金，被厄尔利婉言拒绝了。这次，他们的见面又是“不欢而散”。之后，肯尼迪要求与总统本人面谈，“我对他向来有话直说”。后来，他获知“总统与此事毫无关系，安慰我不必多虑。他通过恰当的方式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于是我又去了伦敦，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已经知道事情不妙了。”

事情的发展的确不妙。肯尼迪这次回国之后没有得到任何休息、赞扬和荣誉，也没有为 1940 年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做出任何准备，在白宫受到打击并失宠之后，此刻他正准备返回伦敦。他在白宫已经名誉扫地，被人看作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在回英国的途中，报界又对他发起了进攻。“这次，他们

肯尼迪传

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了一篇专门针对我的文章……这篇文章特别指出，作为萨默塞特蒸馏公司的主人，我在取消禁酒令之前曾利用过他来获得进口威士忌酒的某些特殊执照，为了答谢他，我将我的保险业务给他作为回报。文章还说，是他亲自和总统建议任命我到英国宫廷出任大使的。”

当肯尼迪大使重新踏上远洋轮船时，他已经很清楚，他赖以生存的新闻舆论这把利剑，同样可能毁掉自己。

慕尼黑的妥协

1938年，杰克和小乔随父亲一起前往伦敦，并在离开美国之前亲自参加了一个很糟糕的记者招待会。小乔在英国将担任肯尼迪大使的秘书，而杰克——按照父亲的命令——应陪他度过余下的暑期。

杰克并不讨厌此次旅行。去年，他曾经悄悄地到欧洲随意看看；如今，他却是作为大使的儿子公开乘船前往英国。阿瑟·克罗克后来回忆说：

在船上我们非常快乐……船上有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小乔很快被她迷住了，这使他的父亲很失望，因为他认为小乔这孩子有点太容易动感情了，也许这个姑娘只是在想方设法地勾引像他这样有身份、有金钱的男孩——我必须承认，这位姑娘的确很有吸引力。杰克晚上也是很晚才睡，他认识了一位女孩，我想他的父亲对此还不太清楚……不管怎么说，他对两个儿子宣布了禁令，并要求他们，午夜必须和他一起回到在他的套间里的舱房。第二天

午夜，他们按时回来了，但经过与我商量，我让他们从套间的后门溜出去了，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发现了没有。但不管怎么说，这项禁令没有维持下去。

罗丝·肯尼迪一直很忙，她没有和丈夫一起回到美国，整个初夏一直呆在伦敦，照顾她的父母以及监督她们初入社交界的女儿凯思琳疯狂的社交生活。在约瑟夫·肯尼迪出任驻英大使的这段时间里，罗丝决定应该让凯思琳、如有可能也让罗丝玛丽进宫去拜访英王。罗丝的丈夫担任驻英大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了挑选美国漂亮的姑娘觐见英王的传统。“从没有过任何行动如此受到过公众的称赞。”他后来开玩笑地吹嘘说。但肯尼迪保留了让自己的女儿、随身工作人员以及“作为美国企业代表而且已在英国定居的家庭中几位初入社交界的美国青年女子”觐见英王的权利。

后来罗丝甚至在七十高龄时还用华丽的语言热情称赞她为两个女儿挑选的莫利纽克斯和勒朗牌女礼服，以及她新结识的朋友贝斯伯勒夫人借给她的光彩夺目的钻石冠状头饰。不幸的是，这种类似于奥斯卡·王尔德作品中的情节无论对凯思琳还是对罗丝玛丽来说均带有悲剧转折的突然性。仅三年之后罗丝玛丽就做了脑白质切断手术。而凯思琳作为美国大使的满意的女儿，地位的突然升高为她开启了一扇扇罗丝从未想过会打开的贵族大门。比如，当天主教航海大王的儿子彼得·格雷瑟七月份到伦敦来“迎娶”他的未婚妻时，凯思琳甚至没老实呆在大使馆，更不用说到南安普敦去迎接彼得了。相反，她去了苏塞克斯郡赛马场，和那些全是新教徒的、更富有的英国花花公子一起下赌注。

肯尼迪传

罗丝·肯尼迪怎么也想不通凯思琳在一个新教国家认识了这么多求婚者之后，最后却选中了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不过，当时，罗丝正全身心地忙着安排每年7月4日在大使馆举办的舞会，于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凯思琳热烈地盼望着她的两个哥哥的到来。她在7月2日拜见英王之前就给勒姆·比林斯写了信，希望他届时光临。“当我遇到一群自以为了不起的笨蛋时，我就常常会想起你。”凯思琳在谈到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时说，“你和杰克让人多么开心，他们很少有人和我开玩笑。”

凯思琳果然没有失望。杰克来到英国后立即“走红”，而小乔却不然。据凯思琳的传记作者说，小乔的“举止生硬粗暴，而且幽默中带有讽刺意味，让人听了以后很不舒服。他缺乏像杰克和姬克那样迅速适应英国生活的技巧……一些上层社会的贵族女子对他偶尔表现出的色迷迷的样子和暴躁的脾气感到震惊。”

这和小乔在哈佛的行为一样，也是任何终极俱乐部不愿接纳他的原因。更糟糕的是，不久人们就评论说他总是像鹦鹉学舌似的模仿父亲的观点，无休止地谈论美国孤立主义，人们觉得在英国处处受到热情款待的年轻客人这样做很不礼貌。

相比之下，杰克常常被误认为是凯思琳的弟弟，他显得那么幼稚、又是那么瘦弱。那个夏天曾与凯思琳谈恋爱的威廉·道格拉斯—霍姆是在王子门宫邸认识杰克的，道格拉斯—霍姆回忆说：“我是他妹妹姬克的朋友，是从哈佛到这儿来度假时认识杰克的。在这之后我们常常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他特别回忆起他们第一次去皇家温布尔登俱乐部打球时，对该俱乐部助理教练的慷慨行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给我们俩每人一

箱高级高尔夫球，每箱 12 个”。在打完球回来时，这两个年轻人看到“在俱乐部大楼外一辆救护车把那个人接走了”。

正如凯思琳所设想的，道格拉斯—霍姆很快就与杰克成为好朋友了，因为杰克总能看到生活中有趣的一面——而且生活的有趣一面似乎总会给他带来回报。“他当时 21 岁，很年轻，对任何事情都很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仅对政治感兴趣，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任何事情都很感兴趣。”

根据休·弗雷泽后来的回忆，由于小乔是肯尼迪大使的长子，所以似乎比较严肃：“乔看起来显得比杰克更为成熟一些。杰克看起来很小，好像不到 21 岁的样子。我认为他头脑聪明、思维敏捷，与杰克相比，乔总是显得很严肃，而且……举止庄重。他是家中的长子，我认为肯尼迪家族对这一方面看得很重，因为他们的家族有点像个等级森严的组织。”道格拉斯—霍姆也表示同意：“乔比杰克更严肃一些。杰克在开展深刻的政治讨论的同时，总是不忘开几句玩笑，他有极强的幽默感。”

在幼年时杰克受过锻炼，在不断地患病期间又受过磨练，他的幽默就好像他的盾和剑。不论到哪儿他都一定要找到乐趣和带有刺激性的活动。他起初对相貌一般的妹妹凯思琳十八岁时竟然能成为英国美女而感到惊讶，但在同英国姑娘进行了几次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他不得不向她妹妹承认说，她的确“美丽无比”。据凯思琳的传记作者讲，“杰克曾经和一位约会对象在整个晚上只有一次开口说话——介绍她父亲花园外侧的一条小溪。”

“一些姬克的男性朋友对杰克能轻易获得女人心感到惊讶。”凯思琳的传记作者说，“杰克·肯尼迪刚到伦敦没多久时，有次在午餐时间，当他来到一家豪华餐馆时，整个餐馆立即变

肯尼迪传

得鸦雀无声。原因是他的臂上挎着一位十分迷人的美女，身穿一套灰色的两件式连衣裙，头上斜戴一顶漂亮的帽子。杰克把她介绍给大家说，她是‘宝贝怀尔德’——路易斯安那州的棉花皇后，刚刚到达英国为棉花业做宣传活动。”

当杰克到处风流之际，欧洲形势开始动荡起来。5月28日，希特勒命令他的将军加强德国的“后方”——齐格菲防线，同时集合了大约96个师准备10月1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开展“绿色行动”。用希特勒的话来说，这次入侵的目的是“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掉”。

约瑟夫·肯尼迪原来认定经济的不景气会迫使欧洲国家将精力集中在发展共同的经济利益上，而现在他的这种思想已经开始动摇了。由于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做所为，肯尼迪开始重视军事准备。在五月份他会见了后来被希特勒授勋的传奇式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登堡。林登堡向肯尼迪汇报，德国空军实力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强国的空军，因此试图以武力阻止德国是不可能的。喜欢统计数字胜过使用论据的肯尼迪迅速传播这一消息。的确，肯尼迪对这种复杂的外交问题不但没有保持距离，反而使自己投入到关于如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争论之中，他支持张伯伦的孤立政策，并帮助他反驳邱吉尔要求建立联盟的意见。德国驻英国大使冯德克森已经向德国政府汇报说，约瑟夫·肯尼迪也许是德国在伦敦可以结交的最好朋友。与此相反，邱吉尔却把这位美国大使当作英国最大的敌人。

这时候，杰克表现出了一个21岁年轻人的中立态度，他对肯尼迪大使在争论时称他为“傻瓜”毫不在意，并用他所熟悉的幽默方式来戏弄他的父亲。由于英国议会正在休会，罗丝

在法国南部戛纳的伊登罗克为全家预订了一套别墅，准备住两个月——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毫无缓解，罗丝的这一行动是项不寻常的乐观行动。肯尼迪在“八月初”与两个儿子一起去法国与她团聚，但令英国国王及女王懊恼的是，他不久就被邀请到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住处一起进餐。

据肯尼迪回忆，他和家人享受着“蓝色的地中海和到处都是阳光的沙滩、享受着假日的轻松悠闲、茶会、午餐会、晚宴以及高尔夫球的乐趣”，却对不断加剧的捷克危机不管不顾。到八月底，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已经失去了耐心，甚至肯尼迪也意识到“假期应该结束了”。于是他带着杰克于1938年8月29日晚乘飞机回伦敦，并在飞机上趁张伯伦及其内阁成员耽误拖延之际让杰克得到了一个前排座位。

全家一起在伊登罗克度假这件事对肯尼迪的观念显然产生了影响。在他定于8月31日在苏格兰要做的一次重大演讲中，这位大使计划问听众是否知道“世界有什么争执值得你的儿子或其他任何人的儿子为之失去生命？我也许不太了解引起世界动荡不安的可怕的理由”，他打算说，“但对于我的生命而言，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样东西值得让我为之流血牺牲。”

当希特勒正在试探民主国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之时，美国驻欧洲的首席代表的这篇讲话草稿是令人遗憾的，并立即被国务院命令销毁。令肯尼迪生气的是，国务院还将此事报告了罗斯福。

杰克经历了对父亲的演讲稿遭审查销毁的兴奋之后，在南安普敦登上了“布雷门”号轮船，于9月8日回到纽约，在那儿等待他的有比林斯，还有一群急于想了解他的父亲对欧洲形势如何评价的记者。杰克说不存在爆发战争或撤走美国公民的

肯尼迪传

问题，他试图减少对这场危机的舆论，并向记者指出，他家里的其他成员，包括凯思琳，明年将继续住在欧洲。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才刚刚开始。希特勒动员 96 个师并制定出详细的入侵计划不是为了消遣，他计划通过武力优势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部的苏台德地区。张伯伦飞抵德国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摆脱英法保证人责任的借口，对此希特勒很清楚。肯尼迪也很明白，他立即邀请林登堡夫妇从法国到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参加一次特别午餐会，将他俩介绍给一些英国政府里的重要人物，并请林登堡介绍他最近撰写的一份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的报告摘要。“他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立即让他口述一份报告的主要内容。他口述完后，我使用电报将它立即发回国内，”后来肯尼迪透露说，“并暗示国务院，总统以及海军部和作战部也许都会对它有兴趣……林登堡根据我的建议在以后的几天里与英国空军的高层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甚至肯尼迪还答应张伯伦，让这位已经年过七旬的疲惫老人在飞往巴特戈德斯贝格参加与希特勒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时能够得到一份林登堡的报告概要。

林登堡认为，目前德国空军力量已经超过了其他欧洲所有强国的力量总和，如果它要进攻英国城市，一天之内就可能造成七万人伤亡。因此在林登堡看来，最好避免战争发生，英法两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只能尽力满足希特勒的要求。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也会被征服。“德国在飞机作战方面拥有不可抵御的绝对优势，因此它在轰炸欧洲的任何城市时都只会遇到微弱的抵抗。英法两国的空中军事力量极弱，甚至都无法保护自己。”

肯尼迪在对独裁者采取绥靖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已达到、令人痛恨的地步。他向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指出，他每天都前往唐宁街 10 号英国外交部，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德国人显示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但事实正好相反：肯尼迪每天都对张伯伦、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以及前外交大臣霍尔不断地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抵抗，避免战争。他在到处散布林登堡的“军事末日”言论的同时，却忽视了英国最新情报中所谈到的情况，即希特勒自己的部下也反对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外交部常任次长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对肯尼迪说：据德军最高层的可靠情报说，“德国国防军并不支持可能引发战争的行动。他们担心德国无法打赢一场世界大战，并且认为，如果战败，那么将要签订的和平协议会把德国作为和平的破坏者永远地压在最底层。”肯尼迪将这份预测报告转交给了国务院，但他否定报告中的观点，并补充说：“据英国人说，德国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当他被问到“你认为美国将对欧洲战争做出什么反应”时，肯尼迪向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强调说，“除了知道我们要尽力避免战争之外，我对其他毫无兴趣。”他还请求罗斯福下达支持外交努力而不是敌对行动的命令。

肯尼迪对绥靖政策的坚持让张伯伦定下心来，但却压制不了英国内阁的主战派。张伯伦采取的绥靖政策获得的结果只是羞辱。他强迫安东尼·艾登辞去内阁职务，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他疏远罗斯福。他还不顾罗斯福提出的由他主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反而同意签署英—意协定并对希特勒做出进一步妥协，这又使他剥夺了让美国参与的机会。奥地利在年初已被德国完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被瓜分的危险境地。

1938 年 9 月 26 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全世界等着想

肯尼迪传

知道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什么样的讲话时，约瑟夫·肯尼迪暗地里给已经回到美国的克罗克写去了一封短信：“离希特勒发表讲话只有几分钟了……我感到非常烦闷，我开始考虑将罗丝和孩子送回美国，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知道要呆多长时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从他的信里可以看出他的紧张不安，因为他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场危机有多么严重。

罗丝当时还在巴黎购买衣物。她记得她的丈夫很敬佩张伯伦，曾经这样说过：“张伯伦真是了不起的人。”在随后就捷克问题进行议会争论之后，张伯伦非常直接地对肯尼迪表示感谢。肯尼迪说：“张伯伦非常友好地说，他依靠的更多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判断和意见。”数月之后他还向沃尔特·温切尔炫耀说，“林登堡对希特勒可能会进行空中打击的畏惧”，成了英国首相决定不让希特勒摊牌的关键因素。

正如 1929 年纽约发生“股市大崩盘”时他所做出的贡献一样，如今他也同样加速了欧洲民主国家的失败。“我们似乎必须在‘战争和羞辱’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邱吉尔 9 月 15 日就已经向莫因勋爵预言，“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选择谈判，趁机作好战争准备，然后再光荣地选择战争。”英国海军大臣达夫·库珀认为还可能有第三种选择：“不正式参战”，即当国家领导者们迫于舆论压力对自己抛弃捷克的做法感到后悔时，他们再站起来，打败希特勒这个战争狂徒。

然而，肯尼迪坚决不相信这一点，他没有想到邱吉尔获得的公众支持及其对议会的说服力会这么强大。肯尼迪在写给克罗克的一封信中说邱吉尔的说服力还不及最普通的国会议员。当听到张伯伦宣读希特勒答应在慕尼黑召开四国会议的消息时，肯尼迪兴奋不已，并且不顾下议院的所有礼仪，带头在

“贵宾席”上为首相的胜利欢呼喝彩，这使议长感到甚为惊恐。“当我离开下议院时，”后来肯尼迪描述说，“人群已经提高了声调，他们又是欢笑，又是喝彩，还向每一个过路人频频招手，并围绕在轿车的周围，兴奋地跟在车旁奔跑。我也很高兴。听说那天下午有个人笑容满面地走进大使馆说：‘好啦，朋友们，战争危险已经过去了。’”

那天晚上，在给美国国务院发过去的电报中，肯尼迪洋洋得意称：“整个伦敦的上空都弥漫着一种感觉，认为这次会议将会避免战争。如果战争能够避免，那么由于四国领导人一起开会以及罗斯福总统一向愿意谈判，这也许会成为可能再次意味着繁荣与和平的新的世界格局的开端。”

肯尼迪在绥靖政策和孤立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最终将会终止他在政治领域的生涯，这和他在股市上的恶名一样，将来都会成为其子女身上的一个沉重负担。不过眼前他觉得自己尚处于“赢”方，尽管当时英法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同意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这使美国担忧得更厉害了。达夫·库珀甚至以辞职来抗议，他强烈反对张伯伦支持“武力威胁论”。他说：“慕尼黑协定中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他这次侵略将会得逞，就像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通过恐吓、敲诈和胁迫，不用打仗阴谋就得逞了一样？……我也许毁灭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那无关紧要……我仍然可以昂起头来到世界各地去周游。”肯尼迪将达夫·库珀的辞职说成是“最普通的辩护”。张伯伦向这位美国大使承认，他“对达夫·库珀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但很高兴这位海军大臣能给我一个接受其辞呈的机会……他又和我握手，并坚持认为我必须继续做我的工作，因为他相信我有能力为世界和平做出很大的贡献。”

肯尼迪传

然而，公众在对“慕尼黑协定”欢欣鼓舞后不久就提出批评，当然，肯尼迪作为该协定的制定者之一也未受到宽容。肯尼迪本人回忆说：“在协议确定几天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对它表示强烈反对，我也未能逃脱那种诽谤和舆论攻击……甚至我个人的尊严也受到侮辱。在美国的某些报刊上，有许多报道说，在这场危机过程中，我是伦敦最‘紧张不安’的人，担心在那个致命的日子结束之前炸弹会落到伦敦城上。人们还指责我早早地就把子女转移到安全的爱尔兰去。这两种指责简直是对我的诋毁。”但他却忘记了当时他在给克罗克和其他人写信时的恐慌的心情。

10月6日阿瑟·克罗克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给肯尼迪回信，对他阿谀奉承说：“我认为你一直干得十分出色，而且我对大量歪曲事实的宣传感到非常气愤。我的一些朋友积极参与这种宣传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已经向其中的两位朋友提出了抗议，并责怪艾尔索普掌握的信息很不准确。”

难道真的不准确吗？肯尼迪为了感谢克罗克的忠诚之言，将其在棕榈滩的住房借给他过圣诞节。但是，肯尼迪在英国海军协会作了其臭名昭著的有关特拉法尔加战役纪念日讲演后，即使再拢络这位华盛顿记者，也不能使他免于受公众指责。

三年级成了优等生

杰克在哈佛上三年级时已经从他以前与托比·麦克唐纳一起居住的温斯洛普宿舍搬到了更大的住处，这次的住处是个四人套间，他与麦克唐纳以及其他两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查利·霍顿和本·史密斯住在一起。霍顿和小乔年龄一样。

肯尼迪传

霍顿对杰克邋遢的毛病感到很难忍受。“杰克从不把东西挂起来，他总是扔下就不管了。我们还专门雇了一个名叫乔治·泰勒的黑人，他负责整理我们的所有东西，他总是过来把衣服收拾好。杰克就是那种习惯，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有一次他换衣服准备出去时，”托比·麦克唐纳回忆说，“他把东西往地板上扔，我认为他在我们房间里到处乱扔，使得屋里看起来像要清仓甩卖一样。杰克却说：‘别假装干净了，我的东西扔到谁的东西上面了？’”

杰克在漫不经心的行为背后却十分敏感，霍顿对此印象颇深。“和杰克在一起生活很容易使人兴奋，他喜欢争论但待人友好，他对什么事都很好奇。我想他的求知欲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即他对你讲的任何事情都会提出疑问。他是肯尼迪家族中最具有幽默感的人。”

对于这点，学习政治学的唐纳德·瑟伯对此也非常赞同：

杰克是一个经常会提问的人，他对你的看法提出怀疑，但并不会使人感到不愉快，他会说：“为什么你产生那种感觉？为什么你这样想？”然后，如果他感兴趣他就继续问，再后，他吸干了这个“橘子”的汁，又去寻找另一个水果。他给你的感觉是，他是在向别人学习，并渴望向别人学习。他把别人看作是扩充自己知识的信息来源。他在问问题时不会否定批判你的看法，只是想学习你所知道的东西……

我认识很多浪荡公子，在我们房间的另一边我就能找到一个，但杰克不是那种人，他想玩的时候就玩个痛快，可是他的目的是认真的。你会觉得他早就把人生当做严肃

肯尼迪传

的事情来对待，并不一定要有很多钱以及其他别的东西，但一定要有一项严肃的事业。

从他身上，我不由想起了 A·E·豪斯曼的一句话：“别人心里想的是一时的好事——碰上好运、与情人幽会或名扬四海；而我的心里想的却是倒霉的事情，我正在为倒霉的出现做准备。”

杰克所寻找的并不是倒霉，但他无疑是强迫自己为倒霉做好准备，他决不是一个浅薄的人。

杰克打算今年用功学习。一月份时当他的父亲被任命为美国驻伦敦大使的消息刚一宣布，他就向学校提出了在即将到来的三年级里到英国呆半个学期的申请。这一申请得到了教务长切斯特·汉福德的批准，不过条件是杰克必须在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 月期间获得六门而不是四门功课的学分，才能前往伦敦。

杰克的老师和同学对杰克在三年级的变化感到吃惊。据托比·麦克唐纳说，杰克“在大学前两年并不是那种用功的学生，他那时纯粹为学习而学习，并努力取得好成绩……我一直认为他对大学的学习并不感兴趣，到三年级，战争似乎使我们许多人都长大了，特别是杰克，他好像已经认识到生活并非全是快乐和消遣，生活是非常现实和严肃的事。”

事后来看，可以说，那个夏天杰克在英国出尽社交风头，成为焦点之后，觉得最好的消遣和娱乐是在伦敦，因此下定决心不能因为课程不及格而失去这次出国机会。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他确实以令人惊讶的热情投入学习之中。霍尔库姆教授在前一年教授政治学基础课时，在 500 名学生中杰克一直“处于

下游”，霍尔库姆也一直“不知道杰克还在听他的课”，而且确实没有尽力去“与学生接触，除非他们有了问题……他们只是上课时才能见到我，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曾接触过一些上这门课的学生，他们要么不知道我的名字，要么弄错我的名字；甚至有个学生叫我霍坎姆教授，这自然不能给我留下好印象。”

霍尔库姆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哈佛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好的看法。“当然，肯尼迪是个年轻人，他和众多有钱的年轻人一样来哈佛念书，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序曲，他对生活远比对学习感兴趣。”

因此，杰克竟会选修霍尔库姆的三年级课程，这使这位哈佛教授感到难以理解。“第二年他选读了一门高级课程，就是我过去常给那些学习美国政治学的三四年级学生教授的课程。他为什么来上这门课我并不知道，不知是我在授课时讲的什么内容使他产生了兴趣，还是我的助教——十几个助教——在进行小组讨论时有什么内容……也许是因为在他的家庭中，大家对公共事务和政治都很感兴趣。”

霍尔库姆年老、固执而且呆板，他说：

很多年前我曾经教过杰克的父亲，我也教过他的哥哥，后来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当然，这一家人对政治都感兴趣。但杰克·肯尼迪上大学时，政治并非他的主要兴趣。肯尼迪家族一直打算让他的哥哥小乔从政，由于其家庭相当富有，他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小乔似乎具备一名政治家应该拥有的一切素质：他为人随和、目标坚定，他具备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很明显，当

肯尼迪传

时肯尼迪家族认为，一代人当中只能有一人真正从政，至于杰克，按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他对历史更感兴趣而且很有前途。

他和一群活泼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当然，我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我只清楚他们的课堂作业和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

霍尔库姆从不认为杰克是一个等闲之辈。“他在和他一起生活的那群人中出类拔萃。他们考试全都通过了，当然，杰克的成绩更好一些，不仅仅是及格。”那是“一群认为上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人。他们对生活更感兴趣。但与大多数在大学时为所欲为的学生相比，思想观念更能吸引杰克的兴趣。也只有他对思想真正地感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

霍尔库姆说，如果说杰克对成为政府官员没有任何兴趣的话，那么他对调查一名典型的政治家的压力、责任和表现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兴趣。

可以告诉你，我在认识他时所教的课程……过去常被学生叫做“政治学7”，在这门课程中，我教授政治学研究，我把它当做一门科学，就像讲授自然科学那样授课一样……

我的授课方法是给每位学生分配一名国会议员以便让他们进行调查研究，最好是研究自己地区的国会议员。但如果有很多学生来自同一地区……我就只能给他们挑选一些其他地区的国会议员。至于肯尼迪，他来自波士顿，恰好班里有很多来自波士顿的男孩子，而且他又是个民主

党，我想，如果让他研究其他地区的一名共和党成员，他将会学到更多东西。我给他挑选的是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名议员——事实上这名议员来自纽约州北部的波茨坦地区——他是电力集团的颇具有影响力一名的代表，名叫斯内尔，伯特伦·斯内尔。他在全美并没有知名度，但在当地的共和党成员中属于杰出人物而且在华盛顿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中是一名很有影响的成员。

授课的方法就是我每周会布置一个专门的问题。第一周的问题是，你的国会议员在选举中是如何投票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国会记录中查到，也许需要做些考证，但事实是确定的。第二周的问题是，他有什么政治主张？第三周的问题是，他在自己的组织中做了些什么事情等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将持续整个学期。其宗旨是首先要了解这位国会议员从政的目的，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努力为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为私人利益或地方服务？

然后，要调查这位国会议员的工作手段。他发言很多还是很少？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是努力实现组织的利益还是根本见不着人影？最后是这位国会议员的工作表现。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是否利用自己的职权使一些私人议案获得了通过？他在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上对众议院的行为施加压力了吗？他是不是一名很优秀的议员？

学生必须汇报他们研究的结果并分析出他们的重要性，因此这一研究过程有三个步骤，就像进行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了解实验的性质：这里指一位公民从他的代表身上了解到了什么；第二是证据：经过研究你发现哪些东西是事实；第三是从你的观察中得出了什么推论。

肯尼迪传

在化学实验室里，观察到一个试管里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其实这并不难；但在研究政治学这门学科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学生寻找证据，并且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研究的那位国会议员总结出自己的结论。如果对整个国会进行一次平等的抽样调查，你就会得到一组调查结果，这些结果会使你对国会这个政治机构的性质有更透彻的了解。

霍尔库姆的学习方法引起了杰克的好奇心。“我过去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当他们与别人探讨公共事务时，他人经常会提出个人意见。”霍尔库姆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学生必须能掌握分寸克制自己，“你不能只是反驳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你要问他的意见有什么根据，他的结论依靠什么事实来证明，他得出结论的方法是什么？这是对付与你意见不一的人的最有效办法。”

霍尔库姆不久便发现杰克·肯尼迪是一名爱学习的学生。“他对待学业具有公正和客观的天性，”霍尔库姆回忆说，“他对这种方法很感兴趣，并且非常感兴趣。”

霍尔库姆的回忆很重要，虽然他思想传统、自命不凡、唠叨不休，而且很少夸奖别人，但他是哈佛第一个了解到杰克·肯尼迪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人。不过，杰克和霍尔库姆一样从未想到将来他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我不能肯定他将来要干什么。有时人们认为他想在大学教授历史，有时又觉得他想办一份报纸；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选择。”

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是哈佛的教务长，和霍尔库姆一样，切斯特·汉福德也意识到杰克·肯尼迪在思维活动方面已日趋成

熟，他的兴趣是在全国性政治上而非地方性政治。“直到 1938 年夏，我才认识他本人，”后来汉福德教务长回忆说，“那时，他报名学习‘政治学 9a’，一门美国州政治学课程，由我在‘23 单元’中讲授。”这门课程很少涉及个人，它“强调的是这样一些主题，州组织的发展、州长职务、州立法、行政组织问题、州司法、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州政治。”在汉福德印象中杰克是“一个身体瘦弱、讲话不多但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单纯的面孔上时常挂着一副好奇的表情。他始终按时上课并积极参加课堂讨论，在讨论时发表的意见符合主题。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甜蜜的非茨的这位外孙对在课程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州政治没什么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州与州之间关系变化、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以及州组织结构的发展。”

杰克感兴趣的是华盛顿同 50 个州的关系，虽然他很爱他的外祖父，但他无法使自己认真地对待对州和城市的政治。他和哥哥小乔曾写过一首诗来祝贺甜蜜的非茨在二月份的 75 岁生日，其中写道：他是“波士顿人的坚定保卫者，/无助的人的关心者，/可敬的领导人，第一个获得‘波士顿最伟大的州长’这一称号的人。”但杰克对城市表面的运作只是觉得有趣而并不欣赏。“今晚是波士顿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同寻常夜晚，”他在十一月份给自己父母写信说，“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阁下要发表一篇赞扬他的好友詹姆斯·迈克尔阁下的演说。政治可以使人们成为同床异梦的好友……今天上午我参加了第一门考试，而且感觉考得不错，以后两周里还有三门考试。”

如果说杰克给教授们留下的印象是，相比而言他对学业似乎更感兴趣，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女人或社交失去了兴趣。从英国回来后他写给比林斯的最开始的信都是关于聚会以及哈佛在

肯尼迪传

橄榄球方面胜过普林斯顿的内容。他十月份在信中写道：

老朋友比林斯：19日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信中写的都是一些琐事。人们引用哈佛校队的很多队员的话说：“连续举行了四场艰难的比赛——谢天谢地，我们是同普林斯顿进行比赛。”然而，由于过去的比赛记录，我赌一美元的结果是双方胜负各半。我会努力安排一张床位——但我觉得你真该死。说到该死，那天晚上在科德角你觉得怎么样？我有个约会……无论如何要设法找个姑娘，但要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打算，以便我能尽量安排她参加琼妮的聚会——你带来的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参加。尽量让霍顿以及奥斯本和佩尼斯·派恩到这儿来——最诚挚的祝愿，肯。

信的后面还有一个附言，提醒比林斯“带个约会对象去观看11月19日哈佛对耶鲁的那场比赛，我们准备在布朗克斯维尔开个聚会”。

在这种频繁的活动背后，杰克的身体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几天之后，杰克透露说，他刚刚写信拒绝了佩吉·谢尔顿的邀请，因为他猜测星期六要做很多事情。“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向比林斯解释说，“自从我回来后身体一直很差，似乎有些退步，所以我根本不打算出去，我担心这样下去会让我彻底垮掉。应邀做客听起来很不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身体很差”一点儿也没夸张，杰克的医生要求他上医院接受仔细检查，但他拒绝了。他向比林斯炫耀说，“虽然哈佛队很糟糕，但知情的投机者仍然认为，哈佛会轻易地把普林斯顿打败。”这一预言正如他很得意地告诉父母那样，很快就变

为现实，“近来一直很好，我感到身体比以前强多了。”他撒谎说，“我昨晚参加了外婆的生日聚会——她的身体比我以前见到的要好——她周六还出去观看了普林斯顿同哈佛的比赛，结果是我们以 26 比 7 获胜。”托比·麦克唐纳曾经“三次攻入对方端区持球触地得分然后激动得满场飞奔”，而他的另一位室友本·史密斯则使教练蒙受了耻辱，杰克知道这会使他的父亲的那颗充满抱怨的心感到好过一些，“我们的好友迪克·哈洛让他上场在比赛仅五分钟时就得了 1 分，这使我们感到很高兴，却令迪克有些失望。”

然而，杰克为了去英国，不仅隐瞒了他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没有说出他父亲在发表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纪念日讲话之后在美国报界引起的强烈的批评。约瑟夫·肯尼迪自己也说：“正是由于这一思想——即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我们就应该在独裁国家和自己之间实现某种妥协——才引起了美国报界相当一部分人的指责。这种幼稚的思想被认为与罗斯福总统在其著名的‘隔离’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不符。人们趁机大做文章，认为这将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当报界提出这一观点时，国务院大吃一惊，赶忙通过赫尔先生和公关官员否认了早些时候对那篇演说的支持。”

约瑟夫·肯尼迪指责“从许多犹太人出版商和作者……所采取的策略中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满怀热情、毫不犹豫地采取诽谤和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当然不是他们惟一的进攻目标，但我没有逃避他们的攻击”。肯尼迪满腹怨言，不明白他当时提出与纳粹和解的要求为什么一定要被认定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肯尼迪自己的政策。

许多方面都要求解除肯尼迪驻外大使一职。罗斯福原打算

肯尼迪传

让肯尼迪在伦敦只任职六个月，这一期限早就过去了，然而，与其把肯尼迪调回美国，让他不受限制地发表演说，还不如把他继续留在伦敦，这样对罗斯福更加有利。因此，罗斯福只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含蓄地指责这位大使的言论，而肯尼迪却将这篇讲话称为在他“背后捅了一刀”。

小乔在巴黎的布利特大使那里完成了工作之后，回到伦敦帮助他的父亲。他认为父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罗丝也是这样认为。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的遗孀阿斯奎思夫人称“慕尼黑谈判像‘德雷福斯事件’一样将英国分裂为两个阵地”时，罗丝，这位美国大使夫人坚定地将自己划入慕尼黑阵营之中。“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她当时给一位朋友写信说，“在乔看来如果再爆发战争，那将会导致文明的终结和世界局势混乱不堪——而且捷克人自己的境况也决不会有什么好转。”

小乔也这样认为。他在给美国的一位老校友的信中说，“德国仍在到处开火，他们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但是要想阻止德国获取它想得到的东西并不容易。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爸爸因为发表演说试图与德国独裁政府和解，引来美国报界的许多批评。令我感到难过的是所有人都在试图让大家团结起来反对独裁，”小乔评论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好与独裁政府战斗的准备，那我们不妨与它们和解。”

多年来约瑟夫极力讨好或收买的许多以前的忠诚的支持者们开始掉转头来反对他，特别是对德国恶毒的仇视犹太人的情绪感到恐慌的美国犹太人。最高法院院长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猛烈地指责罗斯福说：“我不知道肯尼迪是否了解一位美国大使公开讲话的意义。对独裁政府表示公开赞成——即使是部

分的赞成——也会对他自己有利。”甚至沃尔特·李普曼也在其报纸的辛迪加专栏中指责肯尼迪，而《华盛顿邮报》更是谴责美国驻伦敦大使居然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变成一种绥靖政策。《纽约邮报》抗议说：“肯尼迪大使竟然建议美国同一个要摧毁美国民主和自由的人交朋友……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杰克看到父亲受攻击感到非常难过，为表孝心，他试图将父母的注意力从遍布美国的批评中转移出来，他向他们详细描述了最近一部在纽约上演并突出表现肯尼迪家族的戏剧《交给我办》。他解释说，剧中主人公“有五个女儿，是驻俄国大使的夫人，她说要是还能够有四个女儿的话，她就会前往伦敦”。不仅如此，“她还制订出计划，按照每年生育一个的速度，到1943年她仍然无法替肯尼迪家族完成生育目标。剧中的另一部分，还有斯大林和维克托·穆尔一起在红场参加一项重大庆祝活动的场面。在此剧的中间，她说，‘我敢肯定到目前为止肯尼迪家庭的知名度已经达到顶峰了’。这出戏非常有趣，那些关于我们的笑话，先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反正到目前为止已经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热闹的肯尼迪家族使得被称为“肯尼迪事件”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纪念日演说不再那么令人痛苦。“还有海军节演说，”杰克写道，“它似乎并不受犹太人的欢迎，但任何一个不是彻底反对法西斯的人都觉得它很好。不过确实每一个人都极力反对集体安全这一说法。”杰克补充说。他对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把握。

然而，如果没有集体安全，那些欧洲小国怎么有实力与独裁者的军队交战呢？这是杰克新的助理教授、辅导教师布鲁斯

肯尼迪传

·霍珀提出的问题。

杰克以前的辅导教师 A·S·达施佩特一直很谦虚、对学生没有启发性，而这位布鲁斯·霍珀教授则是个喜欢表现自我的人。他相信博览群书的作用，但其善于表现的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哈佛同事所采取的超然客观态度的一种抗议。他认为民主不仅是由原则而且是由那些愿意捍卫原则的人来确定的。

美国驻英大使在阿伯丁宣布，国际关系中任何争端都不值得他的子女为其献身。霍珀对此表示异议。“布鲁斯·霍珀是一个好战的人，”吉米·鲁斯马尼埃回忆说，“我们上大学时的一项传统就是庆祝 11 月 11 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而每到布鲁斯·霍珀总要做演讲……每到停战纪念日那天，他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布鲁斯·霍珀则穿着一件破旧的战壕雨衣——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不管天气是冷是热，他都会穿着那件有纪念意义的战壕雨衣，这已经是一种性格化。他还颂扬第一次世界大战。每年如此，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以每一种方式来表示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并为此尽心尽力。”

霍珀在随后的两年中对杰克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与他的父亲——美国最著名的绥靖者对他的影响起到了平衡作用。

然而，虽然杰克拼命想取得好成绩，以便能前往伦敦，但他无法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之中，因为一位令他心荡神驰、美丽无比的新星弗朗西丝·安·坎农闯入了他那动荡的社交生活。

求婚风波

自从杰克与奥利夫·考莉的关系逐渐冷淡，最后完全分手

之后，弗朗西丝·安是杰克迷恋上的第一位姑娘。他的室友查利·霍顿后来回忆起弗朗西丝·安对温思罗普宿舍三年级的学生的影响：“F·A·坎农确实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我不清楚是谁先发现安的，或者是杰克，或者是我。确实，我当时对她紧追不舍。弗朗西丝·安不仅是个才女，而且身体健康，她喜欢打网球和滑雪。”

然而，杰克之所以被吸引住并不仅仅是因为坎农小姐喜欢打网球或滑雪。她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康尼·伯韦尔认为她是“我们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之一，而且非常聪明……她的年龄和杰克大概差不多。弗朗西丝·安一向对写作和政治感兴趣……是的，杰克的确被她迷住了。”

杰克首次和比林斯提起弗朗西丝·安时是在1938年10月，当时他向比林斯解释了自己拒绝佩吉·谢尔顿邀请的“真正原因”：身体不好。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坎农小姐。“我的缺席会使她的聚会十分扫兴。”杰克谈到佩吉·谢尔顿时说，并请求比林斯一定要代他去参加佩吉的聚会，“我一直在科德角度周末，并准备于本周六晚上和弗朗西丝带麦卡杜一起开车前往。F·A·坎农在这儿玩得很痛快。本周末她也许会来。”

从此以后，弗朗西丝·安这个名字就出现在杰克写给比林斯的每一封信中。他不仅带她观看了在十月份举行的哈佛与普林斯顿的橄榄球比赛以及十一月份在纽黑文举行的哈佛与耶鲁的比赛，而且还邀请他所有的老朋友同她见面。

后来杰克的妹妹尤妮斯认为这段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他经常带弗朗西丝·安出去玩，”尤妮斯说，“他曾带她到我们家去过几次。我很喜欢她。我认为杰克是没有想

肯尼迪传

过要与她结婚的……他当时的那个年龄段是不会对结婚感兴趣的，我想我们当中没有谁会对结婚感兴趣。我们都玩得很开心，而且我的父母从未鼓励过我结婚，”她补充说，“我的父亲非常希望我们都呆在他的身边。”

正如勒姆·比林斯所总结的，尤妮斯后面讲的那句话完全属实。“肯尼迪的女儿中没有一个是在三十岁之前结婚的。经常有一些男孩子在周末来看望肯尼迪的女儿，但很少有人成为回头客的……我总是为他们感到遗憾……我想像不出自己要是周末作为肯尼迪的一个女儿的客人会是什么样子。肯尼迪家里没有人对这些姑娘的约会对象有所关心，”比林斯回忆说，这一点肯尼迪夫妇已经向那些求婚的男士早已明确地表示过，“这一切肯定是令人非常痛苦的经历。”比林斯猜测说。

由于对父亲感到敬畏并认识到父母的大力阻拦——“我不记得她们说过‘难道你怀疑他将来会是一个好丈夫吗？’”——因此，尤妮斯根本不认为杰克会过早涉入婚姻。但比林斯更了解杰克。倾诉心里话是他和杰克之间的“一条共同的纽带”。“他从未对我有什么隐瞒。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彼此分享对方的秘密……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告诉我，从不对我隐瞒什么。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这么密切呢？也许是因为他确实对我无话不说。这些事情当然不能讲给他的家人听。”比林斯透露给一位采访者说，“我比他的家人更了解他的私生活。”

里普·霍顿也同时被坎农迷住了。“我记得在纽约曾经与杰克和弗朗西丝·安一起出去过。她的确是一位非常妩媚动人的姑娘，”霍顿回忆说，“我认为她是与杰克约会过的姑娘中最有魅力的。她相貌漂亮、思维敏捷、富有刺激性，是一位很出色的姑娘。我记得简和我曾同他俩一起赴约。我记得当时自己心

里想，‘天哪！杰克为什么不和她结婚？’”

事实上，杰克的确想过与她结婚，不过使查利·霍顿感到遗憾的是，杰克放弃了求爱的通常惯例。“我确实认为他不是会讨女人喜欢的男人，”霍顿说，“我想他是不会花费时间去追求一位姑娘，因为女人并不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觉得他不在乎……我认为他从不向姑娘求爱，并对她说她是多么美丽、多么甜蜜。我认为他没有那样说过……我认为他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也并不依赖同姑娘的交往。他总是觉得在他需要时姑娘是个有用的东西，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她们放回原处。”

比林斯同意霍顿的观点，认为杰克并不是把女人作为朋友，而只是当做晚上的伴侣——同床共枕、进行炫耀、然后抛弃。但他对 F·A·坎农则不同，甚至连霍顿也承认这一点，“后来，我发现杰克对待安比我想象地要更认真。她有一颗极其善良而敏感的心。”

正如杰克向比林斯讲过的那样，弗朗西丝·安确实“决非平庸女子”。她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校毕业，曾在 1937 年在英国觐见过英王，后来去波士顿韦伯工商学院学过工商管理课程。除了受到良好教育外，她的家庭背景也非同一般，她的父母拥有大量财富，属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坎农·米尔斯家族。但她是个新教徒，这便给杰克带来了一个难题。

杰克并没有气馁，而是尽可能多地主动约她出来。这段恋情丝毫没有分散他在学习上的注意力，而是激发着他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要想被看作一个真正的求爱者，他就必须向她的父母证明，他不只是一个寻找异性伴侣的波士顿爱尔兰裔天主教男孩，而且还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

肯尼迪传

在这方面，杰克的财富相当具有吸引力，但他父亲糟糕的名声是个负担。由于战争在欧洲逼近以及他父亲的政策越来越引起争议，这使得一些旧的偏见肯定会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满足于在广播里对肯尼迪发表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纪念日演说进行暗地里的否定。当肯尼迪一家的其余成员在瑞士滑雪时，肯尼迪先生被命令返回华盛顿，并且立即受到了总统的“严厉批评”。此时，甚至连肯尼迪也已经意识到——正如他向记者承认的那样——慕尼黑事件之后，“绥靖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过他更担心的是“经济混乱”而不是爆发战争。“我在1938年12月抵达纽约时几乎没有感受到我六个月前回国时的那种欢快气氛，”肯尼迪回忆说，“我肯定慕尼黑协定迄今为止尚未带来人们希望见到的结果。”

肯尼迪同罗斯福在白宫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他想讨论一下在“纳粹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犹太人目前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困境之中”。甚至后来肯尼迪也承认，“总统对张伯伦所采取的警惕地等待希特勒行动的政策有点不耐烦了。他认为使用一些武力威胁要比继续进行公平合理的交易更容易起作用，而且他说自己打算实施小规模的措施。”

在哈佛的这一学期即将结束之际，杰克来到华盛顿完成他对国会议员斯内尔的调查研究，而他的父亲则回到了棕榈滩。“他对这次研究如此认真，以至于在圣诞节到来时，他还去华盛顿拜访他父亲的一些朋友，并对他研究的那位国会议员的工作情况有了明确了解。”霍尔库姆教授回忆说，“他的调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对那位国会议员所做的调查报告称得上是一篇杰作。杰克对政治活动是真正地感兴趣……如果他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他就会把全部热情和精力投入其中，就像他在参加游

泳队或其他任何活动时一样。通过这次调查，他不仅对以前清楚的共和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国会这个政治机构有了更深刻的评价，这一评价比大多数人对政治机构的评价更具有充分的依据。”

当杰克后来和他父亲见面时，他发现那儿有一大堆记者。肯尼迪大使意识到罗斯福对他在伦敦的行为并不满意，于是邀请了一些专栏作家博克·卡特、沃尔特·温切尔和阿瑟·克罗克同他一起讨论当前形势前景问题——这一行动使得《波士顿先驱报》驻华盛顿记者亨利·埃利希刊登了另一篇报道。报道称肯尼迪正在考虑将来参加总统竞选运动，并说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已成为他争取总统提名的“一个宣传局”。

罗斯福对六个月之后报界再次掀起肯尼迪的“竞选总统宣传的小热潮”感到非常不满。虽然肯尼迪已经预订好票准备于2月24日和杰克一起返回英国，但罗斯福坚持命令这位大使立即离开美国，他觉得肯尼迪留在英国要比呆在棕榈滩策划阴谋所带来的麻烦更少一些。于是，肯尼迪在2月9日便登上了“女王玛丽”号离开了美国。

至于杰克，他必须返回哈佛参加期中考试。“杰克·肯尼迪清晰准确、独具风格地回答考试问题的能力及其设置主题的结构”给他的教务长、政治学教授汉福德“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写的那些关于选择阅读的论文尤为突出，这些文章组织有序并且看得出他是经过了独立思考，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书法有时写得很潦草。他在政治学9A这门课中获得了B这样的好成绩。”汉福德回忆说。杰克在历史、政治学和英语作文等其他五门课中也都获得了优异成绩——“这对于一个学习六门课程的学生来说是很不错的。”汉福德强调说，“杰克在

肯尼迪传

这学期的成绩不仅显示出其智力天赋，而且使他有望在未来的生活中能了解到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困难局面并有决心去处理它们。”因此，汉福德毫不犹豫地建议哈佛行政委员会同意杰克半年休学的申请。

然而此后，杰克却被迫住进了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再次接受连续的医疗检查。他很痛苦地给比林斯写信说：“要是我能离开这儿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总是对我瞎折腾，让我感到不习惯。”杰克说，“实际上我得到的也确实是瞎折腾，因为他们规定我每天必须三餐都要吃土豆和米饭。护士很不错，照顾得十分周到，她们让我翻过身来趴在床上，把那根管子放到我的屁股上，这时她们似乎对我失去了刚才带有的兴趣，不过，那是在她们瞟了一眼我的棕色大生殖器之后。”

父亲很快离开美国，对杰克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因为一旦他从梅奥诊所出院，便将成为布朗克斯维尔和海恩尼斯港以及棕榈滩的惟一主人。因此，当他的父亲离开纽约时，杰克便飞往佛罗里达在他的家庭别墅里住下来。情人节之前，他给比林斯写信说，他已经“约坎农上这儿度周末来了，并且我们玩得非常痛快。祝贺你成为优秀学生——我也在名单里面，所以也应该庆祝一下。我将于星期三晚上 11 点左右到达纽约，并将于星期五下午动身。如果你到时也前去的话请尽快通知我——尽量和我一样找个女友。让里普尽量抽出时间去一下。”他命令说。

弗朗西丝·A·坎农已牢牢吸引住了杰克。她通知杰克，她准备去新奥尔良参加狂欢节，于是杰克带着一个小提箱立刻追赶过去。杰克在普林斯顿的朋友罗伯特·沃姆斯利和弗朗西丝·坎农一起在机场迎接他。沃姆斯利后来回忆说：“她问我是否

能够带她去机场接杰克，我便带她去了。那时候乘坐飞机的人很少，我是杰克在这里惟一认识的人。他没有带晚礼服，而晚礼服在这里是必须要穿的。于是我把小乔的一套借给了他，我哥哥身高 5 英尺 4.5 英寸，体重 190 磅。”杰克要比沃姆斯利的哥哥高 6 英寸，但体重轻 40 磅。“他穿起来非常合适，”沃姆斯利越说越有兴趣，“关于他这次来访的情形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大概印象只是杰克……在拼命地追求弗朗西丝·安·坎农。”

“他是第一个和我谈恋爱的人，他曾经向我求过婚。”弗朗西丝·安·坎农和她的朋友康尼·伯韦尔说。她的另一位朋友简·苏伊德姆后来回忆说：“关于杰克，弗朗西丝·安和我谈过很多次。她说这是一段很浪漫的爱情，但她的父亲决不让她嫁给一名天主教徒。”

这种宗教偏见对杰克和他的朋友来说的确是打击。“我认为她是新教徒并不会有多大影响，”杰克的天主教朋友里普·霍顿遗憾地说，“杰克是一个坚信基督教的人。”

杰克原计划去欧洲住六个月，现在也只好暂时推迟一段时间。康尼·伯韦尔说：“据我回忆，坎农妈妈曾经试图拆散她女儿同肯尼迪的关系。”她记得坎农夫人“后来带着女儿乘坐‘昆肖尔姆’号游轮周游世界，一去就去了四五个月。”

杰克失望地回到了纽约。1939 年 2 月 24 日，他带着一只装满衣服和书的大箱子，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在坎农夫人带着女儿环游世界的同时，杰克决心去伦敦“炫耀一番”。

约翰公爵

杰克在离开美国之后的第二周写信给比林斯说，跨越大西洋“条件十分艰苦”。与此同时，小乔很神气地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杰克将于二月份到英国接受教育”。到时候，他将作为一名大使馆的非正式观察员前往西班牙，他的工作由杰克接管，陪伴他的父亲同时担任他的秘书。“我过得开心极了……每天都在工作，还同爸爸一起赴宴。”杰克对比林斯说，“今天早晨我在利维宫廷拜见英国国王。觐见英王一般在上午进行，你得穿燕尾服。国王站在那儿，你走上前去向他鞠躬。我见到了女王玛丽并和王妃伊丽莎白在一起喝茶，和她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杰克炫耀说，“星期四晚上我准备穿着新丝绸齐膝短裤去宫廷，这条裤子紧贴着我的胯，我穿起来显得非常尊贵。”

不过，能与英国国王、王妃和女王闲聊对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是获得更大荣誉的前奏。杰克和比林斯曾在1937年见到的教皇庇护十一世已于1939年2月病逝，并由红衣主教帕切利继位。尽管美国政府为了是否要向当时正在德国、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权正进行着关键部分的磋商，但肯尼迪却一直在打搅国务院，直到总统通过电话批准他参加1939年3月12日在罗马举办的新教里加冕典礼他才停止打搅。然而，罗斯福在作这项批准之前做了一项令人意外的补充说明：“1940年后，我准备当观众而不是当演员。”194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争从此开始了。

“星期五我动身去罗马，因为爸爸受罗斯福委派参加教皇

的加冕典礼。”杰克向比林斯解释说，“迄今为止情况一直很好，而且自我感觉也很不错，因为我将穿着新礼服参加工作。如果你夏天到这儿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开车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希腊，以便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艺术。不过，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你到纽约为我送行。我离开纽约后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感到心里很不痛快。”他自嘲说。

肯尼迪夫人再次离开家人，独自呆在埃及，这时她得到了教皇去世的消息。她从开罗直接飞往罗马。她的丈夫在杰克的陪伴下从克罗伊登机飞往巴黎与一些法国部长举行会谈。除了小乔仍留在马德里没有动身之外，肯尼迪家的其他子女和一名女总管以及埃迪·穆尔则坐上了火车。在巴黎，他们在通往罗马的快车上租了一整节卧铺车厢。当他们到达罗马时，他们受到了美国大使以及北美大学里的那些穿着长上衣的男孩子的欢迎。

不过，肯尼迪一家来了十人而非一人，人多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还出现了滑稽可笑的场面。约瑟夫·肯尼迪回忆说，意大利外交部长查诺伯爵、墨索里尼的女婿“就在我前面”走进了梵蒂冈大教堂。“当他迅速穿过教堂时，他向左右的人又是鞠躬又是微笑，还敬法西斯礼。我在当时当地就将他看做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穆戈’”，肯尼迪说。但肯尼迪没有提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根据红衣主教蒙蒂尼后来回忆，当查诺发现自己在官方使团楼座上的席位被肯尼迪家族的十名成员占有时，他非常生气并威胁要“离开梵蒂冈大教堂，不出席典礼了”。虽然此事后来得以解决，但听说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奥康奈尔还一个劲儿地说：“噢，乔会知道这件事吗？”

约瑟夫·肯尼迪的回忆很有意思。当他看到这种奢侈豪华、

肯尼迪传

别具风格的天主教庆典时，他禁不住流下热泪，并对查诺的庸俗感到愤怒。在美国驻罗马大使举行的一个聚会上，肯尼迪听说许多“漂亮的意大利姑娘都被邀请来服侍查诺，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查诺就不肯来”。肯尼迪发现“与查诺伯爵进行任何连续的交谈是不可能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将姑娘勾引到墙角进行交谈，而且他甚至不愿意与你认真地谈上五分钟，因为他担心专为他的到来而邀请的那两三个姑娘可能会转眼就不见了。的确，我对查诺没有丝毫好感地评价。鉴于我对他的试探和关于墨索里尼现有的德国情人的暗地里的消息，我在报告结束时说，‘若是派十几名漂亮的女演员到罗马来，那将会比派一群外交官和一群飞机来有更大作用。如果查诺这个样子竟能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国务卿的话，那么就标志着我完全失去对男人的判断力。’”

鉴于肯尼迪本人以及他的儿子们的品德，这是一份有趣的报告。与此同时，多年来肯尼迪为讨好美国天主教重要人物所付出的努力如今终于有了回报。红衣主教帕切利在布朗克斯维尔时拜访过肯尼迪一家。作为新的教皇，帕切利私下召见了他们，据杰克说，他甚至还授予肯尼迪‘教皇爵士’的荣誉：这一荣誉就像纳粹授予查尔斯·林登堡‘德国鹰骑士’一样了不起，如果罗斯福知道，他一定会大发雷霆。”

不过，对任何事情杰克都爱开玩笑。“我刚刚从罗马回来，我们在那儿过得痛快极了。帕切利现在正傲气冲天，所以你见到他时对他卑躬屈膝才会有好日子过。”他拿比林斯开玩笑时说，“泰迪从他那里领了第一份圣餐，这是过去两百年来首次有教皇这么做。有一次他在私下里做弥撒时向爸爸和我以及尤妮斯发了圣餐，总之，当时场面非常感人。”杰克还告诉比林

斯说，“加拉齐被委派去陪同爸爸代表美国出席教皇加冕典礼，而爸爸要求让你陪同，所以对于你的名字他有了更深印象。他们想授予爸爸公爵称号，这一称号将会是世袭的，可以传给家族的所有成员，并且将使我成为布朗克斯维尔的约翰公爵。如果你经常围着我说一些奉承讨好的话，我可能也会封你为爵士。不过，”杰克指出，“爸爸并不打算接受这一称号。”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约瑟夫·肯尼迪所坚持的那套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尽管欧洲局势日趋紧张，但我决定在罗马多呆两天。”肯尼迪后来解释说，“我的儿子特迪将从教皇那里领第一份圣餐，我不想让他错过这一机会。”不过，因为她与罗丝在巴黎的裁缝已经事先约定好了，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罗马。1939年3月15日晚，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布拉格，美国最后下令要求肯尼迪回到大使岗位。

据谣传，在圣诞节时，罗斯福再次表示希望肯尼迪担任商务部长的职务，但被肯尼迪谢绝了，并对外宣称他同张伯伦的关系对于世界的和平太重要了。假如果真如此，那么罗斯福并未对张伯伦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留下什么印象。张伯伦首相在下议院发表的讲话中否认英国将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安全问题做出任何保证。在提到张伯伦的这一讲话时，罗斯福曾在电话中对布利特说：“我看了一些晚报，上面的题目是‘张伯伦拒绝承担责任’。你听说过一个拒绝承担责任的名人吗？”

随着张伯伦声誉的降低，肯尼迪的名声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糟。这位大使现在终于认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大家都认为战争在今年结束之前是不可避免会爆发的。虽然爸爸也这样认为，但我个人并不这么看。”1939年3月23日杰克在写给比林斯的一封信的附言中说。

肯尼迪传

爸爸的观点是对的，不过杰克正在伦敦放纵地享受生活，根本顾不上这些。“我过得非常痛快……没有干什么事情，”他承认说，“我一直到处在玩，身穿长燕尾服、头戴‘安东尼·艾登’式的黑色霍姆堡毡帽、胸佩白色的栀子花，有点像乔治·斯梯尔。”他郑重请求比林斯不要“讲任何关于”他父亲被教皇授予公爵头衔的事情：“千万不要讲，因为我认识到这将成为那种幽默感的一个绝妙开端。”与此同时，杰克准备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做点事情。“爸爸和我一起去了巴黎，并同‘美男’奥夫勒一起共进午餐。布利特建议我和他呆在一起，但我认为应该婉言谢绝。”杰克在信中写道。他不想被社交和公共活动束缚住，“我打算周五去利物浦观看一年一度的越野障碍赛马，然后周六和爸爸一起去巴黎，并将在那儿呆一个月——之后去俄国、波兰等，最后返回英国。”他仍然梦想着和比林斯一起去地中海避暑。“据说，沿着希腊海岸通过地中海一直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一路线航行是一种愉快的旅程，如果我能让麦卡杜对这次旅程感兴趣，同时你也能来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

但是，比林斯已经没钱了。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正打算去可口可乐公司工作，这使得杰克 1939 年 4 月 6 日从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又匆匆地给他写了一封简短有趣的信：

亲爱的柯克：

这封信是在一台旧式打字机上打的，所以并没有多大意义。刚刚我收到你的来信和那份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漂亮剪报。我很高兴地告诉你那是教皇认为我是个很不错的人而奖赏我的一条腰带。近来我工作十分辛苦，据可靠消息

说，如果你这个夏天不工作的话，我也不会工作——当然，只要它不会对你找到一份工作产生影响，因为一旦工作开始，你就得干下去。我认为过暑假的一种可悲方式就是和那些在路边摆摊出售过时的可乐的人一起展示才能。

自从上次写了一封长篇大论的信之后，杰克突然收到了“来自乔特中学的一封令人心烦的信，让我推举一名‘能继续发扬目前六年级传统’的男孩子。”“到目前为止，”杰克说，“我一直没有猜出来谁是这个大蠢货，但我正在努力地想。我要去瑞士滑雪一周，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杰克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玩乐，他越来越英国化，这便意味着他应该拼命地玩、拼命地工作和拼命地参加社交活动。“今天我和林登堡夫妇共进午餐，他俩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对夫妇。”杰克说，但他忘记了林登堡支持法西斯的思想。林登堡本人仍然相信希特勒要同法国和英国谋求和平，在聚会上他并未对杰克·肯尼迪或任何其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和夫人安妮一起“在一点钟来到美国大使馆出席午宴。那儿大概有40人，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令人最讨厌的家伙。”

不过，杰克被林登堡夫人吸引住了。“她的相片很难看，而实际上却非常可爱，漂亮极了。”杰克写道，“我住在大使馆里，过着富裕的生活。我和奥菲现在是最好的朋友，他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虽然我认为你听到这话时会有点不舒服。我只会在伦敦呆一两天，因为爸爸准备为英国女王及国王举行一个宴会，我打算回去参加这个宴会。然后，我想如果形势和现在依然一样的话，我就去波兰。”

肯尼迪传

我还没有确定这个夏天要做什么，但去希腊是个很好的建议，不过，你最好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你从事可口可乐工作的事情。还有“大公牛”布利特和往常一样友好，事实上他一直对我很不錯……教皇虽然实际上并没有提过你的名字，但我看得出来他很想念你。

奥菲刚刚打过电话找我，所以我想我必须准备好写一封信堵住他的嘴。

国王般的日子

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曾对张伯伦讲过：“请你记住，我获胜主要靠言论而不是靠武器。”这也许意味着人们有某种可以依靠的东西，即使是一根稻草。”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张伯伦向肯尼迪大使透露说，他之所以没有邀请达夫·库珀、邱吉尔和艾登参加内阁是因为害怕希特勒将这一行为视做是英国政府对好战分子的妥协。如今，张伯伦终于向世界宣布英国将保证波兰边境不受侵犯，并开始寻求缔结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以便牵制德国。然而，张伯伦对此并不抱真正的希望。在同肯尼迪的一次谈话中，他“打开一张地图来说明他围攻德国的策略。当我即将离开时，”肯尼迪回忆说，“他把地图折叠起来并且以嘲讽的口吻说，‘如果动作再不快一点，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就可能要使用一张新地图了。’”

张伯伦的嘲讽果然成了真。3月22日，希特勒侵略了立陶宛的梅梅尔港，4月5日又强令15至17岁的德国青年入伍。

1939年4月8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英国地中海舰队出击以阻止其可能对土耳其和希腊的入侵。杰克打算悠闲地航行至君士坦丁堡这一完美的度假计划不得不破灭。不过他还是决定按预定的安排前往法国的伊泽尔山谷，他从那儿给比林斯寄去了一张明信片，简要地概括说：“这里活动很多，既有滑雪，也有其他的。”

欧洲的战争正在一天天临近。不知是因为不愿意还是因为害怕解除肯尼迪的职务，罗斯福总统总是尽可能地绕开他来进行各种活动。这位大使不再被允许去发表任何演说，“只能谈谈花鸟树木之类无聊的话题”，肯尼迪愤愤不平地说。“在英国，公众对我的批评有逐渐高涨之势，”他后来承认，“不过我知道阿尔巴尼亚和布拉格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已造成很大地影响。由于英法的妥协，美国人对这些事件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但我本人仍不希望发动战争。”

历史学家威廉·考夫曼通过对两次大战期间美国外交官的行为进行研究总结出，肯尼迪的言论自由受到赫尔的严格限制，于是他“抓住每一次机会拼命发表自由言论”。他像个“天气预报员”一样，“在战争前几个月的沉寂日子里，他所做的一些报告前后极不一致，这使人们不得不用一些神秘的自然现象加以解释。”

相比之下，布利特大使清醒过来时已经比较晚了，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表面上的和平“实际上并不是取决于他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所做出的那种绥靖政策，而是取决于是否能够形成与德国相抗衡的一个强大的同盟组织。”布利特以前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在那里，他对斯大林和共产主义从心底里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作为一个生活舒适、讲究吃喝的法国

肯尼迪传

人，他热爱一切具有法国特色的东西。而他一旦发现希特勒像威胁俄国一样威胁法国，或者程度更深一步，他就会果断地采取行动，这是众所周知的。的确，对布利特深恶痛绝的约瑟夫·肯尼迪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指责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但杰克却喜欢布利特的风趣幽默，喜欢与他呆在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利特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人，”杰克向比林斯透露说，“我在那儿过着像国王一样优裕的生活，因为那儿只有我和奥菲以及大约 30 个佣人。”布利特还拿出了“在地窖里储藏了大约 10 桶慕尼黑啤酒，他总是试图将香槟灌进我的食管里，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杰克也为他父亲感到遗憾，因为极力反对实施绥靖政策的重要人物罗伯特·拉福莱特在美国强烈要求肯尼迪辞职。“拉福莱特因为没有人为他举行晚宴，所以一直对我很不满，”杰克评论说，“同一天，戈贝尔斯指责爸爸是反对德国的战争贩子，这使得拉福莱特提出的理由显得有些可笑。”

“我自从滑雪回来之后一直很忙，”杰克向比林斯报告说。他并不是指工作很忙，他在巴黎遇见了“一个过去常常和肯特公爵在一起的姑娘，她说自己是‘通过一些裙带关系使自己成为英国王室家庭里的一名成员的’。她有肯特公爵送给她的非常漂亮的贵重手饰，还有一颗尼泊尔土帮主送给她的红宝石。我不知道她想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杰克含糊其辞地说。不过他显然希望她能从自己那儿获得进一步的裙带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比不上与王室建立的关系，“与此同时，我觉得生活非常有趣。”

以上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现在谈严肃的话题，我刚刚

听了希特勒发表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他讲得很糟糕，不过现在做出评价还太早。”杰克从安茹街报告说。他指的讲话是希特勒最近向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要求将自由城市但泽“归还”德国。由于事先就预料到德国会提出这种无礼要求，苏联外长建议成立一个包括英国、法国、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在内的六国和平同盟，在德国周围组建一个防御包围圈。在英国议会上，邱吉尔要求张伯伦接受苏联的建议，但是张伯伦坚决反对与俄国签订协议，而且还对组建欧洲同盟的想法也不赞成。

“连续两周以来，有关建立‘和平阵线’组成的谈判，似乎前景很好。”杰克在给比林斯写的信中说道。但是，最终由于张伯伦反对建立同盟，再加上希特勒对但泽重新发出警告，局势又开始紧张动荡起来。杰克写道：

当前局势错综复杂，难以进行预计。比如说，如果试图让俄国进入和平战线，就得允许俄国带来援助部队，以防德国入侵波兰或罗马尼亚。但是，波兰和罗马尼亚自己又组成了一个对付俄国的防御联盟，因为他们害怕俄国像害怕德国一样，俄国也一向渴望获得这两国的领土，他们认为，如果俄国军队来了，就无法使其离开。令局势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德国备有齐格菲防线，三分之一的德军就能牵制住全部法军，德国可以用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军队入侵但泽或罗马尼亚。英国舰队能做些什么呢？所以，除非先处理好联盟内部的矛盾，否则和平阵线就根本无法建立。不过，令人受到鼓舞的事情是，如果希特勒想要动手，那么在一个月之前当英国和波兰尚未签约时他就应该

肯尼迪传

动手了。但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说明他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认为情况会有好转。整个形势的发展非常曲折，如果这封信不是通过德国轮船不莱梅号带走，如果不是担心他们打开邮件进行检查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过，这并没有减少杰克在信的附言中描述肯特公爵的情妇的香烟盒：“上面画着伸开双腿躺在床上的白雪公主和手握生殖器与她准备做爱的七个小矮人的画像。这幅图画非常迷人。”

后来，当不莱梅号轮船上的邮件检查员辨认杰克·肯尼迪的笔迹之时，杰克已经去了东欧和但泽地区。“我现在已经到了华沙，”杰克 1939 年 5 月给比林斯寄过去的信中说：

上周在华沙我一直和比德尔大使一起生活，这里非常有趣，而且我还在但泽呆了一两天。但泽已完全被纳粹化，对希特勒的欢呼拥护声此起彼伏。我与那儿的一些纳粹领导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过交谈。那里的形势目前错综复杂，大致情况是这样：

首先，但泽走廊和但泽问题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但泽和但泽走廊都必须归还给德国。如果这样的话，波兰就完全与大海失去了联系。

如果波兰人把但泽给德国……那么德国人就能掌握波兰贸易，就像他们可以凭借武力牢牢控制格丁尼亚，吓得所有的犹太商人不得不通过但泽才能进行贸易一样。然而，除了金钱和欠账的因素之外——这些只是次要的——

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德国人根本不会注意波兰的贸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明确地告诉我，波兰最好的出路是与德国结成联盟。

这与大革命时期拿破仑的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波兰决定不放弃但泽，而且可以将以下的话看做是波兰的正式表态：她既不会放弃但泽地区，也不会让德国拥有在但泽走廊上修筑公路的特权。她会表示妥协，但决不会放弃自己的领土。如果德国一定要打仗，那么他要做的就是试图使波兰变换角色成为侵略者，然后开始进攻。波兰拥有 400 万高素质的士兵，不过装备条件很差。可是，波兰的道路很糟而且战争爆发时可能被毁，这将使德国无法发挥其机械化优势，而且它需要进攻的兵力是防御兵力的 1.5 至 2 倍。但是请记住，法国无法帮助波兰对付德军，因为自己的西部有德国的齐格菲防线，英国的舰队也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波兰将会孤军作战。不过他们的意志十分顽强，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援助，他们都愿意为但泽而战——因为他们首先将这次反抗视作一种象征，其次视作在这种局势下立足的基本原则。

“整个形势目前错综复杂——但如果希特勒能顺利得到领土，我想他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位 22 岁的年轻人预测说。但他不知道希特勒早就拟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因为现在希特勒已经得到了很多领土，所以他能很容易地取得别人信任。然而，如果激进派和里宾特罗甫能够最终获胜，那么希

肯尼迪传

特勒也许会在六周之后入侵但泽。看看结果到底如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幅用墨水画出的地图概括了杰克所说的话。“德国舰队可能会炸掉格丁尼亚，而来自赫尔的波兰炮击将会炸毁但泽。部队将从德国及东普鲁士进入，然后把波兰与大海的联系切断，这只是粗略的介绍。”杰克表示歉意说，“要把所有发生的情况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了解到是怎么回事。建议你去看一下比尔的著作《波兰——欧洲门户》。不同的是，波兰人与捷克人不同，他们会坚持战斗到底的。”

即使在整个欧洲都处于灾难的边缘，杰克的享乐爱好也丝毫没有改变。“除政治之外，我一直过得非常痛快，”他向比林斯透露说，“美国驻波兰大使的夫人——比德尔夫人昨晚为我举办了一个欢迎晚会，虽然波兰姑娘不是很热情，但我还是玩得相当愉快。这里确实非常有趣，人们行礼的时候要屈身单脚后退，仆人头戴白色假发。此地的贵族拥有 100000 英亩的庞大庄园，还有约 1000 个农民。你如果夏天能够到这儿来，我们可以去拜见比德尔夫妇，他租了一个约有 12000 个农民的庄园。庄园里佃农一只手摘下帽子打招呼，另一只手却急忙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外人。”杰克在讲完这一有趣的情形之后补充说，“我明天要去俄国。最后，我认识了一位离婚的罗马尼亚公主——先说到这里，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暂时保守秘密，等与你见面时再详细告诉你。”

灾 难

杰克·肯尼迪在战争前夕仍然在欧洲进行了一次匆忙的旅

游，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离婚者、王室的情妇、地主、王妃以及几乎是具有法国革命前夕特点的初入社交圈的青年女子。他思考着：“我打算先去列宁格勒，然后去基辅、莫斯科、布加勒斯特，之后我计划去土耳其，随后到布拉格、维也纳和柏林，我必须在6月22日之前回到家，参加尤妮斯初入社交圈的庆祝舞会。”

虽然杰克对他的父亲一直忠心耿耿，但他亲眼目睹了国际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与波兰和但泽丝毫没有关系。在克莱夫登，肯尼迪大使曾满含热泪自豪地向集中在那里的一批绥靖主义者、政客和上层社会的名流们宣读他的长子从已经被战争破坏的西班牙寄来的信件。肯尼迪表示，如果他的新闻秘书编辑和出版小乔的信件，他将帮助其子女念完大学。他甚至要求他的传记编写人詹姆斯·兰迪斯将这些信件中一些又蠢又长的话写进他那永远都没有公布的回忆录里。但随着欧洲缓缓地切入希特勒的全面战争，公众对小乔从西班牙寄来的中小生式的信件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肯尼迪大使将其作为张伯伦的知己的表现所做出的自我掩饰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肯定。

同时，杰克也从俄国、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中东寄来了自己的汇报。肯尼迪大使认为这些信件并不值得在阿斯特勋爵的克莱夫登住宅里向大家公布。不过据在1959年为杰克的竞选运动大肆宣传时读过这些信件的詹姆斯·麦格雷戈尔·伯恩教授说，虽然当时杰克年轻体弱，但正是这些汇报成为最好的现场报道。

1939年初夏，英国议会正在讨论关于巴勒斯坦的未来划分的问题时，杰克从耶路撒冷寄来的一封信至今还保存在杰克个人的珍贵收藏里。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它说明了杰克

肯尼迪传

已经逐渐变得成熟，并能对世界局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判断。

“敬爱的爸爸，”杰克写道，“我想趁我现在对巴勒斯坦的印象还比较深刻之际写信告诉你，尽管您毫无疑问了解‘整个’情况，而我只了解犹太人的情况。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杰克简要地描述了巴勒斯坦在大战前的状况，“这里居住着穆斯林教的忠实信徒阿拉伯人，还有一些零零落落的基督教教徒。过去这里也有数千名犹太人，不过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尚未达到规模。”然而，这种稳定的格局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英国政府既希望获得犹太人支持，又希望获得阿拉伯人支持，于是向双方都做出了承诺，一项是支持麦克马洪宣言的观点，另一项是通过鲍尔弗宣言做出的承诺……目前考虑整个问题，讨论哪一方的要求“更加公正和公平”是毫无意义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提供一项在这两种含糊其辞、相互矛盾的承诺之间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强烈抗议“白皮书”的原因。

英国政府关于如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在理论上制定了一项很好的解决措施”，杰克说，“但是它没有可行性。”

杰克一一列举了过去几年里英国政府成立的委员会和召开的会议，以及为实现在英国统一控制之下的分治所作的种种努力。然而，犹太人集团和阿拉伯人集团在公开支持的背后“从根本上都表示反对，这一点虽然没有公开过，但它更为重要。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应该获得全部统治，把耶路撒冷作

为这一富饶国度的新首都，并拥有在外约旦地区开拓殖民地的特权。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机会，他们就能像在西部所做的那样，开发和耕种这片土地。”

然而，阿拉伯人对这项提议表示强烈抗议，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已经获得了首都的有利条件，假如阿拉伯人获得这一好处，他们也能创造同样的奇迹。”杰克自己也讲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阿拉伯人发展农业的结构，依靠住在国外地主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同犹太人竞争的。”这一事实证明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大多数理由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已经意识到犹太人的优势并且害怕这种优势。”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的宗教领袖正流亡海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因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相比势力较弱。

“我认为完全依照该白皮书的内容来制定英国政策是不合适的。”杰克最后说。它“听起来确实是公平和公正的”，但是

必要的和重要的并不在于制定一项公正和公平的理论措施，而是在于制定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

由于英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必须而且理所当然地要得到保护……所以我认为，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这个国家分治，让它们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政府，彼此之间互不干涉，并维护英国的利益。耶路撒冷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应当独立。虽然这是一项很难执行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只有它才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按照这个建议，对巴勒斯坦进行分治这一问题产生了各种

肯尼迪传

各样的猜测。不过，欧洲战争的逼近无疑使英国开始担忧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因此，尽管这里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英国仍然小心谨慎。“昨晚我呆在那儿时发生了 13 起爆炸事件，都是在犹太人地区发生的，而且都是由犹太人干的。”杰克告诉他的父亲说，“顺便说一下，在那儿我比以前的亲英思想更强烈，因为我认为那些现场的英国人干得很出色。以上只是粗略地——事实上也是非常粗略地——概述了局势。观察局势的发展以及猜测它将以何种方式获得解决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迄今为止尚未确定一项明确的解决方案。我原以为但泽是个麻烦的问题，但我从未见到过有哪两个集团要比这两个集团更不愿意同心协力制定一项成功的解决方案。”

“在现场的英国人似乎都同情阿拉伯人”，杰克报告说。部分原因是由于“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某些领袖——一直采取一种毫不妥协、傲慢自大地态度。”但也有其它原因：即“毕竟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几百年来一直属于阿拉伯人，因此他们流露出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毕竟失去巴勒斯坦对英国而言几乎算不上什么损失”，因为英国只是在 1916 年同土耳其人交战获胜后才对该地区实行统治的，而且国际联盟的委托统治权仅从 1922 年才开始的。

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集团各自的内部又出现分裂，就使得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年老正统的犹太人群体十分肯定地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他们希望拥有一个支持这种态度的政府；而由比较年轻的犹太人组成的犹太人群体则担心这些传统分子，他们更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而且近乎是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夹在这两者之间愿意做出妥协的中间派……至于阿拉伯人，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极其痛恨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破坏的这些理由，但穆夫提因为其宗教吸引力和新的民族主义者的努力而形成的统治权十分强大，所以要想不经他同意就确定一项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穆夫提回来了，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那份英国白皮书上写着“要求过渡期间阿拉伯官员须由英国政府任命”，最糟糕的是穆夫提不在被任命者之列。“根据这个国家的一般标准”，即使议会被选出来也会“自然地成为闹剧”。“这是使整个问题变得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杰克解释说，“三方都拥有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相互冲突的巨大利益，而且三方政府都拥有施加压力的理由。可怜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他指的是那位曾准备起草议会报告的前英国首相。

杰克指出，“理论上是公平和公正的解决方案”正在逐步“走向失败”。这一方案一旦失败，杰克认为，英国就会“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竭尽全力，然后强迫双方接受分治这项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英国九年之后企图要做的事情，不过遇到了困难，因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反对”强行分治计划，从而导致了中东几十年来一直连续的动荡局势、恐怖活动和种族仇恨。

然而就在同时，杰克因“身穿一套日常西服而不是长燕尾服出席英国高级专员”为庆祝乔治六世国王6月8日寿辰“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使传统的英国人非常地不习惯。之后，他给父亲匆匆地写信说，他准备“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途经

肯尼迪传

贝鲁特、大马士革、黎巴嫩和雅典返回伦敦。不过，通过比较他发现那些地方的局势甚至更加混乱。

“我做了一次很有必要的旅行。想真正了解当前局势的惟一方式就是到所有的这些国家亲自去考察。我仍然认为今年不会爆发战争，”他向比林斯写信说，“依据就是意大利并不愿打仗，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不过8月20日至9月8日将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很多人预计在这段日子里将会爆发战争。德国试图逐步吞并但泽，使得波兰的独立正在受到威胁。但我认为德国的阴谋不会得逞。”

时间会说明一切。当普通英国人在他们的后院里挖防空洞的时候，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物和美国大使却仍在为他们的女儿举办最后的舞会。尤妮斯首次进入社交界时身穿“一件帕坎牌桃色连衣裙”。罗丝·肯尼迪在她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大约两点半，大家都开始跳一种新编出来的舞蹈——‘大苹果’舞，而且每个人都很开心。我感到很奇怪，甚至有点震惊。不过一些陪同少女前来的年长女伴使我确定，这次舞会获得了巨大成功……马尔伯勒公爵曾问过他是否可以前来参加，通常做父亲的是不参加女儿初入社交界的舞会的。不过他是‘大苹果’舞的领舞人物之一。”

杰克白天穿着平常地礼服在大使馆帮助他的父亲工作，晚上则穿着燕尾服参加社交聚会，他过得相当开心，特别是当他的哈佛室友托伯特·麦克唐纳来英国的时候。麦克唐纳是作为学校的一名短跑运动员随体育运动队一起来英国的。麦克唐纳到来后爱上了杰克的妹妹凯思琳，因此，他非常希望给肯尼迪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因此当杰克、凯思琳以及肯尼迪大使一起在伦敦西部的怀特市观看比赛时，麦克唐纳的紧张心情是可以

想像的。“杰克曾指出，我几乎赢得了我想赢得的一切东西。”麦克唐纳后来在形容那个特殊时刻时说：

比赛是在很糟糕的跑道上展开的……在哈佛，你可以跑直线 220 米。而在怀特市，你得站在错开的跑道位置上起跑……我不幸选中了最外侧的那条跑道。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弯道之前我可以领先最近的人十码的距离。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跑；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跑过弯道，离开弯道之前我觉得自己远远跑在别人前面，但过了弯道后突然发现自己落后每个人约十码的距离。我努力地跑，因为我要向大使和姬克以及每个人展示自己的实力。我记得赶上了不少距离，但结果仍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三。这种结果令我感到难堪，因为杰克以及全家人都来观看这次比赛。

杰克却觉得很有趣。“托比在运动会上得了第三名，”他立即向比林斯报告说，“而且他看起来有点羞愧。大比尔·比歇尔到这里来了，我和他到布莱尼姆见过马尔伯勒公爵的女儿在社交界的首次露面。布莱尼姆和凡尔赛在面积上差不多。你没上这儿来真是太遗憾了，因为现在这里非常有趣——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杰克真的好久没这么开心了。他现在不仅成为英国显赫家庭、甚至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的客人，并出席了 1939 年 6 月 27 日在官邸举办的一次盛大招待会，而且还享有可以拆阅甚至起草父亲的信件、电报和报告以及战争前夕接待英国政治人物的特权。

总之，杰克是个言行谨慎的聪明人而不是个自以为是的蠢

肯尼迪传

人。哈莱克勋爵的儿子戴维·奥姆斯比—戈尔这种英国人并不了解杰克对国际政治的迷恋程度。“我经常看到他参加各种聚会以及在家里和家人呆在一起。”奥姆斯比—戈尔后来回忆时说，“他过得非常快活。他虽然很瘦，但很坚韧，并看得出——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他——精力充沛。他严肃的一面我见得并不多。的确，那个时候——噢，当然，他只有 21 岁，我和他年纪相仿——我们也许在当时谁也没有让别人看到过自己很严肃的一面。”

不过回想起来，甚至连奥姆斯比—戈尔也肯定，杰克一定有更为严肃的一面很少让别人看到，这一点他在社交聚会上从未显露出来。奥姆斯比—戈尔后来说，“虽然他对国际政治和当前局势肯定比我想像中的更感兴趣，但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因为当时他正忙着准备自己的事情——那是一篇比通常论文还要长一些的论文。”

杰克实际上已经在与他的政治导师霍珀教授的书信往来中确定了他来年要在哈佛撰写的论文题目，而他的那些英国朋友对此并不知晓。霍珀曾建议杰克在离校期间阅读《政治哲学史》，马克西的《政治》、李普曼的《良好社会》和科克尔的《近代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选读》，但他对杰克的那些描述了当代欧洲的信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半个学期肯尼迪选修了六门课，”霍珀在杰克的哈佛的选课记录上提到，“他计划在下半个学期去欧洲旅行期间按照我为他制定的阅读计划来学习。我一直与他针对搜集论文材料的问题进行讨论，我很想明年还辅导他。”

霍珀已看出杰克具有调查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的特殊机会。英国是如何使自己陷入这种困境的？为什么绥靖政策没能够阻

止希特勒的步伐？英国曾作为具备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国家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它对这次战争这样狼狈不堪？内维尔·张伯伦坚持绥靖政策背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

杰克因为越来越多地思考他的论文，而且趁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又进行了最后一次欧洲大陆的考察。“我们从英国启程到法国、意大利、德国，然后去巴黎。”托比·麦克唐纳后来回忆说。在慕尼黑的时候，他们在霍夫布劳豪斯碰见了“奇才”怀特。以前杰克见过他，那是春季的时候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颁奖聚会上。怀特高 6 英尺 2 英寸，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优秀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我们三人一起相处得不错，所以我们决定参观一下这座城市。”麦克唐纳记录说，“‘奇才’怀特从别人那里借了一辆车，我们坐上车并从一座纪念啤酒酒店英雄沃斯特·黑泽尔的纪念碑旁经过，我们下车看了看。有人点燃火把并开始叫喊，说实话，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沃斯特·黑泽尔是谁。”

据麦克唐纳回忆，在离开英国之前这几名学生已被多次警告不要惹事生非。“我很清楚地记得大使说过——他把我俩叫去并且说——在德国期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招惹任何麻烦，要尽力去避开麻烦……他说他们非常野蛮，而且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和制度。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迅速躲开。”

可是这几名美国学生没有听从大使的警告，错误地将车停了下来，于是德国的冲锋队员开始对我们“粗鲁”起来。“我们被呵叱回去，他们开始朝我们的汽车扔砖头。我们只好把车暂时开走。我很奇怪地对杰克说，‘他们究竟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什么事也没干，我们既没有招惹他们，也没

肯尼迪传

有做任何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奇才’怀特解释说，因为我们驾驶的汽车是英国车牌，他们非常痛恨英国人，所以才向我们的汽车扔石头！而且我第一次听到杰克说：‘你知道，如果这就是德国人对别人的感情，那么我们怎么能躲过一场世界大战呢？’”

在哈佛，霍尔库姆教授曾经坚持要求他的学生回答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性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屈服？1939年夏在慕尼黑时，杰克意识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即宣传的效果。“纳粹德国正在迅速地使本国人民对英国人产生强烈的仇恨。”杰克给他的父亲写信说。当怀特的德国朋友一个个地被强征入伍时，他越来越肯定将会爆发战争。“南方的德国人待人十分友好很容易吸引别人，”怀特后来说，“但如果爆发战争，毫无疑问他们同样会为德国而战。”

托比和杰克1939年8月回到巴黎后租了一辆车，计划开车前往法国南部，因为杰克一家正住在那儿附近的一套租来的别墅里。麦克唐纳回忆说：

我们租的是一辆开起来就摇摇晃晃的破汽车，没办法我们不得不挤在狭窄的座位上，驱车前往度假的好地方里维埃拉去参加一个聚会。租车给我们的那个人一定可以看出我们是没有租车经验的学生，因为这辆车实在很破，一直摇晃，而且总是向右颠簸。杰克并不是个开车很小心的人，他驾着车，突然车身倾斜，无法控制，我们冲破了马路右边的路基，车顶朝下向前滑行了大约30英尺，结果行李撒了一地，一片狼藉。在车祸发生之后我们谁也没说什么，准确地说，当我们两个人的脑袋朝下倒在翻过

来的车中时，杰克斜着眼看了看我，并漫不经心地说：“哎，老兄，我们又失败了，对吗？”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地抵达了目的地，并且幸运地发现了妹妹凯思琳——罗丝·肯尼迪坚持要将她“放逐”到英国之外的地方，以阻止她出席哈廷顿勋爵的成年社交聚会。哈廷顿勋爵是德文郡公爵爵位的继承人，也是姬克最近新交的男友。有关俩人已经订婚的消息正在到处传播。

杰克虽然对凯思琳最好的朋友及客人萨莉·诺顿“一见钟情”，但这只是杰克的一厢情愿。由于凯思琳逐渐对麦克唐纳冷淡下来，于是，这两个男孩决定离开这里，再次去德国。“8月12日，杰克和托比·麦克唐纳启程再次前往德国。”罗丝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们计划去布拉格，但我们已经被告知任何人都不能到那儿去。”

但是杰克毫无畏惧，他从被纳粹吞并的维也纳写信告诉他父亲说，他已经“于昨晚从慕尼黑出发抵达维也纳。在慕尼黑我们住了一天，并看到了坦豪瑟尔。我现在正犹豫是否还要去布拉格，今晚不是去那儿就是去柏林，托比已经去了布达佩斯。”

“这里没有火车奔驰，没有飞机航行，也没有任何边境中转站。”一位傲慢的美国外交官员在回忆中说，“然而，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我们收到了来自伦敦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意思是说我们的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选择这个时候派遣他的一个小儿子去欧洲各地进行一次实际调查旅行，而且让我们设法帮助他越过边境并顺利通过德国防线，以便他能将布拉格纳入其旅行计划之中……收到电报后我们感到非常生气。乔·肯

肯尼迪传

尼迪根本不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因此我们许多人——由于听说关于他的许多情况——从心底里就对他的要求不愿理睬。他的儿子没有官方职务，在我们的眼里他显然是个自以为是的人，也是个浑噩幼稚之辈。”

杰克对国务院的态度根本不予理睬，他尽可能地在布拉格多拜访一些人，然后又动身去了柏林。1939年8月20日，他在德国首都给比林斯写信说，他“已于一周之前离开戛纳，然后一直在德国旅行。在慕尼黑遇见了利皮特和巴特勒，以及大埃迪·霍布勒——他和以前一样看起来是个傻乎乎的普通农夫”，杰克带着自己的眼光说道，“我知道他是‘我们’班里最受好评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同学我感到很荣幸。我记得那个相册上还有我的照片，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地方，翻阅这个相册的每个人好像都曾说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普林斯顿非常大——我以前从未见过那个混蛋。’”他嘲笑说，“我已经决定13号乘坐‘曼哈顿’号回国，我本想去科德角呆段时间，或者去南方的夏洛特等等。如果真的去南方，我会顺路去看你。但是，如果你能够设法去科德角的话……不过我认为那些日子都已经成为历史了。”杰克突然不说了，他想起了比林斯将要成为一名可口可乐公司的雇员，开始新的生活。

最近杰克购买了一部德国新生产的摄影机和一台放影机，“以便我们有时间来拍摄彩色特写镜头。还要顺便说一下，在德国吃了一周的饭后，我这张脸如果拍成彩色照将会引起巨大轰动……我仍然认为战争不会爆发，但局势看起来很不乐观，因为德国人在国内做得很过分，利用宣传但泽和但泽走廊的机会大做文章，他们很难放弃自己的主张。英国这次态度似乎很坚定——但由于这里尚未完全认识到英国的这一态度，因此目

前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德国希望慕尼黑的绥靖政策会再次重演，一旦张伯伦拒绝让步，他们就更有理由爆发战争。”

尽管美国驻欧洲的初级外交官们对此非常重视，但杰克·肯尼迪已经了解了一定程度上战争的边缘政策是什么样的，这种政策直到肯尼迪本人成为美国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时才再次被使用。杰克从埃克塞尔宾馆前往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收听了最后一次情况介绍，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亚历克斯·柯克交给他一份带给他父亲的秘密文件：即一周之内将会爆发战争。然后杰克回到了英国。当杰克再次看到柏林时，柏林将会是一片废墟，这座被彻底毁灭的城市表明了德国人为其在 1939 年的傲慢自大而付出了沉重代价。